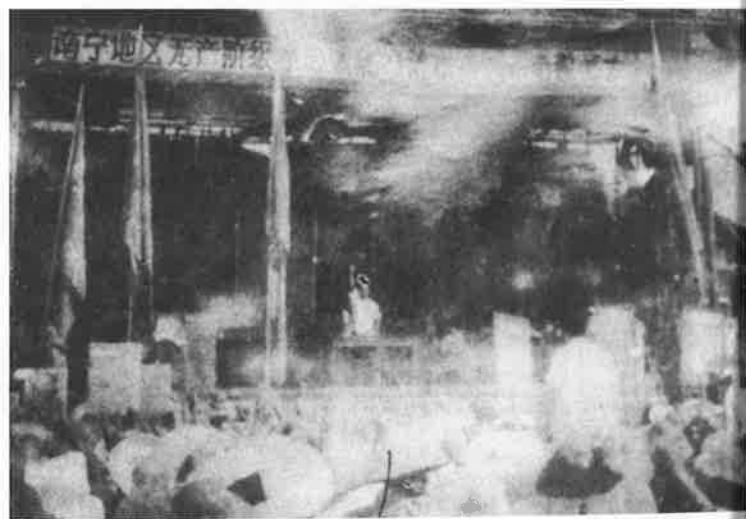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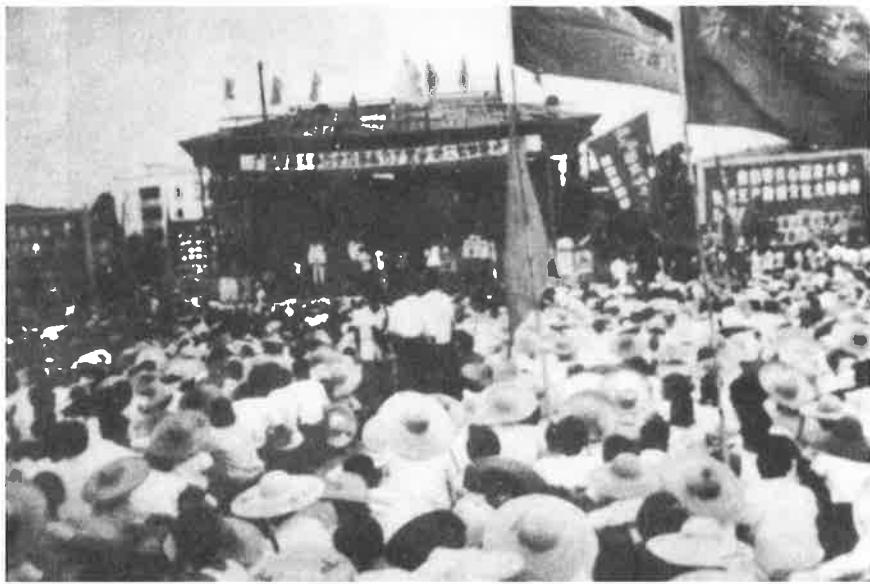




1967年6月13日，南寧市第一中學發生大規模武鬥，事件持續到6月15日上午結束，從此拉開了廣西文革兩大派系大規模武鬥的序幕。



1967年7月，
南寧地區“聯
指”派召開所
謂“痛打落水
狗劉少奇誓師
大會”。



1967年8月1日，廣西“聯指”派把賀希明、霍泛從北京押到南寧批鬥。次日又對其進行“游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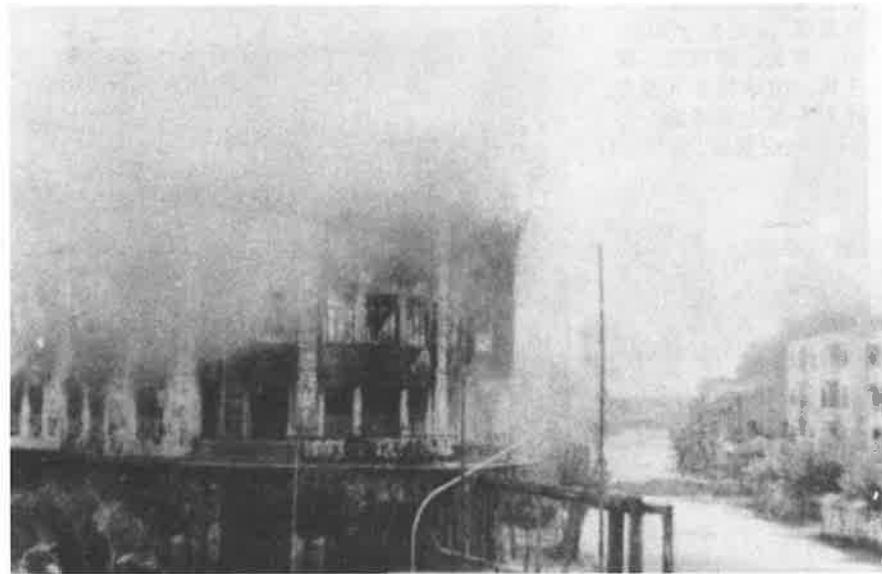


1968年1月間，在自治區體育館和區人民委員會禮堂批鬥所謂“伍修集團”。之後，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等人被押送到全區七個專區，四個市和32個縣“游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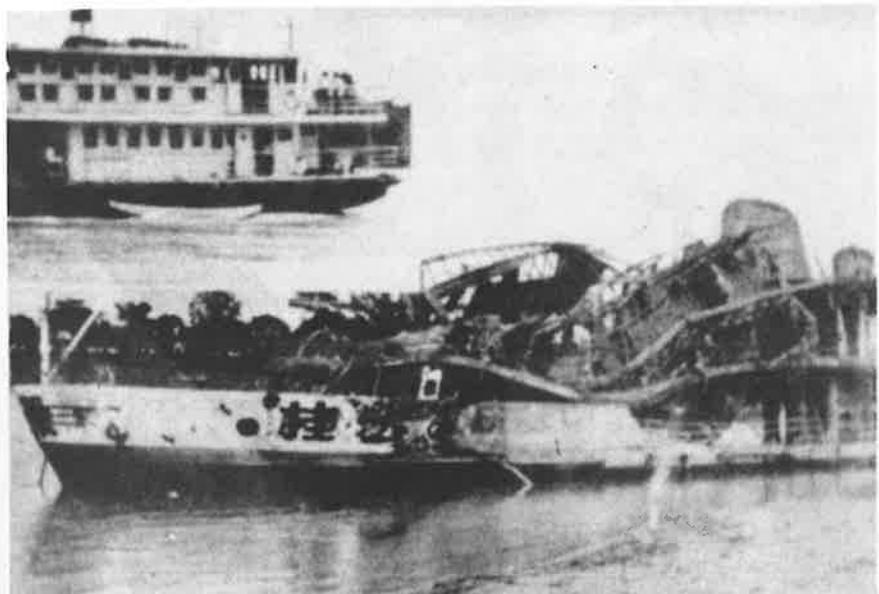
1968年7月15日，自治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在區體育場召開“誓死捍衛《‘七三’布告》大會”。



1968年7月17日，廣西“聯指”派桂劇院據點向“4·22”派百貨大樓據點開炮。大樓第三層被炮擊後起火燃燒。



1968年7月18日兩派武鬥持續，解放路與新華街交界處幾十家商店被燒；滅資路（民生路）銀行、三合館、朝陽百貨大樓與上國街、自強路多處民房起火。



“4·22”航運“工總”據守的“桂宏號”等船隻被“聯指”火炮擊中。



1968年7月17日，“聯指”與“4·22”兩派相互投擲汽油燃燒瓶，致街道起火。

1968年7月31日，“聯指”圍攻“4·22”展覽館據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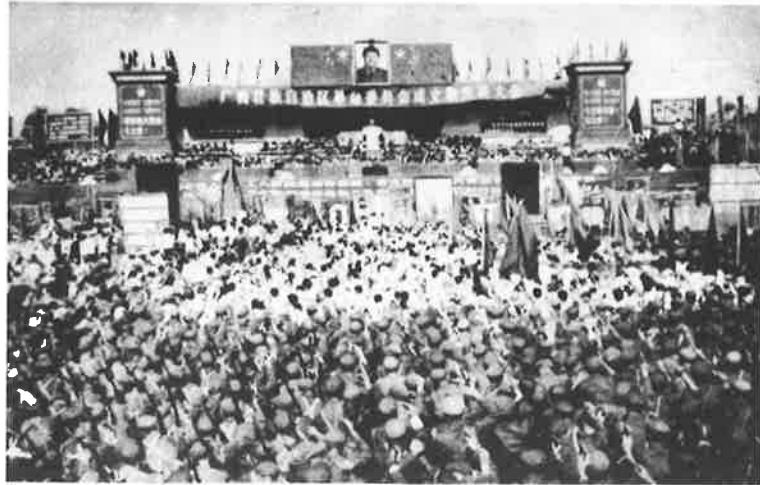


1968年8月1日，
“聯指”圍殲
“4·22”展覽館據
點結束，圖為“4·
22”被俘人員。



1968年8月5日，
“4·22”控制的解
放路被“聯指”攻
占以後，“4·22”
人員被抓，一部分
人員被當場槍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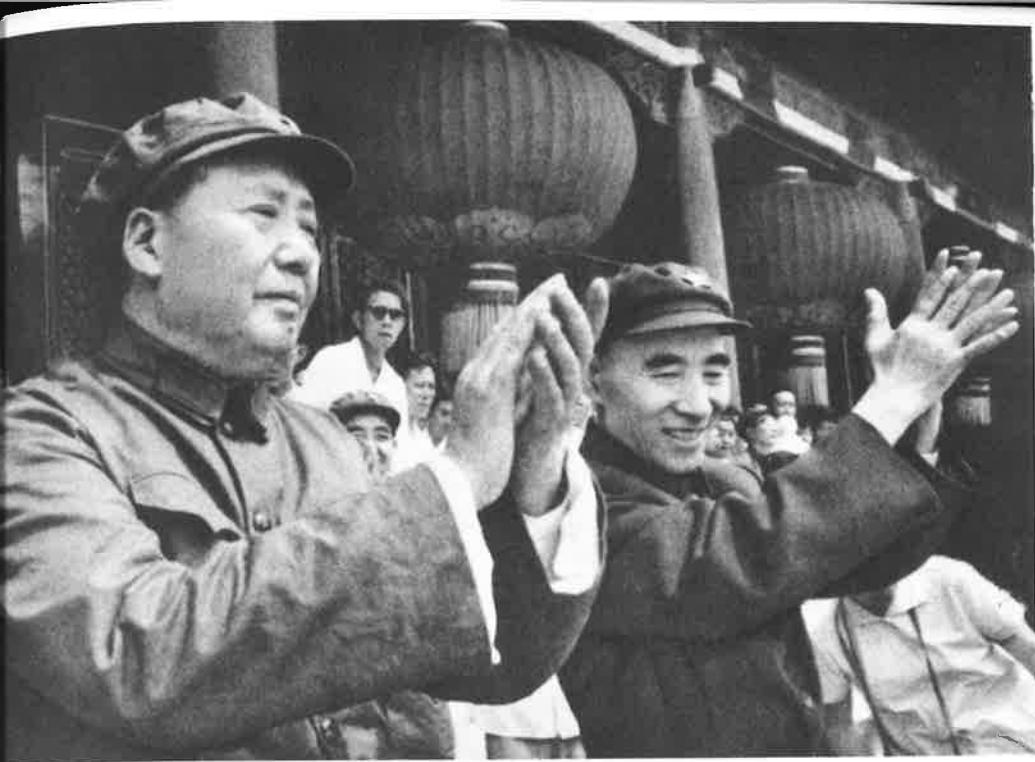


1968年8月26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



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時舉行游行慶祝。





1968年8月18日，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親自接見百萬參與文革的群衆。





廣西文革痛史鉤沉

A PAINFUL HISTORY:
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XI PROVINCE

曉明著



書名：廣西文革痛史鉤沉
作者：曉明
封底照片：作者提供
封面設計：Renee Chiang
出版社：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
聯絡方式：editors@newcenturymc.com
國際統一書號：978-988-99420-2-1
定價：港幣88圓

第二版香港印刷2013年
第一版香港印刷2006年

版權聲明

沒有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的書面同意，本書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在任何媒介中複製或傳播。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English Title: A Painful History:Cultural Revolution in Guangxi Province
Author: Xiao Ming
Photos: Courtesy of the author
Design, Layout & Production: Renee Chiang
Publisher: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editors@newcenturymc.com
ISBN: 978-988-99420-2-1
Price: HK \$88

Second edition, printed in Hong Kong, 2013.

First printed in Hong Kong, 2006.

Copyright ©2013 by New Century Media & Consulting Co. Ltd, Hong Kong.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hatsoever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目錄

第一輯

- 不應遺忘的歷史——論文革中的廣西大屠殺 1

第二輯 廣西文革列傳

引子.....	47
第一回 山雨欲來驚天動地 神州大地黑雲翻滾	49
第二回 劉少奇派出工作隊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	53
第三回 紅色恐怖震驚世界 造反有理響遍全國	58
第四回 師院學生遭受圍攻 桂林老多威震廣西	62
第五回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各級領導膽顫心驚	70
第六回 韋國清桂林被遊鬥 伍晉南南寧發聲明	74
第七回 桂林老多護路立功 韋國清認錯交檢討	79
第八回 各地聯指尋釁滋事 四二二們四處求援	86
第九回 韋國清下令颶颶風 全廣西湧起殺人潮	93
第十回 尸橫遍野血流成河 挖肝吃肉前所未有	99
第十五回 十萬大山聯指剿匪 姑婆山四二二逃生	108
第十二回 圖謀權財施計奪妻 十八條命慘遭殺戮	114
第十三回 桂林聯指仗勢瘋狂 自衛反擊老多告捷	119
第十四回 美麗山城遭受重圍 桂林老多固守抵抗	125
第十五回 求自衛柳州奪軍列 為生存頑強守據點	132
第十六回 軍區下令全線出擊 南寧街頭屍橫遍地	136
第十七回 柳州四二二慘遭圍殲 凤山縣聯指深山剿匪	145
第十八回 桂林老多停戰繳槍 聯指趁機亂抓亂殺	151

第十九回 平樂聯指四處搜捕 可憐無辜慘遭殺戮	157
第二十回 武鬥前線多人戰死 後方報復殺人墊底	166
第二十一回 全廣西再起殺人潮 血淚中成立革委會	174
第二十二回 區革委下令大批鬥冤假錯案遍及廣西	183
第二十三回 清查運動又起狂潮 造反骨幹再次遭殃	188
第二十四回 批林批孔又批韋祖珍 桂林老多揭批八二〇	192
第二十五回 血淚控訴悲憤交集 殺人兇手逍遙法外	196
尾聲	201
附錄一：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 《“七·三”布告》	206
附錄二：《“八·三零”公告》	208

附文

永遠難忘的苦難歲月	215
後記	235
後記二	244
主要參考文獻和資料來源	248

謹以此書，
紀念
在那個瘋狂年代裏慘遭殺害的人們！



第一輯

不應遺忘的歷史 ——論文革中的廣西大屠殺



一、引言

被世人稱為十年浩劫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簡稱文革），是毛澤東在 1966 年春夏之交親自發動和領導的，至 1976 年 9 月隨著毛的去世和其後毛的餘黨江青、張春橋等“四人幫”的垮臺而結束的一場運動。這場為期十年的所謂運動，是中華民族史無前例的大災難、大悲劇，是一場革文明的命、革文化的命、革人民的命的歷史大慘劇。文革中的種種罪惡及其所造成的嚴重後果現在已為中國人民、也為世界各國人民所知曉和譴責，毛澤東這個獨裁者和迫害狂也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文革中的重災區廣西，發生在 1968 年的那場大屠殺及它的幕後策劃者、指揮者韋國清及其許許多多的殺人兇手則是許多人（特別是當今的青年人）所不知或知之甚少的。因此，當今的文革研究者、幸存者有責任、有義務來記述廣西文革中所發生的一切，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以教育後人，使我們的民族和國家永遠不致再發生類似文革的慘劇，這是一件十分重要而有意義的大事。

廣西為什麼會出現如此慘重的大屠殺，而且殺人手段是那麼的殘忍，殺人數量是如此之多，是全國其他地區少有的（湖南的道縣和邵陽地區也有與廣西類似的殺人慘案）。事件發生之後，執政者們為什麼長期不予處理，而且還千方百計地壓制和鎮壓敢於揭露大屠殺事件真相的人們。這一切無不使受難者家屬們無比的憤恨而又無可奈何。這個社會的公理何在呢？

筆者親歷了廣西“文革”運動的全過程，期間所發生的一切至今尤歷歷在目，許許多的鎮壓造反派和屠殺人民的事件常常縈繞在我的腦海中，使我不時沉浸在痛苦的回憶和思索之中……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為了使後來的人們瞭解當年廣西的文革運動，總結和反思這段歷史，筆者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近年來所收集

到的許多資料綜合整理分述如後。通過這些論述如果能夠對文革研究者們有所參考，對世人有所警示作用，就是筆者的希望所在了。

二、廣西兩派的形成和發展演變

在文革之初，全國所有的地方都無一例外地形成兩派鬥爭。這是因為毛澤東要利用群眾的力量來達到搞掉他的政敵劉少奇等人的目的，他要通過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文革派的人物，挑動群眾起來造劉少奇和他在各地代理人的反；而劉少奇和各地的當權者也必然要組織力量來保護自己。在這種背景下，出現兩派之鬥爭就是歷史的必然了。

1、廣西兩派之爭始于桂林

1966年的春天，當批判《海瑞罷官》、《三家村劄記》、《燕山夜話》的高潮在桂林出現時，桂林市各大、中學校的批判運動是在桂林市委和各學校黨委的領導下進行的。此時的人們不論開批判會還是聲討會，寫批判文章，基本上都是當時報刊上說過的話。在一些高等學校，如廣西師範學院（校址在桂林，簡稱廣西師院，即現在的廣西師範大學）也有結合本校的實際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但，這種批判也僅僅停留在大字報的形式而已，學校的一切秩序還是正常的。

隨著運動的深入，1966年6月14日，廣西區黨委按照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的指示，向全區各大專院校和文化部門、文藝團體、報社派出文革工作組，此時的形式則出現變化了。

工作組到學校後，即代行黨委的職權領導運動，旨在穩定學校的局勢。由於工作組在學校的許多規定使同學們不滿，加之北京不時有文革的信息傳來，同學們對工作組的不滿逐步表現出來了。恰在此時，廣西師院的少數學生寫出了《炮轟桂林市委》的大字報，這可震驚了工作組和桂林市委，也引起了廣西區黨委的警覺與重視。為此，工作組受市

委和區黨委的指示，對寫大字報的學生開展了調查，並在學校內組織大字報進行反擊，按照 1957 年反擊“右派”進攻的辦法，企圖把寫大字報的學生當“右派”打壓下去。離 1957 年的反右運動還不到十年，人們尚記憶猶新，那時的獨秀峰下“右派”據說就是“借共產黨整風之機猖狂向黨進攻的”，今天的“右派”竟敢“炮轟桂林市委”，這不是明目張膽地在向黨進攻嗎？

但此時的獨秀峰下卻出現了與 1957 年反右時相反的情景：1957 年大多數的師生聽從黨委的領導去反擊“右派”；而現時在廣西師院內參與反擊的人卻很少，多數人同情和支持那張“炮轟桂林市委”的大字報，反對工作組。運動一開始，反工作組、反本單位領導，甚至敢於“炮轟”上級黨委，是多數的學生所為，這就是廣西師院的“多數派”，也是後來“桂林老多”名稱的由來。這與全國其他地區一開始造反派總是少數是不相同的，也是廣西師院的特殊之處。

由於毛澤東 7 月底他回到北京後，表態支持反工作組一派，稱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北京和各地的工作組不得不陸續撤出學校。8 月 5 日，駐廣西師院的工作組也撤出學校，反工作組一派的學生當即貼出“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的對聯，致使某些領導人大為惱火，當即組織工人赤衛隊、幹部和另一部分學生來揪鬥當事者。8 月 7 日，開始是辯論，後來形成武鬥，打傷了十幾個學生，這就是轟動一時所謂桂林“八·七”事件。

8 月 10 日，反工作組一派的學生派出代表上北京告狀，要求改組桂林市委，要求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到桂林處理問題。8 月 13 日，韋國清就秘密到了桂林。

8 月 18 日，區黨委書記喬曉光代表區黨委到廣西師院召開全院師生大會，宣佈撤消桂林市委書記黃雲和副書記徐為楷的職務，任命王同連為新的市委書記。當喬曉光剛宣佈結束，一些同學馬上湧上會議主席臺，給徐為楷戴上高帽，押上汽車開到市區內遊街。一時間整個山城轟動了，這是桂林有史以來聞所未聞的大事件。當晚，韋國清即在桂林主

持會議，認為學生們的這種過火行為是“右派”翻天，決定組織工人赤衛隊、出動桂林步兵學校師生上街宣傳，以對付師院學生，並佈置桂林一些重要機關部門加強警衛。這一切部署的結果，適得其反，使對立情緒更為激化。

其後數天，街上隨處可見廣西師院的學生遭到赤衛隊和步校軍人及不明真相群眾的圍攻，這就是最初形式的群眾鬥群眾場面。

與此同時，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百萬師生和紅衛兵。也就是在這一天，北京的學生來到桂林串聯，他們帶來了北京的許多信息，到桂林後，他們到各學校串聯，很快桂林各大、中學校的紅衛兵組織建立起來了。一開始，除廣西師院的造反派是多數以外，整個桂林市各單位的造反派還是少數；而由桂林市委一手操縱成立的紅衛兵和工人赤衛隊則是大多數，這一派是保工作組、保市委的。從此兩派圍繞要不要改組桂林市委和炮轟區黨委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並且這一鬥爭很快傳到了南寧、柳州和幾乎廣西所有的縣、市，甚至傳到了工廠、農村，到處都有炮轟黨委和保衛黨委的兩派之爭。這種鬥爭一直延續到1966年的年底。

由於毛澤東支持造反派，由於從1966年的8月開始，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報刊連續發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社論和文章，都十分有利於造反派的發展壯大。這時許多原來偏向保守的學生到全國各地串聯後，見歷了各地的許多造反場景，回到本地後他們逐步改變原來的觀點，加入到造反派的行列。由此，保守派的組織漸漸縮小，而造反派的組織卻日益壯大。到了1967年的1月，上海發生了所謂的“一月革命”，毛澤東支持造反派奪權，許多地方的造反派先後奪權，並取得了勝利，保守派的組織幾乎完全垮了。

在桂林，造反派通過奪權取得了勝利。柳州、南寧等城市的造反派也在進行奪權。但在廣西的許多縣、市和工廠、農村，運動進展緩慢，兩派的鬥爭尚剛剛開始，出現了兩派反復奪權的複雜鬥爭局面。

2、保守派重新集結後的兩派鬥爭

1967年1月19日，桂林的造反派連續三天在市體育場召開幾萬人大會，批鬥區黨委領導人韋國清和桂林市委領導人黃雲等一大批領導幹部。1月22日，南寧市的26個造反派組織成立“廣西革命造反派奪權行動委員會”，23日正式奪權。1月24日，廣西軍區遵照上級指示參加“三支兩軍”工作，支持左派。1月25日，廣西造反大軍圍抄南寧市的保守組織“工人赤衛隊”和“盾牌紅衛兵總部”，南寧的保守派徹底垮了。

1月26日，桂林地、市造反大軍奪權，駐桂部隊、桂林軍分區、桂林步校等均表示支持，祝賀奪權的成功。

1月29日，區黨委領導人韋國清在區黨委大院內貼出“揭發劉少奇、鄧小平的幾個問題”的大字報，表明他參加文革運動的決心。

1月31日，廣西軍區舉行駐邕機關、部隊接受軍委命令和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的誓師大會。

在此種形勢下，標誌著桂林、南寧等地的造反派取得了勝利。特別是在桂林，駐桂林的6955部隊全力支持造反派，並派出部隊指戰員到市內各大、中學校開展軍訓工作，幫助學校進行復課鬧革命。桂林市革命委員會也在籌建之中。經過半年來的社會動亂，桂林市的形勢似乎穩定下來了，人民松了口氣，光明日報和新華社都曾作過相關的報導。

然而在南寧，形勢卻在發生變化。

首先是1967年2月19日，自治區黨委領導人賀希明、霍泛等12名領導幹部聯名發表“革命造反聲明”（習稱“二·一九聲明”），表態支持革命造反派，而韋國清沒有表明態度支持造反派，也未徹底檢查自己的錯誤以獲得群眾的諒解。廣西軍區沒有表態支持賀霍等人，卻在群眾中做韋國清站出來的工作，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滿。

其次，廣西軍區認為南寧造反派“工總”的組織不純，於1967年3月1日砸了“工總”總部，並逮捕了總部宣傳委員熊一軍。這是公然侵犯人權和違法之舉。同時，在3月間軍區對南寧造反派中的學生組織

又強調班級聯合，解散了原來的組織。這些都激起了造反派的不滿和反對。

南寧的造反派反對廣西軍區的做法，桂林的造反派更是一馬當先，公開反對軍區的做法，並於3月19日公開發表“嚴正聲明”，開始提出“打倒韋國清，解放全廣西”的口號。

3月21日，廣西軍區召開座談會，討論區黨委領導誰能站出來的問題。會上，廣州軍區副政委陳發紅傳達中央對韋國清的看法，說“韋國清是有功的，是好同志，要支持他站出來”。

3月25日晚上，廣西的造反派召開“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革命復辟逆流誓師大會”，提出“打倒韋國清”，“反對砸‘工總’”等口號。造反派的負責人對軍區表態說：“韋國清是硬抬出來的，是違背人民意願的”，“即使要支持韋國清站出來，現在也不是時候，請軍區慎重考慮”。

軍區要做韋國清站出來的工作，而造反派則極力反對，支持和反對韋國清站出來的兩派鬥爭開始出現。

4月11日，一些造反派組織聲稱廣西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希望他們改正錯誤。

4月16日，南寧的造反派七千多人召開大會，《新工總》的旗號重新打出來，造反派並要求軍管小組撤出廣西日報。

此時，在“一月革命”已經垮了的保守組織在軍區支持韋國清站出來的旗幟下，重新集結，六萬多人在朝陽廣場召開大會，支持韋國清站出來，聲援軍管廣西日報。

4月19日，伍晉南、賀希明、霍泛三人聯名發表聲明（習稱“四·一九聲明”），支持造反派的行動。

4月20日，造反派一千五百多人在火車站廣場集會。支持“四·一九聲明”，宣稱要“砸爛”廣西日報。

同日，支韋派4萬多人召開大會，鬥爭的矛頭直指“四·一九聲明”。

4月22日，造反派成立“四·二二”火線指揮部，到廣西日報前

靜坐示威。

4月26日，廣西軍區黨委決定撤銷賀希明的“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副主任職務。

晚上，廣西大學等一千多學生到軍區靜坐示威。反對軍區的決定，高呼揪出軍區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

5月11日，支持韋國精的一派決定成立“南寧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即後來的“廣西聯指”）。自此，南寧的兩派圍繞“支韋還是支伍”、“打韋還是打伍”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廣西軍區站在支韋的立場上，使支韋派的力量迅速擴大，並影響到全廣西。

5月29日，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公開發出致“新工總”、“倒海翻江”（“四·二二”派）負責人的“忠告、警告書”，公開指責“四·二二”派，震動很大。

6月2日，“四·二二”派在南寧召開“聲討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鎮壓造反派的罪行大會”；聯指派也同時召開大會，擁護警司的決定。

6月6日，南寧警司又發出《致“四·二二”火線指揮部的通告書》，再次公開指責“四·二二”派。

6月4日，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對廣西軍區作指示，支持廣西軍區，要軍區穩住陣腳。

兩派鬥爭的進一步發展，導致武鬥的出現。6月13日起兩派終於在南寧發生武鬥。由於“聯指”派得到廣西軍區的支持，他們可以調動工廠的工人和郊區的農民進城來圍攻“四·二二”，所以武鬥中受進攻的往往是“四·二二”一派，他們經常處於受壓制和打擊的境況。

南寧兩派之爭很快影響到全廣西，各地區、市、縣也相繼出現“四·二二”和“聯指”兩派之鬥爭。由於各軍分區、各縣人武部大多數是支持“聯指”派的，所以受壓制和打擊的多是“四·二二”派。

就是在“老多”占絕對優勢的桂林，隨著南寧兩派鬥爭的影響，到了1967年的5月底，原來的保守派又重新集結起來成立“桂林聯指”，

在鹿寨、陽朔、荔浦、柳州“聯指”的支持下，在桂林挑動武鬥。桂林的形勢一度緊張。

為了穩定廣西的局勢，促進廣西兩派的大聯合，中央從1967年5月初開始就組織廣西兩派代表和黨政領導幹部、軍隊幹部到北京學習，周恩來從6月1日開始至11月中旬，先後八次接見廣西的兩派代表、黨政領導幹部和軍隊幹部，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在接見中，周恩來對“四·二二”派，特別是“桂林老多”有所讚揚，對“聯指”一派和廣西軍區則有所批評。在周總理耐心工作的基礎上，廣西軍區和韋國清都交出了檢討，承認在文化大革命中支一派、壓一派，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砸“工總”，逮捕“工總”宣傳委員熊一軍，給“造反派”發忠告、警告書，施加政治壓力，對支持韋國清站出來沒有做好工作，這些都是錯誤的。向造反派表示賠禮道歉，向毛主席請罪，決心改正錯誤。伍晉南和安平生兩位領導也同時交出了檢討。

在廣西軍區和韋國清檢討的基礎上，廣西兩派赴京代表經過多次談判，在中央的主持下，達成了《關於廣西兩派促進大聯合的十條協議》，並同時達成停止武鬥，拆除武鬥工事，上交武器的協議。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同時作出了《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同意韋國清、伍晉南以及廣西軍區的檢討，決定成立由韋國清、歐治富、魏佑鑄、孫鳳章、焦紅光、郝忠雲、王斌、伍晉南、安平生同志以及革命群眾組織代表參加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下稱“區革籌”）。到此時廣西兩派的鬥爭應該結束了。

3、1968——前所未有的大屠殺年

1967年的11月，中央關於解決廣西問題的決定下達後，兩派達成了大聯合和停止武鬥的協議，廣西的形勢本應就好了，原來受壓制和打擊的各地“四·二二”派的人們盼望安定和不再受打壓的願望也可以實現了，他們的內心是高興的。然而事態的發展卻出乎他們的意料，形勢不但沒有變好，反倒越來越糟。在1967年的冬天和1968年的春天，廣西各地就不斷傳來“四·二二”派受打擊迫害的消息，一些地方甚至出

現了亂殺人（殺地富及他們的子女，殺“四·二二”派的人員）的現象。就是在“老多”占絕對優勢的桂林市，“聯指”派中的一些人竟敢於挑起事端，隨意抓人、打人，恐嚇廣大的群眾。桂林尚且如此，在廣西其他地方“四·二二”派受壓制和打擊的事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說在中央關於解決廣西問題的決定下達前廣西一些地方的武鬥主要是用木棍、鋼叉、彈弓等武器而外（個別地方也有動槍的），殺人也僅是個別人的行為的話；此時的武鬥則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大規模用槍用炮了，殺人也成了公開的行為了。此時的區革籌已經成立，它就是當時執掌大權的政府，韋國清就是這個政府的最高長官；而各地的軍管會都是廣西軍區、各軍分區、人武部在掌握大權，對於各地的武鬥和亂殺人現象他們為什麼不能堅決制止和依法懲處呢？

大屠殺早在 1967 年的 10 月就開始了。在桂北地區，出現了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庭”一類的非法組織，亂抓地富分子及他們的子女加以殺害。如全州縣東山公社三江大隊 10 月 2 日至 4 日兩天之內，在民兵營長黃天輝的指揮下就集體坑殺了 76 人，首開了廣西文革以來殺人的大慘案。

1967 年的 11 月，容縣“聯指”就殺害地富分子和一般群眾及“四·二二”派成員 69 人。12 月 5 日，在武裝部的支持下，容縣“聯指”400 多武裝人員攻打黎村“四·二二”派“支多陣線”，打死“四·二二”派 12 人。

1967 年 11 月玉林“聯指”進攻福棉公社“四·二二”派據點，歷時 4 天，“四·二二”派多人被殺害。

1967 年 12 月 4 日至 7 日，荔浦“聯指”圍剿修仁“農總”（即“四·二二”派），當場打死“農總”多人。7 日下午，“聯指”在修仁烈士塔召開所謂“荔浦修仁鎮壓反革命奪權勝利大會”，會上當眾殺害“農總”成員 14 人，成為廣西又一起典型的殺人慘案。

從 1967 年的 11 月起，廣西許多地方都出現了“聯指”進攻“四·二二”和亂抓人、殺人的慘劇。不但殺地富分子，也殺他們的子女、

一般群眾及“四·二二”派成員。為此，12月19日，梧州、荔浦、賀縣、桂平、鹿寨、容縣、羅城、玉林、欽州、博白等縣“四·二二”派成立“反屠殺控訴團”赴邕，到廣西軍區靜坐和遊行，強烈要求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制止武鬥，嚴懲殺人兇手。同時，各縣“四·二二”“反屠殺委員會”向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發出公開信，嚴正提出五點要求：1、立即制止農民進城參加武鬥，解除各地武裝民兵和“聯指”對“四·二二”的圍攻；2、立即派野戰軍到武鬥地區制止武鬥，收繳武器；3、立即下令取締“貧下中農最高法庭”等非法組織；4、立即解決各地因受迫害而到南寧、桂林、柳州等城市避難的“四·二二”派人員的生活問題；5、韋國清、廣西軍區負責人要立即到群眾中公開檢討改正錯誤。

12月26日下午一時，各縣“四·二二”“反屠殺委員會”組織兩千多人到廣西軍區禮堂門前開大會，強烈要求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制止各地的大屠殺。

12月29日，南寧“四·二二”在軍區院內召開支持各地反迫害、反屠殺的萬人大會。

到了1968年，各地“聯指”進攻“四·二二”和亂殺人之事仍在繼續，並有發展和增加之勢。為此，各地反迫害、反屠殺的鬥爭也仍在繼續。

1968年1月4日，玉林“四·二二”數百人到玉林軍分區門口召開“反圍剿、反迫害、反屠殺”大會，靜坐6天6夜，請求軍分區解決他們受迫害的問題。

1968年1月18日，靈山縣“革聯”（即“四·二二”派）控訴團兩百多人逃到首府南寧，到廣西軍區控訴靈山縣“聯指”亂殺人的罪行，控訴團在廣西軍區政治部大樓前靜坐數天不走，廣西軍區負責人就是不出面解決問題。

1968年1月20日，廣西“四·二二”河池地區“工總”四百多人來到廣西軍區請願，聲援靈山縣“革聯”控訴團，揭發各地“聯指”屠殺群眾的罪行，抗議並譴責廣西軍區負責人繼續以“支左”之名，行支

一派、壓一派之實，破壞廣西大聯合的大好局面。

儘管各地反迫害、反屠殺的鬥爭在不斷進行，區革籌和廣西軍區也發出通知要“制止武鬥”，嚴禁“亂抓人、殺人”，但他們僅是口頭上談談而已，並未採取什麼強有力的措施。實際上他們的所謂“制止”、“禁止”只是表面文章，對“聯指”派是在“小罵大幫忙”，因為各地“聯指”進攻“四·二二”就是在一些軍分區和縣人武部支持下所為的，亂殺人也是他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默許的。

1968年1月28日欽州“聯指”進攻“四·二二”派據點，調動各公社武裝民兵進城武鬥。29日，“四·二二”據點由於沒有什麼武器而被攻破。支持“四·二二”派的縣委書記王劍東，縣總工會主席馮懷忠，副縣長周中權，農業局長張石英，百貨公司領導幹部蔣斌等人，在“四·二二”派據點被攻破後，手拿白旗出來“投降”，當即被“聯指”武鬥人員槍殺，一批“四·二二”人員也被槍殺。圍攻“四·二二”的武鬥結束後，“聯指”召開慶功會，武裝部和縣領導人劉玉柱、盧壽凱、董義、任勇憲等人親自參加會議。

1968年2月6日，玉林地區“聯指”組織兩千多人全副武裝攻打玉林“四·二二”州配據點，包圍兩天後，據點被攻破，抓獲“四·二二”派13人，全部槍殺。

2月11日至20日，靈山縣召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暨貧下中農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公開槍殺“四·二二”派成員3人，並陳屍示眾。大會號召要對階級敵人實行鎮壓，佈置會後各公社、大隊回去立即進行。會後，新圩公社即按會議的佈置殺了5人。四海公社則把全公社的“四類分子”數百人幾乎全部殺光。其它各公社都有殺人的事件發生。

2月16日，在柳州“聯指”的支持下，融安縣“聯指”攻打融安“四·二二”，攻破據點後，“四·二二”派36人被抓，在押解途中又有15人被槍殺。

2月25日至28日，大新縣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召開各公社、大隊“抓促”領導及廠礦武裝部長、民兵營長會議，縣人武部部長周永

山、政委韓奇主持會議，傳達區革籌領導人的講話，研究佈置做好成立縣革委會的準備工作。周永山在會議閉幕時講話指出：“為迎接縣革委會的成立，對不守法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要實行專政，不要心慈手軟”。會後各地代表回到本地，立即按照會議的佈置，大搞所謂“群眾專政”，在十七天的時間裏全縣就屠殺了439人。

從1968年的1月到6月中旬，在梧州市、平桂礦務局、巴馬、宜山、鳳山、天等、崇左、北海市、上思、寧明、臨桂、羅城、武鳴、陸川……等等，幾乎廣西所有的縣、市都有“聯指”進攻“四·二二”的武鬥和亂殺人的慘案發生。據官方的統計資料，在此期間被殺的地富分子、他們的子女、“四·二二”派人員總數近3萬人左右。

由於各地“四·二二”派遭到“聯指”的圍剿，許多人為了逃命，有的下鄉上山躲藏，有的則逃到“四·二二”力量強大的南寧、桂林、柳州等城市。此時，區革籌、廣西軍區不但不能有效地制止各地的武鬥，反而大肆宣傳支持“四·二二”派的幾名領導幹部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等人是什麼“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叛徒”、“特務”，通知各地要狠抓階級鬥爭，清查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託派、反革命”。廣西日報則在輿論上大加配合，號召向“一小撮階級敵人”大刮十二級颱風，報導各地群眾專政亂殺人的經驗。“聯指”派的頭頭們更是得意忘形，加緊了在各地對“四·二二”派的圍剿。在南寧、桂林、柳州“四·二二”佔優勢的地方，“聯指”派也搶先佔據點，搶奪部隊的武器，企圖挑動這三座城市的武鬥，以便最後消滅“四·二二”和“桂林老多”。

面對此種嚴重的局勢，南寧、柳州“四·二二”和“桂林老多”也迅即行動起來抗爭，發表聲明，指出廣西各地武鬥和大屠殺的嚴重性，指出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在繼續犯錯誤，並動用一切宣傳機器揭露“聯指”派的陰謀；同時也學習“聯指”的方法，佔領據點，搶奪部隊的武器，以便挫敗“聯指”的進攻，保衛自己的生存。由此，在南寧、桂林、柳州這三座城市，一場大規模的武鬥終於爆發。最後，區革籌和

廣西軍區向中央謊報軍情，欺騙中央，調動農民進城，並動用部隊把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一舉殲滅。南寧街頭屍橫遍野，血水染紅了邕江，廣西各地大屠殺再次湧現，是 20 世紀人類最慘重的大屠殺事件之一，是廣西有史以來從未有過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三、大屠殺是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一手造成的

1967 年 11 月 8 日，韋國清和廣西軍區向中央交出了檢討，承認自己在文革中支一派、壓一派，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決心改正錯誤，向毛主席請罪，向造反派賠禮道歉。事實證明，這是假的，是他們緩兵之計的一種策略罷了。他們檢討的墨汁未幹，圍剿造反派、大屠殺之事就開始了，到了 1968 年的 7、8、9 三個月，造反派全部被殲滅，亂殺人也達到了最高潮。

如果說在 1967 年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支一派、壓一派，僅僅是支持“聯指”們用棍棒、石頭來進攻造反派；對造反派的壓制也僅是政治上施壓，發發忠告、警告書之類的，再就是逮捕造反派個別負責人，把他們打成“反革命”。1968 年則不一樣了，他們大權在握，可以欺上瞞下，肆意妄為，調動農民進城，甚至動用部隊來圍剿造反派，放手讓“聯指”來屠殺“四·二二”派人員和廣大群眾，是一場滅絕人性、反人類的屠殺，超過了二戰時日本法西斯在廣西的大屠殺，連後來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的大屠殺也不能與之相比。

1、《六·一七公告》是大屠殺的動員令

1968 年 6 月 17 日，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向全廣西人民公佈了《關於破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案件公告》(下稱《六·一七公告》)，這是韋國清及廣西軍區負責人有意製造冤案，向造反派及人民群眾舉起屠刀大開殺戒的動員令。

所謂的《六·一七公告》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1968 年 2 月間，廣西公安機關破獲了一起“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國民黨時代的“老反團”)的反革命集團案，緝拿了

以梁漢忠為首的罪犯 63 人歸案，只有 3 名主犯漏網，不存在偵破繼續追查這個組織的問題。但廣西區革籌領導人韋國清及廣西軍區負責人，為了鎮壓造反派，就利用這一事件來移花接木，借題發揮，傾注全力號召全區人民起來追查所謂的“反共救國團”，導致全廣西追查“新反共救國團”冤案的發生，終至出現亂打亂殺人慘劇。

1968 年 5 月 17 日，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報告《破獲蔣匪“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一案的報告》，韋國清親自簽發這一報告。報告中除了說明破獲這一反革命案件外，還特別指出“該反革命組織涉及南寧市及玉林、欽州、柳州、南寧四個地區，全區已發展匪徒兩千人（破案時認定實為 491 人），總部設在南寧市解放路新鳳街即原醒漢街（‘四·二二’派控制區），利用“四·二二”據點造反樓做聯絡站，與越僑有聯繫……”

1968 年 5 月 20 日，區革籌、廣西軍區又向各地、市革委會和軍分區黨委發出《關於繼續深入偵破〈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問題的指示》，要求各地、市、軍分區指定專人負責，建立專案組，充分發動廣大群眾偵破此案，要深入追組織、追聯繫，務必緝拿一切“反團”分子。

1968 年 6 月 17 日，《六·一七公告》正式向全廣西人民公佈。公告在介紹了案情之後，進一步指出：“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分子，混入了某些群眾組織，有的還當了頭頭，打著造反的旗號，狡猾地利用群眾組織掩護他們進行反革命活動”。“現在這個反革命組織並沒有完全摧毀，必須徹底追查組織，緝拿漏網主犯歸案”。號召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人民群眾，“組織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主動地、不停頓地向階級敵人發動全面的、猛烈的進攻，徹底摧毀這個反共救國團”。

1968 年 6 月 18 日，區革籌、廣西軍區就《六·一七公告》的貫徹執行向全區各地、市、縣革委會、軍分區和縣人武部發出通知，要求統一認識，結合本地區情況進行佈置，廣泛深入宣傳《公告》，要召開各種會議，檢舉揭發叛徒、特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於是，一個借本來已

經查清了的老案件來追查所謂“反共救國團”的特大冤案在廣西各地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由於區革籌和廣西軍區的發出的《公告》和《通知》都說“這個‘反共救國團’已經混入了‘四·二二’群眾組織中，有的還當了頭頭，總部設在‘四·二二’控制區”，並佈置全區各地“加緊偵破”，“追組織”、“追聯繫”，因此，各地的“四·二二”組織和群眾就成了追查的主要對象。

對於區革籌、廣西軍區的《公告》和《通知》，“聯指”派及那些支持“聯指”、反對“四·二二”的各級幹部就如獲似寶，到處廣為宣傳，到處散佈“反共救國團”就在“四·二二”組織中。於是，全區各地到處亂抓、亂打、搞逼、供、信的事件就頻頻發生了，緊接著就是非法關押、亂殺人。

僅據官方的統計資料，由於追查“反共救國團”，玉林地區刑訊逼供達 5213 人，僅北流縣就達 804 人，非法殺害 275 人，打傷 414 人，打致殘廢 139 人。

南寧市有 3543 人（全為“四·二二”派人員）列為“反共救國團”成員，鬥爭 1772 人，關押 957 人，37 人被殺，34 人被逼自殺，4 人下落不明。園藝場職工黃輸孟（貧農出身，單位革委會成員）一家三口人，妻子有孕在身，都被逼致死。

百色地區批鬥了 9396 人，打死 1074 人，打致傷殘 2135 人。

南寧地區因此案而打死、逼死 4943 人，僅武鳴縣就達 1546 人。

都安縣因“反共救國團”案非法殺害 441 人；蒙山縣在十天內就殺害了“反共救國團”及四類分子 457 人；臨桂縣委副書記李瑾科，只因是支持“四·二二”的領導幹部，被殺害後以“反共救國團第一方面軍軍長”的罪名公諸於眾，其妻子周英麗（縣民政科科長）也慘遭殺害。在廣西的所有縣、市都有因“反共救國團”一案而亂抓、亂殺的事件發生。

當時廣西軍區支左幹部董坤（後被韋國清提為區黨委辦公廳主任）

于 1968 年 7 月 16 日從北京打長途電話回南寧市，稱在北京的廣西幾位領導人研究，“擬再公佈一批‘反共救國團’成員名單及罪惡”，大有猛打窮追之勢。

從 1967 年冬以來，至 1968 年 6 月中旬，全廣西各地到處都在圍剿“四·二二”派，到處都在亂抓人、亂殺人，韋國清及廣西軍區負責人不但不出面制止和依法處理，反而製造“反共救國團”這一無中生有的冤案，使圍剿“四·二二”及亂殺人之風迅即加劇，遍及廣西各地，多少人頭落地，屍橫遍野。韋國清的用心何其毒也。

據官方的統計資料，全廣西因“反共救國團”案被害人員為 37400 人，5000 人以上的有玉林、河池、百色、桂林等地區和南寧市。是一起驚天地泣鬼神的大冤案。

2、《七·三佈告》的下達給殺人狂潮推波助瀾

1968 年 7 月 3 日，經毛澤東批示“照辦”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佈告（習稱《七·三佈告》）公佈了，這是韋國清及廣西軍區負責人繼製造《六·一七公告》之後，又騙得的中央尚方寶劍，使大鎮壓、大屠殺之事“合法”了，他們可以毫無顧忌地大幹一場了，把大圍剿、大屠殺推向了新的高潮。

《七·三佈告》的形成，是韋國清及廣西軍區負責人謊報軍情，欺騙中央的結果，是他們為使鎮壓“四·二二”合法化而使出的陰謀鬼計，它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是令人觸目驚心的。

從 1967 年冬以來，廣西的一些地方就不斷出現圍剿“四·二二”和亂殺人的事件；到了 1968 年的春天，這種圍剿和屠殺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後果越來越嚴重。而這種圍剿和屠殺往往是由各地、縣、軍分區和人武部的負責人指揮“聯指”武鬥人員，以“剿匪”的形式進行的。“四·二二”派被他們稱之為“匪”，消滅“四·二二”建立革委會是他們早就定下的方針。最典型的“剿匪”事例，如：

1968 年 4、5 月間，廣西軍區、南寧軍分區、寧明縣人武部、崇左駐軍部隊、寧明駐軍部隊各一個連，憑祥邊防軍四個連，和甯明縣夏石

公社“聯指”共一千多人圍剿“四·二二”派上石“農總”；6、7月間梧州軍分區和梧州地區各縣人武部策劃指揮，集中富川、賀縣、鐘山、昭平四縣“聯指”武鬥人員和梧州專、市“聯指”武鬥人員近萬人，在梧州軍分區副司令員李錢榮、副參謀長李玉濤的指揮下，圍剿平桂礦務局“井崗山兵團”（“四·二二”派）；與此相呼應的，梧州“聯指”也加緊了對“四·二二”派的圍剿，南寧、柳州、桂林三座城市的“聯指”也搶先佔據點，搶奪武器，以圖刺激“四·二二”和“桂林老多”，挑動武鬥，達到最後消滅“四·二二”和“桂林老多”的目的。

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四·二二”及“桂林老多”一面動用宣傳機器，揭露韋國清、廣西軍區負責人和“聯指”派頭頭們的陰謀和錯誤；一面被迫也佔據點、奪武器用以自衛。

5月21日，柳州“四·二二”和柳州鐵路“工機聯”聯合搶奪了9257次列車八輛援越的1700多萬發子彈；5月23日，“桂林老多”也搶奪了蘇聯援越的50噸黃色炸藥。與此同時，在桂林和南寧也有個別“聯指”派人員被“桂林老多”和南寧“四·二二”下屬組織和人員所殺害的事件發生。

6月19日至20日，南寧“聯指”攻打“四·二二”“火種兵團”據點（區水電設計院），殺害了“四·二二”62人，屍體全部丟入邕江之中。

對於上述的所有事件（包括自去年冬天以來所有“聯指”圍剿“四·二二”和屠殺事件），區革籌和廣西軍區負責人對“聯指”的胡作非為隻字不提，而對“四·二二”和“桂林老多”的所謂“事件”則片面指責，誣稱“四·二二”和“桂林老多”“製造反革命”事件，並多次向中央報告。在《七·三佈告》下達前的半年多時間裏，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向中央上報了有關廣西“文革”問題的電報80多份，絕大部分都是指責“四·二二”派的，把“四·二二”派說成是被“階級敵人”“操縱盡做壞事的‘反動組織’”。如1968年5月14日，由韋國清簽發的《關於廣西階級鬥爭形勢的情況報告》中，明確指責新“四·二二”（老“四·

二二”派個別領導人被韋國清拉過去了)是由“壞人操縱的壞組織”,“在政治上有反動綱領”,“在行動上,他們搞了很多破壞活動”,“在他們控制的據點,大搞打、砸、搶、抄、抓、殺事件等罪惡活動,並派專人到各專區、縣挑動武鬥”。

這真是賊喊捉賊的可恥伎倆。對於“聯指”派圍剿“四·二二”、搶槍、殺人等一系列罪大惡極的事件他們是從不上報,並千方百計的縱容、袒護。就是對於6月19日“聯指”攻打“四·二二”“火種兵團”殺害62人沉屍邕江的大慘案,在6月22日給中央的報告中仍在袒護“聯指”。

更有甚者,廣西軍區的支左幹部王生江,竟授意從“四·二二”派分化出來的羅振龍、曾學文(南寧八中教師)胡編亂造許多虛假案情,以欺騙群眾,欺騙中央。

《七·三佈告》就是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欺騙中央所得出的結果。聽信韋國清的謠報,也說明當時的中央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絕非“一貫正確”的。

顯然,《七·三佈告》是一個錯誤的報告,實踐證明,這個報告給韋國清、廣西軍區負責人及“聯指”的指揮者們作為鎮壓、屠殺“四·二二”和人民群眾的綱領性文件,起到了極其惡劣的作用。

《七·三佈告》一下達,韋國清、廣西軍區負責人及“聯指”頭頭們如獲至寶,他們當即翻印了一千多萬份,在全區各地廣為散發,為了造聲勢並以此誣陷“四·二二”和“老多”“反對”這個《佈告》,他們幾次派出飛機從憑祥至南寧、柳州、桂林等地空投《佈告》。

為貫徹落實《七·三佈告》,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指令各地、市、縣召開聲勢浩大的群眾大會,狠抓階級鬥爭,加緊清查“走資派、叛徒、特務、反共救國團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對“階級敵人”實行“群眾專政”。各地、市、縣又層層加碼,發佈“通告”和“命令”,有的地方則成立“剿匪指揮部”,派武裝民兵四處搜捕“四·二二”人員(被他們誣稱為“匪”)。

《廣西日報》也在輿論上配合，為貫徹落實《七·三佈告》，連續發表 9 篇社論和 52 篇文章，大肆煽動派性，鼓吹群眾專政、鼓吹向“階級敵人刮十二級颱風”，為鎮壓造反派和廣大群眾大造輿論，使廣西各地的大鎮壓、大屠殺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瘋狂地步。

如果說在《七·三佈告》下達前，一些軍分區和縣人武部就在支持那裏的“聯指”圍剿“四·二二”和屠殺人民群眾，但在南寧、柳州、桂林這樣的城市，韋國清和廣西軍區也僅是暗中支持“聯指”胡作非為的話；但在《七·三佈告》下達後，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則是公開出面了，派正規部隊打前鋒，全力圍剿南寧、柳州的“四·二二”派，把“四·二二”一舉殲滅。僅在南寧市，部隊和“聯指”圍剿“四·二二”解放路等據點就殺死“四·二二” 1558 人（《七·三佈告》前僅殺害 261 人）

賓陽縣僅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十多天時間裏就殺害 3681 人；桂林地區在《七·三佈告》前殺害了 2831 人，《七·三佈告》下達後就殺害了 9087 人。

全廣西各市、地、縣都有類似的情況，《七·三佈告》下達後都在公開的殺人，7、8、9 三個月是殺人最多的時期，據官方統計資料，“文革”期間全廣西打死、逼死共 89810 人，其中 5 萬多人是在《七·三佈告》下達後殺害的。這些受難者都是在縣人武部、軍分區負責人、以至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指揮或縱容下由“聯指”派非法抓人加以殺害的，是有領導有計劃進行的；是在非武鬥的情況下被個別或集體加以殺害的。

3、殺人手段之殘忍是歷史罕見

1968 年的廣西大屠殺，不但殺人數量之多數全國之最，就是殺人手段之殘忍也是全國其他地方少有，也是廣西自有文字記載以來所罕見的。形形色色的殺人慘案幾乎遍及廣西各地，都是令人毛骨悚然，慘不忍睹的。下面擇其最殘忍的一些殺人慘案分述如後，就足可見廣西當時殺人的慘狀了。

(1) 1967年11月2日，全州縣東山公社三江大隊民兵營長黃天輝與黃天愛（大隊會計）、劉性林（“聯指”頭目）、劉義周（信用社會計）、劉俊博（黨支部委員）、楊隆義（大隊治保主任）等人商議，召集民兵班、排長等30多人開會，黃在會上傳言湖南道縣殺地、富分子的情況，提出“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對地、富分子要“鏟草除根一掃光”。會議決定採取坑殺的辦法，即將人抓來推下黃瓜沖山洞，並按村分配抓地、富分子的任務。會後，黃天輝於10月3日晚帶民兵去抓地、富分子，抓到後即押到黃瓜沖山洞。從10月4日凌晨1時起至上午11時的十一個小時裏，分三批集體殺害地、富分子及無辜群眾76人，其中有少年、兒童、嬰兒31人，有7戶39人被全家殺絕。死者蔣鸞英（高中文化，民辦教師，女）曾當面指責黃天輝的行為是違反政策的，被黃一棍打下山洞而死。蔣的老母親蔣元秀（地主，70多歲了），也被逼抱著自己三歲的孫子和一歲的孫女被推下山洞而死，死前曾苦苦哀求黃天輝留下一個孫子給入贅其家的貧農女婿也不准，只能含恨而死。地主劉香元是到貧農家入贅的，死前也曾哀求黃天輝，請求留下一個小孩給他貧農出身的愛人，也未獲准，三父子被逼跳下山洞而死。這世上還有比這更殘忍的慘劇麼？

(2) 貴縣松英鄉鄉長覃錫明，從1968年3月27日起，先後策劃、組織殺害無辜群眾40人，其中38人是經他親自批准殺害的，有13戶人家男性全被殺光，包括未成年的小孩12人，最小的一個年僅7個月，是從其母親的背袋拉下來當著孩子母親的面活活打死的。把人殺死後，又捏造罪名，誣陷他們是“反革命組織‘同心會’”的會員。

(3) 1968年3月7日，忻城縣“聯指”在其頭目盧建能（縣委組織部幹事）、藍名貴（縣財辦幹事）及安東鄉民兵營長莫現武等人的指揮下攻打岩峨“四·二二”據點，“四·二二”派盧秀苗、鐘紹輝、莫家慶、莫顯祖、吳祖順、羅奇格等多人被“聯指”抓獲後槍殺。一個88歲的老太太貴仁媽因孫女婿鐘紹輝是“四·二二”派的，“聯指”到她家搜查，叫她出去，老太太動作慢，被兇手用棍棒活活打死。一個88歲的

老人也不放過，天理何在？

(4) 1968年3月9日，地主家庭出身的女青年陳振廉與未婚夫到靈山縣檀圩買布，被“聯指”頭目陳寶聲、姚善南非法抓捕，兇手們當眾把她的外衣、外褲脫掉，又用刀把她的內褲叉、內衣和乳罩割爛，赤身裸體的讓數十名圍觀的人看，一個兇手並把自己的膠鞋脫掉，拿來不停地打她的陰部和乳房取樂，最後用繩勒、用刀捅把女青年殺害。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野蠻地辱殺女青年，絕對是人世間罕見的慘劇。

(5) 宜山縣的黨員幹部黃秀英和小學教師楊松瓊，都是已懷孕在身的女同胞，只因參加了“四·二二”派，被“聯指”派的人用槍殺和棍棒打死。楊松瓊死後腹內的胎兒仍在蠕動，被兇手們用腳踏上肚子猛踩；黃秀英槍殺後被辱屍、曝屍示眾，殘忍至極。

(6) 1968年8月，平樂縣二塘公社山背村地主分子李林結全家6人被殺，財產和糧食被搶光；二塘中學學生周治年只因是“四·二二”派的，被“聯指”們將其推下錳礦礦井，然後把手榴彈丟下礦井將其炸死；二塘中學女學生申廣秀，是一位優秀的學生，只因是“四·二二”派的負責人之一（宣傳部長），被“聯指”派非法抓到二塘公社各個大隊輪流批鬥，並多次遭到輪奸，最後被用刀捅死。

(7) 1968年6月9日至10日上午，在1天多的時間裏，蒙山縣文平大隊民兵營長譚釗奇，策劃和親手殺害無辜群眾、教師50人，其中全家被殺絕的有5戶，地、富家庭的男性全部被殺光。1~14歲的小孩有18人被殺，其中有13個小孩是用繩子套住脖子後，在地上活活拖死的。

(8) 在1968年6月15日至9月26日間，臨桂縣“聯指”頭目、武鬥副總指揮胥明德，策劃佈置、親自決定和組織指揮殺害幹部、群眾77人，其中有縣委副書記李瑾科、副縣長周克仁、法院院長劉錫臣、檢察院副檢察長龍炎雲等支持“四·二二”派的領導幹部13人，一般幹部16人，教師4人，醫師3人，學生6人，工人5人，有8對是夫妻雙雙被殺的。

(9) 凌雲縣武裝部政委、縣革委主任王德堂，誣陷在“文革”之初

揭發、反對過他的幹部、群眾組織為“反革命”、“暗殺隊”；誣陷縣委書記趙永禧是“反革命總後台”、“陰謀組織暴亂”，親自策劃、組織“聯指”人員把趙活活打死，並有 12 名幹部、群眾同時被殺害。殺人後王又公然宣稱打死人事件為“革命”行動，大方向“正確”，並作為經驗向全縣推廣，把全縣殺人事件推向高潮。

(10) 貴縣大岑公社柳江大隊民兵營長徐善富，在 1968 年 4~8 月間，策劃指揮或親手殺害無辜群眾 33 人，其中一次就殺害 16 人。為了殺人取樂，把被害者排成一路縱隊，從背後開槍，名曰“串豆腐果”；有的是用船裝到河中活活淹死的。徐善富獸性發作，殺人後強姦被害者的妻子二人，並用權勢強姦其他婦女 5 人。

(11) 1968 年 7 月 20 日，在“聯指”頭目唐厚全和顧問吳蘭才的指揮下，南丹縣和大廠礦務局“聯指”1700 多人圍攻拉麼礦“四·二二”派據點。由於“四·二二”派沒有什麼武器，之前他們也並未與“聯指”派發生過什麼武鬥，被圍困 10 天後，7 月 31 日下午 4 時，據點內的“四·二二”人員 510 多人手持毛主席像、語錄本、“忠”字旗，扶老攜幼出來到拉麼第 5 生產隊向“聯指”“投降”，“聯指”們當即從這 510 多人中挑出 105 人（所謂的“壞人”），然後又再從中挑出 50 多人拉到道班房公路邊跪下，當即就槍殺了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工人鐘三。之後，“聯指”派的兇手張昌瑾、邵波、匡宗玲、蔡科宣、楊加開、張敏、鄭宗祥、李友華、龍世乾、劉明等一批人就對這些“投降”的人用木棍、鐵條瘋狂的亂打，有 47 人被當場打死，殺人場面慘不忍睹。幾名女死者被打死後，被流氓龍世乾、劉明等人把衣褲剝光，用木棍捅女死者的乳房和陰部，極盡污辱之能事。

(12) 在武宣縣，1968 年的大屠殺中有 526 人被非法殺害，其中竟有 75 名死者被割肉、挖肝供兇手們煮食，是廣西挖肝、割肉最多的一個縣。最典型的慘案如：

1968 年 6 月 17 日，正值武宣圩日，“聯指”派小頭目蔡朝成、龍鳳桂等人抓湯晨輝上街遊鬥，走到新華書店門前，龍用步槍將湯擊傷倒

地未死，兇手王春榮手持五寸刀剖開湯的腹部挖出心肝，圍觀的群眾也蜂擁而上動手割肉，湯即命絕身亡。當時在場圍觀的有縣革委副主任、武裝部副部長嚴玉林，他親眼目睹了這一殘忍暴行而一言不發，如此的共產黨領導幹部連起碼的人性和正義感都沒有了。

7月的某一天，通挽區大團村第七生產隊幹部龍剋星組織批鬥會，批鬥甘大作；批鬥後將甘大作拉到附近田邊，兇手龍業偉喝令甘大作跪下，並一棍往甘大作頭部打去，甘倒地但並未死，兇手們即動手脫甘大作的褲子割生殖器。疼痛使甘大作醒來，並哀求說：“等我死了你們再割”，這些野獸們無動於衷，慘無人道的繼續割甘大作的陰部，並剖腹取肝、割肉。甘大作在撕心肺腑的慘叫中掙扎，令旁觀者毛骨悚然。生割活人，令人怵目驚心。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了，竟有如此的慘狀，實在叫人無法理解。

(13) 1968年5月20日晚，武宣縣祿新區大榕鄉黨支部書記石朝保等人，在橋輦村召開批鬥王德歡、王開華大會。在批鬥會上，王德歡被兇手們用木棍活活打死，王開華被打後未死，被拖到會場外用刀捅死。迨後，幾名兇手即竄到王德歡家，輪奸正處豆寇年華之次女王凡珍。

(14) 1968年7月16日，陽朔縣“聯指”為他們到桂林參加武鬥被打死的百貨公司職工黃金成在陽朔公園內開追悼會，“聯指”頭目呂明忠、陳益昌、王天德等人竟策劃殺人來祭奠他們的所謂“烈士”。他們把被非法關押的“四·二二”派幹部程志純（百貨公司幹部）、蘇良鈺（縣委委員、糧食局長）、李超（縣合作社幹部）押到會場，強令他們跪在死者黃金成的屍體前，當即被殺死。三人都是被棍打、刀捅死的，最後再補槍。蘇良鈺是先被割下耳朵再打死的，殘忍至極。

8月20日晚，福利糧所在福利區禮堂召開批鬥普益糧站幹部廖大文大會。在批鬥中廖大文被棍棒亂打，未死，幾名兇手就用繩子把廖大文頭在前、面朝下、手反綁著，從禮堂沿著福利老街，在那高低不平的石頭路上拖到灕江邊鯉魚洲上，約一裏半路程，廖被活活拖死。

(15) 1968年7月13日，平樂縣“聯指”武鬥人員圍攻桂林師範學

校及榕湖飯店“老多”派的據點。由於進攻失敗，平樂“聯指”有12人在武鬥中被打死，他們就尋找機會瘋狂地報復。

當時，桂林“聯指”在桂林火車站對面的東方紅飯店前語錄牌樓建立了一個專門關押人的“看守所”（臨時監獄），把抓獲的“老多”派人員和所謂“五類分子”關押在此，先後關了258人。7月14日上午，平樂“聯指”把在進攻桂林師範和榕湖飯店時死的12人屍體運到桂林玻璃廠，“聯指”人員前往悼念。上午9時左右，平樂“聯指”盧紅光、林海、李紹邦等20多人，沖進“看守所”對關押的人亂打，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長郭文剛等多人被打得頭破血流。到了中午，平樂“聯指”武鬥人員廖德權、伍學強、林海、廖昌輝、候永成、唐橋生等24人又沖進看守所樓上，將被關押人員唐躍武（針織廠職工）、候徽（插青）、馬震鵬（二中學生）、秦恩深（獸醫站職工）、白先德（棉紡廠職工）、李江（汽配廠職工）等12人拉到桂林11中學對面的樹林裏，兇手們三人一群，5人一堆，分別圍住被抓來的“老多”派人員，先是拳打腳踢，再用槍托猛擊，用刺刀亂刺，最後開槍，把被抓的12人全部打死，殺人手段慘不忍睹，是又一起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驚天血案。

(16) 1968年6月28日，在龍勝縣玉贈村發生一起驚天慘案。在支部書記吳建興、鄉長吳代珍等人的指揮下，兇手黃仁原、吳代松、吳孟賢、吳才智、吳和平、吳金秀等多人，把地主石光祖打死，吳耿基及女兒吳樹娥、女婿吳振凡等同時被打死；孕婦楊開梅見其丈夫吳均被打，求民兵吳代章不要打，兇手黃仁原即把楊開梅打死，兩個小孩（吳玉平8歲，吳玉金3歲）和丈夫同時被打死，死者的腦漿四射，血肉橫飛，殘忍至極。

(17) 防城縣防城公社二江大隊的唐頌南，是一個年近80歲的老人，早年曾跟隨孫中山參加過辛亥革命，會見過孫中山先生，後又反對國民黨，擁護共產黨，1968年2月29日被誣為“歷史反革命、國民黨殘渣餘孽”而被活活砸死。

防城縣文工團的女演員、大學畢業生易甯，因參加“四·二二”

派，被“聯指”非法抓捕殺害。面對兇手們的刀槍，易寧宣稱自己無罪，並嚴正指出“聯指”們亂殺人是違法的，是真正的犯罪。她臨死前曾高呼“共產黨萬歲”，並面對槍口站立著迎接罪惡的子彈，表現了大無畏的勇敢和對兇手們的蔑視，不愧為一位巾幘英雄之舉。

(18) 1968年4月初，巴馬縣的“五·一二”派（即“四·二二”觀點一派）在縣城受到圍攻，沒有立足之處，在黃德康、蘇漢等人的帶領下，部分人員逃到了恙圩公社乙圩大隊下乙屯躲藏逃命。“聯指”得到消息後，即由縣武裝部部長李彥智、恙圩公社武裝部部長盧金珊、副部長黃正業和乙圩大隊革委會主任覃德強等人指揮下，組織2500多人圍攻下乙屯。從4月中旬開始至4月21日，圍攻多天。由於“五·一二”派沒有什麼武器，加之村裏男女老少一村人，不可能擋住“聯指”的進攻，他們願意主動“投降”。“聯指”們叫被圍困的人不論男女老少都要脫掉上衣舉起雙手出來，極盡人格之侮辱。這些人“投降”後，當即遭到血腥的屠殺，黃德康與下乙屯韋卜樓等49人被槍殺（蘇漢當時曾逃脫，但不久即被抓獲殺害，蘇是體委主任、體育運動員，妻子胡春虹也被殺），被殺者中有兩名兒童（8歲、11歲），三名嬰兒，60歲以上的老人8人。兇手們不但殺人，全村44戶133間房屋全被燒毀，倖存者只好流落他鄉，整個乙下屯荒無人煙。這和日本法西斯當年的三光政策有何區別呢？

(19) 羅城縣的“六·一五”慘案：1968年6月15日，羅城縣革委會在縣城廣場召開“向階級敵人發動全面總進攻誓師大會”，由軍管會宣判三名罪犯。縣直各單位、全縣各區上萬人到會，並帶來了155名批鬥對象（“四·二二”派人員和地、富分子）到會場，人人掛黑牌、戴高帽、被反手捆綁跪著在大會會場一旁。大會對三名罪犯宣判後，段志英（縣革委第一副主任、縣人武部部長）在大會上講話：“專政是群眾的專政，要放手發動群眾，依靠群眾，鎮壓敵人。要向階級敵人刮十二級颱風，不管敵人在什麼地方出現，就要在那裡把他消滅掉”。接著鼓動幹部群眾說：“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一定要把他們鬥倒鬥

臭，不獲全勝決不收兵”。段講完話後，大會即宣佈以各區和縣直機關為“戰區”進行批鬥。於是，各區、縣直各單位就把隊伍和批鬥對象帶到廣場周圍開展批鬥，一場大屠殺即開始。

在批鬥現場上，各區、縣直各單位都有人用棍棒、石頭打批鬥對象，有好心的幹部對段志英說：“這樣行嗎？要出事的，我們要講話”。段卻說：“不能給群眾潑冷水呀！”

段志英走到黃金“戰區”時，見該區只帶來了三個批鬥對象，批鬥又不激烈，即叫該區革委主任銀應用出來，邊講邊向天河“戰區”方向走，並說：“你們這個班子怎麼樣？是不是有點右傾呀！”銀見天河區已批鬥打死了七、八個人，回到本“戰區”後即組織群眾繼續批鬥，當即把三個批鬥對象活活打死。

四把糧所幹部柳學志（1954年入伍）被打死後，其妻黃鳳瓊即找段志英一起去看；當看到群眾正用石頭砸人時，段也不吭聲。黃便問：“他們犯了什麼罪，為什麼這樣打死人？如果犯了法，也應由法院處理，你們為什麼這樣做？”段志英卻說“這是群眾，我們講他們不聽，制止不了，你快走吧！”這時，旁邊有人說，她不走，就連她一起幹掉！黃鳳瓊只好無奈的離開。

當天，各“戰區”在批鬥中，共鬥死、敲死、砸死、開槍打死59人，其中國家幹部12人，職工2人，群眾15人，地、富分子30人。縣直機關打死韋善忠（供銷社經理部幹部）等3人，龍岸區打死高定中（居民）等8人，黃金區打死黃兆安（青明山林場幹部）等7人，東門區打死張永華（社員）等10人，四把區打死莫加星（四把供銷社主任，1946年入黨的老幹部）等10人，天河區打死張福寬（中學教師）等12人，喬善區打死許國強（群眾）等6人，都是“四·二二”派的人。

(20) 1968年8月5日，在韋國清、軍區負責人的指揮下，部隊和聯指武裝人員圍攻“四·二二”派南寧市解放路據點的戰鬥結束，“四·二二”派有1340人被打死，其中許多人是被抓到後當場槍殺的，殺後把屍體推下邕江，鮮血染紅了邕江河水。在抓獲的“四·二二”派人員

中，有好心的部隊戰士把他們圍住以圖保護他們，但“聯指”的兇手們殺紅了眼，衝破軍人的保護，強行把那些“四·二二”派的男、女青年拉出人群槍殺。

在“聯指”人員押送“俘虜”的過程中，從解放路出來，走到廣州照相館門前又槍殺了 26 人。

在部隊和“聯指”武鬥人員圍攻展覽館和解放路等地“四·二二”派據點時，“四·二二”派共被打死 1470 人，被“俘虜”9845 人（包括居民 2500 人），在被“俘虜”的人員中，有 7012 人是各縣到南寧避難來的，交回各縣處理，這些人在路上或者回到本縣後即有 2324 人被殺害。圍剿南寧“四·二二”，是全廣西殺人時間最集中、殺人數量最多的地方。

類似上述的殺人慘案全廣西幾乎各地都有，無須再一一列舉了。任何一個正常的人、有良知的人，看了這些記述，都會痛心疾首，悲憤交集，對死難者會充滿無限的同情和惋惜，對殺人的指揮者和兇手們會充滿無比的仇恨。

關於殺人手段之殘忍和那個悲慘的時代，看看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簡稱“處遺”）時幾個地方政府工作人員的語言，就能更清楚地說明了。

武宣縣：“縱觀歷史，原始社會生產力極不發達，有吃人肉的現象，此後這一現象已絕跡。但，‘文革’中武宣縣有 75 名死者被挖肝吃肉，是喪失人性、愚昧無知的‘返古’人吃人的離奇行為……在武宣縣，黨員幹部因吃人肉受到開除黨籍或清除出黨的共 27 人”。

合山市：“我們……百感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在那個‘偉大’的革命時代，在那場‘史無前例’的運動中，國法不復存在，公理不復存在，整人、害人、殺人者不但無罪，反而有功。不少人入黨、當了官。挨整、挨害、挨殺的人還得背上各種莫須有的罪名，連他們的家庭、親屬都受到歧視……”

崇左縣：“……（殺人手段）有剖腹取肝煮食，取腸掛在樹枝上的，有用牛拖死的，有殺夫姦妻、殺父姦女的，有殺人後抄家搶劫財物

的……”

柳江縣：“（殺人手段）有拳打、腳踢、刀砍、匕首刺死、棍棒打死、槍殺、粉槍殺、挖眼睛、割鼻子、割耳朵、剖腹取肝、死後砍頭示眾、火燒死、活活用死、活埋、丟下水潭或河裏淹死等等”。

四、大屠殺之事為什麼長期得不到揭露和處理

1968 年的廣西大屠殺，雖是在文革的特定時期所發生的事，但事後依法進行處理，對殺人的組織者、策劃者和殺人兇手依法懲處，總是一個正常的社會、一個國家和政府所應該做的事。然而在廣西，這些殺人的策劃者、指揮者及殺人兇手們不但未受到法律懲處，反而成了文革有功之臣，成了“保衛紅色政權”、“保衛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幹部韋國清”、“鎮壓階級敵人”的積極分子而入黨、提幹，或者參軍、升學，一些人並被提拔成了掌握一方大權的領導幹部。這又是一件叫人無法理解和無法容忍的怪事。

如南寧“聯指”的頭目廖煥雄、顏景堂、潘玉臣，因指揮武鬥、指揮殺人、迫害幹部有功，廖、顏都當上區革委副主任，廖並當上了區黨委組織部長、宣傳部長、九大代表，潘也當上了區革委常委、公安廳副廳長；憑祥“聯指”頭目黃日南當上了市委副書記、市長；來賓縣“聯指”頭目唐彪當上縣委書記；興安縣“聯指”頭目唐廷國當上了縣委書記；桂林“聯指”頭目曹鐵軍、李年生成了市委和市革委的重要領導幹部；其他許多地方的“聯指”頭目和殺人兇手如臨桂的胥明德、韋英豪、凌雲的王德堂，賓陽的王建勳、韋善強，陽朔的呂明忠、蔣彬，上思的段振邦，羅城的段志英等等，因鎮壓群眾或殺人有功，都得到了重用或者提拔；甚至光天化日之下在桂林開槍連殺 5 人的興安中學生蔣孝生（時年 20 歲）事後也參軍、入黨、當上了大隊黨支書和大隊長。像這樣的人和事。在廣西是太多了，這真乃天大的怪事和奇聞。

原來這一切皆因有韋國清的關係，文革中韋國清一直是廣西的一把手，他大權在握，背後又有黃永勝和林彪在支持。黃、林垮臺後又有

毛澤東的支持，廣西各地、各級的當權者又都是他的親信、黨羽，無怪乎他可以一手遮天，可以翻雲覆雨，誰能奈何了他呢。

另一方面，韋國清所控制的輿論陣地廣西日報，更是成了韋國清的喉舌，一直在為韋國清歌功頌德，搖旗吶喊；鼓吹文革中廣西有一條“正確路線”，為韋國清塗脂抹粉。

在文革中的任何一個階段，廣西日報都成了韋國清發號施令、胡作非為的傳聲筒和吹鼓手。文革初期的1966~1967年大動亂期間，1968年的大屠殺期間，廣西日報所扮演的角色已是世人皆知無須重複了；就是在其後的清查“五·一六”運動、批林批孔、儒法鬥爭、評水滸、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一系列的所謂運動中，廣西日報所扮演的角色都是極不光彩、令人作嘔的。對報上的語言，那種低能的水平，筆者當年（1968~1978年）讀廣西日報，往往會發出會心的嗤笑。

如1971年的春、夏季，廣西開始全面清查“五·一六”運動，廣西日報勁頭十足，一馬當先，把在1968年鎮壓“四·二二”和“桂林老多”所說厭了的話又搬出來鼓噪一番。什麼“廣西有一條‘五·一六’黑線”，他們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反黨亂軍”、“反對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等等，全是以大帽子壓人的空話、廢話。筆者當年是一個單位“老多”派的負責人之一，對廣西的問題十分清楚，廣西根本就不存在什麼“五·一六”集團。可是韋國清之流仍在拉大旗作虎皮，還是通過廣西日報在拼命的喧嚷，還是在裝腔作勢的在搞清查，只不過是把“四·二二”和“桂林老多”的各級大小負責人（大屠殺的幸存者）又抓來軟禁，名曰辦“學習班”交代問題。實在是可笑而又可惡之舉。

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桂林老多”中有一批人站出來揭露1968年桂林“八·二〇”行動鎮壓“老多”和人民群眾之事。“八·二〇”行動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區12個縣近萬人喪命，是一起驚天的大慘案。這些人站出來揭露“八·二〇”，揭露韋國清、陳秉德之流的滔天罪行，桂林人民無不拍手稱快。但此舉卻惹惱了韋國清等殺人的幕後策劃者，

他們當即佈署鎮壓，把敢於揭露殺人之事的張雄飛、許瑞林、龔志明、李新等 20 多人非法逮捕並以“反革命”罪判刑，同時在全市各單位強制群眾表態，要說“八·二〇”是“革命行動”，這是地地道地法西斯行為，是強盜行為。廣西日報也在輿論上配合，說什麼“桂林那幾個反革命分子”“企圖翻天”，以壓制人民起來揭露韋國清等人的罪行而在製造歪理邪說。

到了 1976 年春、夏時節，“四人幫”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韋國清又通過廣西日報把桂林 1974 年抓捕的那幾個“反革命分子”張雄飛、李新等人說成是“復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和依靠力量”；但到了 1976 年冬“四人幫”倒臺後，他們又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此時則把張雄飛、李新等人說成是“四人幫”反黨集團的組成部分，是“四人幫”的別動隊。1977 年廣西區黨委發出的 3 號文件中說：“在批林批孔運動期間發生在桂林的那幾個‘反革命’分子挑起事端，是‘四人幫’插手廣西的嚴重‘反革命’事件，是‘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並在廣西日報上連續刊登批判文章。對於韋國清和廣西日報這種“翻雲覆雨”的卑劣伎倆，筆者當年就覺得可笑、可恥。韋國清和廣西日報所做的一切，全是欲蓋彌彰的可恥伎倆。

1968 年廣西大屠殺之事，長期得不到揭露和處理，原因就是因為韋國清和他的黨羽一直在把持著廣西的黨、政大權。大屠殺、大鎮壓本來就是他們搞起來的，他們怎麼能自己起來清查自己、處理自己呢？他們千方百計地壓制群眾，不准談論“文革”中廣西殺人之事，更不准揭露；誰敢於揭露，他們就會利用權力來封鎖、鎮壓，免使他們受到法律的追究，用心何其毒也。

1975 年韋國清調到廣州，其後又調到北京升遷，當了政治局委員、總政治部主任可謂“一路順風”。雖然“四人幫”倒臺，文革結束了，但安平生、喬曉光依次在廣西執政，執行的仍是一條沒有韋國清的韋國清路線，他的餘黨仍在把持廣西各地的大權。當全國各地都在清算

文革的罪行，平反冤假錯案時，廣西卻依然不動，使廣西的“處遺”工作比全國晚了六年多，其原因皆在於韋國清的緣故。

五、廣西的“文革處遺”及其給世人留下的遺憾

1968 年的廣西大屠殺，在韋國清當政時期不可能得到任何處理，這是在人們意料之中的。因為事情本來就是韋國清及各地的當權者們策劃、指揮的，他們不可能自己處理自己。但在韋國清調離廣西後，特別是在 1976 年 10 月“四人幫”垮臺後也仍然長期得不到處理這就使人不可理解了。“四人幫”的垮臺，文革的結束，全國到處都在清算文革的罪行，到處都在平反冤假錯案，追究文革中的壞人壞事，特別是那些作惡多端的殺人兇手，對他們依法嚴懲，這是廣大人民正義的要求，是時代的呼聲。然而在廣西，卻是景物依舊，人事依然；慶父不死，魯難不已。這可急壞了無數受難者的家屬們和無數受迫害的人們。他（她）們無不心急如焚，對那些殺人兇手和現在仍在保護殺人兇手的執政者充滿了無比的憤恨。

對於廣西的大屠殺，廣西人民一直都是不停頓地在揭露的。現在毛澤東死了，“四人幫”倒了，許許多多受難者家屬及受迫害的人們更是勇敢地站出來揭露韋國清及那些殺人指揮者和殺人兇手們的滔天罪行了。到了 1982 年，在全國各地處理文革遺留問題基本結束之後多年，在全國形勢的影響之下，在廣西人民的迫切要求之下，廣西的文革處遺工作也終將開始了。

1983 年初，中央派出工作組進駐廣西。中央領導人批評了廣西當時的執政者喬曉光，指出他在處理文革遺留問題上犯了錯誤，其後喬檢查了錯誤。在中央的督促下，廣西區黨委成立了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領導小組，區黨委先後發出了 [1983] 54、55、59 號文件，以指導廣西各地的“處遺”工作。文件中所規定的“處遺”方針和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實事求是，有錯必究”，“既要解決問題，又要穩定局勢”；對打死人問題和對殺人兇手的處理，要本著“宜粗不宜細，宜寬不宜嚴，宜少不

宜多”的原則行事。某些領導人甚至說文革中殺人問題的清查，要做到“水不能乾，石頭不能現”，“要向前看，不要向後看”，“要看當時的歷史情況”，現在如果“再殺一批人怎麼了得”。

根據區黨委和中央領導人的指示，廣西各地、市、縣都成立了文革“處遺”領導小組，抽調一批幹部從事“處遺”工作。首先是調查核實各地的冤假錯案和打死人的情況，然後進行處理。在此基礎上，否定了中央的《七·三佈告》，特別否定了廣西區革籌、廣西軍區的《六·一七公告》和桂林的《八·二〇公告》。對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反共救國團”、“暗殺團”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恢復名譽；對被非法殺害或迫害致死的人一律給予平反昭雪，強加於他們頭上的一切不實這詞一律推倒。對農村中被殺害的人，每個受難者發給喪葬費 100 元，撫恤費 120 元；如果是國家幹部和單位職工被殺害的，除單位給予喪葬費和撫恤費外，其未成年的子女由單位撫養至 18 歲，特困家庭的成年子女安排就業，孤寡老人和生活困難者給予定期的生活補助。這樣的處理無疑是一大進步，也是最起碼應該做到之事。

然而，對那些嚴重的違法亂紀者，特別是那些殘殺無辜的殺人兇手和它的幕後策劃者、指揮者們的處理，就不能令人滿意了。在 1983 年至 1985 年的文革“處遺”中，據官方的統計資料，全廣西 87 個縣、市、柳州鐵路局被非法殺害（包括被迫害至死者）共計 89810 人（民間估計應超過十萬），而在“處遺”中受到判處死刑的僅 10 人，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 14 人，判處有期徒刑的 1841 人；而受到黨紀、政紀處分的竟達 47617 人。這樣的處理結果就不能令人滿意了。受難者家屬無法接受，社會輿論也普遍不滿。

人們的不滿，首先是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人太少了。大屠殺中殺了 89810 人，現在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了，卻只有 10 名兇手被判死刑，14 名兇手被判死緩，判有期徒刑的也只有 1841 人，這怎麼能使人滿意呢？

當然，當年殺了近 9 萬人，現在不可能再殺這麼多人，這是人們

的常識所能理解的。雖然當年的亂殺人是在文革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事，但特定的歷史條件並不等於可以亂殺人，而殺了人並不等於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少殺是對的，但那些殺人手段殘忍、殺人數量多的兇手（連小孩也殺，全家殺絕）每個縣、市至少應有數名被判死刑，全廣西至少應有 100 至數百名兇手被處死才能足以平民憤，才能還法律的尊嚴與公正。

其次，人們的不滿是以黨紀、政紀的處分來代替法律的懲處。黨紀、政紀處分怎麼能與法律的懲處混為一談呢？文革中的殺人狂、迫害狂，甚至吃人肉、吃人肝，全廣西 47671 人只受黨紀、政紀處分，不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太叫人難以接受了。這近 5 萬名殺人兇手（或與殺人有關的人）至少有一半以上要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才是令人滿意的結果。

另外，一些幕後指揮者或者負有領導責任人的一些人，他們根本未受到任何處分。如韋國清就調離提升了；賓陽縣殺了三千多人，負有直接領導責任的賓陽縣革委會主任王建勳調到廣州升官去了；平樂縣武裝部負責人李帽山對平樂縣的亂殺人也是負有領導責任的，也調到南寧軍分區升官了。類似這樣有罪（起碼是過錯）未受到任何處分就調到異地升官的還大有人在，這怎麼能使人信服呢？

大屠殺本身就是一種政府行為，當時的革委會、武裝部、軍分區以至區革籌、廣西軍區，都是當時執掌大權的領導機關，他們發《通告》，鼓吹殺人理論，鼓動殺人，帶隊圍剿造反派，這不是政府行為又是什麼？個別地方至少也是政府不作為的結果；面對亂殺人他們看到了、聽到了，都不出面制止（或制止不力），都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

政府不能保護人民，這個政府又有何用呢？有的就是政府出面做的，政府的負責人站到了殺人兇手一邊。直到“處遺”的時候，也未見哪一級政府和哪一位負責人站出向受難者家屬和受迫害的人說一句道歉的話，他們哪里還有一點人性和自責之心呢？

特別是在那個瘋狂與荒唐的年代裏，以“革命群眾之手”，以“革

命”的名義殺人，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群眾專政”的歪理邪說，至今在一些人的頭腦中殘存，未得到很好的批判。一些人在談論文革問題的時候，往往會暴露出許多認識上的錯誤，這是十分令人憂慮的。一些人當年雖未參與殺人、打人，但他們在旁邊圍觀，有的還在喝彩，推波助浪，至今仍不感到內心有愧和自責，認識沒有提高，更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問題。文革“處遺”是一大進步，但它的不足，它留給世人的遺憾也是永存人間的。

六、廣西文革給世人留下的反思

文革是一場大災難、大浩劫，已是世人所公認的了。文革在廣西，更是一場反人類、反文明、滅絕人性的獸性猖狂大表演。在文革之初期（1966年至1967年初）廣西的文革與全國各地大致是相同的，只是受毛路線的挑動而產生的派性之爭而已。但從1967年的夏季以後，特別在1968年及以後的漫長時間，廣西的文革就有它的特殊性了。今天我們反思廣西的文革，至少有下面兩個方面是值得人們深入思考的。

一是關於韋國清的問題。文革的罪責當然首推毛澤東，沒有毛澤東挑起的文革，全國人民就不會有十年的大災難。然而在廣西，除了要追究毛澤東的罪責以外，更主要的是應追究韋國清的罪責。因為廣西的幾乎一切問題和事件，都是因為韋國清而引發的。正是他利用職權，指揮廣西軍區、各軍分區、人武部，支一派、壓一派；製造《六·一七公告》把“四·二二”派打成“反共救國團”、打成“反革命”組織；向中央謊報軍情騙取中央下達《七·三佈告》；公開動用軍隊鎮壓“四·二二”和“桂林老多”及廣大人民群眾，終於導致廣西大屠殺的發生，十多萬的生靈死於非命。那種種殘酷的殺人手段，那種殺人如麻的驚天慘案，乃是歷史罕見的。這是一場滅絕人性、反人類的大屠殺，比起當年的日本法西斯和德國法西斯的大屠殺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就是現代的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反人類的大屠殺、南聯盟前總統米洛舍維奇反人類的大屠殺，與韋國清的大屠殺相比也是遠遠不及的。

就是這麼一個韋國清，大屠殺發生之後，他一直壓制廣西人民，不准人們談論和揭露大屠殺之事，誰要敢於揭露他就要利用權勢來鎮壓誰，把人打成“反革命”而逮捕判刑。桂林的張雄飛、李新等二十多人的遭遇就足以說明韋國清的霸道和獨裁者的本質。

1976年9月毛澤東死了，10月“四人幫”倒臺，文革結束了，全國各地都在清算文革的罪行，都在平反冤假錯案。然而在廣西，大屠殺這人命關天的大事卻是仍在被壓制不准揭露，受難者及受迫害的人更談不上平反昭雪，這一切皆因韋國清及他的勢力仍在控制著廣西的緣故。

文革中韋國清對廣西人民是犯了罪的，不論從什麼角度來看，在廣西人民面前他都是一個罪人都應該受到法律的審判。然而大屠殺之後十多年了，從未見他對廣西人民有一絲一毫的檢討，從未見他對受難者和受迫害的人們有愧疚之情。直到1983年，全國各地文革“處遺”結束6年之後，在廣西人民的強烈要求下，在中央的督促下，廣西才開始文革“處遺”。而直到此時，韋國清才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發言說，“對錯誤認識不足，思想轉不過彎來”，仍未見有一句對廣西人民的檢討和道歉的話。所謂“思想轉不過彎來”，是他一直認為“文革中廣西有一條正確路線”，他自己就是這條“正確路線”的代表，他是一貫“正確”的，這種錯誤的思想一直在阻礙著廣西“處遺”工作的開展。

韋國清在廣西所犯下的罪行（絕非一般的錯誤），不但沒有受到任何清算和處理，反而一路升遷，實在是叫人無法理解的。更有甚者，到了上世紀的90年代以至本世紀的初期，仍有人在睜著眼睛說瞎話，還在為韋國清歌功頌德。這說明韋國清的餘毒、說明文革的餘毒遠未肅清，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警覺和思考。

如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廣西新四軍人物》一書，其中的一篇文章《一代英才億人景仰》是專門寫韋國清的；2000年6月，《南寧晚報》連續刊載了何紹榜寫的《韋國清上將主政廣西二十年》（下稱《兩篇文章》）。《兩篇文章》都是極盡能事吹捧和美化韋國清的，看了使人覺得肉麻，空話、套話使人生厭。

韋國清何許人也，他主政廣西到底幹了些什麼，廣西人民是最清楚不過的，任何歌功頌德和吹捧的不實之詞都是廣西人民所絕不能接受的。

1913年9月2日韋國清出生在廣西東蘭縣東院區板梅鄉弄英屯一個僮族農家。1925年夏天，韋國清的父親韋宗典因參加共產革命反對地主和國民黨的地方政府，於1926年7月17日遭團防局的伏擊而喪命；翌年春祖父韋廷繁也因參加共產革命而遭殺害。父親及祖父的死，給了韋國清巨大的打擊與影響，他決心為父親和祖父報仇，對國民黨和地主豪紳充滿了仇恨。1929年韋國清跟隨韋拔群參加農民運動，參加共產革命。他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百色起義，而後轉戰到了蘇區，成為正式中共黨員。在其後的漫長歲月中，韋國清從蘇區的反圍剿、到轉戰至延安、然後參加八年抗戰、到國共3年內戰向國民黨奪權，近二十年的時間從一個普通戰士而成為共產黨的將軍，就他的個人奮鬥來說是收穫頗豐的。他作戰勇敢，是深得共產黨領導人稱讚的。

客觀來說，韋國清參加了八年抗戰打日本，是為中國人民做了好事的。至於他參加共產革命，參加了兩次國共內戰，為共產黨奪取全國政權立下戰功，對中國人民來說卻未必有什麼功績可言。

就算他過去有功，也只能說明過去，不能說明現在，更不能說明將來。韋國清從1955年至1975年主政廣西20年究竟幹了什麼呢？

1957年的反右運動，1958年的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此時的韋國清雖是廣西的第二把手（劉建勳是區黨委第一書記），這些胡作非為、殘害人民的所謂運動，韋國清也是負有責任的。1960年的反瞞產，1960年至1962年的大饑荒廣西有數十萬人餓死；1964年至1965年的四清運動，大搞階級鬥爭，整幹部、整群眾、割資本主義尾巴，此時的韋國清是廣西的一把手了，他該負什麼責任不是很清楚的嗎？至於十年文革給廣西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是人所共知的，就無須再重複了。

而所有這些韋國清所犯下的罪行，《兩篇文章》皆隻字不提，不知

這是無心還是有意。作者的用意人民是會看得很清楚的。

更有甚者，《兩篇文章》最後都說：“1989年在他生命的最後時期，對制止動亂和平息北京地區的反革命暴亂極為關注，表現了一個共產主義者的赤誠之心，他的不朽功績將永載史冊”。至死都不忘獨裁專制，至死都不忘壓制人民、鎮壓民主運動；和他在廣西的一系列胡作非為，和他在廣西所製造的大屠殺一樣，他的罪行才是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

《兩篇文章》都在不顧事實地吹捧和美化韋國清，其目的在於掩蓋和抹去韋國清在廣西所犯下的罪行。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在民主化、法治化逐步實現的今天，還有人把韋國清這個獨裁者和禱子手搬出來胡吹，只能說明文革的餘毒遠未肅清，人民更應該反思文革，更應該深入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

其次，廣西的造反派與民主運動問題也是值得反思的。文革中廣西兩派的基本群眾都是在毛澤東思想和路線的指引下參加運動的，誰都標榜自己要“保衛毛的思想和路線”，“保衛以毛澤東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兩派之間的派性之爭，全都冠以“革命”的名義在進行鬥爭。這是文革初期那個特殊年代的普通現象。

然而，深入的研究和反思，人們會發現，最初參加所謂“保守派”的人，多是“老實、本分、聽話”的人，多是一些平時表現“積極”和“先進”的人；而參加“造反派”的人，多是一些所謂“不太聽話”、“思想活躍”、“調皮”的人。筆者和他的同伴當年參加“桂林老多”這個“老造反派”組織，正是由於平時對領導們的官僚主義和獨裁不民主的不滿，我們這些人具有一定民主思想，在毛澤東號召“造反”的言論指導下，很巧合的與我們要求民主的思想相結合的結果。後來的發展，社會上的一般群眾，特別是那些所謂的“地、富、反、壞、右”，他們也是同情和支持我們的觀點，這與他們長期受壓制、受迫害、沒有民主、連基本的人權都沒有有關係的。

全國造反派的先進典型，北京的遇羅克，東北的張志新，湖南的

劉鳳翔、楊曉愷，江西的李九蓮、鐘海媛，上海的林昭等人，她們反獨裁、反迫害、爭人權、爭民主的鬥爭是令人敬佩的，她們最終的遭遇是令人同情和惋惜的。我們廣西的造反派“四·二二”和“桂林老多”，也是因為反政治歧視，反迫害、反屠殺、爭人權、爭民主而受到殘酷鎮壓和屠殺，而且是集體的屠殺。1967年冬天和1968年春、夏的那場大屠殺，正是這種屠殺和反屠殺鬥爭的集中表現。

在這場你死我活的鬥爭中，反獨裁、反迫害、反屠殺、爭人權、爭民主一方是失敗了。這是因為獨裁者一方他們動用國家機器，動用了暴力手段，蒙蔽和欺騙那些愚昧無知的人，以“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群眾專政”的謊言，以“革命”的名義挑動起一些人的兇殘和獸性，草菅人命、大開殺戒而上演了一場20世紀人世間的大慘劇、大醜劇的結果。

其實，廣西造反派反迫害、反屠殺、爭人權、爭民主的鬥爭之所以遭到失敗，根本的原因是在於我們這個社會制度的問題，在於我們這個民族劣根性的問題。

我們這個國家的社會制度一直以來就是一個獨裁專制的制度。過去的封建統治者如此，其後的北洋軍閥政府如此，國民黨的政府如此，到了毛澤東的共產政權更是如此。毛的獨裁專制更是要遠遠超過了歷代的政府。毛氏的共產邪教理論深深地毒害了幾代的中國人民，他教導人們一切只為黨、一切只為領袖而存在，從不給人民以人權、民主和自由。他信奉暴力，視人權、民主為異端。1900年的拳匪暴亂、殺人放火被他視為“反帝反封建”的“偉大農民運動”；文革之初在北京這樣的文明城市就出現了“紅色恐怖”大屠殺，一千多人喪命，毛氏卻在鼓吹殺人兇手們是“勇敢的闖將”，他們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要把“彬彬”的名字改為“要武”。這種毛氏的狼奶餵養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一代又一代的狼群在中國產生，他們在為“革命”、“真理”、“理想”、“人民”、“領袖”、“主義”等等的名義下，不吃人、不施暴那才是怪事呢。廣西文革中的殺人兇手們正是這樣的狼群，在僧子手韋國清指

擰下一群兇惡的狼群。

中華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為人類作出過巨大的貢獻。但我們這個民族也存在著不足之處，一些人的劣根性，使他們愚昧無知、兇狠殘忍，這在每個時代都是存在的，只不過到了毛氏當權的共產時代，喝了毛氏的狼奶，表現得更為愚昧和兇殘罷了。

假如沒有獨裁者們鼓吹的“階級鬥爭”、“群眾專政”的歪理邪說，假如沒有那些具有劣根性的愚民受這些邪說的鼓動，大屠殺之事是絕不可能發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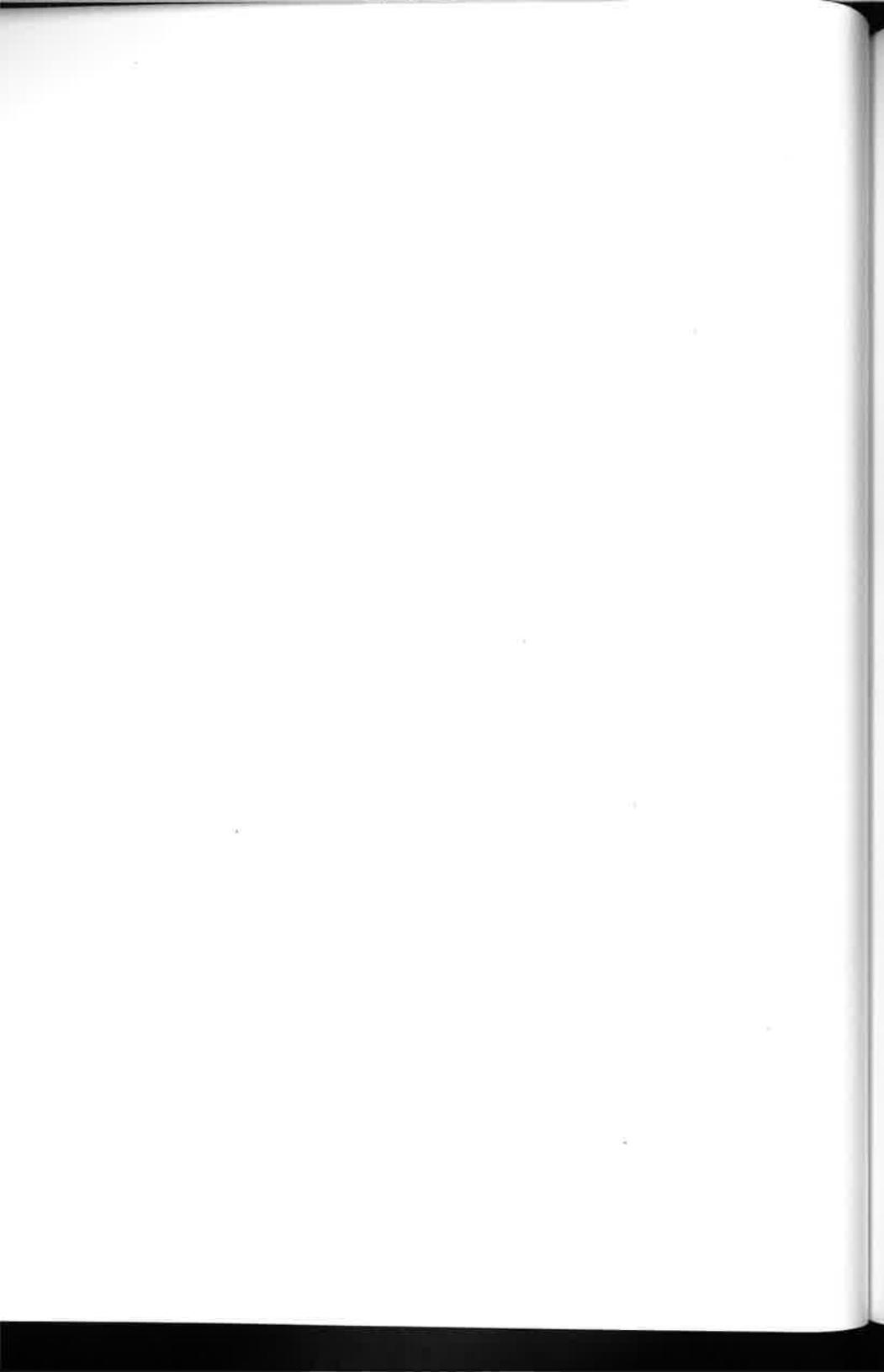
文革中要反思的問題是很多的，要總結的經驗教訓也是很多的。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政治體制要進行徹底的改革。這就要祛除人治，建立真正的法治；要取消一黨的獨裁專制，開放黨禁、報禁；真正實行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經濟市場化；給人民以真正的人權、民主和自由。惟有這樣，才能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才能與世界接軌。否則，文革之類的大災難說不定哪天還會在中國再現。

今年是文革運動爆發的 40 周年。在紀念文革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要使無數的受難者再被隱瞞、不要再被遺忘。要牢記文革的慘痛教訓，牢記文革中的廣西大屠殺。要使文革中的慘痛教訓、要使那種滅絕人性的大屠殺成為世人永久的警示。惟有這樣，才能使仁愛、友善、不害人、抵制暴力、尊重人、保護家庭、講禮儀道德、重知識等等這些社會生存的基礎得以實現，才能促進這個社會真正的和諧。這是今天的人們所要追求的和實現的目標。



第二輯

廣西文革列傳



引子

詩曰：朗朗乾坤，血雨驟腥風。冤魂屍骨遍人間，是誰造下妖孽。
八桂大地子民，慘遭醜類逞兇。危國強虜應灰滅，待春風化雨冰
雪。

這首詩說的是西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廣西各地發生大屠殺之事。列位看官，你知道廣西當時被非法殺害的有多少人，說出來著實令人心驚膽寒，最保守的估計，無辜慘死者幾近十萬人。近十萬的生靈死於非命，至今仍然叫人無法理解、無法相信。但這是血淋淋的無可爭辯的事實。可以說，這是廣西乃至整個中國自古以來極為少有的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人們知道，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國，殘殺中國人民，欠下了中國人民的累累血債。一九六八年的廣西大屠殺，其殺人手段之殘忍，殺人數量之多，比起當年日本法西斯在廣西的殺人來說，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九六八年廣西大屠殺的殺人兇手們的殺人手段五花八門，與日本法西斯和歷代統治者的殺人手段相比更有所創新。有開大會公開槍殺的，也有秘密處決的；有成批集體槍殺的，也有個別用刀慢慢割死的；有在批鬥、游鬥中用木棍打死，石頭砸死，甚至打死後用刀挖心肝、割肉煮食的；有的婦女先被強姦、輪姦後再被打死，也有先殺死丈夫再逼姦妻女的；有老人、兒童被殺的，更有全家被殺絕家財被強佔的。真乃無其不有，殘忍至極。當時還美其名曰是：“保衛紅色政權”，向“一小撮階級敵人大飈十二級颱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實行“群眾專政”。實在是人性的大毀滅，獸性的猖狂大表演。人類社會的歷史難道倒退到了野蠻時代嗎？

看官們必定會問，人類社會到了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早步入了文明時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何以會出現如此野蠻的大

屠殺呢？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有其發生和發展過程的。一九六八廣西的大屠殺，其原因當然與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關，與那個時代民主不健全、法制不健全有關，但直接的原因則是由於廣西當時獨裁統治者韋國清，這個號稱“僮（壯）族人民的優秀兒女”，“一代英才、億人敬仰”的韋國清，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是他、正是因為他使廣西產生了兩大派，而他大玩手腕支一派、壓一派，最終導致了大屠殺。

韋國清及其許許多多的殺人兇手們早已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今天活著的人們回首當年之事，旨在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牢記那個無法無天的時代，牢記那些慘死的冤魂，建立今天真正的法制社會，是人們最大的心願。

要知道文化大革命在中國是如何產生和發展的，又是如何傳到廣西的，廣西又是如何分成兩大派，韋國清又是如何支一派、壓一派以至後來又是如何發生大屠殺，讓筆者給你慢慢道來。

第一回 山雨欲來驚天動地 神州大地黑雲翻滾

話說一九四九年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把蔣介石及其國民黨趕到一群海島之後，中國大陸成了共產黨的天下，毛澤東理所當然的成了統治中國的領導核心。經過連年的戰爭，人們多麼需要休養生息，需要和平的環境來從事經濟建設。此時的毛澤東如果能夠順乎民意，順乎歷史潮流，中國的經濟建設將會長足的發展，人們也會有安居樂業的幸福生活。但勝利後的毛澤東未能順乎民意，未能順乎歷史潮流。他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所作所為有悖於民意和歷史潮流，諸如什麼統購統銷、肅反、農業合作化、反右派、大躍進、大煉鋼鐵、人民公社、反右傾等等，這一系列的所作所為，把個好端端的中國搞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把中國的經濟建設引入了歧途。然而，共產黨內也不乏明智之士，以劉少奇為代表的中共一批高層領導人，他們不認同毛澤東的一套作法，特別是自一九五八年毛退居二線後，劉少奇等一批高層領導人企圖使中國的經濟向好的方面發展。毛澤東對此十分不快。

一九六〇年開始，中國進入了三年的大災荒時期，期間有數千萬中國人被餓死，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為此，劉少奇等人積極主張中國要先發展經濟，糾正大躍進帶來的各種問題，毛澤東更是不能容忍。一九六二年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一九六四年又在全國開展“四清運動”，目的是要狠抓階級鬥爭，“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顯然，毛澤東是對著劉少奇來的。

早在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對蘇共赫魯雪夫批判史達林十分反感。他斷定蘇共赫魯雪夫搞現代修正主義，認為中共黨內也有現代修正主義的代表，有赫魯雪夫式的人在走資本主義的道路。他決心要清除“睡在

身邊的赫魯雪夫式的人物”。毛澤東為清除劉少奇等人，可以說是頗費一番心思的。這從一九七〇年和斯諾的談話可以看出，毛澤東認為中國需要個人崇拜，也就是需要更多的對毛澤東本人的崇拜。斯諾是美國著名的作家兼新聞記者，一九三六年曾訪問過中國的西北，與共產黨高層特別是毛澤東有過親密的接觸，成了毛澤東的好朋友。此次談話中毛澤東對斯諾說，許多權力——各省各地方黨內，特別是北京市委內的宣傳工作的權力他都管不了。當斯諾問他“你什麼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時，他親口回答道，一九六五年一月發表二十三條的時候他心目中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劉少奇。

毛澤東向來深知輿論的重要，他早就熟知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都要先作輿論的準備。為了把劉少奇搞下臺，他必須先在輿論上作準備。這時毛澤東抓住了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來做文章，作為搞掉劉少奇的輿論準備。海瑞是明朝人，作官時曾為當時的中國老百姓作了許多好事，深得人民的好評。就連毛澤東對海瑞敢於講真話“海瑞精神”都曾肯定。吳晗是我國研究明史的著名專家，在毛澤東希望找幾個歷史學家研究一下海瑞的鼓動下，吳晗寫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等文章。這些文章在報刊上發表後，是深得國人好評的，就連毛澤東本人也加以稱讚。不久，吳晗又在此基礎上寫成歷史劇《海瑞罷官》，此劇在全國上演，獲得一遍讚揚之聲。然而到了一九六五年，事情起了根本變化，毛澤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從讚揚海瑞精神，到批判劇本《海瑞罷官》。毛澤東認為，“中共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個海瑞”。為了達到批判《海瑞罷官》的目的，毛澤東通過他的夫人江青，跑到上海找中共上海市委領導柯慶施以及當時主管上海宣傳工作的張春橋和文人姚文元，商討寫作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江青曾多次秘密來往於上海、北京之間，最終由姚文元執筆寫成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並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匯報》上發表。在許多人看來，以為是一篇文藝批評的文章，文藝上有不

同的觀點是正常現象，這種看法是大錯特錯了。因為這背後是得到了毛澤東支持的，只是當時不為許多人知道罷了。其實這是一場大的政治風暴來臨的前奏，是文化大革命的輿論動員，它吹響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號角。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北京及全國許多地方的報紙都沒有轉載。對此毛澤東十分惱火，下令要求各地的報紙轉載。這顯然是毛澤東發向長空的一顆耀眼的信號彈，但大多數的中國人並不理解這個信號的意義。

圍繞著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它的作者吳晗，毛澤東和他的親信們要揭發批判，藉以達到在全國掀起文化大革命開展起來的目的。而劉少奇、彭真等一些人則加以抵制，允許發表不同意見，保護吳晗。彭真是北京市長，吳晗是副市長，保護吳晗也保護了他自己。毛澤東與劉少奇、彭真雙方圍繞此事展開了一場鬥爭，並且這個鬥爭迅速擴大。為了發動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和陳伯達、康生、張春橋、江青等一夥人不但批判吳晗和他的《海瑞罷官》，進而批判鄧拓、廖沫沙的《三家村劄記》、《燕山夜話》，直至批判彭真和他領導的中共北京市委，最後導致了彭真的下臺。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全國出現的聲勢浩大的批判和聲討《三家村劄記》和《燕山夜話》的高潮，來勢之凶是世人少見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佈，撤銷彭真具體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成立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康生為顧問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具體領導“文化大革命”。從此，江青正式步入了政壇，成了毛澤東開展文化革命任何人都無法代替的得力助手。

隨著文化革命運動的發展，緊接著改組了北京市委，由李雪峰組成北京新市委。毛澤東又拋出“彭、羅、陸、楊反黨集團”，一時間全

國上下大字報鋪天蓋地貼上街頭，各種批判會、聲討會此起彼伏，報刊上大塊的批判文章不斷湧現。真個是神州大地黑雲壓城，“文化革命”的烈焰在全國燃燒起來了。從此，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將要發生的是震驚世界的政治大爆炸。欲知事態如何發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劉少奇派出工作隊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

話說“五·一六”通知發出後，全國上下掀起了揭發批判“三家村”、“四家店”的高潮。其聲勢之大、來勢之猛。是中國人從未見過的。這時的毛澤東卻躲在外地靜觀事態的發展和變化，他時而在上海，時而現身武林（杭州），時而又跑到西方的一個山洞裏（韶山），北京發生的一切自有康生、江青等人隨時與他溝通。此時的北京日常工作雖在劉少奇和周恩來的掌握之中。毛澤東通過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秘密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點火，目的不在於學術批判，而是要往上搞。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在中央文革和康生的親自授意下，康生的老婆曹軼歐繞過北京大學黨委的陸平、彭佩雲，找到北京大學哲學系的聶元梓等人，鼓動他們起來造陸平等人的反，並特別說明上面有人支持他們。在曹軼歐的指使下，五月二十五日，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在北京大學張貼出來了。大字報措詞強硬，矛頭直指向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學黨委，聲稱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週圍，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制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雪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這篇大字報敢於造黨的反，這在中國人民的心裏產生了巨大的振動。許多人對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記憶猶新，對點名批評黨委書記當然難以接受，因而許多人站出來批判聶元梓，與聶元梓展開面對面的鬥爭，一時間使聶元梓等人難以招架了。

此時，康生則把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直接轉給了外地的毛澤東，

毛澤東看後拍手稱快，立即下令向全國、全世界公佈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

六月一日晚八時，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聯播節目時間，頭條重要新聞播放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全文。

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以《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的通欄標題。刊登了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全文，同時發表了陳伯達參與炮制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把陸平、彭佩雲等領導的北京大學稱為“三家村黑幫的一個重要據點，是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頑固堡壘”，號召“革命派”要“無條件地接受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對“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指示的，不論他們打著什麼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麼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都要與之堅決鬥爭，並把他們徹底摧毀”。

在《人民日報》的煽動下，全國上下哄然而起。僅幾天時間，全國各地工、農、兵、學、商各界掀起了聲援聶元梓等人的高潮，北京大學一時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心，聶元梓成了“文化大革命”英雄。五顏六色的大字報佈滿了北京大學的校園，校園內一片人山人海。

在北大的帶動下，北京的五十五所大專院校和部分中等專業學校、普通中學掀起了揪鬥黨委第一、二把手的浪潮。各個學校都貼滿了大字報，正常的教學秩序被打亂了。為了使學校的運動不出混亂，劉少奇讓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學校派出文化革命工作組，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參加了駐清華大學的“工作組”。為了維持學校的正常的秩序，規定各學校只在校內討論和批判。這些顯然是與毛澤東的想法背道而馳的。文化革命工作組進入學校，與試圖成為無政府狀態下的脫韁烈馬的學生發生矛盾，由此產生新的對立和鬥爭。

北京的“文革”工作組進到學校後，工作組立刻代行黨委職權領導學校的文化大革命，規定“大字報不要上街”，要“內外有別”，“開會要在學校開，不要在街上開”，“不要上街示威遊行”，“不要搞大規模

的聲討會”……學生中很快分裂成反對工作組和保護工作組兩派。當時，反對工作組的是少數派，處於受壓制和打擊的地位，像清華大學的蒯大富曾為此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珍等都曾為此而受到壓制和迫害。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秘密支持這些學生，使他們很快得以平反而成為“文革”的英雄，與北大的聶元梓一起，成了北京“文革”運動中的五大領袖。

學校中保工作組的一派是多數，他們得到工作組的支持，在學校中處於主導地位。然而毛澤東最終支持的是少數派，最後少數派成了響噹噹的造反派，工作組最終被迫撤離學校，工作組的負責人均被批鬥。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首都高等院校部分代表也列席了會議。會間，毛澤東和劉少奇為各自的觀點和行動進行了辯解。為了證明各自的正確，都在群眾中進行了大量的活動。劉少奇選擇了北京建築工程學院去蹲點。這個學校是在北京高校中最早形成兩個組織對立局面的學校，問題比較多，情況也比較複雜，劉少奇試圖按“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制定的“中央八條”的精神，用“試驗開小會議來解決矛盾”。此間，劉少奇就工作隊問題和學生運動問題多次講話，講話精神基本上是他前一階段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王光美則繼續在清華大學活動。然而，他們哪知道毛澤東的根本目的是要他們下臺。劉少奇這時的所作所為顯得那樣蒼白無力，缺乏氣勢。形勢的發展由毛澤東操縱著，對劉少奇他們則是越來越不利，以致劉少奇終日鬱鬱寡歡，憂慮不安。想起過去打天下立下了汗馬功勞，而今毛澤東對自己如此發難，不免悲痛萬分，與王光美抱頭沉思痛苦。

在毛澤東方面，他則認為應該用公開的、大規模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形式，製造聲勢，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於是，毛澤東通過江青與陳伯達、康生等人的活動，加緊了在清華、北大的工作，為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平反，以推動各高校的文革運動按他們的設想去發展。

八月五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大院裏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寫道：“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多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嗎？”。

顯然，毛澤東這裏指的是劉少奇，毛澤東使用了大字報這種非常手段，將正在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會議動向，在中南海裏洩露了。這無疑等於向中國人民宣告，他的大字報就是炮打劉少奇這個司令部的，劉少奇孤立了。

八月八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毛澤東要借用群眾的力量來達到個人的目的。《十六條》的公佈，使全國整個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一時間，全國各地的報刊都在頭條以套紅的大字標題全文刊登《十六條》。在各種宣傳工具的鼓動下，歡呼的人群，報喜的人流湧向了中南海，湧向了各省市委機關所在地。鑼鼓聲、口號聲、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響成一片，激情的場面顯示了群眾對毛澤東的敬仰。

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和中共高層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百萬學生，林彪、周恩來發表講話，號召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積極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破四舊，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誓死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在天安門城樓上，人們發現劉少奇的地位變了，從原來的第二位排到了第八位。人們還發現，原來被打成反革命的蒯大富及聶元梓、譚厚蘭、王大賓、韓愛珍等人此時也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江青

等文革小組的成員談笑風生，十分親熱。這是個極不平常的現象。

自此以後，個人崇拜的熱潮達到了極點，紅衛兵運動在全國興起。有分教，神州大地一時烏雲翻滾，各級領導幹部受到衝擊，許許多的文化名人、各種技術權威受到非人的待遇，無數的文物遭受破壞。抄家成風，游鬥成風，真乃革文化的命，革文明的命。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紅色恐怖震驚世界 造反有理響遍全國

話說毛澤東支持學生，學生們也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推動下，掀起了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狂熱。毛澤東走上了神壇，成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特殊作用的紅衛兵組織誕生的政治前提。當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出籠後，北京一些敏感的中學生似乎領悟到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與事件直接相關。首先是清華大學附中的幾個學生聚集在一起對形勢進行分析，提出現在應該“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並於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秘密組織了紅衛兵組織。在他們的影響下，六月初，北京地質學院附中、北京礦業學院附中、北京石油學院附中、北京大學附中以及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學的學生都相繼成立了“紅衛兵”、“紅旗”、“東風”等秘密學生組織，即是最早的紅衛兵組織。他們的誓言是：“我們是保衛紅色政權的衛兵，黨中央毛主席是我們的靠山，解放全人類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行動的最高指示。我們宣誓：為保衛黨中央、為保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我們決心流盡最後一滴血！”從此，“紅衛兵”開始作為一種狂熱的政治力量，步入中國的政治舞臺。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寫出了《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喊出了“造反有理”的口號。到了七月份，又連續寫出了《再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和《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大字報，在社會上影響十分巨大。毛澤東看到這些大字報後，寫信表示支持，並且在八月十八日接見百萬師生的大會上，欣然接受學生們送的“紅衛兵”袖套，把它戴在手臂上，這再次表明毛澤東非常支持紅衛兵。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

一夥更是火上加油，讚揚紅衛兵、支持紅衛兵。由此，紅衛兵運動在北京很快興起，並迅速遍及全國。

有了毛澤東的支持，紅衛兵瘋狂起來了，像一股洪流一樣衝向社會。霎時間，毛澤東的畫像遍佈全國，牆壁上到處是紅色油漆塗寫的毛澤東語錄，毛澤東選集和語錄本大量出版，人手一冊。本子上的封面都是紅色的，全國上下簡直成了一片“紅色的海洋”。紅衛兵殺向社會破“四舊”，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他們聲稱，要將世界改造為“非常無產階級化、非常革命化”的世界。

在大街上，紅衛兵們見穿有牛仔褲的，馬上就要強制剪破，有“飛機頭”頭髮的就會立即被剪光，“火箭鞋”被削平，高跟鞋被砸為平底鞋；一些街道也被強制改名，如長安街被改為“東方紅路”，東交民巷被改為“反帝路”，西交民巷被改為“反修路”，同仁醫院被改名為“工農兵醫院”。一些文物古跡更是慘遭破壞，如海灘區朱房村的漢城遺址內，珍藏著豐富的遺跡資料，被挖得千瘡百孔、面目全非，城內保存完好的大型漢墓也遭破壞。豐台區大井村延壽寺中，保存有完好的、有高度文化藝術價值的明初遺物千手千眼菩薩銅像也被拉倒，佛身斷為三截。手全部斷殘，成了一堆廢銅。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的古刹戒臺寺，戒壇上的大佛和週圍數以千計的小佛全被砸光。人們熟知的白塔寺、潭柘寺、團城、圓明園遺跡也遭到令人痛心的破壞。

伴隨著破“四舊”風的連連升級，更為殘酷的游鬥戴高帽成風，打人致傷、致殘直至把人逼死、打死也遍及各個角落。共產黨的高級領導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尚且被批鬥、遊鬥，一些中下層單位的領導人被鬥則更平常。那些名教授、名作家、名演員，知識份子精英們大多遭受到了批鬥、遊鬥，就連一般的中小學教師也有許多人受迫害的。戴高帽、遊鬥、打花臉、剃陰陽頭、拳打腳踢、罰跪等無奇不有，人格上遭受了極大的侮辱，甚至被迫害致死。著名作家老舍自沉，傅雷夫婦自盡，而北京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則是被人活活打死的，她是全國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名演員上官雲珠、舒秀文，以及各地

許許多被迫害至死的人，成了“文革”的首批冤魂。更有許多名著、名畫、文物被抄、被毀，是真正的革文化的命，是對文明的反動。

學生們的過激行動，是得到林彪和中央文革支援的，也是毛澤東所作所為影響的結果。這種瘋狂的行動很快就傳到全國各地，各地也依照北京的榜樣，到處破“四舊”，到處抄家，層層批鬥各地各單位的主要領導人，這些領導人在運動開始時還是這場運動的領導者，必然會堅決反對學生們這種行動。當時相當多的群眾還是聽單位領導的，他們組織起來與過激的學生相對抗，從而導致許多地方發生群眾鬥群眾，並把過激學生打成“反革命”的事件。如西安交通大學“六·六反革命”事件、“蘭州事件”、“長沙事件”、“青島事件”、“銅川事件”，以及發生在上海、四川等地的類似情況，對學生採取鎮壓的行動，使許多地方的學生在文革之初受到打擊和迫害。

面對這種受壓迫的處境，一些學生回顧多年來所受的教育，認為自己的行動是符合報紙上所鼓吹的“中央精神”的。一些血氣方剛的青年學生，揣著一顆探索“真理”的心，聚在一起，想要找“毛主席”、“黨中央”評這個理。而其中膽子大、脾氣勇的人尋路上京告狀，由此產生了外地學生逐步湧向北京。外地學生們到北京看到了許多大字報，特別是中央首長關於“文革”的講話，看到了北京的鬥爭，很快就把這些學到手，帶回本地，立竿見影，學以致用，各地的“文革”運動也就與北京一樣大搞特搞起來了。他們的行動的確得到了“毛主席”、“黨中央”的支持。從八月到十一月，毛共八次親自接見北京和來京串聯的紅衛兵一千一百多萬人次。九月初，中央還專門發通知支持大串聯，宣佈參加串聯的學生一律免費乘坐火車，伙食和住宿都由當地政府安排。

因此北京學生也北上南下，西進東出，把北京的一套迅速傳到了全國各地，所有這一切，對各地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北京的學生高唱著“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的造反歌，高唱著毛主席的“語錄歌”，戴著紅衛兵的袖套，配上黃軍帽、黃軍裝，背上小垮包，雄赳赳、氣昂昂地奔向全國。所到之處，各地“文革”接待部門都

要好生接待，解決他們寫大字報、印發各種傳單的紙張和用具。北京學生們的“造反精神”，被當地學生看著是“首都精神”、“中央精神”，甚至覺得是“代表毛主席”的，以致北京人的語言行動構成了當地運動的一個核心，與當地學生彙集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衝擊力量。這股力量勢不可擋，震撼全國，一時間全國上下出現了混亂不堪的局面。

正是這股衝擊的力量波及廣西，廣西的文化大革命也隨之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有詩曰：。

八桂大地起風霜，便有凶頑隨地生；。

危國強虜施暴政，人頭落地血成河。

這是廣西文化大革命中殘殺無辜，草菅人命的真實寫照，容後再表。

花開兩朵，話分兩頭。現在暫且擱下全國“文革”之事不表，單就廣西文革之事一一稟報給列位看官。欲知詳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師院學生遭受圍攻 桂林老多威震廣西

廣西“文革”的第一件大事發生在桂林。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廣西師範學院（現廣西師範大學）中文系學生率先貼出矛頭對準學院黨委領導的大字報，這無疑是在獨秀峰麓投下一顆重磅炸彈，立即在學院內引起巨大的反響。面對這突然襲來的大字報，學院領導認定有壞人在幕後操縱，當即在全院組織大字報進行反擊，聲稱要揪出幕後的黑手。

反擊的大字報出來後，不但不能制止矛頭對準學院領導的大字報，接著外語系、數學系及其他各系相繼出現了此類大字報。十四日，部分學生又貼出“炮轟桂林市委”的大字報。這可震驚了桂林市委，市委當即向廣西區黨委彙報，區黨委決心進行調查。並於二十日以區黨委的名義，派出桂林市委副書記徐為楷和中共自治區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申本田為首的文革工作組進駐廣西師院，領導該院的文革運動。學習北京的辦法，同時派出多個工作隊到南寧、桂林、柳州、梧州等地的大、中學校，領導學校中的文化革命運動。桂林是一座文化名城，廣西師院更是廣西有名的高等學府，文化革命一開始就走在了運動的前面。師院的學生們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積極地投入運動。從批“三家村”、“四家店”到揭發批判本院的“反動學術權威”，批本院的領導幹部，直到炮轟桂林市委，在廣西開創了把鬥爭矛頭對準各級領導的先例。一開始學校的秩序還是正常的，只是各種大字報逐步增多而已。也許由於該院的學生們有不少同學在外地、特別是在北京學習，北京及外省市一些文革運動的情況很快就會傳給他們。特別是中央領導人關於文革運動的講話，傳到桂林後對同學們有著巨大的影響。由此，學生們就越來越膽大，不但敢於寫學校領導人的大字報，也敢於給桂林市委寫大

字報，大有如一九五七年春夏之交整風期間的大字報高潮一樣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日，桂林市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成立，組長為市委副書記徐為楷。面對廣西師院出現的大字報高潮，學院和市委領導一方面組織大字報反擊，一方面暗中對寫大字報的學生進行調查，以便掌握情況，揪出幕後的壞人。為了使其他學校和單位不至出現師院的局面，二十八日，市委領導召開各單位負責人和工作隊隊長會議，介紹師院的階級鬥爭新動向，並組織與會人員參觀師院的大字報，以便吸取這裏的經驗，指導各單位的運動。

工作隊進到學院後，不斷的給敢於寫學院領導和市委大字報的學生施壓，誣陷他們是“右派翻天”，是“反革命行為”，以此來壓制寫大字報的學生。但壓力越大，反抗力就越強，同學們不聽市委的一套，他們的大字報越來越多，措辭也越來越激烈。大字報的矛頭不但對著學院的領導。也對著市委領導，甚至廣西區黨委領導的大字報也出現了。頓時，獨秀峰下沸騰了。

回顧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在毛澤東大搞“陽謀”的時候，也就是在這座獨秀峰下，當年的不少知識份子精英們，出於對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熱愛，響應號召，幫共產黨整風，校園內貼滿了大字報。然而事隔不久，這些滿懷熱情寫大字報的積極分子們就有許多人被打成了右派，遭到打擊和迫害。那種“反對本單位領導就是反黨”的邏輯，人們至今尚記憶猶新。事隔九年後，今天學生們又在張貼大字報，矛頭指向黨的各級領導人，事情還會是一九五七年的重演嗎？許多人是有疑慮和擔心的。

對於師院學生們的這些行動，工作隊和桂林市委、廣西區黨委都是反對的。為此，他們明令禁止師院的事情不得向外傳播，禁止各學校間學生們的來往和聯繫，關起門來搞自己學校的運動。當時，生活在桂林市的人不知道廣西師院校園內所發生的一切。然而封鎖終究不能持久，總有那麼一些學生會把校園內的一切傳到社會上，也總會有社會上的一些人會打聽到校園內究竟發生了什麼。學生們對這種關起門來搞運

動的作法越來越不滿意，反工作隊的呼聲也就越來越高，大字報也隨之更多、更激烈。桂林市委和廣西區黨委面對學生的過激行為，也感到有壓力了，有點招架不住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初，中央下令撤銷各地文化革命工作隊，以緩和和學生們的對立情緒。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駐廣西師院的文革工作隊撤離學校，此時有某些膽大的學生出於對工作隊的反感而貼出“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的對聯。工作隊和市委的領導人看後，認為這是壞人在乘機鬧事。八月七日，便組織工人赤衛隊、幹部和另一部分學生來揪鬥寫對聯的學生，聲言要揪出幕後的指揮者。開始是雙方的爭論，進而互相推撞，最後形成打鬥，有十多名學生被打傷。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桂林“八·七”事件。

八月八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了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決定，同學們深受鼓舞，於十日派出代表上北京告狀，要求改組桂林市委，要求廣西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到桂林處理問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給廣西師院學生們打來電報，決定派韋國清全權解決桂林的問題。十八日，區黨委書記喬曉光到廣西師院，召開全院師生大會，代表區黨委宣佈：撤銷黃雲的市委書記職務，撤銷徐為楷的市委副書記和市文革小組長的職務，任命王同連為市委副書記。當聽到宣佈後，同學們高興極了，頓時歡呼聲和口號聲響成一片。由於同學們事先得到了某些消息，早有所準備，當喬曉光剛宣佈結束，一些同學馬上湧上會議主席臺，給徐為楷戴上高帽，押上汽車開到市區內遊行。大批學生跟著汽車上街，沿途高呼“打倒徐為楷”、“擁護區黨委的正確決定”、“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毛主席萬歲”等口號。一時間，整個山城轟動了。這是桂林有史以來聞所未聞的重大事件。

說來也巧，廣西師院的教師和學生，從一開始就是多數反工作隊的，而保工作隊的只有少數人，這就是所謂的“師院老多”，也就是後來擴大到整個桂林市，“桂林老多”名稱的由來。在這一點上與北京和全國許多地方是不一樣的，因為在北京和全國許多地方，一開始反工作

隊的總是少數，也就是“造反派”在開始時總是少數，只有廣西師範學院的“造反派”一開始就是多數，這是很特殊的。

對於廣西師院學生們的這些行動，桂林市的許多人由於不瞭解真實情況，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尚不真正理解，因而反工作隊，打倒徐為楷、火燒桂林市委、火燒伍晉南這樣的大字報和口號，對於戴高帽遊街這樣的作法是不能理解和容忍的。人們疑慮這不是和一九五七年“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一樣了嗎？多數人是懷疑的、反對的；也有一些好心的人在為學生們的所作所為擔心受怕。然而，也不乏有人同情和支持學生們。

在文革的初期，桂林市各大中學校都是關起門來搞運動的，與外界隔絕，互相間不瞭解情況。現在師院的學生們衝出校園了，走上街頭，打破了工作隊規定的種種禁令。同學們有如脫韁的野馬，和市民一樣懷著一顆好奇的心奔向師院、湧向街頭。頓時師院校園內和大街上都是人山人海，熱鬧非凡。人們爭相看大字報，特別是中央領導人關於文革的講話，許多人並認真的用筆記本來作記錄。

師院的學生則三三兩兩的在校園內和大街上發表演講，闡明他們關於文革的各種問題和自己的觀點，號召人們起來反對那些阻礙文革運動的領導幹部，起來造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對於學生們的這些舉動，遭到了許多人的圍攻，他們指責學生們的行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右派翻天”，與學生們展開激烈的辯論。更有桂林市委和區黨委指令駐桂林的部隊出動宣傳車與同學們相對抗，組織幹部和工人圍攻學生。八月份正是桂林的盛夏時節，天氣炎熱，但人們的政治熱情比這天氣更熱。往往幾名師院的學生被數十人以至數百人圍在中間。名曰辯論，實則是在圍攻，不准學生離開，學生們長時間連水都沒有喝的，這就是最初狀態的群眾鬥群眾，完全是市委和區黨委一手組織策劃的。

這樣的的局面持續了數日，把個原來平靜的山城桂林鬧得人聲鼎沸。市民們在一起，即使是一家人在一起，談論的話題都是師院學生上街遊行、大字報和徐為楷戴高帽遊街之事。在這些議論中，同情的、支

持學生的有之，但是更多的則是不理解或者是反對的。不論是哪一種意見，人們關心國家大事的政治熱情是調動起來了。

學生從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十六條》中瞭解到，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治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保護少數，有時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裏”。有了中央的這些指示，一些頭腦敏感的人，特別是一些青年的知識份子開始思考桂林以至廣西的問題了，覺得學生們的作法也許是對的。有這種認識的人慢慢的多起來了。

面對桂林出現的問題，桂林市委及廣西區黨委的領導們，感到桂林的問題是嚴重的，他們顯然不願看到廣西師院學生們的這種行動繼續發展，更不要波及到廣西其他的地方。為了控制這種局面，區黨委一方面決定撤銷文革工作隊，一方面又留下觀察員監視學校的動態。八月下旬的一天，桂林市委在中心體育場召開有數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會上宣佈區黨委撤銷文革工作隊的決定，傳達了中央的指示精神。會議的最後是請韋國清講話。韋國清是區黨委第一書記、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委員，這樣級別的高官在桂林亮相，可見當時區黨委對桂林問題的重視和憂慮。韋國清本來到桂林多天了，住在一〇四部隊，派部隊宣傳車上街和組織群眾對師院學生的圍攻本來就是他指使的，他對桂林的情況十分瞭解。然而，當著數萬名與會群眾，他竟敢當面說謊。什麼他“昨天剛從北京到桂林”，對桂林的情況還不瞭解；“要求同學們要按照中央指示的精神開展文化大革命，要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開展運動，提高警惕，不要被別有用心的人欺騙和利用。”韋國清的撒謊很快被人揭穿，他的講話也遭到學生們有力的抨擊。

自八月下旬以來，外地的學生，特別是北京的大學生不斷來到桂林進行串聯，他們帶來了北京的許多資訊，並把北京的一些作法帶到了桂林，這對桂林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他們與師院的學生們的結合，增強了桂林學生們的力量和信心。此時的大字報更多了，不但貼滿了校園，大街上主要街道都成了大字報的海洋。大字報的內容也逐步升級，從打倒徐為楷到打倒黃雲，從打倒伍晉南到炮轟韋國清，鬥爭的矛

頭逐級向上，且愈來愈激烈。一些善良的人們看了大字報直搖頭，不知學生們要搞到什麼地方為止；但也有不少人看後覺得十分過癮，認為學生們有膽量，有水準。

北京學生的到來，他們手臂上都戴了紅衛兵的袖套，身穿黃軍裝，肩背小垮包，顯示出雄赳赳氣昂昂的朝氣與青春的活力。這些都成了桂林學生們的楷模。很快師院的學生們依照北京的樣子也成立了紅衛兵組織，並且各學校的紅衛兵組織聯合起來，成立了桂林市大中學校紅衛兵總部，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集中火力，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桂林市委，指向了廣西區黨委。

直到此時，桂林市委和區黨委仍然認為師院學生們的行動定是受到壞人指使的，其行為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要與之堅決鬥爭，揭露操縱他們的幕後指揮者的陰謀。為此，市委在學校中組織另外的學生成立“紅旗紅衛兵”組織，在機關職工和工廠中成立“工人赤衛隊”，與師院學生和桂林市大中學校紅衛兵相對抗，從而挑起了不同觀點兩派群眾間的矛盾和鬥爭。

在桂林市委和區黨委的授意和支持下，紅旗紅衛兵和工人赤衛隊在街頭上貼出了不少反對師院“老多”的大字報，誣稱師院“老多”是“右派鬧事”，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有的大字報則指名道姓說某人是“地主、資本家的兒子”在搞階級報復，某人又是什麼“野心家”、“投機分子”等等。有些敢於公開表態支持師院學生的幹部、職工則遭到指責和圍攻，少數人則被本單位領導打成“反革命”而遭到迫害。文革初期的“槍打出頭鳥”，在桂林是較為普遍的。桂林附近的一些縣城，當地領導更有組織群眾大會來聲討師院“老多”的。桂林的事態發展就顯得愈來愈嚴重了。

圍攻和聲討，都是在桂林市委和區黨委的指揮下進行的，目的是製造白色恐怖給學生們施壓。然而這一切都不能嚇倒學生，相反更激起了學生們的對立情緒。為了抗爭，學生們不但寫出了更多的大字報，並且於九月七日到桂林市委大院內開展絕食靜坐鬥爭，要求市委承認和

檢討認錯，不許圍攻學生，此舉使桂林及廣西的領導更感到了事態的嚴重。

連續三天的絕食靜坐，把個桂林市鬧得滿城風雨，市委的領導們則更是躲避不敢出面。但一些學校和單位聲援學生們絕食靜坐鬥爭的大字報和遊行隊伍不斷增多。面對此種局面，市委領導則是躲在後面，組織紅旗紅衛兵與工人赤衛隊與之對抗。市委組織人數更多的隊伍，出動多輛宣傳車，不分白天與黑夜地在街上亂跑亂叫，高音喇叭聲不絕入耳，似乎把個山城都要翻起來了。更有甚者，《桂林日報》的攝影記者陳亞江拿著他那鎂光燈跟隨赤衛隊沿路拍照，鎂光閃爍，赤衛隊員則高喊“好消息，南寧來電，黃賽陽被打，張鐵錨被抓”，企圖向靜坐絕食的學生們施壓。赤衛隊的狂叫聲震撼著桂林的夜空，也吸引了不少市民的圍觀。

黃賽陽本是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張鐵錨則是北京農業機械化學院的學生，他們隨北京南下串聯隊來到桂林，煽風點火，推動桂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他們支援桂林學生們的靜坐絕食鬥爭，並與桂林的學生代表共赴南寧，找區黨委領導請願，要求解決桂林的問題。到南寧後，他們大鬧區黨委，使南寧市的空氣也驟然緊張了起來，搞得區黨委的領導們大不好受。這種局面在南寧第一次出現，許多人都未見過，都趕來看熱鬧，甚至圍攻桂林和北京的學生，因而才有“黃賽陽被打，張鐵錨被抓”這樣的消息傳到桂林。

經過桂林和北京學生們的鬥爭，區黨委和桂林市委承認了桂林學生們的靜坐絕食是革命行動，並答應和同學們就桂林文化大革命之事進行討論。就此靜坐絕食結束了。學生們回到了學校。

桂林和北京的學生們繼續在南寧進行串聯，桂林的學生並正式打出了“桂林老多”的旗號開展各種活動。他們不但到南寧的大中學校、機關、工廠進行串聯，也到全區各地進行串聯，一時間“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在八桂大地震響，到處擺開了“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戰場，造單位領導的反成了各地學生們的行動目標。八桂大地

沸騰了。這都是毛澤東、陳伯達、江青等人講話影響的結果，也是《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等眾多宣傳機器鼓動的結果，更是“桂林老多”和北京南下學生串聯、煽風點火的必然結果。從此，“桂林老多”的聲威大震，成了廣西響噹噹的革命造反派，似乎由他們在左右廣西的形勢。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各級領導膽顫心驚

話說桂林“老多”和北京南下串聯隊在南寧大造區黨委的反，他們高舉“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大旗，到處煽風點火，一時間把個南寧鬧翻了天，弄得區黨委和南寧市委的領導人韋國清、伍晉南、賀希明、霍泛、袁家柯等人東躲西藏，不敢見學生。他們派一些辦事人員與學生週旋、應付，這就更激起了學生們的不滿。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九日兩天，一些學生到區黨委“靜坐絕食”，要求區黨委領導人接見學生代表，並向全廣西人民檢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區黨委的領導韋國清、伍晉南等人一則是怕見學生，再則也認為桂林的“靜坐絕食”事件剛解決，現在又到南寧來鬧事，認為學生們的要求是無理的，也是難以滿足的，因而就想方設法來對付學生。

伍晉南是廣西區文革領導小組的組長，面對學生們在區黨委的鬧事和“靜坐絕食”，他與韋國清研究後，就指示區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賀亦然出面，組織南寧市的一些機關幹部和學校的學生、工廠的工人出來圍攻“靜坐絕食”的學生，寫大字報來反擊他們，並企圖把桂林“老多”和北京南下串聯隊趕出南寧，說他們是“串亂”隊，是“煽陰風、點鬼火”，擾亂了南寧的大好形勢。區黨委和南寧市委所做的一切，不但不能把這些學生們趕走，相反更激發了他們的反抗情緒。

經過桂林和北京學生們的串聯和煽風點火，南寧的形勢果然起了變化，首先是南寧市的一些大、中學校的學生起來造反了，接著一些機關和工廠的幹部、工人也起來了，他們成立了紅衛兵、戰鬥隊與桂林、北京來的學生一起造反，鬥爭的矛頭對準南寧市委和廣西區黨委。如廣西醫學院的“闖”、廣西大學的“革聯”、南寧二中的紅衛兵、區水電

廳的“火種”、區直機關“捍衛毛澤東思想戰鬥隊”等，都是當時群眾組織中十分有名的戰鬥隊，成了南寧第一批革命造反派。這些造反派的負責人如龍智銘、曾春生、石懷宇、曹東峰、朱仁、熊一軍等人，一夜之間幾乎就出了名，成了群眾運動的領袖人物。這些戰鬥隊都表明支援桂林和北京學生的革命行動，徹底批判南寧市委和廣西區黨委的錯誤，決心把南寧和廣西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就使南寧市的文化大革命向前邁進了一步。

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十月中旬，中央又召開了工作會議，各省市主要黨政領導人都出席了會議。會議聽取了林彪和陳伯達關於文化革命的講話和幾個月的總結報告，指出要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堅定不移地執行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不要怕群眾，要相信群眾自己會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會後，韋國清、喬曉光回到廣西，對中央會議的主要精神無聲無息。在全區的三級幹部會議上，韋國清仍然認為區黨委沒有錯誤，向到會的幹部大談如何對付紅衛兵的先進經驗，並要求各級黨委堅守崗位，要支援左派學生組織紅衛兵，機關、工廠要成立赤衛隊，與少數壞人作堅決的鬥爭，防止壞人的破壞和搗亂。韋國清的所有這些舉動，顯然是與毛澤東的文革路線格格不入的，必然要遭到桂林、北京南下學生和南寧市造反派的抵制和批判。

在桂林及北京南下串聯學生的鼓動下，南寧市的學校、機關、工廠的大字報多起來了，並把大字報、大標語貼到了大街上，矛頭直指南寧市委和區黨委，特別是它的主要領導人袁家柯，肖寒、韋國清、伍晉南等人。

八月二十五日，南寧市二中、三中、廣西大學等多個學校的紅衛兵組織聯合組成“南寧市紅衛兵聯合司令部”，向市委、區黨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開火。其後，南寧的一些工廠的造反派也聯合起來，成立“南寧市工人革命造反總部”（後改稱為“廣西工總”），造反派的力量逐步發展壯大了。

十二月八日，二十多個造反派組織在自治區體育場召開十萬人大

會，批判區黨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造反派封管了《廣西日報》，並奪了《南寧晚報》的權，從而把廣西的文革運動推向了新的高潮。

隨著文革運動的發展和深入，外地學生到廣西串聯逐漸增多，廣西學生也大批到北京和全國各地串聯，回到廣西後帶回了許多外地特別是北京的經驗和作法，一些原來偏向保守的人也開始敢於造反了，一些人也加入到造反派的組織中去，從而使造反派組織的人數大增，而偏向保守的組織則人數越來越少。這些造反派們不但敢於造本單位領導的反，更敢於造上一級黨政機關領導的反。他們寫大字報，開展大批判，也走上街頭破“四舊”、立“四新”，並到一些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黑幫”、地主、資本家和一些領導幹部家中抄家，企圖找到一些“封、資、修”的材料，好展開批判鬥爭。許多人，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都受到大的衝擊，他們大多躲藏起來不敢見學生，躲藏不及的就受到大會、小會的批判鬥爭。一時間，廣西幾乎成了無政府主義，各級領導機構都處於癱瘓狀態，只有少數幹部在做紅衛兵的接待工作。然而仍有一些領導幹部在幕後組織一些人成立各種各樣的戰鬥隊來和造反派們對抗，來保護自己。這些較為保守的組織一開始時人數還是比較多的。敢於造反和保守的組織在文革時初期形成了造領導的反和保護領導兩派的鬥爭，這種鬥爭主要是通過寫大字報辯論，或者開大會相互辯論，激烈的時候會出現圍攻。和後來出現武鬥相比，還算是文明的。

不但城市出現了兩派的鬥爭，很快縣級城鎮也出現了兩派之爭，最後發展到工礦企業、甚至農村也出現了兩派鬥爭，把生產的形勢也搞亂了。在廣西，工礦企業兩派之爭首推平桂礦務局了。該局是中央的直屬企業，以產業工人為主，也有不少工程技術人員，局裏有中學，這些中學生同樣到北京和外省市進行串聯，帶回了許多北京和外地的東西，回來後帶頭成立紅衛兵和各種戰鬥隊，造局領導的反。特別是從北京來的學生，到局裏進行串聯，煽風點火，如清華大學學生吳瑞等人的到來，使局裏出現了許多戰鬥隊，最後聯合起來成立了“平桂井岡山”，

是一個有名的造反派組織，他們在局裏大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批局領導執行的修正主義路線，領導們認為他們是鬧事，是有壞人操縱，因而就組織力量反擊，同樣出現了兩派的鬥爭。

第六回 韋國清桂林被遊鬥 伍晉南南寧發聲明

書接上回，話說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年底，由於毛澤東的革命路線不斷深入人心，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慢慢失去了市場，從而使廣西各地的造反派隊伍在逐步擴大。特別是在桂林市，經過桂林“老多”和北京南下學生與桂林市領導人馮邦瑞市長的多次公開辯論，桂林市委執行的是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逐步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了，桂林“老多”的隊伍就逐步增大，而市委支援的保守組織紅旗紅衛兵和工人赤衛隊則在天天縮小，到了一九六六年底就宣告垮臺了。接著市長馮邦瑞開始轉向“老多”，而新上任的市委副書記王同連則完全支持“老多”，桂林市的文革運動發生了新的變化。

只有韋國清等廣西的主要領導人此時仍站在學生的對立面，打壓學生的造反舉動。此時的桂林“老多”則把鬥爭的矛頭集中指向了韋國清，打倒韋國清的大字報則貼遍了桂林和南寧。

轉眼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一月。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人在張春橋、姚文元等的授意和支持下，製造了“安亭事件”，一舉奪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黨、政、財、文大權，此舉並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這就是所謂的“一月革命”。受“一月革命”的影響，全國各地都發生了連鎖反應，進行奪權鬥爭，從而進一步掀起了批鬥領導幹部的新高潮。在這種形勢的推動下，桂林“老多”的學生們在劉振林等人的帶領下奔赴南寧，與南寧的造反派一道共同揪鬥韋國清；給韋國清戴高帽遊街，事後並把韋國清及賀希明等自治區領導人押送到桂林，一月十九日起連續三天在市體育場召開幾萬人的批鬥大會，批鬥韋國清及賀希明，並把桂林地、市黨政領導人黃雲、劉竹溪、王祝光等拉到會場陪鬥。會

後並把韋國清等人戴上高帽在市區遊街批鬥。此舉使韋國清的威風掃地，支援他的保守組織也頃刻全部瓦解。後來，韋國清對造反派的瘋狂報復便由此而起，此是後話。

上海的一月奪權後，成立新的政權，毛澤東稱之為“革命委員會”。接著有黑龍江、貴州、山東等省造反派也奪了權，相繼成了革命委員會。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東北的新曙光》；貴州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西南的春雷》以示慶賀。這些社論的發表，表明了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勝利，表明了毛澤東支持奪權成立新的政權的決心。在此種形勢下，各地的許多領導幹部，原來是壓製造反派的，現在則公開表態支持造反派了，他們也紛紛檢查自己的錯誤，站出來亮相，表明自己支持造反派的態度，爭取被結合到新生的政權——革命委員會中去。在廣西，首先站出來檢查錯誤並表明態度支援造反派的是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等黨政領導幹部。他們原是和韋國清、伍晉南一道支持保守派打壓造反派的，現在則轉變立場支持造反派了，於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公開發表聯合聲明，表明了自己的態度。此舉立即得到了廣西造反派的歡迎與支持。

在此種情況下，廣西軍區出面了，一方面軍管《廣西日報》，一方面於一九六七年三月下旬做支持韋國清站出來的工作。同時對造反派施壓，砸了造反派“工總”，逮捕了“工總”宣傳委員熊一軍。這些都遭到了造反派的極力反對。

到了一九六七年四月，區黨委書記、區文革小組組長伍晉南站出來了，並與賀希明、霍泛、傅雨田及南寧市委書記袁家柯等人聯合起來，於四月十九日發表聯合聲明（習稱“四·一九聲明”），公開支援桂林“老多”和南寧的造反派，並承認過去跟隨韋國清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他們決心改正錯誤，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與造反派共同戰鬥，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伍晉南等人的“四·一九聲明”發表後，在南寧以至在整個廣西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各地、市、縣不少的黨政幹部也先後站出來亮相，

表明態度，支持造反派。如自治區黨政機關的謝王崗、吳洪甯、楊明、謝東來、滿謙子、張青棟等一批領導幹部、桂林市市長馮邦瑞，桂林地委書記吳騰芳，南寧地委書記甘懷勳，百色地委書記鄭少東，玉林地委書記韋樹輝，柳州鐵路局黨委書記張炎，以及一些縣的黨政領導幹部都站出來亮相，表明態度支持造反派。伍晉南及許多地、市、縣領導幹部們的行動得到了各地造反派的熱烈歡迎和支持。

四月二十二日，南寧造反派組織一萬多人到《廣西日報》靜坐，反對廣西軍區對《廣西日報》的軍管，同時成立《南寧“四·二二”火線指揮部》（後改為《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習稱“四·二二”）。其後，廣西各地的造反派都先後加入到“四·二二”的行列中來，支持伍晉南，反對韋國清。

面對此種情況，韋國清及廣西軍區負責人大罵伍晉南是“投機分子”，是“分裂革命隊伍”，是想“奪廣西的大權”，這是決不能容忍的。五月二十五日，他們支持另一派群眾組織在自治區人委大樓成立“五·二五革命行動指揮部”（後改為“聯指”），提出維護軍管，保衛《廣西日報》的口號，公開反對伍晉南，支持韋國清，與“四·二二”派針鋒相對。

自此，南寧的兩派“聯指”和“四·二二”圍繞著“支韋”還是“支伍”展開了激烈的鬥爭，這場鬥爭影響到了全廣西，各地、市、縣，也形成了“聯指”和“四·二二”兩派。

“四·二二”一派是以學生和工人為主體，也有部分機關幹部和農村中的農民，特別是桂林“老多”，是有名的造反派，《光明日報》和新華社都發表過文章肯定了的，得到了六九五五部隊的有力支持。廣西“聯指”是以工人、職工幹部和農民為主體的隊伍，也有部分學生，這些人原來都是保工作隊、保領導的所謂保守派，在“一月革命”中垮臺了，現在由軍區支持重新集結起來的。在兩派的鬥爭中，顯然“聯指”一派佔有優勢，因為他們有廣西軍區和各級實權人物的支持。

廣西軍區為了支持韋國清，不但扶持“聯指”起來與“四·二二”

抗衡，並在政治上給“四·二二”施壓，企圖從組織上把“四·二二”搞垮。五月二十九日，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給造反派“新工總”和“倒海翻江”等組織發出了“忠告、警告”書，六月二日又對“四·二二”火線指揮部發出通告書，目的在於打壓“四·二二”，以便“聯指”支持韋國清，打擊伍晉南等人。從而使南寧兩派的鬥爭，最終出現武鬥，整個六月到八月期間，武鬥十分激烈。如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南寧一中發生大規模武鬥，“四·二二”和“聯指”雙方各有二三百人受傷，此次武鬥揭開了廣西兩派武鬥的序幕。六月中旬，南寧“聯指”派組織一千多人進攻廣西日報，企圖反奪權。六月二十一日，南寧“聯指”又調動工人及郊區農民包圍區水電設計院“四·二二”派據點“火種”大樓，設計院工人藍晨被“聯指”派用鋼叉刺死。大樓被攻下後，有六人被“聯指”派關押並毒打。六月二十五日，“聯指”派又進攻文化大院，“四·二二”派紅衛兵二十多人被打傷。

為了增強自己的力量，在武鬥中能取勝，七月十三日，南寧“聯指”組織數百人到廣西軍區警衛連和區黨校分部駐軍六九八四部隊搶走步槍、衝鋒槍三百多支，輕機槍三挺，六〇炮一門，彈藥一批，這是廣西第一次出現的搶槍事件。“聯指”派的這一舉動，更增加了南寧市及整個廣西武鬥的緊張局勢。

八月四日，“聯指”又調動上萬武裝人員到廣西日報奪權，並同時圍攻文化大院和區展覽館兩地“四·二二”據點，武鬥中雙方傷亡嚴重。九日，“聯指”佔領廣西日報，並繼續圍攻展覽館。二十日，“聯指”又攻打工人醫院和民族電影院“四·二二”據點，“聯指”死一人，“四·二二”死九人。

在此期間的武鬥，雖然較激烈，但開始時雙方主要是使用石頭、木棍、鋼叉、彈弓罷了，因而死亡人數較少。從八月份開始，雙方武鬥中開始出現槍支，因而傷亡程度也隨之增加。

一九六七年的形勢，就整體而言對造反派是有利的。因為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在全國勝利了，毛澤東支持造反派，部隊支左也是要支持造

反派，因而整個形勢對“四·二二”特別是桂林“老多”是有利的。但就局部地區來說，在廣西，除桂林而外，各地“四·二二”卻仍然處在受壓制和打擊的處境。因為廣西軍區及各軍分區、武裝部、各地仍在掌握實權的領導幹部，他們都是支持“聯指”反對“四·二二”的。廣西軍區的背後是廣州軍區的黃永勝，“聯指”有了他們的支持，自然是為所欲為了。“聯指”一派原來都是保守派的，現在他們重新集結，也敢於“造反”了，他們大造伍晉南、賀希明等人的反，要把他們堅決打倒。為此，他們到處發難，製造事端，中斷鐵路運輸，以此來打擊桂林“老多”、廣西“四·二二”和伍晉南等一批站出來的領導幹部。

面對此種局面，桂林“老多”奔赴南寧，支援““四·二二”的鬥爭，奔赴鐵路沿線維護鐵路暢通。有分教：南疆大地“老多”爭立新功，韋國清認錯交出檢討。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桂林老多護路立功 韋國清認錯交檢討

話說廣西“聯指”這個由保守派重新集結而形成的組織，他的骨幹成員是幹部、工人、少數學生，而眾多的成員則是不瞭解真實情況、不明事理的廣大工人和農民。他們的主要成員在文革之初是受單位領導和工作隊支配的，是保工作隊和領導的所謂“保皇派”。在那時，誰要是站出來反對工作隊和單位領導，特別是反對省、市的領導，他們就會在領導和工作隊的支持下，槍打出頭鳥，把那些敢於造反的人打成右派和反革命。圍攻敢於起來造反的人是他們的本領。他們聽不得“造反”二字，一聽有人喊“造反有理”，他們就反感，就要歇斯底里大發作。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革命”後，這樣的保守組織被毛澤東的革命浪潮衝垮了。然而，到了一九六七年的夏季，在廣西，當伍晉南等一批領導幹部出來亮相支持造反派後，這些原來的保守組織成員，重新集結在韋國清的旗幟下，得到廣西軍區的支持，此時他們敢於大造伍晉南、賀希明等人的反了，“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是他們喊得比誰都響亮了，這真是有點出乎人們的意料。

廣西軍區和韋國清與“聯指”形成“三位一體”，他們鬥爭的目標就是伍晉南等一批站出來亮相的領導幹部，要打擊的對象則是桂林“老多”和廣西“四·二二”。為此，“聯指”一派不但在南寧挑起大規模武鬥，在廣西各地、縣也在製造事端，挑起武鬥，圍攻各地的“四·二二”。如平樂、荔浦、容縣、鳳山、宜山、柳州、臨桂、北海……等許多地方，兩派都發生衝突武鬥，多數地方的“四·二二”派都處於受打壓和圍攻的困境。就是在桂林，“老多”的力量雖然占絕對優勢，“聯指”派由於有軍區和韋國清的支援，有桂林地區各縣“聯指”的支持，

仍然敢於對“老多”尋釁鬧事，挑起武鬥。

桂林“聯指”是由原來的保守組織工人赤衛隊和紅旗紅衛兵的成員組成的。在“一月革命”的衝擊下，他們原來的組織垮掉了；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五月，隨著南寧“聯指”的興起，廣西各地的“聯指”也先後成立，桂林“聯指”也在五月底宣告成立了，為首的頭目就是李年生和桂林市委宣傳部的幹部曹鐵軍、五金站幹部曾明軒等人。他們的組織成立後，為了對付“老多”急於要搞到武器。在鹿寨縣、臨桂縣和柳州“聯指”的支持下，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他們組織一千多人突然包圍、封鎖二塘火車站和炸藥庫，並向炸藥庫發起攻擊，打傷“老多”十三人，撬翻鐵路五十多米，使鐵路運輸中斷。同時，“老多”的一名汽車司機（歸國華僑）被他們抓到二塘，慘遭殺害，這是桂林市出現的第一起殺人慘案，是一起嚴重的事件。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晚，桂林“聯指”二百三十多人（大部分人持槍）分乘八輛大卡車從荔浦回桂林，到達雁山郵電局門口時，與桂林“老多”相遇而發生激戰。“聯指”佔領了雁山糧所，搶裝了一卡車半糧食，搶走了部分糧票和二十多張毛毯，九十雙膠鞋，兩箱炸藥，三十多枚手榴彈。不久，從桂林方向趕來增援的“老多”武裝人員開來十輛大卡車（其中有兩車為支持“老多”的解放軍）趕到雁山，“聯指”人員即帶物往南撤退。

九月十五日早晨八點多，突然，有桂林駐軍和“老多”一千二百多人，全副武裝，分乘五十輛卡車駛入陽朔縣境內，分佈在葡萄到白沙一帶的公路上，在白沙與“聯指”相遇，雙方發生武鬥。激戰數小時後，陽朔“聯指”陸續增援白沙，掩護桂林“聯指”人員撤往陽朔、荔浦等地。武鬥中雙方各死一人，傷數人，時稱“九·一五”事件。

在廣西境內，除桂林、柳州、南寧三座城市“四·二二”的力量強大外，其餘地方大多是“聯指”的力量強大，特別是各級地方的實際大權都掌握在“聯指”一派手中，因而他們仗勢欺人，為所欲為，製造事端，搞亂社會秩序，破壞交通，特別是鐵路交通，然後又嫁禍於

“四·二二”，以此來打擊“四·二二”。所有這一切，給廣西的經濟建設造成重大的損失，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為了維護廣西文革的正常秩序，維護鐵路交通的安全暢通，桂林“老多”在六九五五部隊的支持下，派出大批的學生赴鐵路沿線開展護路工作。他們與支左部隊和柳州鐵路局職工一道沿湘桂線、黔桂線沿線進行宣傳，與鐵路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組織工人和當地的農民開展文化革命運動，揭穿了“聯指”派破壞鐵路交通的陰謀，保障了鐵路交通的暢通，深得當地群眾好評。就連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也為此表揚桂林“老多”，說他們維護鐵路暢通是立了功的。周總理的讚揚，使“老多”倍感親切，更感到自身的責任之重大。

桂林“老多”這支造反派的隊伍，可以說是毛澤東“造反有理”的忠實的執行者。這群思想激進而又單純的青年學生，他們不為名、不為利，一心一意投入到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去，捍衛毛澤東的思想和他的革命路線，堅決反對和抵制反毛澤東思想的人。“老多”和“四·二二”都認為韋國清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就是反毛澤東思想的人，必須徹底批判使其檢查錯誤，如繼續堅持錯誤就必須堅決打倒。與此相反，廣西“聯指”則認為韋國清是“僮（壯）族人民的優秀兒女，是毛主席的好幹部，必須要支持和擁護”；要打倒的則是支持“牛鬼蛇神的陰謀家伍晉南和賀希明等人”。廣西這兩派圍繞“打韋”還是“打伍”，“支韋”還是“支伍”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由於廣西軍區和韋國清支持“聯指”，打壓“四·二二”，使兩派不時出現武鬥，如從一九六七年的五月開始，南寧市內連續出現大規模武鬥，廣西的一些縣、市也相繼出現兩派的武鬥。到了八月，桂林也出現了武鬥的緊張局面，至此，全廣西多數地方都出了混亂不堪的局面。

為了穩定廣西的局面，促進廣西兩派的大聯合，中央從一九六七年五月初以來就組織廣西兩派代表到北京談判，周恩來總理曾八次接見廣西的兩派代表以及廣西的黨政領導幹部韋國清、伍晉南、安平生、廣西軍區和駐桂林部隊的領導等。在接見中周總理曾經幾次表揚過桂林

“老多”，說“老多”確實激進，確實敢於造反；對廣西軍區和“聯指”則有所批評。經過中央的工作，廣西軍區和韋國清被迫交出了檢討，承認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從他們的檢查中人們可以瞭解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廣西文化大革命的發展變化。

他們的檢查是這樣的：。

廣西軍區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線錯誤的檢查報告（摘要）：

“……由於我們對毛主席革命路線領會不深，貫徹不力，……在南寧市的支左工作中，支持了一派，壓制了另一派，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並且影響了各軍分區和各市、縣人武部，給南寧以及整個廣西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極大的曲折和嚴重損失，現在回顧起來感到十分痛心！我們所犯方向路線錯誤，主要表現在：對待南寧‘四·二二’造反派的看法有錯誤，壓制了‘四·二二’，特別是在砸‘工總’總部的問題上，表現尤為明顯。”

“……三月一日錯誤地砸了‘工總’總部，逮捕了總部宣傳委員熊一軍，後來並有取締這個組織的想法……我們對於‘工總’的這種錯誤行動是極端錯誤的，……”。

“三月下旬，我們開始做韋國清同志站出來的工作……當時，沒有先同‘紅總’、‘八·三一’、‘闖’等造反派商量，聽取他們的意見，依靠他們進行工作。因而，有些造反派即認為軍區是扶持保守勢力，‘抬’韋國清出來。我們對這種說法很反感……。四月中旬，伍晉南同志到群眾中去，支援造反派，我們沒有表示歡迎和支持。”

“五月，南寧地區圍繞著‘支韋’還是‘支伍’的問題，形成了‘聯指’、‘四·二二’兩大派。我們錯誤是，對反韋國清的‘四·二二’，接近少支援少，實際沒有給予支援。嚴重的是，一段時間未給予承認這個組織……。並且在政治上壓制了他們。突出的表現在五月二十九日由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發出《致新‘工總’、‘倒海翻江’某些負責人的忠告、警告書》和六月二日發出的《致‘四·二二’火線指揮部的通告書》，錯誤地指責了他們，給他們在政治上造成很大

壓力，起了壓製造反派的惡劣作用……”

韋國清的檢查：

我在廣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線錯誤的檢討（摘要）。

“……在這場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違背了毛主席的教導，背離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犯了嚴重的方向路線錯誤，給廣西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重大損失，辜負了毛主席、黨中央的信任和委託，心情萬分沉痛。在這裏，我再一次向毛主席認錯，向革命小將和革命群眾認錯！……”。

“……運動開始，……派出大量的工作隊，包辦代替，限制和壓制了群眾……把矛頭指向一些群眾，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使許多敢想、敢闖、敢革命、敢造反的革命群眾，遭到圍攻和壓制，不少人還被扣上‘反革命’、‘右派分子’、‘牛鬼蛇神’等政治帽子，受到委屈和迫害。我感到非常痛心，並再一次向這些同志賠禮道歉。”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我回到桂林，……對待敢想、敢闖、敢於向區黨委、市委的錯誤開火的革命小將，……極錯誤地認為他們是受壞人背後操縱，在‘鬧事’。於是，我提出對要害部門加強警衛，在機關、工廠成立赤衛隊。防止紅衛兵衝擊。把革命小將視同洪水猛獸。我還請桂林步校派出宣傳車，……是把矛頭指向頭一天上街遊行的桂林‘老多’，起到了挑動群眾鬥爭學生的作用。特別嚴重的是，當我聽到一些片面的、尚未證實的彙報後，更加害怕群眾，害怕壞人鑽空子，煽動‘暴亂’。八月十九日、二十日兩天，先後調動幾個連隊，集結在郊區桂林步校，加以防範……是極端錯誤的。”

“在處理革命小將到區黨委靜坐絕食的問題上，我是十分錯誤的……在桂林、南寧等城市均發生了圍攻南下串聯隊的情況，有幾個縣城還開了聲討桂林‘老多’的會議或遊行，使革命小將受到壓制和打擊。在這裏，我再次向南下串聯隊及桂林‘老多’的革命小將賠禮道歉。”

.....

“我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方向路線錯誤外，近幾年在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上，也有不少錯誤，如在一九六二年執行了反革命兩面派陶鑄推銷的‘大段包工’聯繫產量的田間管理責任制的試點，並一度大砍社會性辦企業，……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四清運動中，執行了中國赫魯雪夫所推行的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和所謂‘桃園經驗’，排擠和打擊許多基層幹部，……這是極其錯誤的。”

這是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廣西軍區和韋國清的檢討（摘要）。廣西軍區和韋國清交出檢討，說明毛澤東和中央當時是支持桂林“老多”和廣西“四·二二”的，也是桂林“老多”和“四·二二”經過堅決鬥爭得來的，他們認為這是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在廣西取得了勝利。

在廣西軍區和韋國清檢討的基礎上，廣西兩派赴京代表經過多次談判，在中央的主持下，達成了《關於廣西兩派促進大聯合的十條協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同時作出了《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同意韋國清、伍晉南以及廣西軍區的檢討，決定成立由韋國清、歐治富、魏佑鑄、孫風章、焦紅光、郝忠雲、王斌、伍晉南、安平生同志以及革命群眾組織代表參加的廣西僮（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簡稱“區革籌”），領導廣西地區的革命和生產，把廣西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廣西兩大派實現了大聯合，人們盼望已久的安寧得以實現，這本是一件好事。特別是對廣西一些縣級城鎮的“四·二二”來說，他們本來就是受當地掌權者和“聯指”一派壓制的，現在實現聯合了，政治上平等可以不再受壓制了，他們的內心是多麼地高興啊！然而，好景不長，他們的想法實在是過於天真了。因為他們原來堅持要打倒的韋國清和要批判的廣西軍區負責人，他們對桂林“老多”和廣西“四·二二”一直懷有刻骨仇恨，必欲除之而後快。就韋國清和“聯指”的幕後指揮者們來說，打倒伍晉南、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消滅“四·二二”建立革委會是他們早就定下的宗旨。現在實現所謂的“聯合”。廣西軍區和韋國清所交出的檢討，只不過是迫于當時文革

形勢所作的緩兵之計，是他們鬥爭的一種策略罷了。後來事情的發展完全證實了，他們所謂的“聯合”、他們所交出的檢討，完全是假的，是為了應付中央，是為了欺騙群眾，以便他們尋找時機來瘋狂的報復。果然，“聯合”和“檢討”的墨蹟未乾，他們就設計鎮壓“四·二二”，引導“四·二二”向他們的圈套裏鑽。一時間，八桂八地黑雲翻滾，“四·二二”重陷困境再次受壓。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各地聯指尋釁滋事 四二二們四處求援

話說廣西兩派實現了大聯合，成立了“區革籌”領導小組，各地群眾敲鑼打鼓歡呼慶祝，顯得十分高興。特別是“四·二二”一派的人們，滿以為廣西的形勢會變好了，自己不會再受壓了，他們內心充滿了喜悅。然而，時隔不久，事情的發展卻出乎他們的意料，形勢不但沒有變好，反倒越來越糟了。一九六七年的冬末和一九六八年的初春，廣西各地就不斷傳來“四·二二”受壓的消息。即使在“老多”占絕對優勢的桂林，“聯指”中的一些人竟敢於經常挑起事端，製造矛盾，挑動群眾鬥群眾，然後則把責任轉嫁於“老多”的頭上。更有甚者，“聯指”中的一些骨幹分子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抓人、打人，恐嚇廣大的群眾，使桂林形勢很不得安寧。桂林尚且如此，在廣西其他地方“四·二二”受壓制和打擊的事就可想而知了。如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玉林“聯指”進攻福棉公社“四·二二”的“福棉事件”，歷時四天，“四·二二”派多人被打死；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四日至七日的荔浦“修仁事件”，荔浦“工農兵司令部”（即“聯指”）圍攻修仁“農總”（“四·二二”），把“農總”當成“反革命”來鎮壓，打死“農總”多人。七日下午，“聯指”在修仁烈士塔召開所謂“荔浦修仁鎮壓反革命奪權勝利大會”，會上當眾殺害“農總”成員十四人，成為荔浦縣文革中首例亂殺人的悲慘事件；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容縣武裝部組織“聯指”民兵四百多人攻打黎村“四·二二支多陣線”，打死“四·二二”十二人，其餘人員被迫逃向廣東；再如欽州地區的“靈山事件”、河池地區的“宣山事件”等，都是“四·二二”受迫害和打擊的典型事件。

早在一九六七年的十月，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廣西一些地方就

出現了“貧下中農最高法庭”一類的非法組織，亂抓亂殺“四類分子”和他們的子女，以及“四·二二”派的成員，後果十分嚴重。特別在桂北地區，僅全州縣的一個大隊，兩天內就集體坑殺了七十六人，由此造成了成批亂殺人的局面。

十月二日至四日，全州縣東山公社三江大隊民兵營長黃天輝召集大隊會計、“聯指”派負責人等商議，召集民兵班、排長等三十多名骨幹成員開會，黃在會上傳言湖南道縣殺地、富的情況，提出“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對地、富要“鏟草除根一掃光”。最後決定採取坑殺的辦法，即將人推下黃瓜沖山洞，並按村分配抓地、富分子的任務。會後，黃天輝連夜帶民兵去抓人，抓到人後立即押到黃瓜沖山洞，強迫被殺者跳坑，有的不願跳，被黃用棍打後推下坑。當中有地主出身的劉香元在坑口向黃求情，請求留下一個小孩給貧農出身的愛人，說：“天輝，我兩個仔，到政府去判我也只得一個，我老婆也應有一個，我抱一個跳下去，留一個給我老婆”。黃說：“不行”。結果劉被迫抱著兩個小孩（大的三歲，小的一歲）跳坑而死。這世界竟有如此殘忍之慘劇。

從一九六七年的十一月起，廣西各地都出現了“聯指”派亂殺人的事件，不但殺地、富及他們的子女，“四·二二”派的人員也有被殺的。如容縣“聯指”在十一月就打死地、富及“四·二二”成員六十九人。同時許多縣武鬥頻繁，“四·二二”派被圍攻、被殺。為此，十二月十九日，梧州、荔浦、賀縣、桂平、鹿寨、容縣、羅城、玉林、欽州、博白等市、縣“四·二二”造反派《反屠殺控訴團》二百多人赴邕，到廣西軍區靜坐和遊行，強烈要求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制止武鬥，嚴懲殺人兇手。此時的區革籌和廣西軍區雖然也發通知禁止武鬥和亂殺人，但沒有採取得力的措施，武鬥和亂殺人是禁而不止，愈演愈烈。在這些事件中，各地軍分區、人武部和“聯指”相互配合，製造事端強加於“四·二二”頭上，把“四·二二”打成“反動組織”，當“反革命”予以圍剿，致使“四·二二”的人員被抓、被打、個別人甚至被殺，是極其嚴重的政治事件。對於這樣的重大事件，廣西“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及各

地掌握實權的領導機關，他們則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實際上起到了縱容“聯指”肆意妄為的作用，使“四·二二”一方深受其害。“四·二二”人員為求生存，被迫逃散、四處求援。如一九六八年一月四日玉林“四·二二”數百人到玉林軍分區門口，召開“反圍剿、反迫害、反屠殺”大會。靜坐六天六夜，請求軍分區出面解決他們受迫害的問題。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八日，靈山縣“革聯”（即“四·二二”）控訴團兩百多人逃到首府南寧，到廣西軍區控訴靈山縣“聯指”亂殺人的罪行，但廣西軍區不予理睬，放縱“聯指”的屠殺，控訴團在廣西軍區政治部大樓前靜坐數天不走。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日，廣西“四·二二”河池地區“工總”四百多人來到廣西軍區請願，聲援靈山縣“革聯”控訴團，揭發各地“聯指”屠殺群眾的罪行，抗議並譴責廣西軍區以“支左”之名，行支一派、壓一派之實，破壞了廣西大聯合的大好局面。

一九六八年的春天，本是春暖花開之時，但“四·二二”的人們在政治上仍然感覺不到春天的來臨。此時的廣西軍區、各軍分區及各縣人武部，廣西的最高掌權者韋國清、歐治富等人，他們並沒有真正執行中央對處理廣西問題的決定，促進廣西兩派的聯合，而仍然保持繼續在支一派、壓一派，慇懃和支持“聯指”對“四·二二”的打壓和迫害，使廣西許多地方不斷出現“聯指”圍剿“四·二二”的事件。在這些事件中，吃虧的往往是“四·二二”一派，因為他們手中沒有武器，只能束手待斃。而“聯指”一派則是全付武裝，這是軍分區和人武部給他們提供的。如果說在文革之初的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韋國清及廣西軍區支一派、壓一派僅僅是在文字上、口頭上的話，發發“忠告”、“通告”之類的東西，嚴重的則是砸造反派的組織，抓造反派的負責人；現在則不一樣了，他們汲取了過去的經驗教訓，必欲把“四·二二”從組織上徹底搞垮，骨幹人員徹底消滅，這是現在他們支一派、壓一派的目的所在。

韋國清、廣西軍區負責人及“聯指”的高參們，他們既定的方針是“打倒伍晉南、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消滅

“四·二二”建立革委會。他們的一切計劃和行動都是圍繞這一目標來進行的。一九六八年的春天，廣西各地“四·二二”重陷困境受壓制和打擊，完全是韋國清、廣西軍區負責人及各軍分區、人武部支持“聯指”肆意妄為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四·二二”一派的廣大群眾有的被迫改變自己的觀點加入到“聯指”一派去了，一些負責人和骨幹分子或則逃到農村、深山避難謀生，或則逃到“四·二二”力量強大的桂林、柳州、南寧尋找安身之處。

各地“四·二二”被迫作出的這些舉動，正中了韋國清及“聯指”頭頭們預先設計的計謀，因為各地“四·二二”人員逃走的多了，那裏的力量顯然就更不堪一擊了，便於“聯指”迅速消滅；另一方面，各地“四·二二”的負責人和骨幹分子跑到了桂林、柳州、南寧這三座城市，又會給韋國清及“聯指”頭頭們提供了是“四·二二”破壞大聯合的口實，他們可以欺上瞞下，製造輿論，宣稱“桂林、柳州、南寧”這‘三點一線’是反革命的頑固堡壘，可以集中力量予以圍剿消滅。一九六八年的春天，韋國清及“聯指”的高參們正是按照他們的設計逐步實施的。“四·二二”一派再次遭受迫害和打擊，他們理所當然要起來據理反駁和抗爭，並積極向中央反映廣西的情況。然而，中央關於解決廣西的問題剛下來不久，既然“區革籌”成立了，中央顯然是聽“區革籌”的，更何況一九六八年的形勢不同於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了。那時，毛澤東需要造反派起來造劉少奇的反，儘管造反派是少數，而毛澤東支持他們，才使他們敢於造各級領導的反。現在劉少奇倒臺了，造反派就不那麼需要了，更何況中央此時的權力之爭，林彪、江青、周恩來各派之間在明爭暗鬥，對廣西“四·二二”受壓這樣的事件，在他們看來也只是小事一樁，無暇顧及了。更何況韋國清、廣西軍區負責人有廣州軍區黃永勝這樣掌握軍政大權人物的支持，他們向中央說一句話，廣西“四·二二”作多少努力、反映多少情況都是徒勞的。

各地“四·二二”受迫害和打擊的事件不斷的增多，許多縣的“四·二二”已被整垮了。在當地軍分區、人武部的支持下，由“聯指”一派

成立了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隨之市級的革命委員會先在梧州市成立，因為梧州市的“四·二二”垮臺了。緊接著南寧、柳州、桂林也先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三座城市雖不像梧州市和其他縣是在“四·二二”被整垮後成立的革委會，但在革委會中掌握實際大權的卻是支持“聯指”的領導幹部，如桂林的王斌、陳秉德，南寧的肖寒等人，都是韋國清的人。因而在這三座城市中，“四·二二”的力量雖然強大，仍不能排除受壓制和打擊的狀況，處在十分不利的地位。

面對如此困難的局面，在此生死存亡的關頭，“四·二二”的人們既感前途難料，又普遍存在著反抗情緒。首先有柳州鐵路局工機聯“四·二二”《紅衛兵戰報》二月十日發表編輯部文章《今日的哥達綱領——評“倒旗協議”》，文章針對廣西的現實，作出了客觀公開的剖析，特別指出了所謂“大聯合”後“四·二二”一派受迫害和壓制的種種情況，提醒“四·二二”一派的人們，只有抗爭才有出路，否則就只有任人宰割的死路一條。這是一個擺在“四·二二”派面前現實而又嚴重的問題。此文寫得十分好，有理有據，很有現實意義。出自一個中學生之手，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然而，該文的作者肖晉雲卻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被柳州警方以“現行反革命”罪給逮捕了。事情傳到北京，時任中央文革顧問的康生，點名批判了此文和它的作者，這無疑是給韋國清們鎮壓“四·二二”提供了一顆重磅炸彈。

在首府南寧，面對廣西各地的武鬥及“四·二二”派被壓、被殺的情況，“四·二二”領導人向“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反映中央三個“照辦”（即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中央要求照辦的《關於廣西兩派進行革命大聯合的十條協議》、《關於立即停止武鬥的協議》、《關於全面上繳槍支彈藥的七點協議》）不落實的情況，並指出各地仍在武鬥，武裝部和“聯指”派在進攻和屠殺“四·二二”。“區革籌”和軍區領導人則不承認有如此嚴重的情況。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四·二二”常委黃達升在南寧召開大會，宣佈成立廣西“四·二二”野戰軍，以支持各地“四·二二”抗擊“聯指”派的大屠殺。三月二十九日，廣西“四·二二”領

導層因對各地“四·二二”受壓和受屠殺有不同的看法，產生了分裂，撤銷了龍智銘、曾春生、林福文、章英等人的常委職務，由高興學任總指揮，黃達升、蔣志恭任副總指揮。這種分裂正是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所需要的，也是他們略施小計的結果。會後，他們馬上把龍智銘等四人接到軍區保護起來，讓他們代表“四·二二”參加區革籌。由此“四·二二”分裂成了“新四·二二”和“老四·二二”兩派，以龍智銘為首的“老四·二二”派被韋國清和軍區收買過去了。

三月二十九日，“四·二二”的“邕江風雷”在南寧發表《關於廣西當前時局的緊急聲明》，指出“區革籌”和廣西軍區的錯誤，指出各地“四·二二”受壓制和迫害的現狀及“四·二二”派應採取的辦法，得到了廣大“四·二二”人員的擁護。但“區革籌”及廣西軍區則認為這是把矛頭指向“區革籌”和軍區，發動“聯指”開誓師大會反擊，同時向中央彙報“四·二二”野戰軍和“邕江風雷”的情況，認為他們是“幹擾廣西文革的逆流”。

為了排除這些所謂的“幹擾”和“逆流”，“區革籌”和廣西軍區一方面暗示“聯指”派連續開大會和遊行，反“幹擾”反“逆流”，一方面指令《廣西日報》在輿論上配合，利用康生關於肖晉雲那篇文章的指示，在《廣西日報》上發表社論和文章，批判肖晉雲的文章，批判“邕江風雷”的“三·二九”聲明。四月十一日起《廣西日報》連續報導“聯指”的活動，並公開批判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等黨政領導人，誣陷他們是“叛徒、特務、國民黨殘渣餘孽”，誣稱新“四·二二”被壞人操縱，是“階級敵人在搞破壞”，要向“一小撮階級敵人”大飈“十二級颱風”，要主動地不停頓地發起猛烈的進攻，堅決地消滅他們。

有韋國清、廣西軍區負責人這些當權者的幕後支持與策劃，有《廣西日報》在輿論上積極配合，在各級“聯指”負責人的直接指揮下，由原來小規模的打壓和屠殺變成大屠殺了。一場大規模的、空前的、史無前例的對“四·二二”和無辜群眾的大屠殺開始了。可憐“四·二二”

派以及那些什麼派別也不未參加而慘遭殺害的芸芸眾生，他（她）們慘死在“聯指”的屠刀之下，慘死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真乃驚天地、泣鬼神，世人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幕幕的殺人慘劇。

大屠殺從一九六八年初就開始了，直至九月，歷時半年多。而殺人最多、最為慘烈的當數七、八、九三個月，據最保守的官方統計，慘遭殺害的人當在十萬以上，那些無法記錄在案的被殺死了多少人就無法統計了。

欲知幕後指揮者如何策劃、各級“聯指”頭目如何指揮殺人、兇手們又是以何種手段殘忍的殺人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韋國清下令颶颶風 全廣西湧起殺人潮

話說一九六八年的春天，雖說是春暖花開，萬物復甦，然而對“四·二二”派的人來說，卻仍然似寒冬冰雪，他們好似仍然生活在冰天雪地之中，正在為生存而作殊死的抗爭。

一九六八年的初春，八桂大地就籠罩在腥風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中。大權在握又有韋國清、廣西軍區及各軍分區人武部支持撐腰的“聯指”，正在磨刀霍霍，只等韋國清的一聲令下，他們就要動手殺人了。一九六八年的四月九日，韋國清通過《廣西日報》下令，向“一小撮階級敵人大廳‘十二級颶風’”。大規模的屠殺開始了。

屠殺首先始於廣西的一些縣級城鎮和農村。

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玉林地區“聯指”組織兩千多人，配備步槍九百多支，輕重機槍二十六挺，衝鋒槍四百零七支，各種炮八門，手槍一百六十四支，自製坦克一輛，攻打玉林“四·二二”州配據點。包圍兩天後，據點被“聯指”攻下，抓獲“四·二二”派十三人，全部槍殺，從而拉開了廣西大屠殺的序幕。

二月七日至五月二十七日，在三個多月的時間裏，上思縣“四·二二”派有一千一百二十五人被當成“土匪”和“反共救國團”予以抓捕關押，普遍遭到毒打，其中有三十九人被槍殺。

二月十一日至二十日，靈山縣召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暨貧下中農代表會議，會議期間殺害了“四·二二”派三名成員，並陳屍示眾。大會號召要對階級敵人實行鎮壓，佈置會後各公社、大隊回去立即進行。會後，新圩公社即按會議的佈置殺了五人。四海公社則把全公社的“四類分子”數百人幾乎全部殺光。其他各公社都有殺人的事件發生。

二月十六日，“聯指”攻打柳州地區融安縣的銅鼓橋據點。由於事前融安縣“四·二二”得到情報，他們搶先強渡融江，佔領了融安縣“聯指”駐地東圩和直屬糧庫。為此，融安縣“聯指”火速派人向柳州“聯指”告急求援。柳州“聯指”當即決定由“工交兵團”出兵支援，在蘇一民、胡文治帶領下前往融安進攻“四·二二”。他們分乘十三輛汽車，三百多名全副武裝的人員於二月十六日凌晨趕到東圩，立即包圍東圩和銅鼓橋，並發起進攻。當天下午五時攻下“四·二二”的據點，抓獲“四·二二”派三十六人，在押解途中有十五人被槍殺。

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大新縣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召開各公社、大隊“抓促”領導及廠礦武裝部長、民兵營長會議。縣人武部部長周永山、政委韓奇主持會議，傳達“區革籌”小組領導人的講話，研究佈置做好成立縣革命委員會的準備工作。周永山在會議閉幕時講話指出：“為迎接縣革委會成立，對不守法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要實行專政，不要心慈手軟”。會後各地代表回到本地，立即按照會議的布署，大搞所謂“群眾專政”，在十七天的時間裏全縣共屠殺了兩百三十九人。

三月上旬，宜山縣發生“聯指”和“四·二二”兩派的大規模武鬥。宜山縣“聯指”聯合羅城、都安等縣的“聯指”數千人圍攻宜山“四·二二”派的據點。三月八日，宜山“四·二二”的人在從據點逃跑時有數十人被殺害。

三月十六日，天等縣成立革委會，縣人武部部長馬政華在講話中強調：“為樹立正氣，壓倒邪氣，保衛新生的紅色政權，每個公社、大隊幹掉個把罪大惡極、民憤大的四類分子和‘四·二二’壞頭頭是沒有問題的”。在馬政華等人的佈置和策劃下，從三月八日到二十七日的十多天裏，全縣發生一百九十多起殺人事件，共屠殺了六百三十多人，其中有九戶是全家殺絕的。有的丈夫被殺害後妻子被強姦，父親被殺後女兒被強姦，如死者農會沖的女兒就是被殺人兇手黃正健等人強姦的。

三月十九日，崇左縣人武部負責人馬風池、張洪恩等人到天等縣

參加革委會成立大會，回到崇左後，張洪恩發表講話說：“天等縣的紅色政權是用槍桿子打出來的，我們要向天等縣學習，也要用槍桿子建立和保衛紅色政權”。結果，該縣在籌備成立革委會前就屠殺了四十九人。

三月十八日，欽州地區公檢法軍管會給軍分區的情況反映說，三月五日至十二日，全專區共殺了兩千人左右，其中以靈山縣、上思縣、防城縣殺人最為嚴重，一些大隊的民兵營長、治保主任、公社武裝部長到處在鼓吹殺人。

三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馬山縣“聯指”派一千多人在縣人武裝部的支持下，圍攻“四·二二”派據點，攻破據點後，大批“四·二二”人員被抓，有一百九十七人被打死。

三月下旬至四月初，貴縣石龍公社松英大隊負責人覃錫朋，以覃XX寫大字報翻案，誣告覃XX有槍支，組織“暗殺隊”進行階級報復為名，先後組織策劃並直接指揮，打死“四·二二”派群眾四十人，其中成年人二十八人，未成年人十二人，有十三戶人家男性全被殺光，殺人後把被害者家中的財物洗劫一空。

四月十三日，貴縣舉行慶祝革委會成立大會，在革委會委員的名單中，由於該縣當時掌握大權的領導人有意把“聯指”派的頭頭當作“四·二二”一派的代表參加革委會，從而引起了“四·二二”派的強烈不滿，認為現在成立的革委會是人武部包辦代替的“派委會”、“假委會”，並衝擊慶祝大會會場，引起了“聯指”人員開槍打死了一個小孩劉小圈。“四·二二”派抬著劉小圈屍體衝擊大會主席臺，撕毀大會橫額，砸爛縣革委會的牌子。事後貴縣“聯指”以“四·二二”破壞紅色政權為由，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對“四·二二”採取圍剿鎮壓的手段，結果“四·二二”的據點被炸毀，人員被抓，有三百多人慘遭殺害。

三月下旬，陸川縣“聯指”在縣人武部的支援下，策劃對該縣“四·二二”的圍剿，“四·二二”派人員被殺一百一十人，原縣委書記周履光等八人被集體槍殺，後用炸藥毀屍，被稱為“三·二四”事件。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巴馬瑤族自治縣在縣城街上就公開槍殺了陳媽甯（地主分子）和陸秀林（工人，資本家家庭出身），拉開了該縣亂殺人的序幕。

四月初，巴馬的“五·一二”派（即廣西“四·二二”派觀點）在縣城受“聯指”圍攻，許多人被“聯指”抓捕，黃德康、蘇漢等人率領部分“五·一二”派人員逃到差圩公社乙圩大隊下乙屯躲藏逃命。“聯指”派得到消息後，四月中旬在縣武裝部部長李彥智、差圩公社武裝部部長盧金珊、副部長黃正業和乙圩大隊革委會主任覃德強等人組織指揮下，“聯指”武裝民兵數百人前往圍剿。由於“五·一二”派沒有什麼武器，不可能抵擋“聯指”的進攻，他們願意主動“投降”。“聯指”們叫被圍困的人不論男女都要脫掉上衣舉起雙手出來，極盡人格的侮辱。這些人出來後，“聯指”們進行瘋狂的屠殺，黃德康與下乙屯韋萬樓等四十九人當即被槍殺，死者中有兩個只有八歲和十一歲的兒童，三個嬰兒，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八人。全屯四十四戶一百三十三間房屋全被燒毀。幸存者全部流散他鄉，整個下乙屯荒無人煙，是一起驚天動地的大慘案。

在圍攻中，“五·一二”派負責人蘇漢有幸逃脫，但不久即被“聯指”抓獲槍殺。他的妻子胡春虹（臺灣籍人士）知道丈夫被殺後，企圖逃出巴馬，在上汽車的時候被單位“聯指”抓回去殺害，留下一對可憐的孤兒。

四月十九日，參加過紅軍的老戰士楊世昌（城關區副區長），一名離休幹部，僅因是支持“五·一二”派的觀點而慘遭殺害，其妻陳紅枝也於同日被殺。

從三月至六月底，該縣就非法殺害或迫害死者七百零七人。文革中該縣有一千二百八十七人被殺害或迫害致死（占該縣當時總人口的百分之零點七二），死者中有縣級幹部二人，區級幹部四人，一般幹部四十二人，中小學教師三十四人，工人二十二人，農民和城鎮居民、學生一千一百八十三人。也是文革的重災區之一。

四月十四日至十五日，在短短的兩天中，浦北縣僅北通公社就有“四·二二”人員和無辜群眾兩百多人被殺，其中有十五戶人家被全家殺絕。

四月二十一日，龍州縣“聯指”和縣人武部及公檢法軍管會的幹部武裝包圍“四·二二”在工商聯的據點，攻破該據點後，“四·二二”有九十多人被抓，其中有十二人被作為壞頭頭槍斃，此一事件完全是在縣革委會主任常玉善策劃下進行的。

四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玉林地區革委會召開全地區政工會議，地區革委會主任、軍分區政委甘照寰，副主任、軍分區副政委孫景芳，副主任蔣昌永三個人分別在會上講話，號召全地區反擊右傾翻案風，向階級敵人大颶“十二級颶風”，從而全地區迅速掀起了殺人狂潮。僅陸川縣在數天時間裏就屠殺了近千人，全地區共屠殺了數千人。

五月初，在“區革籌”和廣西軍區的指令下，寧明縣革委會調動“聯指”派武裝民兵配合駐軍，對所謂反革命組織“上石農總”進行圍剿，“農總”據點被攻破後，多數人員被抓，多人當場被打死，共殺害了一百一十多人，此乃為震驚廣西的“上石事件”。

除上列所述的殺人事件外，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以前，廣西各地、縣都有殺人的事件發生。被屠殺的除“四·二二”派的人員外，其他被屠殺的有所謂“地、富、反、壞、右分子”、“反共救國團”、“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等，被屠殺的總人數保守的估計當在三萬人以上。

除了被屠殺的以外，尚有更多被殘酷鬥爭、被打至殘廢的人，更是比比皆是。最典型的要數五月二十二日廣西“聯指”總指揮部通過所屬的“瀝血兵”搞的所謂“禽獸展覽”（活人展覽）。“瀝血兵”將關押在“聯指”總指揮部的領導幹部林執真（區水電廳副廳長）、張祖貴（地質局處長）、黃海泉（欽州地區手工業經理部副經理），“四·二二”派“雄鷹”組織的成員以及孔祥興、黃強、張飛、方少華、黎子竟等二十多人拉到南寧市北大路建築研究所，關進木籠，強行組織群眾前往

觀看“禽獸”，展覽三天時間，這些人被折磨得死去活來。爾後廣西“聯指”不但肆意殺人，搞“活人展覽”這一法西斯暴行也遍及廣西。

“聯指”敢於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意殺人，完全是韋國清及廣西軍區的容忍所為的，是在縣、公社武裝部的直接指揮下進行的，簡直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這是法西斯的暴行，是“聯指”中部分人獸性大發作，是人性的大毀滅。多少善良無辜的人慘遭殺害，多少人家破人亡，公理何在？人權何在？人性何在？

“任是泥人也落淚，縱叫鐵漢也傷心”。面對如此的殺人暴行，任何有良知的人都會心驚膽顫，痛心疾首。然而，還有更殘忍的是挖肝、吃人肉的事件在一些地方出現。人世間竟有如此的野蠻行為，更是令世人無法理解和容忍的。但這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屍橫遍野血流成河 挖肝吃肉前所未

話說廣西“聯指”頭頭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慘無人道的亂殺人，各地當權者或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其肆意妄為，或則暗中策劃操縱幕後指揮，或則赤膊上陣親自指揮。他們是真正的殺人兇手。因為他們是各個地方的當權者，是說話算數的，只要他們有一點人性、有一點黨性、有一點法制觀念，他們站出來說一句話，就絕不會有這許許多多的殺人事件發生。然而他們最終沒有這樣做，是因為在他們的思想深處，他們本來就是希望這樣的。正是有了這些當權者們的策劃和指揮，才使殺人事件愈演愈烈，殺人手段層出不窮。

一九六八年五月至六月上旬，柳州“聯指”為了配合大部隊進攻柳州“四·二二”，“聯指”的保衛部骨幹梁國開、周繼才、覃紹昌等人研究決定，提前處理關押在柳州市禮堂不同觀點的“審查對象”，分五批拉到柳江河邊殺害。有的是用鐵絲把人的手腳捆綁後推下河淹死的，有的則是把人押到河邊集體槍殺後推下河的，共屠殺了四十五人。

一九六八年六月六日，金秀瑤族自治縣忠良區召開群眾批鬥大會，會上把三名無辜的社員打死，首創該縣打死人的先例。隨後，在縣革委和人武部的指揮下，縣內普遍開展“向階級敵人猛烈進攻”，全縣七區一鎮及半數以上大隊發生亂殺人現象。六月至八月共有一百四十八人被打死。特別嚴重的是六月十九日，在金秀區六拉大隊召開的批鬥大會上，六名瑤族同胞被打死；六月二十六日長二大隊寨堡生產隊一名瑤族婦女被活埋，在大瑤山寨也有如此的法西斯暴行。

在平果縣，早在三月四日，縣革委會就發出[一九六八]第六號文，對階級敵人實行群眾專政，使全縣不斷出現亂殺人的慘案。五月

十八日，縣革委、縣人武部下文通知，抽調榜圩、鳳梧，黎明、海城等區的武裝民兵數百人，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四日由人武部政工科長臨陣指揮，到榜圩區常星公社圍攻“四·二二”據點，使“四·二二”派多人被抓，被打死。文革中全縣被非法殺害七百一十五人，被逼致死二百一十六人。

六月十九日，凌雲縣武裝部政委、縣革委會主任王德堂陰謀策劃，殺害了原縣委書記趙永禧等二十一名幹部、教師和學生。六月十九日下午，王德堂在縣“積代會”上作總結報告，煽動縣工代會主任韋德帶領一夥兇手拉趙永禧等二十多幹部、教師和學生上街遊鬥，趙永禧等二十一人被當場打死，另外幾個人被打致傷殘。二十四日上午王德堂決定“積代會”延期一天，他向與會代表佈置殺人，要求各公社回去後要狠抓階級鬥爭，決不能心慈手軟。於是，會後全縣各公社、大隊開始出現了殺人狂潮。

如果說自二月初開始各地只是零星出現一些殺人事件的話，那麼從五月份開始，各地殺人事件則是愈來愈多了，而且殺人手段更為殘忍，令人髮指。如：。

恭城縣的殺人稱其為開“石頭會”，把“四·二二”派人員和“地、富、反、壞、右分子”五花大綁後拉到河灘上，由眾多的兇手們用石頭隨意亂砸，被砸者腦漿四射，血肉橫飛，最後把屍體推下河裏，頓時一江春水染成紅色。該縣殺害的人保守估計當在一千人以上。

永福縣殺害了九百零五人，死者中有幹部、教師、學生和工人、農民。如在壽城鎮，召開了多次所謂的批鬥會，每批鬥一批就打死一批，用木棍把人活活打死，其場面慘不忍睹。龍江鄉的保安大隊在黨支部書記譚孝武的策劃下，成立所謂的“貧下中農專政委員會”把三名教師活活打死。縣民礦站技術員吳啟昌在壽城丁興硫鐵礦工作，縣“聯指”把他從礦山拉回縣城，半路上即把他槍殺了。這些被殺害的人僅僅因為是“四·二二”派的，有的則什麼派別也未參加，也被殺害了，他們何罪之有？

早在一九六七年冬天，羅城縣即開始了對“四·二二”派的大屠殺。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凌晨，羅城縣“聯指”就調動各區武裝“聯指”九百多人分南、北兩面包圍縣城攻打“四·二二”派，“四·二二”人員得到消息後當即撤離縣城。“聯指”派進城後到處抓人。縣統計科長譚安豐（曾任天峨縣縣長）躲在銀行一間廚房裏被炸死，其他的“四·二二”人員一百多人被抓，當晚李正源、何維福即被吳才英（公安局副股長）等人槍殺。

十一月二日，“四·二二”人員黃瑀（縣教育科副科長）、覃樹命、朱國安（均為農民）、劉雲（縣教育科科員）、韋宗盛、羅華文（糧食局幹部）等七人被“聯指”指揮部羅寒修（糧食局長）、崔承祥等人殺害。

在一九六七年底前尚有四把區的“四·二二”人員廖德全、潘恩東、孫宮政、唐玉枝、謝才賢（中學生）、彭家昌、吳中琪被“聯指”羅書群、銀景昌等人殺害。龍岸區的李光華、曾鵬、賴慶明等十二人也被“聯指”頭目梁樹榮、邱有德、梁和慶、李志等人指揮殺害。

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四日，羅城縣革委會成立，革委會主任石堅（縣長）、第一副主任段志英（縣武裝部部長）。段志英為軍代表，縣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組長，大權在握，此後的一系列大屠殺都是在他導演下進行的。

在段志英的直接策劃指揮下，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五日，在縣城召開“向階級敵人發動全面總進攻誓死大會”，縣直各單位、全縣各區、公社上萬人參加會議。會上，由軍管會宣判三名罪犯，各單位、各區帶來的一百五十五名批鬥對象人人掛黑牌、戴高帽，被反手捆綁，跪在大會會場一旁陪判。宣判後，段志英在大會上講話，大講：“專政是群眾的專政，要放手發動群眾，依靠群眾，鎮壓階級敵人。要對階級敵人颶十二級颶風，不管敵人在什麼地方出現，就要在那裏把它消滅掉”。接著鼓動幹部群眾說：“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的進攻，一定要把他們鬥倒鬥臭，不獲全勝決不收兵”。段講完話後，各單位、各區分開批鬥本單位的“階級敵人”，當天即有五九人被棍棒、石頭、刀、槍等慘殺，死

者中有國家幹部十二人，職工二人，群眾十五人，四類分子三十人。四把區一九四〇年入黨的供銷社主任莫家星和縣供銷社經理部幹部韋善忠都是此次被殺害的。

此後該縣各地不斷出現亂殺人事件。如黃金區一次就槍殺了十八人，有一個小女孩看到她的父母被殺害，只說了一句“毛主席說要文鬥不要武鬥”，以圖救她的父母，也慘遭殺害。“聯指”們真是殺紅眼了，沒有人性了。

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一九四四年入黨，曾任過縣監委書記、縣委書記的清明山林場黨委書記張雲亭慘遭殺害，僅僅是因為他同情“四·二二”派的觀點；一九三七年人伍的縣工會主任王修武也在批鬥中受迫害致死。這些人何罪之有？

文革中該縣被非法殺害或迫害致死者共計一千三百八十九人，也是廣西文革的一個重災區。

五月二十八日，武鳴縣革委和人武部指揮、調動城廂、陸斡、兩江、羅波、雙橋等地的民兵二百七十多人，與太平公社革委、人武部調集民兵一百八十多人，共同圍剿慶樂大隊“四·二二”派的“二·一三”兵團據點，當場打死“二·一三”兵團三人，其餘人員被迫逃上山，被誣稱為“反革命暴亂事件”，派民兵們上山抓捕。被抓的“二·一三”兵團人員先後有三十人被毒打致死。

六月十七日，廣西區革籌、廣西軍區發佈所謂《關於破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反革命案的公告》（習稱《六·一七公告》）後，六月二十日，武鳴縣革委召開大會，傳達區革籌和廣西軍區的《六·一七公告》，並聲討“反共救國團”。六月二十一日將公告全文印發給縣直機關和各公社，六月底至七月初，各公社根據上級指示，陸續召開群眾大會，聲討“反共救國團”，全縣共把二千七百七十一人列為“反共救國團”成員，被打死或被迫害致死者達八百五十六人。

大屠殺在全縣各地普遍展開，僅兩江公社在七月二十八日一天就殺害了一百六十多人。當天兩江公社召開群眾批鬥大會，“四·二二”

派的頭頭、骨幹成員及所謂的“四類分子”被綁到會場批鬥。二十多名手持棍棒的暴徒，對被批鬥的人員亂棍暴打，一百六十多人被活活打死。死者腦漿四射，血肉橫飛，屍體遍佈河灘中，頓時染紅了兩江河水，其場面恐怖萬狀，慘不忍睹。文革中武鳴縣被非法殺害和被迫害致死者達一千五百四十六人。

當時的二七二地質隊就在兩江公社的轄區內，兩江公社召開殺人大會，二七二隊“聯指”少不了要前往參加會議。為此，他們也把本單位“四·二二”的骨幹成員和頭頭雷定榮、莫明初等十多人押送到批鬥會場。看到當時恐怖的殺人場面，一些押送人員由於良知的發現，他們未敢把這些被押人員叫下車，從而使這十多人幸免於難。但事後不久，二七二隊的“聯指”仍然殘殺了兩名技術人員羅青宇和孫傳，也留下了濫殺無辜的千古罪名。

除了上述許許多非法殺人事件外，更有甚者，是一些地方在殺人之中竟有挖心肝、吃人肉的慘劇發生，真是聞所未聞的人間慘劇。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晚九時，隆安縣布泉公社武裝部長黃以荃出謀，指揮高峰大隊民兵營長周朝洙和黨支部書記隆秀佳組織民兵黃光權、馮品業等五人將高峰大隊“四類分子”梁受玉、韋信家綁架到龍厚山打死，後剖腹取肝、膽煮食。此一事件後，該公社從三月下旬到五月又發生剖腹取肝事件十一起，殺害二十二人。

四月二十五日，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分四批殺害了二十四人，並剖腹取肝煮食飲酒。全公社被殺一百八十人，兇手劉維秀、劉家錫等人把劉振堅打死後，對其未滿十七歲的女兒進行輪奸，然後打死，並剖腹取肝、割乳房、割陰部，令人髮指。

在武宣縣，從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九日起至七月十七日，近三個月時間，全縣非法殺害和迫害致死者共五百二十六人（不包括武鬥中死亡的八十七人和武鬥中“聯指”抓到“四·二二”派人員殺掉的十人）。六月中旬開始是殺人的高峰時期。

早在五月十一日，武宣“聯指”就攻打“四·二二”派的北樓、

北街、武宣小學等據點。柳州“聯指”派人來支援，貴縣（現在的貴港市）武裝部副部長廖秀峰率領“聯指”武裝人員三百餘人也來支援。五月十三日，在南北兩路夾攻之下，“四·二二”據點被攻破，當即有九十七人被殺。如蔡友斌等人，在突圍時被“聯指”韋玉錦、李炳龍等人用鐵線捆綁手腳，丟下河中溺死，“四·二二”總指揮周偉安突圍時，逃到祿新大榕被打死，“聯指”頭頭潘茂生專程到大榕將周的頭顱和雙腳割下拿到祿新為武鬥死者覃漢茂、董世效開的追悼會場，懸掛於樹上，後又拿回縣城食品公司售肉門市部倒懸於樹上示眾。副總指揮黃流至突圍後隱藏在經理部的伙房內，被人告密被抓，同月十五日被槍殺。黃生前為一名汽車司機，也是縣革委會委員。兩名中學生紅衛兵覃宗珍、韋國榮突圍逃跑時被古祿大隊民兵抓住，當即被打死。在突圍後被抓住打死的還有覃乃文、覃乃武、李志平等多人。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一日，武宣縣革委會為了打擊“階級敵人”的需要，決定成立糾察隊，由革委會副主任、縣武裝部副部長嚴玉林負責，下設兩個連隊，連長孫蘭發、王傳義。糾察隊成立後四處設卡，到處搜查，導致社會上形成恐怖氣氛。

六月十四日，縣革委在縣城召開縣、區、大隊、生產隊四級幹部會議，貫徹柳州地區革委會的會議精神，武裝部長、革委會主任文龍俊在會上說：“對敵鬥爭要颳十二級颶風，方法是充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來對階級敵人專政，把政策交給群眾”。“搞級鬥爭不能手軟，在批鬥中可採取多種形式，加上控訴會、訴苦會、遊鬥等，對象就是黑五類，有歷史污點的人、“四·二二”壞頭頭、走資派”等。

在縣革委會的動員指揮下，縣直各單位、各區、各大隊都掀起了對“敵”鬥爭的高潮，一批幹部、“四·二二”骨幹成員及“黑五類”慘遭殺害。如桐嶺中學副校長黃家憑，在七月一日晚的批鬥會上，被該校“革籌”副主任謝東指揮人把他打死。黃在建國前參加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曾任一二一縱隊第一支隊第一中隊政治指導員，桂中支隊十八大隊隊長，解放後任過蒼梧縣副縣長。

支持“四·二二”的縣交通局長劉志遠，被“聯指”遊鬥後，“聯指”人員梁春林等人把劉志遠拖到縣城十字街槍殺。劉是一位南征北戰的老幹部。

祿新區大榕鄉黨支部書記石朝保等，在橋鞏村批鬥王德歡、王開華等人，批鬥會上將王德歡亂棍打死，王開華被拖到會場外用刀捅死。其後，覃錦必夥同潘新德、覃漢民、覃世松等人到王德歡家，輪奸正處豆寇年華之次女王凡珍。

更為惡劣和不可思議的是該縣發生的吃人肉、人肝的事件。文革中該縣有七十五名死者被挖肝吃肉，這是慘無人性的悲劇，是人世間的奇恥大辱。這些慘劇如：。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聯指”人員蔡朝成、龍鳳桂等人拿湯晨輝上街遊鬥，走到新華書店門前時，湯晨輝被人用步槍擊傷倒地未死，王春榮手持五寸刀當即剖腹取出心肝，圍觀群眾蜂擁而上動手割肉，活活把湯晨輝割死。當時縣革委會副主任、生產組長、縣武裝部副部長嚴玉林就在現場，目睹了這一殘忍暴行的全過程而一言不發。共產黨中竟有這樣的幹部，大概不會是多數吧！

六月二十一日，東鄉區上棉村黃培剛參與該鄉雷國保召開的批判張富展（當時僅十八歲，武宣中學應屆畢業生）的大會。批鬥不久，張富展被人用木棍打擊頭部昏倒在地，黃培剛即將張富展拖到一華里多遠的那鳳嶺放下，用五寸刀朝張的胸部捅一刀，張掙紮扭動著身子，黃培剛又在旁邊拿一塊石頭砸張的太陽穴，接著又連捅幾刀，從胸部直割到肚臍處，取出心肝；接著廖水光割去張的下陰，其他人即蜂擁而上把肉割光。

六月二十三日是武宣街圩日，約中午時分，武宣鎮對河生產隊李炳龍等人用鐵線把黎明啟、黎中元、黎中傑等人的腳、手綁住，李炳龍帶領左伯洪等十四人，各拿棍棒押送被鬥者到縣城區遊街，遊到菜市時，即令黎明啟等三人跪下，李炳龍當場宣佈這三人的所謂“罪狀”，宣讀完後高喊：“這三人該不該殺？圍觀的群眾有人喊“該殺！”李炳

龍等人片刻即將被遊鬥者活活用棍棒敲死，後將屍體拖至黔江邊，黃啟煥等人即用刀剖腹取肝、割生殖器，後棄屍于黔江。

七月×日，通挽區大團村第七生產隊龍剋星組織批鬥會，批鬥甘大作；批鬥後將甘大作拉到附近的田邊，龍業偉喝令甘大作跪下，並一棍往甘大作頭上打去，甘倒地但未死，甘祖楊即動手脫甘大作的褲子割生殖器，疼痛使甘大作醒來，並哀求說：“等我死了你們再割”，這些野獸們無動於衷，慘無人道的繼續割去甘大作的陰部，又剖腹取肝、割肉。甘大作在撕人肺腑的慘叫中掙紮，令旁觀者毛骨悚然。生割活人，殘忍至極，令人怵目驚心，慘不忍睹。

七月十七日上午，上江大隊“聯指”頭頭組織批鬥“四·二二”派的廖天龍、廖金福、鐘漢權、鐘少廷等四人，批鬥中把四人全部打死，後拉屍體到平昭碼頭，由李燦熙、徐達財、樊榮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肝和肉、生殖器，拿回大隊食堂煎炒會餐，參加會餐者有徐達財等二十三人。

武宣縣是挖肝割肉最多的一個縣，這種人吃人的現象只有在原始社會才有，這種離奇的“返古”現象竟然出現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廣西，實在是廣西乃至中國的奇恥大辱。在文革後的處遺中廣西的某領導人竟說“該縣向有吃人肉的習慣”，不知這是什麼樣的混帳邏輯。

除武宣縣發生吃人肝、人肉的事件外，廣西其他一些縣亦有類似事件發生。

五月二十八日，大新縣昌明公社一個大隊的民兵營長趙榮廷指派趙興廷等二十多民兵槍殺何以路等三人，剖腹取肝，陳屍野外。

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七日，上林縣“聯指”四百多人到南寧參加圍剿“四·二二”，武鬥中上林“聯指”有四人陣亡。回到上林後，上林“聯指”為陣亡的人員開追悼會，瘋狂地報復殺人，幾天時間就殺害上林“四·二二”一百零三人。殺人手段更是野蠻殘忍、罕見。如十六歲的農中學生覃恒河被拉到“聯指”陣亡人員潘連標的墓地，當場殺害用來當祭品。喬賢大隊的“四·二二”人員蒙光忠被打死後，兇手們用刀

剖腹取肝煮食。一個小小的上林縣竟有黃日旭、黃星輝及上林中學教導主任韋啟華等近兩千人被殺害。

殺人後挖肝、割肉煮食的事件除上述地方發生外，在廣西的賓陽縣、武鳴縣、合浦縣、靈山縣、貴縣等地均有此類事件發生。貴縣的一個殺人兇手還深藏了兩個人肝多年，直到一九八二年文革處遺時才被迫繳出來。

殺人後剖腹挖肝、割肉煮食，真乃全國的首創，二十世紀最野蠻的法西斯獸行。

在這些被殘害的人當中，有“四·二二”的人員，他們中有幹部、教師、學生、工人、農民，另外就是在文革中從不敢亂說亂動的所謂“四類分子”；他們有的全家被殺絕。“聯指”派的人們與這些被殺者有什麼深仇大恨嗎？其實他們之間本無冤仇，而是在那個瘋狂的年代裏，在幕後策劃者們的挑動下，“聯指”派的一些人喪失了理智、喪失了人性，他們認為惟有把對方的組織搞垮，把對方的人員從地球上剷除乾淨，才能顯示出他們是“最革命”的，他們的心理才能夠平衡。把“四·二二”派當土匪來圍剿、剷除，以建立他們一派的“革委會”成了他們瘋狂追求的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們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十萬大山聯指剿匪 姑婆山四二二逃生

話說一九六八年的上半年，廣西各地和縣級都先後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這些革委會都是“聯指”一派在掌權，這正是韋國清及“聯指”們實施消滅“四·二二”建立革委會這一目標的結果。由此，“四·二二”派及許多無辜的群眾慘遭殺害。上兩回書的許多殺人事件已經足以說明瞭。本回書再說兩個殺人的典型事例，用以說明韋國清及“聯指”們是如何把“四·二二”及不同觀點的群眾當“土匪”來圍剿和消滅的。

一個是地處十萬大山的上思縣，這裏是山高林深，地處中越邊界。一九五〇年國民黨潰敗時，曾有少量國軍逃進深山與當地土匪相結合，為此，解放軍曾在此剿過匪，當地的人民如今尚記憶猶新。時過境遷，當年的土匪早已不復存在了。然而到了一九六八年的春夏之交，這裏又在進行一場圍剿“土匪”的戰爭，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文化革命開始後，上思縣這個山林地帶也形成了“四·二二”和“聯指”兩大派，而當地的人武部、公檢法軍管會都是支持“聯指”一派的，對敢於造反的“四·二二”向來視作“匪”，圍剿“四·二二”就是剿匪，已經成了他們行事的準則和所要達到的目標。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七日，上思縣革委會副主任、人武部長、公檢法軍管會主任段振邦一手製造了一宗駭人聽聞的“枯那事件”，因此事件後來有九百七十三名幹部和群眾慘遭殺害。

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段振邦介入地方的文化革命參加支“左”後，從一開始他們就支一派、壓一派，稱讚上思縣的“聯指”是“無產階級革命派”，誣稱“四·二二”為反動組織。在他的主持下，召開各

公社領導、大隊民兵營長、治保主任會議，佈置收繳“四·二二”派民兵的槍支。當時許多“四·二二”派的民兵都把槍繳出去了，惟有枯那大隊治保主任甯協利拒不把槍繳給“聯指”的人員，雙方發生爭奪槍支。在爭奪的過程中，寧協利手中的槍不慎走火打死了“聯指”派的李原才。對於這樣的不幸事件，按正常程式是可以妥善解決處理好的，但段振邦卻是企圖以此為契機，演變成把“四·二二”當土匪來剿的事件。

事件發生後，段振邦向欽州軍分區謊報說：“五月十七日，發現枯那大隊有土匪三四十人，全副武裝伏擊我民兵，瘋狂向我民兵開槍射擊”。段振邦一方面向上級謊報“匪情”，一方面派人武部副部長韓剛生率“聯指”武裝民兵兩百多人開赴枯那“剿匪”。由於寧協利等人早已逃散，“聯指”武裝人員一無所獲。此後兩個多月中又多次派人去圍剿，始終抓不到寧協利。段振邦等人為了達到消滅“四·二二”的目的，於八月十六日又向欽州軍分區報告，要求請示廣西軍區。廣西軍區得到報告後，立即發佈命令“要搞掉這股土匪”。上思縣人武部接到命令後，如獲至寶，馬上由人武部出面組織“剿匪指揮部”，由段振邦和駐軍一個營長負責“剿匪”。欽州軍分區也派出副司令員楊伊銘前來坐鎮指揮，他們調動本縣“聯指”民兵和欽州、東興兩縣的“聯指”民兵及部隊共一千多人前來共同圍剿，包圍“匪區”，設卡搜山，沿村挨戶清查。伏擊聚繳。所有這一切手段，結果都沒有發現一個土匪。

八月二十三日，段振邦又生一計，由縣革委會出具佈告，在全縣張貼。佈告說：“凡窩藏土匪、通匪、濟匪者與匪同罪”。要在全縣範圍內進行挖黑窩、拔釘子的清匪運動。段振邦在公正公社大會上宣佈：“誰跟山上土匪有聯繫，一經查出，一律槍斃”。這樣，一場指鹿為馬，玉石俱焚的大屠殺終於落到了“四·二二”派和持不同觀點的幹部群眾身上，給他們冠以“通匪”、“濟匪”、“窩匪”等之罪名。與“枯那反革命事件”有關者通通與匪同罪，大抓大捕一千六百七十一人，其中竟有九百七十三人慘遭殺害。死者中有國家幹部一百四十九人，枯那大隊有六十一名平民百姓被殺，這真乃震驚中外的大冤案、大慘案。

另一個典型的事件就是文革中平桂礦務局的大屠殺。平桂礦務局是中央的直屬企業，地處賀縣、鐘山兩縣的交界處，管轄有水岩壩、望高、可達、新路、珊瑚、龍水等礦山以及平桂機械廠、平桂電廠、平桂冶煉廠、西灣煤礦等生產單位；另附設有醫院、學校、職工和家屬人口有數萬人，是一個以產業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為主的大型國營企業。另外還有廣西地質勘探公司的二〇四地質勘察隊，也在礦務局的轄區內，專為礦山的地質勘探服務。這樣一支隊伍，他們是真正的無產者，來自四面八方，為中國的礦山建設和採礦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一九六六年的十月，北京來了一批南下串聯的學生到了平桂礦務局。其中有一個清華大學建築系二年級的女學生吳端，此人十分了得，她帶領一班北京來的學生，和桂林來的學生一道，在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中煽風點火，發動大家起來造單位領導和“四清”工作隊的反。首先工程技術人員中的一部分人起來了，他們是知識份子，接受新東西快；跟著工人中也有部分人起來，在孫家銅、張誠、顧啟發、袁孝春等人的組織領導下，很快就成立了造反派自己的組織，名曰：“平桂井岡山兵團”。造反派是反單位領導和工作隊的；另一派則是保單位領導和工作隊的所謂保守派。隨著文革運動的發展和深入，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革命”後，保守的一派慢慢地垮臺了，許多人就參加到“井岡山”派來了，從而“井岡山”的力量得到了發展壯大。但到了一九六七年的五月份後，南寧出現了“四·二二”和“聯指”兩大派，平桂局也由原來的保守派的機關幹部和工人、工程技術人員成立了平桂“聯指”，為首的頭頭是鄒富金、楊子明，這個組織則隸屬於廣西“聯指”指揮之下。這一派是支持韋國清的。而平桂“井岡山”則隸屬廣西“四·二二”指揮之下，是堅決打倒韋國清的。兩大派的鬥爭打得火熱，完全是受廣西“聯指”和“四·二二”互相鬥爭的影響所致。

在梧州市和梧州地區各縣而言，“聯指”一派的力量是強大的，“四·二二”的力量顯得十分微弱。在這些地方本來就是“聯指”的一統天下，那裏容得下在他們的區域內有一支強大的造反派，平桂局“四·

“四·二二”就成了韋國清及當地“聯指”頭頭和幕後指揮者們的眼中釘、肉中刺，不剷除平桂局“四·二二”、“聯指”及其幕後指揮者們是不會安心的。這就決定了平桂局“四·二二”的悲慘結局。

一九六八年春末以來，隨著梧州市及梧州地區各縣“四·二二”相繼被圍剿和消滅，梧州市、梧州地區各縣也相繼成立了革委會。此時，惟有平桂局的“四·二二”尚存在，成了他們一統梧州地區的最大障礙。為此他們調集賀縣、鐘山、富川、昭平等縣的“聯指”，在各縣人武部的支持下，開赴平桂地區與平桂局的“聯指”共同圍剿平桂局的“四·二二”，一場所謂的“剿匪”戰爭就這樣打響了。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七日，在梧州軍分區和各縣人武部負責人的指揮下，成立統一的“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習稱“保紅指揮部”），組織五千多人的“聯指”武裝人員前來參戰。首先武裝包圍平桂局所有各礦山及局內“四·二二”的各據點，使他們互相間失去聯繫，各自在孤立的據點內，以便各個擊破聚纖。

戰鬥首先在各礦山打響，珊瑚、望高、水岩壩、可達、新路等礦山的“四·二二”人員，由於他們沒有什麼武器，哪是“聯指”的對手，不幾天，所有據點全被攻破，人員除少數突圍外，大部分被“聯指”抓獲，可憐一百多條生命慘死在“聯指”們屠刀之下。只有新路礦、可達礦、望高礦、水岩礦有近千人逃進了姑婆山躲藏，以新路礦的人最多。這些躲藏者由於缺衣少食，後來除一部分逃入湖南得逃生外，也大部分被“聯指”的搜山隊抓獲，又有上百人遭殺害。

各礦山據點內逃出來的人，除了部分進到姑婆山或逃往湖南以外，部分人跑到了平桂局機關、平桂冶煉廠、機械廠、選礦廠、電廠及黃花山等據點逃生。這些據點是“井岡山”兵團力量最強大的地方，據點內主要是工程技術人員、工人、幹部、平桂中學的師生及部分家屬，約兩千多人。從五月初以來，“聯指”主要是採取圍而不攻的手段，不時向據點內射擊，以此來逼迫“井岡山”派投降。“井岡山”派的武器除了部分槍支外，大部分是技術人員和工人利用鋼材、車床自造的，和

“聯指”派相比，這樣的武器顯然差多了。除了武器以外，據點內最大的困難是缺糧，躲在據點的人員往往每天只能吃些稀飯度日，給他們的身體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從五月中旬以後，“聯指”則開始了進攻，如五月二十九日進攻西灣選煉廠週邊二號山頭，六月十四日進攻西灣工程隊、試驗所、電廠背後山頭、選煉廠等“井岡山”的據點。六月十七日再次進攻試驗所、工程隊和西灣糧所據點。六月二十日開始進攻平桂局行政大樓和平桂公安局。

七月七日，全面進攻黃花山據點前，梧州軍分區副司令員李錢榮、副參謀長李玉濤在賀縣革委會委員張仁義、繆隆恩等人的陪同下，到戰地觀察，參與決策，圍攻“井岡山”。

到了七月初，“四·二二”已被圍困近一個多月了。平桂局地質科單xx等人提出，這樣沒吃的，長期固守不是辦法，必須派人出去求援，使外面瞭解這裏的情況，最後給據點解圍才是辦法。經與“井岡山”負責人張誠等人研究，同意了這種辦法，由單xx帶人逃出去，經由姑婆山到湖南，再到北京等地反映情況。單xx帶上二十多人，於七月四日晚乘黑夜逃出據點，先到姑婆山腳的光明化工廠附近，在這裏沿著山溝往山上爬。單xx過去在這裏爬山搞地質工作，還算比較熟悉。他們一行二十多人爬到近山頂，天也亮了，碰到一個在砍柴燒炭的山民，此人十分友善，煮稀飯給他們吃，並給他們帶路走到了姑婆山林場。在這裏他們碰到了來自新路礦的“井岡山”數百人，他們早逃到了這裏，難友們相見格外高興。

單xx等人在林場吃過飯後，由於任務在身，不能在此久留，他們就急速下山，到達湖南省江華縣的桃圩，這裏的老百姓很好，給他們飯吃。由於沒有錢，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包括新路礦跟著來的部分人，就留下來給當地農民做工，只求有飯吃就行了。這裏的人老實、善良，就收留了他們，使他們得以逃生。只有單xx等數人繼續往北走，經過藍山縣，到達鐵路線上，再乘火車到了株州。在株州單xx找到株州硬質

合金廠，當時廣西治建的工人正在該廠搞建設，熱情地招待了單xx等人。幾天後單xx到了長沙，再回到常德老家，總算死裏逃生，躲過了一場大劫難。

單xx回到常德後，不幾天就聽到消息說，平桂局“井岡山”的據點已經被“聯指”攻下，人員死傷慘重，他覺得再往北京去反映也無多大意義了，只得等待一段時間看形勢的變化如何再作決定。

回過頭來再看平桂“井岡山”被圍攻的情況。當“聯指”不斷加強對“井岡山”各據點的圍攻後，“井岡山”兵團由於缺少武器彈藥，也缺少糧食，終歸不是“聯指”的對手，據點先後相繼被攻破。八月六日，“井岡山”的人員全面被迫突圍，大批人員被抓。有部分人突圍後逃上了姑婆山，“聯指”武裝人員又組織搜山，又有許多人被抓。許多被抓的人被當場槍殺，包括選煉廠廠長和平桂公安局保衛科長在內的一批人被殺害。一九六八年的七、八、九三個月，全局共有七百多人被“聯指”殺害或被迫害致死，是廣西文革的重災區。

幾乎在圍攻平桂局“四·二二”的同時，在平桂局附近的二〇四隊地質隊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可憐的二〇四隊“四·二二”派的人員，他們身無武器，只能由“聯指”隨意抓捕，任意殺害，成了籠中的鳥和籠子裏的雞。“聯指”中的少數壞人，為奪他人的家財或妻子，傷天害理的殺人，使二〇四隊成為廣西地質勘探公司在文革中殺人最多的一個隊。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圖謀權財施計奪妻

十八條命慘遭殺戮

話說平桂礦務局“四·二二”的據點被攻破後，上千人被抓，數百人被殺。七月十一日至十二日，平桂局“四·二二”派的最後一個據點珊瑚錫礦，也被該礦“聯指”派聯合鐘山縣、賀縣、昭平縣等地的“聯指”武裝人員攻破了，數百人被抓，六十多人被槍殺。自此，平桂局的“四·二二”被徹底消滅了。不幾天就由“聯指”一派建立革委會。為了慶祝消滅“四·二二”、建立革委會，“聯指”的幕後指揮者又指示在被抓獲的“四·二二”人員中槍殺了十多人，並殺豬宰羊大擺宴席，大肆吃喝幾天，以示慶祝勝利。“聯指”們猜拳喊碼，好不痛快。一連數天熱鬧非凡，暫且按下不表。

就在平桂局“四·二二”遭到“聯指”圍攻之時，地處平桂局轄區的二〇四地質勘探隊的“四·二二”人員也同樣遭到本隊“聯指”的抓捕、迫害。二〇四地質勘探隊是冶金工業部廣西地質勘探公司下屬的一個勘探隊，專為平桂礦務局尋找後備採礦基地服務。這是一支以產業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組成的隊伍。全隊八百多名職工，分成六個分隊常年在野外從事地質勘探工作。大隊部設機關、學校、衛生所、化驗室、修配所，人材齊全，是廣西地質勘探公司一支重要的地質勘探隊伍，多年來為地質勘探事業作出過大量的貢獻。

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這個隊就開始進行“四清”運動，由李水松任“四清”工作隊隊長在此大抓階級鬥爭，一些隊領導成員和所謂的出身不好、有“海外關係”的知識份子遭受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地質技術人員乃集隆因此被逼致死。“四清”工作隊執行了打擊一大片的形“左”而實右的路線，傷害了不少幹部和知識份子。

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受北京、桂林及平桂礦務局的影響，這個隊的工人和技術人員也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關心國家大事，積極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在運動中因為對工作隊和單位領導的不同看法，和許多其他地方一樣，這裏的工人和技術人員中也形成了兩派。當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的“一月革命”風暴後，全國各地的造反派都開展了奪權鬥爭。二〇四隊的造反派也學習外地的樣子進行奪權，大隊幹部高國忠、莫成舟、丁時佑等一批人支持奪權，支持造反派，因而造反派一度掌握了二〇四隊的大權，隊伍也迅速擴大。到了一九六七年的四月底以後，由於在廣西的首府南寧出現了“打韋”和“支韋”的兩大派，廣西“四·二二”和廣西“聯指”，此風傳到平桂地區，受其影響，二〇四隊的造反派理所當然的站在“打韋”派一邊，成了“四·二二”的一個下屬組織。而二〇四隊中的另一部分人，主要是一部分幹部和工人，如孫和蘭、楊兆便、黃滿森、李時祥等一幫人在李水松的支持下，成立了二〇四隊的“聯指”，其成員多是由原來的保守派人員組成，他們是“支韋”派，與“四·二二”成了對抗的組織。從此以後，二〇四隊內部的兩派“四·二二”和“聯指”，隨著社會上這兩派的鬥爭而在互相鬥爭著。一九六七年的鬥爭，在這個隊主要是大字報和口頭辯論為主。因為他們是生產單位，要搞生產，大部分人在野外，分散，所以從未發生過什麼大的事件。

到了一九六七年的十一月，韋國清及廣西軍區都向中央交了檢討，承認他們在廣西的文化大革命中支一派、壓一派，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廣西兩派赴京代表在中央的主持下達成了大聯合的協定，廣西區革籌也經中央批准成立了。這在“四·二二”一派來說，認為是勝利了。然而天有不測風雲。韋國清及廣西軍區交出的檢討墨汁未幹，他們和“聯指”頭頭們消滅“四·二二”建立革委會的野心就暴露出來了。從一九六八年春以來，“聯指”在廣西各地尋釁滋事，挑動武鬥，在軍區和各地人武部的指揮下圍攻“四·二二”。一九六八年五月底開始，平桂局“聯指”圍攻平桂局“四·二二”，七月初平桂“四·二二”被消滅，

地處平桂局的二〇四隊，“四·二二”人員的命運就在劫難逃了。

二〇四隊的“四·二二”派並沒有任何武器，他們也從未到平桂局或其他地方參與武鬥，與本隊的“聯指”也未發生過武鬥。爭吵是有的，那只是大字報和口頭之爭，並無動刀動槍的舉動。但當平桂局“聯指”向“四·二二”動刀動槍捕殺時，二〇四隊的“聯指”按耐不住了，他們也在平桂局“聯指”的支持下，向二〇四隊的“四·二二”派舉起了屠刀，大開殺戒。一時間，二〇四隊所在地區五拱水成了殺人場，十八個生靈命赴黃泉，留下妻兒老小熱淚涔涔，欲哭無聲。真乃一片悲涼的世界，人世間竟有如此的慘劇。

全隊慘遭殺害的有莫成舟等共十八人。都是在時任黨委書記的李水松和“聯指”頭目孫和蘭、李時祥等人的直接指揮或者默許殺害的，有的就是他們直接開槍打死的。

李水松原是“四清”工作隊的隊長，“四清”運動結束後，原來的黨委書記楊正元被李水松整垮了，李水松留下來繼任了黨委書記之職，成了全隊最高的領導人。文化大革命中他支持“聯指”，成了“聯指”的幕後指揮者和實際掌權的人物。二〇四隊被害的十八人，如果沒有他的指揮或者默許，是絕不會出現如此慘劇的。

被殺害的十八人是何許人也？通過幾個死者的情況，就可見其一般了。

莫成舟，男，廣西平樂縣人，共產黨員，原二〇四隊保衛科科長，隊黨委組織機關幹部下分隊蹲點，他到了武宣分隊當黨支部書記。文化革命中他同情“四·二二”的觀點，並參加了“四·二二”，從未作過什麼違法之事。一九六八年八月，二〇四隊“聯指”在李時祥帶領下，開車到武宣分隊，說是把莫成舟接回隊參加隊革委會的成立大會。從武宣返回隊部車路過平樂縣榕津時，由李時祥把莫成舟推下汽車槍殺。李時祥也是隊裏保衛科的幹事，他急於想當上保衛科長，所以迫不及待的殺害了莫成舟這個保衛科長。

丁時佑，共產黨員，二〇四隊財務科長。

陳翠珍，女，共產黨員，隊黨委辦公室秘書。

丁、陳二人為一對夫婦，陳已有身孕，文革中他們僅僅因為參加了“四·二二”一派組織，“聯指”中有人想當財務科長和黨委辦公室秘書，就趁機把他們殺害了。陳翠珍是賀縣本地人，她因懷孕早就回家躲藏了，正在醫院檢查身體，是“聯指”派人去把她騙回隊裏的。一個孕婦也不放過，這可是兩條人命呀！

藍光旭，男，湖南省長沙人，大學畢業生，地質技術員，文革中因參加“四·二二”，成了“四·二二”派的負責人之一，僅此而已，並未幹過任何違法之事；再就是因為他的妻子朱惠君長得漂亮，一個湘妹子，被“聯指”中的黃某人覬覦多年了，現在黃某人要想奪人家嬌妻，因而出謀叫人殺害藍光旭。天下之壞人真乃無奇不有。

秦成軍，男，廣西融安縣人，地質技術員，文革中因參加“四·二二”，是“四·二二”的負責人之一，未作過任何違法之事，其妻還是“聯指”一派的，也不能幸免而慘遭殺害。

郭舜卿，共產黨員，設備科科長。

徐棣華，女，職工。

郭、徐二人是夫婦，有一個幾歲的小孩。文革中他們只因參加了“四·二二”一派，就慘遭殺害。在槍殺他們之前，他們兩人曾雙雙跪在兇手的面前，請求只殺一個，留下一個照顧年幼的孩子。兇手們是殺人成性的豺狼，哪會聽得進人的呼聲。

被殺害的還有水文地質技術員韋澤富以及黃風斌、鄒月華夫婦等十八人。

這十八人被殺害後，身穿的衣服和皮鞋，好的都被兇手剝去，身上的錢物和手錶也被搜去，有的家產和存款也被沒收。這不明明是土匪、強盜了嗎！

這些被非法殺害的人，都是二〇四隊的骨幹力量。他們在文革中參加“四·二二”有什麼錯？他們沒有任何違法亂紀之事，更沒有武器，沒有參加武鬥，只是文革中的觀點不同，李水松、孫和蘭、李時祥

及“聯指”中的殺人兇手們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殺人，如此妄為，如此殘酷。公理何在？正義何在？人性何在？這些死去的冤魂是永遠也不會瞑目的。

十八條生命慘遭殺害離開了人世間。那些雖然幸免於死的人們也百般地遭受折磨。

下臺了的黨委書記楊正元，被當著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而遭受殘酷鬥爭和毒打。“聯指”們把他裝進豬籠裏滾來滾去，不時被毒打、罰跪，可憐一個年近六旬的老人，哪經得起如此折磨。“聯指”中的少數壞人哪還有半點人性呢？

行政科長高國忠，是南下的一個老幹部，文革中僅僅因為支持了“四·二二”就遭受殘酷的鬥爭和無情的打擊。他清楚地記得，一次在批鬥會上，“聯指”人員徐名守對準他的肝部狠狠的一腳，差點要了他的老命，使他痛得死去活來。“聯指”中的少數壞人打人太殘忍了。

“四·二二”的頭目房德庫、鄧君傑以及其他許多“四·二二”的骨幹分子，皇天保佑他們雖然沒有被槍殺，但他們個個都被打得半死，有些人造成了殘疾。

平桂礦務局的“四·二二”被消滅以後，廣西“四·二二”就只剩南寧、柳州、桂林三座城市尚存部分力量了，加上各地“四·二二”被圍剿後逃出來的部分人員，也躲到這三座城市逃生。這就是韋國清和“聯指”頭頭們宣稱的所謂“伍修集團的三點一線”，這是韋國清和“聯指”高參們施計造成的，也是他們所希望的。

南寧、柳州的“四·二二”和桂林“老多”的人們當然不甘心任人宰割，為求生存，面對廣西的情況，他們要進行最後的抗爭。最後的決戰就在這“三點一線”了。有分教，炮聲隆隆，火光衝天，殺聲陣陣，屍橫街頭。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桂林聯指仗勢瘋狂 自衛反擊老多告捷

話分兩頭，當廣西各地“四·二二”遭受圍剿和屠殺之時，南寧、柳州及桂林這三座城市的情況又如何呢？這是看官們必然要關心的問題。自本回書起，筆者就專門來說這三座城市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及其變化的經過。

桂林市的各單位，包括街道的老百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屬於“老多”派，“老多”派佔有絕對優勢。雖然如此，為了實現兩派的大聯合，“老多”派高姿態的委曲求全，和“聯指”派對等，平起平坐，實現兩派的大聯合，籌備成立桂林市革命委員會。一九六七年底，桂林市的兩派實現了大聯合，革委會的籌備工作也提到議事日程上，一九六八年開春後，桂林市的革委會即將宣告成立了。

然而形勢的發展似乎難以預料。實現兩派的大聯合，成立革委會，也只是“老多”派的一廂情願，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天真的想法。因為在桂林“聯指”方面，他們可不是這麼想的。韋國清及廣西“聯指”的根本目的是消滅“四·二二”建立革委會，在桂林又豈能例外呢？桂林“聯指”的人數雖少，但他們有韋國清及廣西軍區和桂林軍分區的支援，他們的活動的能量卻相當大。自一九六八年初春以來，桂林“聯指”在市內的許多單位尋釁鬧事，挑起事端，製造分裂，以圖激化兩派的衝突，這樣他們就可以反過來嫁禍於“老多”，以便借機消滅“老多”。在桂林市的週邊各縣都是“聯指”的一統天下，幕後又有實權人物的支持，難怪此時的桂林“聯指”如此的瘋狂，為非作歹，不可一世。面對此種情況，桂林“老多”仍然採取委曲求全的高姿態，忍耐、退讓，以求得桂林市的安寧。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四日桂林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了，革委會主任王斌是一〇四部隊負責人，區革籌的成員之一；兩派群眾的代表對等的參加了革委會，可以說桂林“老多”是做到最大程度的退讓了。數天后，桂林地區革命委員會也成立了。

桂林地、市革委會的成立，本應該給桂林人民帶來平靜安寧的生活，然而形勢的發展卻打破了人們的美夢。對於大多數善良的桂林人民來說，他們哪想得到，此時的廣西，除桂林、柳州、南寧三座城市外，廣西各地、縣的“四·二二”不是被消滅了，就是已被圍困即將被消滅。只有少部分人逃出來到了南寧、柳州、桂林，此時的“聯指”豈能放過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在桂林，“老多”雖然佔有絕對優勢，但此時的桂林也不絕不是一九六七年的桂林了。由於成立了革委會，主任王斌乃韋國清的心腹幹將；桂林市人武部政委陳秉德此時又是革委會的副主任，他們都是全力支持“聯指”的，陳秉德簡直就是“聯指”的頭目一般，一切為“聯指”說話。而原來在支左中支持“老多”的六九五五部隊，在黃永勝的幹預下已靠邊站了。這樣，桂林市的革委會實際上成了“聯指”一派的“派委會”，“老多”的代表在革委會中也只是徒有空名而已，起不到任何作用。由此，“老多”們對革委會當然會有意見，會據理力爭，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這樣一來，“老多”與革委會也即是與“聯指”的矛盾就會日益加劇。俗語說樹欲靜而風不止，此時廣西的整個形勢是“四·二二”行將被消滅，這必然助長桂林“聯指”的囂張氣焰，他們更為得意瘋狂。為了最後消滅“老多”，“聯指”們必然會以百倍的瘋狂向“四·二二”殺來，這就註定了桂林的兩派最終將會爆發一場大規模武鬥，這是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方是退讓委曲求全，一方是得寸進尺步步緊逼，雙方的矛盾日益加劇，終於會有爆發的一天。此時的桂林市革委會不能公正的處理問題，他們完全站在“聯指”一派的立場上，放手讓“聯指”在全市許多單位鬧事。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聯指”派突然在市區搶佔據點，就連當時緊靠市革委會駐地的榕城飯店也被“聯指”強佔作為據點，開

創了搶佔據點的先例。榕城飯店是一座六層高的樓房，是一座在抗日戰爭中日本飛機轟炸桂林後留下的唯一一座高樓，當時作為雙方大聯合的辦公用地。此樓位於環湖邊的陽橋頭，控制這座高樓，可以俯瞰大半個市區，一旦武鬥暴發，這座樓有重大的作用，無怪乎“聯指”要首先搶佔。對於“聯指”派如此明目張膽地破壞大聯合、企圖挑動武鬥的非法行動，市革委會和桂林軍分區不聞不問，任其“聯指”胡作非為，這激起了“老多”的強烈不滿和憤恨。他們大罵市革委會是“派委會”，是“聯指”的“王斌政府”，並寫大字報進行揭露和批判。

“聯指”不但在市區搶佔據點，五月十日起，“聯指”頭目李年生、曹鐵軍等人親自帶隊先後到一〇四部隊、三〇一部隊、警備司令部、軍分區、六九五五部隊、空軍機場、雷達站、市武裝部、南站軍管分隊等處奪槍十五次，共奪得各種槍支二百余支，子彈二萬五千多發，手榴彈五百多枚和一批軍用物資。與此同時，地區“聯指”也奪槍九次，奪得一大批槍支和彈藥。

面對“聯指”們如此肆無忌憚的奪槍行徑，“老多”派也仿效奪槍。從五月二十三日起，在周兆祥、劉天償等人的組織下，“老多”派分別到六九五五部隊、軍分區倉庫奪槍，共奪得各種槍支三千四百一十支，子彈二十六萬九千二百一十三發，手榴彈三千四百多枚，各種炮八門。並到北站運往柳州二化廠的列車上奪得蘇制TNT烈性炸藥五十噸。

“老多”派奪得了如此多的武器，用於武裝自己。“老多”派組建了四個正規的連隊，隸屬於“紅衛師”的領導；各城區則成立聯防指揮部，配合“紅衛師”擔任保衛山城安全的任務。“紅衛師”的師長由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的轉業軍人唐兆宣擔任，政委則由廣西師院外語系六二級的學生劉振林擔任，劉振林是學生運動的領袖，一個非常優秀的學生，“紅衛師”的戰鬥人員則主要由大、中學校的學生和工廠的青年工人組成，當中也有部分從部隊轉業的軍人，是一支戰鬥力很強的隊伍。

自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桂林“聯指”在市區搶先佔領據點後，“老多”也被迫作出相應的反應在市區一些地段構築工事以應付突發事件的

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市革委會不但不出面做工作，制止武鬥的發生，反而把革委會搬到“聯指”控制的區域內，放手讓“聯指”胡作非為。這就充分說明這個“革委會”是“聯指”一派的“派委會”了。為此，“老多”的宣傳機構展開了強大的宣傳攻勢，用大字報、廣播、傳單等來揭穿“聯指”和“王斌政府”的倒行逆施，讓市民們看清他們的醜惡嘴臉。

在輿論上“老多”派是站在理上的，深得市民的同情和支持；在人員組成和武器裝備上，“老多”也是有週密的佈署和足夠的武器，足以和“聯指”派相抗衡的。然而這僅是桂林市區而言，在桂林市區以外就是“聯指”一統天下，桂林“老多”是處在桂林地區十二個縣“聯指”的包圍之中，“老多”面臨的形勢是極其嚴峻的。

在市區，“老多”也只佔有十字廣場至北面觀音閣一帶和東江一片地區；“聯指”則佔據著陽橋的榕城飯店及其以南的整個市區，西面的白岩山附近是一〇四部隊，那是支持“聯指”的，觀音閣以北的所有地區都是“聯指”的勢力範圍，“老多”處於三面受圍攻的不利狀態。

更為重要的是在桂林市以外，桂林地區的臨桂、靈川、興安、全州、資源、灌陽、龍勝、永福、陽朔、荔浦、平樂、恭城等十二個縣，那裏的“四·二二”派已經被打垮，餘下的人員不是跑到桂林逃生。就是下鄉上山躲藏去了，這些縣都成了“聯指”派的一統天下，也成了桂林市“聯指”的大後方。十二縣的“聯指”武裝人員在桂林地區革委會和桂林軍分區的統一指揮下，在各縣革委會和人武裝部的直接帶領下，共同前來圍攻桂林“老多”，桂林“聯指”可以說是勝券在握了。

五月二十四日，地市“聯指”主要負責人伊景春、唐廷國、軒鳳歡、廖祖迪、李年生、曾明軒、曹鐵軍和地區幹部徐孝治在桂林飯店召開會議，研究組織各縣民兵進城和籌集槍支問題。從六月四日起，在地區革委會和桂林軍分區部分領導的支援下，地區十二個縣人武部先後組織了約八千多名武鬥人員（包括各縣人武部幹部一百二十多人）進入桂林。六月五日晚在東方紅飯店開會，成立“桂林地區保衛革命委員會總指揮部”（簡稱“桂保總”），總指揮曹鐵軍，副總指揮曾明軒（兼桂北

民兵師師長)、王榮(臨桂)、董茂軒(荔浦)、邵連剛(陽朔)、李年生(桂林市)等人，總政委徐孝治，參謀長丁絢(桂林百貨站黨委書記)。會後發表了“堅決消滅地、市造反大軍一切反革命武裝”，“桂林地、市造反大軍必須無條件向‘桂保總’全部繳械投降”的通令。

面對“聯指”派如此的囂張氣焰，面對四面受圍的嚴峻形勢，“老多”的頭頭們周兆祥、劉振林、謝榮傑、劉天儕，唐兆宣等人多次反復研究，認識到要打破被圍攻的不利局面，惟有主動的反擊，逼迫對方撤離包圍圈，坐下來談判才有生存的空間。此時，“老多”方面從多種情報來源獲悉，桂林地區十二個縣的“聯指”八千多名武裝人員將於六月四日前來圍攻桂林，必須搶在他們立足未穩之時主動反擊，才能贏得主動。為此，“老多”頭頭們決定搶在十二縣“聯指”武裝人員到達之前，主動出擊，先發制人，以打擊桂林市“聯指”派的囂張氣焰，解除他們對“老多”的威脅。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凌晨，“老多”的紅衛師經過精心策劃和準備，派出一個連對“聯指”派佔據的榕城飯店據點發起攻擊。紅衛師的武裝人員先用炸藥進行爆破，接著突擊隊員以閃電般的攻勢衝入樓內，守衛據點的“聯指”派人員則被巨大的爆炸聲震得暈頭轉向尚未清醒過來，很快就成了俘虜。前後不到半個小時就結束了戰鬥，拔掉了對“老多”威脅最為嚴重的“聯指”守護神，是“老多”的第一次勝利。

首戰告捷，充分顯示了“老多”的實力，被圍攻的山城市民無不興高采烈，拍手稱快，熱烈祝賀自衛反擊作戰的首次勝利！“老多”領導層採取先發制人的自衛反擊，完全是被迫的，目的也在於警告“聯指”不要憑藉武力來包圍“老多”，而應坐下來雙方談判，停止一切武裝圍攻，給山城人民恢復平靜安寧的生活。自衛反擊告捷後，“老多”們就向“聯指”發出停戰議和的資訊，並敦促桂林地、市革委會要站在公正的立場上，不要再玩弄支一派、壓一派的把戲，要命令“聯指”們撤除對“老多”的包圍，雙方坐下來談判以解決爭端。然而，這些只是“老多”們一廂情願的單方面想法，“聯指”的高參們及市革委會和幕後

指揮者可不是這麼想的。他們的根本目的在徹底地消滅“老多”。“聯指”自年初以來的一系列尋釁鬧事，以至後來的搶佔據點，搶奪解放軍的槍支彈藥，目的都是在於刺激“老多”，以挑起雙方大規模的武鬥，最後嫁禍於“老多”，以便韋國清和廣西軍區下令圍剿“老多”，將其消滅。後來的事實發展證明，他們就是這麼計劃行事的。武鬥的爆發，正是他們所希望，也是他們計劃中的，他們是絕不會和“老多”談判議和的。

“老多”的“六·五”自衛反擊，正中“聯指”及幕後指揮者們的下懷，為他們大規模地挑動農民進城圍剿“老多”找到了口實。以此為契機，他們瘋狂地加緊了包圍和進攻“老多”的部署。桂林地、市革委會和桂林軍分區迅速調集十二個縣的“聯指”武裝人員，由各縣人武部負責人帶隊，對桂林實行全面的包圍和封鎖。同時地區成立“保衛紅色政權總指揮部”，號召農民出人、出錢、出糧食支援桂林的“紅色政權保衛戰”。一場大戰在即，有分教，“老多”戰士英勇善戰，桂林北站火光衝天，白岩山上勇士跳崖。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美麗山城遭受重圍 桂林老多固守抵抗

話說“六·五”自衛反擊戰勝利後，山城的人民無不歡欣鼓舞，慶祝勝利。這一仗“聯指”們是失敗了。“老多”強大的攻擊力量超出了“聯指”頭頭們和那些幕後指揮者的預料。好在他們原來預想的目的已經達到，所以對於據點的丟失也並未有自責之感，相反卻在暗中慶幸他們的計劃得以實現。

原來“聯指”頭頭和幕後指揮者們的目的就是要激發“老多”打響第一槍，他們的計劃就實現了。自一九六八年初以來，“聯指”派的人員四處尋釁鬧事，製造矛盾；後來又搶佔據點、搶奪武器，製造武鬥的緊張局勢，市革委會不但不出面制止，反而支持“聯指”派的胡作非為，把市革委會搬出市外。所有這一切，目的都是為了刺激“老多”，迫使“老多”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開槍自衛，“聯指”們的目的就達到了。這樣一來，他們就會宣稱“老多反對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他們就可以打著“保衛紅色政權”的旗號，調動部隊和桂林地區十二縣的“聯指”進城，圍剿“老多”，最後一舉殲滅。“聯指”指揮者們的這一招果然奏效，“老多”開槍自衛還擊，“聯指”全面圍攻“老多”的計劃便得以實施。就在“老多”首戰告捷之時，十二縣的武裝“聯指”八千多人已經到達桂林，一場大規模的圍剿與反圍剿的武鬥就此全面展開了。

“聯指”在榕城飯店的據點失守後，他們退到陽橋以南的百貨大樓和象鼻山、南站一帶佈防，以陽橋為界，與“老多”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西面的白岩山和北面的觀音閣、二級站、北站都是“聯指”控制的據點，對“老多”構成極大的威脅。“老多”的頭頭們想到，必須拔

掉“聯指”的這些據點，才能解除“聯指”對整個桂林的圍攻。為此，“老多”們決定集中兵力，先突破北面的圍攻，然後再分別向西和向南推進。

自榕城飯店據點失守後，“聯指”指揮者們迅速調整了部署，把剛剛到桂林的十二縣武裝民兵佈防在北、西、南三面，以加強圍攻的力量。同時在農村中廣泛開展宣傳，要農民出錢、出糧、出人，支援桂林的“紅色政權保衛戰”。儘管十二縣的農民不都同意“聯指”的所作所為，但在各級掌權者們的欺騙宣傳下，各種強行的攤派，老百姓也是沒有辦法的。只得接受照辦了。可以說參加圍攻桂林的農民，除少數“聯指”的骨幹人員外，多數是不明真相，是受欺騙或者是被迫來的。這樣的一支隊伍的戰鬥力是遠不如“老多”的。“老多”是為了自己的生存而戰，目的明確，是自衛反擊，作戰自然就十分英勇而頑強。

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以後，雙方在南面以陽橋為界對峙，經常隔橋互相對射。此後，雙方在近鐵路邊的榕湖飯店、桂林師範多次發生激戰，互相爭奪這兩個重要據點，但這兩個據點始終掌握在“老多”的手中。

南線雙方的戰鬥雖然激烈，但彼此都不能向前推進。而此時的北線，戰鬥更為激烈。北面的觀音閣、虞山廟、麵粉廠、二級站、北站、第一糧庫經常發生激戰。“聯指”派駐守觀音閣和二級站、北站等據點的，除少量桂林市的“聯指”人員外，主要是靈川、興安、全州等縣來的農民。六月中旬“老多”的“紅衛師”開始了對觀音閣和二級站一帶的反擊作戰。“老多”們組織得十分的有條不紊，前面的攻擊部隊，後面的擔架隊、衛生隊、宣傳隊及後續部隊，互相配合默契。協同作戰，經過數天的戰鬥。一舉奪下了觀音閣和二級站，把“聯指”趕到了北站一帶。激戰中有十多名進城參加戰鬥的農民被打死，他們頭戴雨帽，身背防雨塑膠布，躺在觀音閣牆腳下和二級站院內，有的雙目尚未閉合，嘴還微微張開，似乎在向“聯指”的指揮者們呼喊：“你們為什麼騙我們來送死？你們跑到哪兒去了？”。

此役“老多”方面也有數人傷亡。桂林冶金地質學校（現在的桂林工學院）學生陳兆杏即是在此次攻擊作戰中陣亡的。

觀音閣和二級站一帶失守後，“聯指”派退到北站一帶佈防。再往北就是郊區了，他們必須固守北站。在“老多”方面，則是企圖一股作氣奪取北站，把“聯指”趕出市區，因而雙方在北站展開了更為激烈的戰鬥。

六月下旬，經過數天的休整後，“老多”紅衛師開始了向北站的攻擊。此役中雙方都投入了較多的兵力，因而戰鬥十分激烈。特別是在雙方的作戰人員中，都有一部分是剛從越南戰場回國的軍人，退役後，他們有的參加了“聯指”，有的則參加了“老多”，他們把在越南戰場中學到的炸藥包戰術，即使使用發射架，用小炸藥包來帶動大炸藥包，落到對方陣地爆炸，帶到武鬥中去了，能炸毀對方的工事，殺傷力十分強大。至六月底，一連數個晚上雙方的交戰，伴隨著炸藥包的巨大爆炸聲，雙方對射洩光彈的一條條閃光劃破長空，尤如一幅幅美麗的夜景，十分壯觀。許多市民每當夜幕降臨的時候都爬到樓頂觀看北站上空的戰爭夜景。習以為常，人們似乎不感到恐懼和害怕了。

連日來，每到夜晚北站上空都是一片火球在閃爍。經過數天的激戰，北站及其附近樓房大都夷為平地。此役“聯指”再次戰敗，“老多”一舉奪取北站，“聯指”們退到郊外粑粑廠一帶了。至此北線戰事基本平息，“老多”與“聯指”在北站與粑粑廠之間形成新的對峙局面。

面對榕城飯店及北面觀音閣、二級站、北站等戰鬥的失敗，“聯指”頭頭們覺得原來從軍分區和各縣人武部帶來的武器不夠先進，比不過“老多”派從野戰部隊得來的武器，可能是失敗的主要原因。為此，“連指”頭頭們在幕後高參的指導下，想到了搶奪國防倉庫的武器，才能更有效的對付“老多”。

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至七月四日，在桂林地區“保紅指揮部”的指令下，地區十二個縣到桂林參加武鬥的人員數千人到興安國防倉庫搶奪武器，各縣“聯指”人員都得到了數量可觀的各種武器，武裝了自

己。僅以恭城、荔浦兩縣為例，就可以知道此次搶奪國防倉庫的大概情況了。

據官方的記載，這兩個縣搶得的武器如下：

七月初，恭城縣“聯指”派出二百一十一人乘車到興安國防倉庫搶奪武器，得重機槍五挺，輕機槍十九挺，半自動步槍一百三十二支，衝鋒槍十六支，各種子彈二萬八千七百零五發，手榴彈一百一十九個，炮彈四十九發。

七月初，參加桂林武鬥的荔浦民兵指揮部接到去興安駐軍搶槍的通知，連夜派人趕回荔浦組織力量，分乘十輛汽車，當晚到達興安縣駐軍武器庫，共搶得各種機槍十五挺，半自動步槍三十三支，衝鋒槍六支，五四式手槍十支，八二迫擊炮一門，六〇炮一門，手榴彈一百七十九箱，加重手榴彈二箱，各種槍彈四十三箱，八二炮彈八箱，六〇炮彈十一箱。

十二縣的“聯指”興安奪槍，最多時人數達近萬人，少時也有五六百人。歷時五天，總計奪得各種槍支五千六百三十六支，各種彈藥三百二十五萬餘發，各種手榴彈二萬四千四百二十八枚，爆破筒一百一十四根，各種軍需物資七百八十三件。

有了數量如此之多而又好的武器後，“聯指”們的心裏真是樂開了花。“聯指”指揮部當即召開會議，決定從七月十三日起在西線與“老多”決戰。他們部署南線和北線佯攻，西線作為主攻方向。此時的“老多”決策者們也早已洞察了“聯指”們的用心所在，根據情況作出了自己的部署。

從七月十三日凌晨開始戰鬥同時在南、北及西面打響。由於“聯指”在南、北線是佯攻，戰事不激烈，而數天來激烈的戰事主要在西線。七月十七日前雙方在西線都是對攻，但都沒有進展。七月十九日“老多”攻白崖山，得手後，“聯指”即進行反攻，白崖山又被“聯指”奪回。此役“老多”派損失慘重，有四十多人戰死，數十人受傷。當“聯指”反攻時，一些“老多”戰士被圍在山上，仍然英勇作戰，在無

退路可走之時，一些人則勇敢的從山崖上跳下，有的摔死，多數受重傷。桂林冶金地質學校“老多”負責人之一的吳虹和骨幹成員閉炳玲均身負重傷，該校教師羅家謀和學生余家彬、熊巨光等十八人戰死，是該校死傷人數最多的一次戰鬥。

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聯指”強攻雷劈山“老多”的據點。

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三日，“聯指”又以數連的兵力向飛鳳山、雷劈山、打靶場等“老多”的據點多次發起強攻，但都未能得手。

從六月五日戰鬥打響，到八月五日戰事平息，歷時兩個月時間，雙方參戰人員合計逾兩萬人，桂林兩派戰死共四百零六人，十二縣“聯指”死一百九十八人。可以稱得上是一次較大的戰役了。

經西線戰鬥後，雙方再沒有發生大的戰鬥，至八月初武鬥逐漸平息了。“聯指”企圖用武力來消滅“老多”的計劃是破產了。在整個戰鬥的過程中，“聯指”人多，裝備好，不但有廣闊的後方基地，而且有軍分區、人武部的支持，整個桂林都處在他們的包圍中，從全局來說“聯指”處於攻勢。“老多”處於被圍攻的守勢，但就局部戰鬥來說，“老多”是以攻為主的，不但在南面、北面的攻擊作戰中奪取了“聯指”的據點，把他們趕到了北門外去了，就是在西線，“聯指”們也不能越雷池半步。兩個月的戰鬥，“老多”擴大了地盤，“聯指”未能消滅“老多”，顯然他們是失敗者。在整個的武鬥過程中，“聯指”派死傷的人員更多，他們的損失更慘重。據統計，一個多月的武鬥中，“聯指”派戰死近二百多人。“老多”派也有一百多人戰死。

戰場上“聯指”們不但不能把“老多”消滅，反而丟失據點，死傷慘重。戰場上的失敗，他們就瘋狂地把仇恨發洩到被他們抓獲的“老多”人身上。自武鬥開始後，一些來不及從“聯指”佔領區撤離的“老多”派人員被“聯指”非法抓去作人質，把他們關押在南站對面東方紅飯店旁邊的語錄牌樓裏，先後有二百五十八人在此倍受“聯指”派的折磨和虐待，總共有三十五人被打死，四十多人受重傷。特別嚴重的是當“聯指”派吃敗仗，人員有傷亡時，他們瘋狂地報復殺人。如一九六八

年七月十四日中午，前來桂林參加武鬥的平樂縣“聯指”武鬥人員伍學強、林海、廖昌輝、侯永成、唐橋生等二十四人，衝入關押“老多”人員的語錄牌樓裏，將被關押的桂林針織廠職工唐躍武和李江、白先德、馬震鵬、秦恩深等十二人拉到桂林十一中對面樹林裏集體槍殺，這是一起驚天大案。

這十二名死者並非“老多”的武鬥人員，只是一般的群眾，他們何罪之有？即使是“老多”的武鬥人員被俘了，殺害俘虜也是連起碼的國際公法和人權都不顧了。這些兇手們簡直就是殺人成性的魔鬼。

七月九日至十五日，在齒輪廠“聯指”成員劉若忠（武鬥副連長）、莫敬祥（“聯指”總部常委）等的策劃下，先後由魏日勳等人槍殺該廠黨委書記王偉、副廠長段明池、施工員朱信之、車間主任蘇華祥和國民黨起義將領、特赦人員霍冠南。又是一起特大的報復殺人案。

“聯指”們除了抓“老多”人員來殺害以圖復仇而外，也瘋狂的屠殺無辜的老百姓。如一九六八年六月十日、十九日、二十六日、七月三日、七月二十四日，多次用高射機槍、迫擊炮、無後座力炮轟擊解放橋、東江菜市、東江居民區、桂林冶金地質學校職工宿舍，共打死三十多人，打傷近百人。僅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就打死泥灣街下河洗澡、洗衣服的群眾二十二人，打傷數十人。這些普通老百姓既未參加武鬥，又未惹到“聯指”，“聯指”們吃了敗仗，拿無辜百姓來出氣，這不明明就是土匪了嗎？難怪老百姓都罵他們是“聯匪”。

除了在桂林武鬥前線抓“老多”的人員來殺害外，一些縣的“聯指”武鬥人員不時竄回本縣，抓“四·二二”派的人來殺人墊底以圖報仇，此事容後再表。

話分兩頭，當“聯指”在桂林搶佔據點以圖圍攻“老多”的時候，柳州、南寧兩座城市早已出現“聯指”包圍“四·二二”的緊張局面。這是韋國清及“聯指”頭頭們“消滅‘四·二二’建立革委會”的統一部署。兩座城市的“聯指”在軍區及週邊各縣人武部的支持下，展開了對“四·二二”派的圍剿，“四·二二”派在頑強抵抗，大規模的武鬥

在激烈地進行著。部隊參戰，“四·二二”孤立無援，最後全軍覆沒。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求自衛柳州奪軍列 為生存頑強守據點

話說柳州市地處廣西的中部，湘桂、黔桂兩條鐵路的交匯點，公路四通八達，柳江河自西向東蜿蜒穿過，把個柳州市分成南北兩個城區，是廣西重要的工業城市，也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柳州鐵路局位於柳南城區，柳北、柳南都有許多工廠，產業工人在廣西是最多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後，北京及桂林的學生們到此進行串聯，煽風點火，發動工人和學生們起來參加文化革命運動，因而這裏的工人、學生中的一部分較早就成立了造反派組織，響應毛澤東“造反有理”的號召，積極地投入到文革運動中去。從一九六七年初上海的“一月革命”後，柳州市革命造反派則聯合起來，成立了“柳州市革命造反大軍”；而柳州鐵路局的造反派則聯合成立“柳鐵工機聯”。到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廣西“四·二二”成立後，這兩個組織則成了“四·二二”的下屬組織，是廣西造反派的一支重要力量。與此相對立的，則是原來保守組織的成員，他們則聯合起來成立柳州“聯指”，是廣西“聯指”的下屬組織。這一派由於得到了柳州軍分區和各級實權人物的支持，他們也是廣西“聯指”的一支重要力量。

幾乎在桂林“聯指”搶佔據點、搶奪槍支彈藥準備圍剿桂林“老多”的同時，柳州市的“聯指”也在一九六八年的五月初搶佔據點、搶奪槍支彈藥，對柳州“四·二二”形成包圍的態勢，同時調動柳州地區各縣的“聯指”進城參戰。“四·二二”面臨著生死抉擇，要麼在沉默中被“聯指”消滅，要麼奮起抗爭，就必須要有武器。在此種情況下，為了自衛求生存，他們被迫走上搶奪槍支彈藥的道路，以抗擊“聯指”們的武裝圍剿。

一九六八年五月初以來，正是廣西各縣“四·二二”被圍剿消滅之時，廣西的所謂的“三點一線”南寧、柳州和桂林的造反派也同時遭到“聯指”的圍攻封鎖，此時也正是抗美援越戰爭打得熱火朝天之際，中國加緊了對越南的的軍事援助。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拂曉，柳州“造反大軍”（即“四·二二”）負責人白鑾平、廖偉嚴和柳州鐵路的造反派“工機聯”負責人王反修、李振嶺等人組織數千人到柳州火車站“五三八”列車調度段搶奪援越軍列八個車皮的武器彈藥。王反修、李振嶺並以“李向陽”之名給押車的解放軍寫了收條。有了這批數量如此多的武器彈藥，柳州“四·二二”和柳州鐵路“工機聯”用以武裝了自己，足可以和“聯指”派抗衡了。自此，“聯指”不敢對“四·二二”的據點輕舉妄動了。

柳州“四·二二”搶奪軍列的武器，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當即給廣西軍區領導人來電，要求迅速收繳被搶的武器。為此，廣西軍區即命令駐柳州的部隊出動，對柳州“四·二二”和柳鐵“工機聯”的幾個“據點”實行武裝包圍，強行收繳武器。在部隊把幾個“據點”包圍後，柳州有數萬群眾對前來包圍“據點”的解放軍實行反包圍。群眾高呼：“反對廣西軍區支一派、壓一派，‘四·二二’不能空手等死！”解放軍被群眾包圍後，在互相交手中，部隊二十多人受傷，群眾反包圍又奪了解放軍七百多支槍。

搶奪援越軍用列車，柳州“四·二二”也確是夠大膽的了。此舉驚動了中央，一九六八年六月三日中央發來了特急電報，要求把搶奪的軍用物資和武器如數歸還，就不追究責任。柳州“四·二二”的頭頭們則認為奪軍列與搶奪部隊的武器，其性質都是一樣的，“聯指”派可以搶奪部隊的武器（實際上許多是明搶暗送的），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奪軍用列車呢？權衡利弊，他們只交還了部分一時不太適用的物資，其餘的大部留下了。由此，廣西區革籌、廣西軍區及柳州軍分區則以此為由，找到了進攻柳州“四·二二”的新藉口，馬上組織柳州“聯指”及附近各縣的“聯指”武裝人員前來圍攻，名曰“收繳武器”。僅鹿寨縣從

六月十六日開始就派來兩千多人到柳州，平息所謂“五·二〇”、“五·二五”搶奪武器事件，歷時十八天，始終未能攻下柳州“四·二二”的據點，“四·二二”頑強的守住了“據點”。

在首府南寧，雖然南寧市革委會在四月十三日成立了，但兩派的鬥爭仍然沒有停止，其原因是南寧市革委會實際上是偏向於“聯指”一派的，這就遭到“四·二二”派的反對。在此種情況下，市革委會和“區革籌”、廣西軍區對待兩派不能一碗水端平，而是重複了一九六七年時支一派、壓一派的錯誤，這就進一步激化了兩派的矛盾。“四·二二”派抵制革委會的錯誤，批評革委會，“聯指”派和革委會的領導們認為這是“反對新生的紅色政權”，要求與之堅決鬥爭。由此，兩派的矛盾和鬥爭就急劇加速了。

面對此種情況，此時的市革委會、“區革籌”和廣西軍區的領導們如能吸取去年的教訓，耐心細緻地做兩派的工作，事情終歸是可以解決的。但此時的當權者們早已對“四·二二”派恨之入骨，早就想找機會使之置於死地。現在機會來了，“四·二二”“反對革委會”，這不就是“反革命”麼？為此，他們就指令“聯指”派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以為這樣就可以名正言順的鎮壓“四·二二”了。

南寧“四·二二”派確是激進的組織，他們認為不平等的事必欲拼死抗爭。面對“聯指”派的強大壓力，他們就把人員集中在文化大院、展覽館、水電廳、醫學院、廣西大學、百貨大樓及新華街、解放路一帶，以應付突發的事變。此時，南寧週邊各縣及廣西其他來到南寧逃生的“四·二二”派人員，也住進了這些地方，這些地方一時成熱鬧之地。

儘管南寧“聯指”有“區革籌”、廣西軍區及週邊各縣人武部和“聯指”的支持，在人數和武器裝備上佔有絕對的優勢，有豐富的物資供應和廣大的後方根據地，但對南寧“四·二二”的各據點一時也無可奈何。此時的“四·二二”各據點內是一片熱鬧的景象。特別是在新華街、解放路一帶，號稱是南寧的“解放區”，這裏的人們享受著民主、

自由的生活，社會秩序良好，經濟生活正常。如果掌握大權的領導們能認真過細的做工作，不要支一派壓一派，不要把“四·二二”派看成是“反革命”，不要調農民進城圍攻“四·二二”，武鬥和殺人之事是絕不會發生的。

然而，此時的韋國清及“聯指”的高參們，看到廣西各縣的“四·二二”被消滅了，桂林“老多”及柳州、南寧的“四·二二”已被重重包圍，尋找機會最後消滅他們的時刻到了。他們果然想出了奇招，讓“四·二二”無處逃生，最終“四·二二”全軍覆沒，無數的人頭落地，橫屍街頭，人世間大慘案、大悲劇再次出現。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軍區下令全線出擊 南寧街頭屍橫遍地

話說韋國清、廣西軍區負責人及“聯指”的高參們，為了能名正言順的消滅桂林“老多”及“四·二二”，他們一方面向中央報告桂林“老多”和南寧、柳州“四·二二”如何搶奪軍隊的武器和援越物資，如何佔領據點製造“反革命事件”，以求得中央的尚方寶劍；一方面則設計誣陷，把“四·二二”打成“反共救國團”。這一招真是何其毒也。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廣西區革籌、廣西軍區發出《關於破獲反革命集團“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反革命案件的公告》，由此在全廣西各地掀起了一股清查“反共救國團”的高潮，許多“四·二二”派成員被當成“反共救國團”遭到抓捕、審查和槍殺（此事容後再表）。這是明目張膽的政治陷害，其目的就是尋找消滅“四·二二”的藉口。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針對廣西地區破壞鐵路交通、搶劫援越軍列、衝擊軍隊、搶奪武器等事件的佈告（習稱《七·三佈告》），這顯然是“區革籌”、廣西軍區片面彙報的結果。但這一佈告卻成了韋國清及“聯指”高參們消滅“四·二二”的尚方寶劍。

《六·一七公告》及《七·三佈告》的下達，立即在全廣西再次掀起圍剿“老多”和“四·二二”及亂殺人的高潮。廣西的當權者及“聯指”高參們如獲至寶，立即抓住有利時機開始全面進攻。七月九日，廣西軍區派出兩架飛機，從憑祥到南寧大批空投《七·三佈告》，以此造成佈告中所列的各項事件都是“四·二二”派所為，造成“四·二二”派反對《七·三佈告》的假像，藉以迷惑群眾。七月中旬至八月初，軍區又

多次派飛機飛至柳州、桂林等地空投《七·三佈告》。接著各地、市、縣的革委會組織聲勢浩大的群眾大會，名曰“堅定不移的落實《七·三佈告》”，向一小撮階級敵人發起猛烈的進攻”，目的旨在利用這一有利時機，廣泛動員“聯指”的廣大群眾一舉殲滅“四·二二”。

中央《七·三佈告》的根本目的意在制止武鬥，保障鐵路交通暢通，歸還搶奪的軍用物資，促進廣西兩大派的聯合，恢復廣西地區的正常秩序。但韋國清及廣西軍區負責人是歪嘴和尚念經，大肆歪曲《七·三佈告》之精神，把它變成支持一派、圍殲一派的令箭。伴隨著他們的宣傳攻勢，緊接著就是調兵遣將直接參與對“四·二二”的圍剿。在他們的眼裏，《七·三佈告》所列各項都是“四·二二”“幹的”，而“聯指”派的搶槍、搶國防倉庫、調動農民進城參加武鬥都被視作是“革命行動”。這實在是一派胡言。

為了加速圍殲“四·二二”，一九六八年七月底至八月初，韋國清及廣西軍區負責人下令，先後調動二二〇師六六〇團四個連隊，六九一二部隊兩個連隊，廣西軍區警衛營兩個連隊，南寧軍分區獨立營一個連隊，炮兵第六四二團高機炮一連、二連，以及南寧週邊縣城和南寧郊區“聯指”武鬥隊，以及從貴縣、玉林、陸川等調縣調來“聯指”武裝人員，配合南寧市“聯指”對南寧“四·二二”進行大規模地武裝圍剿。如果說《七·三佈告》下達前，軍方還是半遮半掩地縱容和暗中參與“聯指”對“四·二二”圍剿的話，那麼，《七·三佈告》下達後，他們則是赤裸裸地親自上陣了。

南寧“四·二二”派所占的據點，主要是百貨大樓、新華街、解放路、展覽館、廣西大學、醫學院、水電廳等地，除新華街、解放路一帶有較多的武器裝備外，其他據點的武器是十分少的，不足以和“聯指”派相抗衡。而且這些據點內有許多是廣西各地來的人員，他們是逃避當地“聯指”的迫害、追殺而到南寧逃生的，不想到南寧也成如此局面，他們還能往哪逃生呢？

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不但在軍事上對“四·二二”的圍剿做

好了週密的準備，輿論宣傳上更是展開了強大的攻勢。他們是橫下了一條心要消滅“四·二二”。以下是當時在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指揮下的南寧“聯指”圍剿“四·二二”派的實錄。

《六·一七公告》發表後，六月十八日“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又向各專區、市革委會、各軍分區、人武部發出通知。要求各地統一認識，結合本地區情況，進行部署，以便更好的推動對敵鬥爭的深入發展，要通過印發傳單、有線廣播向群眾宣讀等形式，廣泛深入宣傳《公告》。要召集群眾組織負責人座談討論，檢舉揭發“叛徒”、“特務”和一切“反革命份子”。他們認為這些“階級敵人”是隱藏在“四·二二”一派中的。矛頭是對著全廣西“四·二二”的。

六月十九日，廣西“聯指”常委顏景堂、李家海、何唯欽等人經過策劃，指揮他們的下屬組織“後備軍”、“瀝血兵”等組織，武裝包圍攻打“四·二二”區水電廳設計院“火種”兵團大樓，殺害六十二人，並滅屍於邕江河中。是南寧市武裝圍攻大規模殺人的首創。

六月二十三日，《廣西聯指報》頭版頭條全文刊登了《聯指》指揮部所謂《關於徹底摧毀蔣匪反革命集團“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總攻擊令》。宣稱“‘反共救國團’深藏於‘四·二二’組織之中，‘四·二二’頭頭就是‘反共救國團’”，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即“聯指”）行動起來，清查“反共救國團”。對“抗拒緝捕者可以就地處決”。“要從政治上、組織上、軍事上把他們打個人仰馬翻，殺個片甲不留”。由此，各地“四·二二”中有一大批人被當作“反共救國團”遭逮捕、關押和槍殺。

同日，廣西“四·二二”指揮部發表《告全區人民書》，指出“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六·一七公告》的發佈，是為更大規模的血腥大屠殺、消滅“四·二二”一派群眾組織大造輿論。

同日，廣西“聯指”所屬“航運紅聯”攻打“四·二二”“航運工總”控制的南寧北大路碼頭，向停泊在河邊的“桂宏”、“東風”號等四十多艘船隻開炮，船隻全部起火燃燒。

六月二十八日，《廣西日報》刊登文章“揭露”和“批判”“四·二二”“邕江風雷”的“三·二九”聲明，稱這個“聲明”是“反革命綱領”和“反革命陰謀”，《廣西日報》完全成了一份“聯指報”。

七月一日，南寧警備區召開黨委擴大會議，會議根據廣西軍區的部署，討論和研究了關於執行武裝包圍廣西“四·二二”解放路、區展覽館、百貨大樓等據點，由廣西軍區調動部隊配合“聯指”行動。

七月三日，中央《七·三佈告》發表，“區革籌”和廣西軍區更是開動一切宣傳機器進行宣傳，組織“聯指”召開聲勢浩大的集會，並指令全區各市、縣也照此辦理，以此作為向“四·二二”發起最後進攻的輿論動員和準備。

七月六日，《廣西日報》在頭版顯著地位刊登德保縣革命委員會《組織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穩准狠打擊階級敵人》的消息，報導了德保縣開展大屠殺的經驗。這一報導，對全廣西各地的亂殺人起到了推波助浪的作用。

連日來，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一方面組織“聯指”開大會名曰“貫徹、落實《七·三佈告》”，一方面不斷向中央彙報是“四·二二”派在不斷製造“反革命事件”，以此欺騙中央和蒙蔽廣大的群眾。《廣西日報》從七月十一日起連續發表九篇社論，配合《七·三佈告》的貫徹，作為向“四·二二”發起最後進攻的輿論動員。

面對這種情況，七月十四日，廣西“四·二二”指揮部發表《堅決貫徹《七·三佈告》的嚴正聲明》，指出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以貫徹《七·三佈告》為名，實行對“四·二二”全面武裝包圍和鎮壓。

七月十四日下午，部隊和“聯指”武鬥隊向“四·二二”的據點和控制的地區進行了包圍。與此同時，廣西“聯指”總指揮部在南寧飯店召開常委、各片武裝負責人和各據點頭頭會議，研究部署向“四·二二”發動總攻的問題。會後，“聯指”副總指揮等到廣西軍區彙報。

七月十六日，從中午十二時至晚上，“四·二二”控制的解放路、滅資路、上國街、博愛街等，被部隊和“聯指”炮擊，引發部分地區起

火。軍區負責人卻召見“聯指”常委，要求他們“掩護群眾救火”。對此，“四·二二”的廣播揭露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如此做法是“既做強盜又做官，既當公道又做鬼！”。

同日，南寧市革委和“聯指”遵照“區革籌”和廣西軍區七月八日發出的《關於清理流竄人員的指示》，以“治委會”之名“清理”戶口，抓捕了二百八十多人（外地到南寧逃難的“四·二二”人員），殺害三十三人，還有的被抓後生死不明。

七月十七日，部隊和“聯指”武鬥隊全面包圍“四·二二”控制區解放路一帶，不斷開炮，“四·二二”也奮起還擊，雙方互相開炮、互投汽油彈，使永寧街、和樂街、上國街、自強路、減資路、民生路商店、民房起火燃燒。“聯指”桂劇院據點向“四·二二”百貨大樓據點開炮，大樓第三層裏起火燃燒。部隊和“聯指”同時向“四·二二”“航運工總”所據守的停泊在邕江河邊的船隻再次炮擊，使“興無”號、“反修”號等船舶中彈燒毀，一四三一號和一四〇四號兩艘船內裝汽油一千四百二十六桶，共二百零三點六噸，另有航空汽油二十四桶，因中彈全部燃燒。“聯指”前後三次炮擊邕江河邊船舶，共燒船隻一百六十六艘，一萬一千八百八十載貨噸位，其中載有貨三千六百多噸，全部燒毀，共損失約一千多萬元。事後，南寧市革委、南寧警備區和廣西“聯指”宣傳廣播說是“四·二二”“匪徒”“放火燒毀船舶和貨物，破壞援越抗美鬥爭，犯下滔天大罪”。

七月十八日，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再次調動部隊和“聯指”武鬥隊數千人圍攻“四·二二”控制的解放路一帶，雙方對射，街道再次起火燃燒。與此同時，“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向中央彙報，誣稱是“四·二二”派的人“點火燒房”，造成重大損失，他們要“發動群眾救火，組織部隊掩護救火”，“保護廣大群眾”打擊“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壞。真乃賊喊捉賊的伎倆。

七月十九日，“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又調四個連隊和“聯指”數千人再次武裝包圍、炮擊“四·二二”解放路一帶據點，幾條街道硝煙瀰

漫，一片火海。對此，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又賊喊捉賊式的發佈《立即行動起來，撲滅反革命分子製造的火災——給全市無產階級革命群眾的一封公開信》。他們的拙劣表演到了極為卑鄙的程度。

同日，“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又向中央謊報軍情，給中央發出《執行武裝掩護部隊、群眾救火指示情況報告》。自己放了火又打著“救火”的旗號以武力“掩護”，加緊進攻“四·二二”。

七月二十一日，“聯指”又從桂劇院據點炮擊“四·二二”的百貨大樓據點，東北面牆角被炮擊崩塌，二、三樓起火燃燒。

七月二十五日，“聯指”武鬥隊和部隊繼續進攻“四·二二”控制的街道，不斷向解放路一帶“四·二二”據點開槍開炮，多處起火燃燒。

七月二十七日，“聯指”再次炮擊“四·二二”的百貨大樓據點。他們使用高射機槍、四〇火箭炮、七五無後座力炮，以及發射土坦克送上去的炸藥包，再次將大樓東北面牆炸崩塌，二、三樓再次起火燃燒。大樓附近的民房和機關宿舍中彈也起火燃燒。而南寧市革委和警司、“聯指”則廣播說是“四·二二”自己爆炸了百貨大樓。

七月二十八日，“聯指”和部隊包圍攻打“四·二二”控制的南倫街、華強路、自強路據點，雙方互相開槍開炮、投汽油瓶、打燃燒彈，使這三條街道民房起火。“聯指”和南寧市革委、南寧警司又再次誣稱是“四·二二”的人“縱火燒房”。

七月三十一日，“區革籌”、廣西軍區又調動部隊和“聯指”武鬥人員圍殲“四·二二”展覽館據點。參加圍殲的有六九一二部隊兩個連，廣西軍區警衛營兩個連，南寧軍分區獨立營一個連和炮兵某團高機炮一連、二連，以及玉林、陸川、貴縣、邕寧、武鳴、馬山、橫縣、上林、崇左和南寧郊區“聯指”武鬥隊。指揮所設在明圓飯店，下午三時開始包圍炮擊。

同日，“區革籌”、廣西軍區及南寧市革委主要負責人接見“聯指”總指揮顏景堂，佈置對“四·二二”施加壓力，做好分化瓦解工作，迫使其反戈一擊。

八月一日，圍殲“四·二二”展覽館據點的戰鬥於上午八時結束。打死“四·二二”人員二十三人，傷五人，“俘虜”四百七十多人。

八月二日，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命令六九一二、六九六六、六九三六等部隊，以及南寧“聯指”武鬥隊和武鳴、邕寧、橫縣、崇左、上林、馬山、玉林、貴縣、陸川等縣“聯指”武鬥隊大舉包圍“四·二二”解放路據點。“四·二二”原先控制解放路附近的民生路、新華街、上國街等十二條街道，已於昨天被部隊和“聯指”武鬥隊打成了一片廢墟。

八月三日，部隊打頭陣，和“聯指”武鬥隊重兵包圍解放路，開槍開炮，一片火海。“四·二二”據守人員瀕臨滅頂之災。

同日，《廣西日報》發表社論《對階級敵人就是要鎮壓——八論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批示“照辦”的中央〈七·三佈告〉》。社論鼓動廣西各專、市、縣革委會、各軍分區、人武部和“聯指”要殲滅“四·二二”中的“階級敵人”。

八月四日，部隊和“聯指”武鬥隊發起總攻，密集的槍炮射向“四·二二”的解放路據點。經過多日的抵抗，“四·二二”守據點的人員彈盡糧絕，據點終於在八月五日被攻破，“四·二二”全軍覆沒，屍橫遍地。這是發生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一幕人間大慘劇。

據不完全統計，在連日的武鬥中，“四·二二”被打死一千三百四十人，被“俘虜”六千四百四十五人和居民二千五百人。八月五日上午九點鐘左右，部隊和“聯指”武鬥人員從解放路押送一批“俘虜”出來，走到廣州照相館門前時，當即有二十六人被槍殺。

八月六日，從解放路、展覽館抓獲數千“俘虜”和“流竄犯”（外地到南寧逃生的“四·二二”人員）後，“聯指”中的一些人當即對“俘虜”和“流竄犯”進行屠殺。有的部隊人員想保護“俘虜”都沒能保住。屍體被推下邕江河，鮮血染紅了邕江河水。

武鬥結束後，解放路及其附近三十三條街（巷）被炮擊焚燒成了一片廢墟。所有被“俘虜”的“四·二二”和“流竄犯”先後分別關押

在區文化大院、區電業局、南寧二中、九中、天桃小學、當陽小學、五里亭小學、南寧幼師、區交通學校、區、市看守所等地。其中關押在區看守所的二百六十五人、區交通學校的七百一十一人、南寧幼師的四百四十一人，都被當作“殺人放火”、“四類分子”、“壞頭頭”、“國民黨殘渣餘孽”、“反共救國團”等“要犯”、“首犯”處理。被俘的“流竄犯”交給各縣拉回去“處理”的有七千零一十二人，其中有二千三百二十四人在半路上或者拉回到本地即被殺害了。這確是驚天地泣鬼神的大血案。被當作“要犯”長期關押的二百四十六人，他們雖然沒有被槍殺，卻受盡了非人的折磨。

八月十日，部隊和“聯指”武裝殲滅“四·二二”後，上午“聯指”總指揮部在朝陽廣場召開所謂“捍衛《七·三佈告》勝利大會”。會後並舉行武裝大遊行。與此同時，“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則向中央發出《處理南寧解放路一帶問題的情況報告》，對調動部隊和“聯指”武鬥隊攻打、炮擊、爆破“四·二二”據點，以及雙方對打時互相扔汽油瓶、企圖燃燒對方前沿陣地而引起的火災，燒掉解放路一帶三十三條街（巷）和河邊船舶的責任全部加在“四·二二”一方。

八月十一日下午，“聯指”在朝陽廣場召開“全面落實《七·三佈告》，上繳武器誓師大會”，“四·二二”被殲滅了，他們勝利了，此時的武器可以上繳了。在會上，“區革籌”、廣西軍區、南寧警司的負責人都在大會上講了話。這些講話都一致肯定和表揚“聯指”參加“掩護群眾救火”，打擊殲滅“階級敵人”後上繳武器的“革命行動”。接著，“聯指”大擺酒宴，連續數天大吃大喝，慶祝勝利。

八月十二日，由南寧市革委和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在區展覽館聯合舉辦的“反革命罪行”展覽正式開展。展出時間五十二天，“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先後組織全區“無產階級革命派”（即“聯指”）四十八萬九千三百六十五人前往參觀。展覽共分三個館，第三館是“活人展覽”，將攻打展覽館和解放路一帶抓獲的“四·二二”負責人熊一軍等二十六個“要犯”、“叛徒”、“特務”、“走資派”掛上黑牌，關在鐵

籠，當作“禽獸”讓“無產階級革命派”“觀賞”了五十二天。爾後將他們送進警司，長期關押。

南寧“四·二二”派被武裝殲滅了，他的各級大小負責人除武鬥中被打死的以外，餘下的全部被“聯指”抓捕。如熊一軍、曹東鋒、朱仁、李柏亭、蔣志恭、高興學、駱偉陽、章子淵、農烈、李維燮等一大批人。這些人之所以未被殺害，是因為想從他們身上搞到更多的“反革命”證據，把他們關押起來，反復審問，逼迫或引誘他們招供是“反共救國團”。這些人之後被多次殘酷批鬥或折磨，關押多年，其中熊一軍並被判死刑，只是後來沒有執行而已。這是典型的法西斯專政。

隨著南寧“四·二二”的被殲滅，全廣西的“四·二二”所存無幾了。餘下的桂林“老多”及各地尚存的“四·二二”徹底覆滅的命運就在劫難逃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柳州四二二慘遭圍殲

鳳山縣聯指深山剿匪

話說在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下令部隊和南寧“聯指”武裝圍殲南寧“四·二二”的同時，柳州軍分區及柳州地區各縣的革委會和人武部也正在指揮這些地方的“聯指”武鬥隊圍殲當地的“四·二二”。早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柳州軍分區就請示了廣西軍區和廣州軍區，要求調動柳州地區八縣、兩礦、一廠、一郊（即忻城、來賓、柳城、宜山、環江、鹿寨、合山礦、八一礦、柳州鋼鐵廠、柳州市郊區）“聯指”武裝人員和各縣武裝部來圍殲柳州的“四·二二”。經廣西軍區和廣州軍區同意後，八縣、兩礦、一廠、一郊的“聯指”武裝人員數千人，由各縣武裝部帶隊，軍分區直接指揮，開始了對柳州“四·二二”和柳州鐵路“工機聯”的圍殲。柳州“四·二二”和柳鐵“工機聯”雖然有較強的武裝力量，但他們畢竟是老百姓，而且處在被圍困的孤立據點裏，“聯指”有部隊的指揮，“四·二二”的據點不幾天即被攻破，數十人當場被槍殺，兩千多人被抓，只有部分人員突圍到了柳江縣的福塘，與當地的“四·二二”人員匯合暫時得以逃生。

為了徹底消滅“四·二二”，“聯指”們乘勝追擊，又發起了對福塘“四·二二”的圍殲。七月二十四日，“聯指”武鬥隊在軍分區的指揮下，對福塘“四·二二”據點發起了強攻。一時間槍炮聲大作，據點的牆壁崩塌，多處起火燃燒。由於“四·二二”派的火力較弱，數小時據點即被攻破，“四·二二”人員多人被“俘虜”，當即就有二十五人被槍殺。另有部分“四·二二”人員在據點被攻破後突圍逃到了山上，“聯指”頭頭們又組織搜山。在搜山的過程中，柳江縣“聯指”人員韋德金在良上村搜查，見一婦女背著一個小孩從外面回來，韋德金就說這個

婦女是“四·二二”派的情報員，當即開槍把婦人打翻在地，婦人未斷氣，韋德金又補了一槍，婦人含冤而死，年僅兩歲的小孩見媽媽被打死了，嚇得放聲大哭，韋德金又用石頭把小孩活活砸死。這個世界上真有連禽獸不如的殺人魔王。

圍攻柳州和福塘的“聯指”武鬥大軍數千人，十多天的時間吃去糧食五萬三千五百八十三斤，開支現金一萬零四百多元，全由地方政府財政支出，是一場政府出面的“剿匪戰爭”。

柳州“四·二二”和柳鐵“工機聯”被殲滅後，在“聯指”頭頭們的指揮下開始了到處抓人、打人和殺人，一時間白色恐怖籠罩著柳州。特別是在武鬥中有“聯指”人員死亡的單位，這裏的“聯指”人員就會進行瘋狂的報復殺人。最典型的一個殺人事例發生在柳州鋼鐵廠。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一日，柳州鋼鐵廠革委會，為在武鬥中被打死的“聯指”成員蒙志恒、譚尚才開追悼會，革委會副主任譚銳主持會議，革委會委員吳美紅、張盛坤分別講話。會後為死者送葬，下葬時放槍鳴炮，並把“四·二二”觀點的本廠群眾黃鳴皋用炸藥包綁在其身上引爆，作為陪葬。黃鳴皋被炸得血肉橫飛，留下軀殼，兇手們又將黃的屍體剖腹挖肝，吃肝、泡肝酒，真乃駭人聽聞的慘案。

為了進一步地落實《七·三佈告》，加強無產階級專政，狠狠地打擊“階級敵人”，柳州市革委會按“區革籌”的部署，成立六十五個連的工人武裝糾察隊（全由“聯指”人員組成）八千多人，柳州駐軍單位派出人員配合，進駐到全市各單位，向一小撮“階級敵人”大施“十二級颶風”，一股遊鬥、亂打人、殺人之風再次掀起。其間全市有三百多人慘遭殺害或被迫害致死，僅市郊的太陽村公社就有五十七人被“聯指”當作“階級敵人”而活活打死。

話分兩頭，鳳山縣“四·二二”派的力量在廣西各縣“四·二二”派中是較為強大的。在南寧、柳州的“四·二二”相繼被消滅後，鳳山縣這個邊遠山區“四·二二”派的命運又將如何呢？這是讀者們必定要急於知道的。

鳳山縣位於廣西的西北部，是一個山區縣，以僮（壯）族為主，另有不少漢族和部分瑤族同胞，屬河池地區管轄。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鳳山中學的學生和教師首先帶頭起來“造反”，成立“造反”派的組織，造學校領導的反。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後，這個縣造反派的力量迅速發展，一些機關幹部、工人也參加到“造反”派的組織中來了。到了一九六七年的夏天，南寧市出現了“打韋”和“支韋”的“四·二二”和“聯指”兩派鬥爭以後，這股風飈到鳳山，鳳山縣的“造反”派也聯合起來成立“七·二九兵團”，贊成“四·二二”派的觀點，堅決打倒韋國清。而另一些人（主要是機關幹部、工人和部分學生、教師）則在縣武裝部的支持下，成立“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堅決支持韋國清。兩派從一九六七年的八月起就進行了反復的鬥爭，開始是大字報、大辯論，後來發展到動拳頭、石頭、木棒，最後發展到搶槍，真槍實彈的武鬥起來了。

雙方武鬥從一九六七年的冬季開始。在縣城和一些公社都有武鬥的發生。“聯指”有縣人武部和一些幹部的支持，許多公社和大隊的民兵都掌握在“聯指”的手中，他們的力量十分強大。“七·二九”派也得到一個副縣長和一些幹部的支持，一些公社和大隊大的農民也支持“七·二九”派，他們的力量也相當強大，而且在縣城“七·二九”的力量超過“聯指”的力量，所以“聯指”派往往要調動農民進城才能對付“七·二九”。

在一九六八年初兩派的武鬥中，“七·二九”派在縣城佔優勢，向“聯指”的據點進攻。縣人武部支持“聯指”，調動農民進城支持“聯指”參戰，“七·二九”派就綁架了縣人武部部長來進行批鬥。對此，一九六八年二月二日，“區革籌”就給鳳山縣發出制止武鬥的五條命令，要兩派停止武鬥，指出調動農民進城武鬥是錯誤的，“七·二九”派進攻“聯指”和綁架縣人武部部長都是錯誤的，要立即停止進攻，立即放回人武部部長。並于二月十六日向中央彙報鳳山縣武鬥的情況。

三月七日，區革籌開會研究解決廣西一些縣出現的武鬥問題，會

議決定向廣州軍區提出請求派部隊來解決柳江、融安、鳳山等縣的武鬥問題。對鳳山縣建議由某師派部隊解決。動用部隊武裝解決“派性鬥爭”問題由此定下原則方針。

到了七月二日，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又向鳳山縣支左領導小組發出《關於穩住部隊陣腳，加強社會調查的指示》，要求進駐部隊要依靠群眾揭露“階級敵人”挑撥軍民關係、挑動群眾鬥群眾的罪行。要穩住陣腳，堅守崗位，駐軍和人武部領導機關不得撤出縣城。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九日，“區革籌”給河池地區革委會和鳳山縣支左領導小組發出通知，通知說：“鳳山縣原副縣長某某在文革中，頑固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挑動群眾，指揮武鬥，破壞革命秩序，破壞抓革命促生產，做了不少壞事，起了很壞的作用，是一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應該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公開的指責支持“造反”派的領導幹部，而對支持“聯指”的領導幹部和縣人武部則半句話不說，這是在為鎮壓“造反”派製造輿論。

果然，在南寧“四·二二”被殲滅之後，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河池軍分區奉廣西軍區之命，在東蘭縣人武部召開“關於用武力解決鳳山‘七·二九’問題緊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天峨、巴馬、南丹、東蘭、鳳山等縣人武部的負責人，以及鳳山縣“聯指”頭目，六九一部隊負責人等。軍分區負責人傳達說：根據廣西軍區首長命令，要用解決南寧解放路的辦法解決鳳山“七·二九”的問題。會議決定調宜山、河池、巴馬、天峨、南丹、東蘭、凌雲、樂業、羅城等縣和金城江的人民、龍江兩兵工廠的“聯指”武裝人員，會同六九一部隊、鳳山縣人武部三千多人進駐鳳山縣，“強行收繳”“七·二九”派的武器。東蘭會議結束後，各縣人武部堅決執行“命令”，組織帶領各縣（廠）“聯指”武裝人員（人數超過原來規定，達到四千四百多人）到達鳳山。對逃散在該縣南山和北山的“七·二九”人員全面包圍，抓捕了一萬多人（當時全縣人口共十萬三千多人）。僅這次“圍剿”，全縣就槍殺打死了“七·二九”派一千零一十六人（文革中全縣被殺一千三百三十一

人）。被殺害的人員中有國家幹部、工人二百四十六人，參加過紅軍的二十人，參加過赤衛隊的十二人，參加過遊擊隊的一百一十七人，全縣八十六個大隊，有八十一個大隊被“聯指”槍殺了人。

在“聯指”武裝人員的圍剿中，有一件典型的慘案是特別值得一提的。當“七·二九”派遭到圍攻後，有一部分人員逃到該縣南山、江洲一帶的山洞躲藏，洞裏有男女老少共一百多人，只有七支步槍。被“聯指”武裝人員圍攻了三天三夜後，洞裏彈盡糧絕，老人和小孩呼喊救命，於是洞裏的人提出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可以繳槍投降。在外面包圍的“聯指”和武裝部人員同意後，洞內派出代表黃顯應、陸祖業、陸淪貴三人出洞談判。指揮圍攻山洞的凌雲縣武裝部科長盧元俊主持“和談會議”，雙方談判達成協議，洞內“七·二九”派繳槍投降，“聯指”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經過雙方簽字後，洞內人員繳槍出洞，武裝部和“聯指”人員收繳槍支後，把出洞的男女全部押到大隊倉庫關起來，三個小時後即槍殺了七人，其中一個小孩僅十二歲，後來又殺了十多人。繳槍投降也殺，連起碼的人性和人道都沒有了。這就是有名的“江洲慘案”。

經過武裝圍殲掃蕩後，“七·二九”派全軍覆沒了。踏著“七·二九”人員的血跡和屍體，“聯指”一派的紅色政權——鳳山縣革命委員會終於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成立了。

雖然“七·二九”兵團被殲滅了，但仍有少量的人員躲藏在山林中。為此，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區革委會（已於八月二十六日成立）和廣西軍區批准河池地區革委會、河池軍分區組織四百八十八人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鳳山縣，宣傳動員“散匪”（即跑上山避難的“七·二九”人員）下山“投誠”。“宣傳隊”和縣人武部、縣革委會宣稱：“下山繳槍，一個不殺”。強迫“散匪”家屬上山動員親人下山“投誠”。躲進深山的韋明樂、韋明立、韋明成三兄弟和堂弟韋明景帶槍逃上了高流山，韋明樂父親上山動員韋明景下山“投誠”。但韋明景回去第二天就被拉去殺害了（當時年僅十七歲）。從此，逃上高流山的韋明樂、韋

明立、韋明成三兄弟，長期不敢下山。爾後，區革委會和廣西軍區下令派兵圍剿韋氏三兄弟長達十四年之久。這是人世間的又一幕慘劇。

鳳山“七·二九”被殲滅了，廣西各縣及南寧、柳州的“四·二二”被殲滅了，韋國清及“聯指”頭目們所謂的“三點一線”中的兩點問題解決了，心中好不高興，臉上露出了“勝利者”的微笑。剩下桂林一個點，要拿下也是輕而易舉的事情。用武力強攻桂林，勝利的把握是絕對的，因為此時《七·三佈告》已下來了。部隊可以公開參戰了，絕非六月份時可比了。當然強攻的話，自身也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特別是考慮到桂林“老多”這樣一支老造反派，在人們心目中是十分有名氣的，就連周恩來總理在一九六七年曾多次稱讚過“老多”，六九五五部隊介於地方支左以來一直是支持“老多”的。現在雖然有了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出面壓制六九五五部隊，不許他們支持“老多”，但六九五五部隊尚在桂林，一切事情都瞞不了他們的眼睛。權衡再三，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決定還是不利用武力解決的好。他們深思的結果，決定用軟的一套手法誘使“老多”繳槍，繼而再用“聯指”的武鬥人員改換成“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工人糾察隊”，堂而皇之地開進桂林，對手無寸鐵的“老多”人員隨意抓捕，既可減少自身的傷亡，又可達到消滅“老多”的目的，豈不兩全其美嗎？

在韋國清的部署和授意下，桂林地、市革委會和桂林軍分區立即照辦並付諸行動。一時間，山城桂林處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血雨腥風，生靈塗炭，一片哀鳴，悲涼的慘狀令人不寒而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桂林老多停戰繳槍 聯指趁機亂抓亂殺

書接上回，話說南寧、柳州和各縣的“四·二二”被消滅後，全廣西除桂林外，就成了“聯指”的一統天下了。此時的桂林“老多”早已停止了武鬥，為落實《七·三佈告》，正在準備上繳武器，等待市革委會返回市區做工作，促進兩派新的聯合。這可急壞了“聯指”，他們早就恨不得把“老多”一口吞下，以報他們當保皇派之時受到“老多”的批判和受到桂林老百姓的羞辱、奚落的一箭之仇。就此時的桂林形勢而言，用武力強攻“老多”，有桂林軍分區和各縣人武部的指揮作戰，勝利屬於“聯指”是必定無疑的。然而，“聯指”幕後者們站得高，看得遠，他們正在著手實施一套軟的手腕，是比用武力強攻更為陰險的手段。

為瞭解決桂林的問題，一九六八年八月初廣州軍區在湖南衡山開會專題研究桂林的問題。會議由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主持，除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吳華等人出席會議外，桂林市武裝部政委陳秉德、桂林軍分區司令員景伯承也參加了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桂林市落實《七·三佈告》的問題。會議經過討論後認為，解決桂林的問題不能同解決南寧、柳州問題一樣使用武力，而應是先動員“老多”繳槍，後予以解決。與會人員回到桂林後，韋國清、廣西軍區負責人認為這正符合自己的設想，是可行的好辦法，不但可以減少傷亡，再則可以正視輿論，是切實可行的好辦法。

為了實施這一套軟的辦法，自八月初以來，廣西軍區派出飛機連續幾天飛到桂林上空散發《七·三佈告》，同時派出部隊的宣傳車、宣傳隊到桂林市區街道和“老多”各據點進行宣傳，與“老多”的負責

人和群眾座談，聲稱“繳槍、停止戰鬥以後，絕對保證人身安全”。此時的桂林“老多”面臨著巨大的壓力，部隊和“聯指”大兵壓境，不繳槍的話據點遲早會被攻破，南寧、柳州“四·二二”的據點被武力解決就是先例。另一方面，七月二十五日周恩來總理在北京接見了廣西黨、政、軍領導人和兩派的代表時，對廣西“四·二二”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在一九六七年時，周恩來總理五次接見廣西兩派代表，表揚過“四·二二”，特別是稱讚過“老多”。而這次的接見卻是一改前態，指責“四·二二”搶奪軍列，搶奪部隊槍支，衝擊軍事機關，製造武鬥事件；並特別指明“南寧主要是曹東峰、朱仁；柳州主要是白鑾平、王反修；桂林主要是劉振林、劉天賞”。“要立即繳槍、停止武鬥”。對“聯指”派的殺人放火搶奪國防倉庫，調動農民進城攻“四·二二”和“老多”，則一概不提，顯然這是韋國清及廣西軍區片面向中央彙報的結果，周總理此時是受蒙蔽而聽不進“四·二二”和“老多”的意見了。“老多”的頭頭周兆祥等人在認真地思考著這些問題，心裏感到很不平靜，也覺得極受委屈。

“老多”的頭頭們想到，也就是在周總理此次接見的早幾天，毛澤東和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等最高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見了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珍、王大賓等北京高校造反派的“五大領袖”，對他們在學校中的武鬥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同時派出大批工人組成“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這些學校平息武鬥。在文革之初期毛澤東利用他們起來造反，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正是毛澤東的許多講話和江青等人的煽動，才有後來造反派大規模衝擊黨政軍機關的事件發生。現在覺得造反派已經過頭了、失控了，毛澤東利用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可以把造反派犧牲掉了。毛澤東召見不久，蒯大富等人被抓就是明證。周恩來七月二十五日接見講話後，南寧的曹東峰、朱仁；柳州的白鑾平、王反修；桂林的劉振林、劉天賞等人均被抓。周兆祥等人實在為此事想不通，内心十分痛苦。

面對部隊和“聯指”大兵壓境的現實，想到中央的批評，“老多”

的頭頭周兆祥、謝榮傑、李日明、楊福庭等人經過深思熟慮，最後決定停戰繳槍。只要能保證“老多”廣大群眾的安全，恢復桂林市的正常秩序，即使他們幾個人被抓也心甘情願了。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三日一整天，“老多”的戰士們高舉紅旗，敲鑼打鼓，帶上各種武器和軍用物資到部隊指定地點繳槍。此時，“老多”佔領區內一片歡騰，歡呼繳槍實現和平。然而，他們哪曾想到，一場圍殲他們的陰謀已在緊鑼密鼓地進行了。

奇怪的是“老多”按《七·三佈告》的要求繳槍了，拆除了武鬥工事，紅衛師人員都集中起來學習；但“聯指”方面卻絲毫未見繳槍的動靜，圍攻桂林的十二個縣“聯指”武鬥人員也並未撤離桂林，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伴隨著“老多”的繳槍，等待著他們的是行將被消滅的命運。韋國清的用心何其毒也。

為了最後消滅“老多”，桂林地、市革命委員會和桂林軍分區可說是費盡心機的。他們經過反復研究，草擬了一份《關於進一步全面落實中央〈七·三佈告〉的公告》（習稱《八·二〇公告》），準備以桂林地、市革命委員會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桂林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的名義發表，具體實施日期則選定八月二十日。

為了使他們的《公告》如期順利實施，八月十七日，桂林軍分區司令員景伯承在桂林步校主持召開桂林地區各縣武裝民兵團負責人及各縣人武部第一把手參加的會議，廣西軍區副司令員吳華也參加會議並作重要講話。吳華特別強調“桂林的問題肯定要解決，一小撮階級敵人一定要搞乾淨”。會議具體部署了八月二十日的行動方案。

八月十八日，廣西軍區政委魏佑鑄為此事又專程趕到桂林進行督促檢查，並在部隊駐地召開核心會議，緊急部署八月二十日的行動。魏佑鑄在宣讀並解析《八·二〇公告》時，特別指出“《八·二〇公告》表明依靠的是‘聯指’，鎮壓的是桂林‘老多’”。“八·二〇”行動前，他們把參加武鬥的桂林“聯指”兩千多人組成“工人糾察隊”，配備精

良武器，戴上“工人糾察隊”的紅袖套；把桂林地區各縣進城參加武鬥的人員一萬多人，組編成“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並給多數隊員配備了武器。

八月十九日，桂林地、市革委會及桂林軍分區又在一〇四部隊駐地召開最後的會議，由桂林軍分區司令員景伯承主持會議，桂林“聯指”頭目曹鐵軍及桂林地區十二個縣民兵團負責人、各縣人武部負責人參加會議，會上最後部署次日（即八月二十日）的行動方案。一切準備就緒。只等一聲令下即可展開行動了。

八月二十日凌晨，由桂林“聯指”組成的“工人糾察隊”、由各縣進城武鬥人員組成的“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及軍分區的部隊一萬多人悄悄地開進“老多”佔領區，按事先分工，武裝封鎖各交通路口和街道，武裝包圍“老多”的各據點。二十日天剛亮，全副武裝的人員就分別衝進被各自包圍的據點內，重點是廣西師院所在地的皇城、工人文化宮、桂劇院、專署大樓、廣西師院附中、工人醫院（住著“老多”的許多傷病員）。“聯指”的宣傳人員搶先佔領“老多”的廣播站，立即廣播《七·三佈告》和《八·二〇公告》。武裝人員則逐個單位、逐條街道挨家挨戶地進行搜查，抓捕“老多”人員和各縣逃到桂林的“四·二二”人員。八月二十日的一整天，擴音器裏不斷地播著《七·三佈告》和《八·二〇公告》的全文，播音員聲嘶力竭地高喊著“全面落實《七·三佈告》和《八·二〇公告》”。“堅決鎮壓一小撮階級敵人”，“把桂林地、市造反大軍的一小撮壞人揪出來”，“聯指”武裝人員抓人的狂叫聲，匯合成一股歇斯底里的狂歡曲，震撼著山城的上空，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靜。

那些被抓的人，有“老多”的大小頭目和骨幹分子，有支持過“老多”的領導幹部，也有各縣逃到桂林的“四·二二”派人員和一些無辜的群眾。所有被抓的人都被五花大綁，一排排跪在地上。各單位的“聯指”人員則與國民黨的還鄉團一樣，來回的奔跑著、狂叫著，在尋找單位的“老多”頭目和骨幹分子，找到了就是一場暴打，無數的人被打得

死去活來，痛苦地呻吟聲不絕入耳，悲慘的情景令人生畏。二十日一整天，被抓的有數千人，如廣西師院的教師和學生、造反大軍的負責人楊福庭、崔毅、周兆祥、謝榮傑、甘恒彩、李日明、黃沃南，桂林中學學生、造反大軍負責人梁蓮珍，以及鄧鐵橋、許瑞林、于文傑、張樹枝、鄧井發（專署農委幹部）、諸葛軍（專署外貿局幹部）等數千人，其中廣西師院被抓的就有近三百人。

經過一整天的抓捕，市區內的問題解決了，八月二十一日該到東江片來抓捕了。東江片重點抓捕對像是桂林冶金地質學校、桂林機械工業學校、東江聯防指揮部和東江的幾條街道。八月二十一日凌晨，數千名“聯指”武裝人員首先把東江片的交通路口封鎖，武裝包圍幾個重點單位。天亮後，“聯指”武裝人員分別衝進各單位，立即在制高點架上機槍，挨家挨戶進行搜查，然後把所有人員都趕到空曠地方集中起來聽“聯指”頭頭們的訓話。這種架勢，人們只有在電影中才能看到的鏡頭，猶如當年日本鬼子和國民黨還鄉團進村時搜捕八路軍，把老百姓都集中起來一樣，現在人們是身臨其境，親自經歷這種場面了。天下竟有這種架起機槍、重重圍困向人們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怪事，實在是韋國清及“聯指”頭頭們的首創。

當天包圍、進入桂林冶金地質學校的主要是一興安縣和平樂縣的“聯指”武鬥民兵團。經過武裝圍困宣講《八·二〇公告》和訓話後，接著就是抓“老多”的大小頭目們，清理外地來桂林的人員，有數十人被抓。因為當天桂林冶金地質學校的“聯指”人員並沒有回校，因而當天並未出現打人的事件。到八月二十二日晚上七時許，桂林冶金地質學校的“聯指”們回來了，頓時校園內就一片白色恐怖的情景。“聯指”們有如國民黨還鄉團一般，在校園內各宿舍區狂奔亂叫，進行大抓捕。短時間內就有一百多教師和學生被抓，如（學生中的）王宗器、蔣建榮、馮志華、覃瑞華、蔡義珍及（教師中的）蒙木生、楊正文、林明靜、王乃培、陸宏津、趙如海、何令儀等人。這些被抓的人被強迫跪在校園中的大路兩旁。還鄉團們把這些被抓的人五花大綁，大打出手，有數十人

被打得死去活來，傷痕累累。最後把這些人關押到教室裏，恐怖的氣氛籠罩著整個校園。

八月二十日至八月二十五日，連續六天的大搜捕，“老多”大小頭目、骨幹分子，支持過“老多”的領導幹部，所有逃到桂林的外來人員及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統統被抓了，總數在四千人以上。接著被抓的外來人員近千人被各縣押送回本縣，可憐這些逃生來桂林的人員大多數在押送途中或回到本縣後被槍殺了。市區內各單位被抓捕的人則在數天後送到收容所和第三監獄關押，等候下一步“聯指”們的處理。

桂林地、市革委會和桂林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的《八·二〇公告》，是一道鎮壓“老多”的動員令，也是“聯指”們抓人、打人、甚至殺人的行動指南。“聯指”們以閃電般的行動來執行《八·二〇公告》幾乎在一夜之間就使桂林“老多”蕩然無存，一瞬間桂林市就成了“聯指”的天下，“聯指”們復仇的時機終於來了。欲知“聯指”如何復仇，如何在桂林市及桂林週變各縣打人、殺人，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平樂聯指四處搜捕 可憐無辜慘遭殺戮

話說桂林“聯指”有了桂林地、市革委會和桂林警司制定的《八·二〇公告》這把上尚方寶劍，一夜之間就剷除了桂林“老多”，從而拉開在桂林市抓人、打人、殺人的序幕。關於“聯指”們如何在桂林市實施報復打人、殺人之事暫且先擱下，容後再表；先回過頭來看看桂林地區各縣的殺人慘狀。

桂林地區管轄有十二個縣，分佈在桂林市的四週。早在各縣“聯指”武鬥人員出征圍攻桂林之前，為了有一個穩固的後方，那些地方的“四·二二”和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就慘遭殺害了。

從一九六八年的初春開始，在桂北地區的資源、全州、興安、灌陽等地，在農村中就有所謂的“貧下中農最高法庭”這樣的組織，可以隨意的殺人，許多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被殺害，有的甚至全家被殺絕。到了五月份以後，桂林市出現了武鬥的緊張局面，武鬥之風颳到各縣，各縣的“聯指”又把目標對準了“四·二二”，認為“四·二二”是“土匪”，為了“保衛紅色政權”，他們就要“剿匪”，手無寸鐵的“四·二二”人員被逼得走投無路，或則逃到桂林，或則下鄉上山躲藏逃命，“聯指”則組成“剿匪大隊”在下鄉上山搜捕，一場大屠殺就此在各縣展開。

本回書將通過平樂縣“剿匪大隊”是如何圍剿“四·二二”，是如何殺人的記述，就可以瞭解桂林地區各縣圍剿“四·二二”和殺人的大概。而這一切都是在各縣革委會和人武部的指揮下進行的，也是得到了韋國清等默許的。

平樂縣地處桂林市的東南面，順灕江而下經陽朔即可到達平樂，

灕江到平樂後改稱撫河，再往下游到梧州市與西江匯合，流經廣東諸多縣市而入南海。公路交通可達桂林、柳州、梧州等地，較為便利。自古以來平樂縣就是一個州府所在地，在週邊各縣中是比較文明和文化事業發達的一個縣。

然而，就是這麼一個向來文明的禮儀之縣，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卻遭到了一場空前絕後的大劫難。無數善良的人們慘死在平樂縣“剿匪大隊”的屠刀之下。

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後，在平樂縣首先起來響應毛澤東號召的是平樂縣中學的學生。他們響應毛澤東“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號召，高舉“造反有理”的大旗，起來造學校領導的反，衝擊平樂縣的黨政領導機關。他們到北京、桂林和全國許多城市進行串聯，把外地的經驗帶回平樂，促進了平樂地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開展。特別是在桂林“老多”的影響下，平樂中學高中部的學生張弓、馮反、龍驅豹、黃驅虎等人率先在學校中成立了造反派組織。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把他們推上了歷史的舞臺，使他們成了當地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的知名人物，成了造反派組織的負責人。

一九六七年的“一月革命”後，他們與縣裏其他的造反派組織聯合起來，成立了平樂縣的“革命造反大軍”。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後，由於廣西首府南寧出現了“打韋”和“支韋”的兩大派“四·二二”和“聯指”，平樂縣“革命造反大軍”緊跟桂林“老多”成了“打韋”派，也就成了廣西“四·二二”的一個下屬組織，很快在縣城發展成為人數比較多的一支隊伍。它的主要組成人員是學生、教師，也有部分工人和各機關幹部，如當時縣委的幹部肖漢飛、黃呂操和食品公司幹部毛作仁、五金公司經理鄒灝中及某公司經理林紫等許多人成了“造反大軍”的成員。而平樂縣另外一些黨政幹部和學生、工人等在縣人武部的支持下則成立了“支韋”派的“聯指”，是廣西“聯指”的下屬組織。自此，平樂“聯指”與平樂“造反大軍”兩派的鬥爭，都是圍繞著廣西“聯指”與廣西“四·二二”和桂林“老多”之間的鬥爭而展開的。平樂“聯指”

由於得到了縣人武部和縣公、檢、法等部門的支持，各公社和大隊的民兵營都控制在“聯指”的手裏，因而“聯指”的力量十分強大，平樂縣的“造反大軍”一直都是處在受壓制的地位。

到了一九六七年的十一月，經過廣西“四·二二”和桂林“老多”的共同鬥爭，韋國清和廣西軍區終於交出了檢討，承認在文革中支一派、壓一派，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在中央的主持下，廣西兩派也達成了大聯合的協定，中央並就廣西的文革問題做出了相應的決定，成立廣西“區革籌”。廣西的兩派代表自北京返回廣西後，一九六七年底和一九六八年初，廣西各地、市、縣的兩派都相繼實現了大聯合。在這種情況下，平樂“造反大軍”的人們總算松了一口氣，心想自此可以不再受壓制和打擊了，可以和“聯指”派平等了。他們的內心充滿了喜悅。

一九六八年初，平樂的兩派實現了大聯合，“造反大軍”的負責人張弓、馮反、毛作仁、白先春和“聯指”負責人朱秋麟、莫世奏、林秉剛、黃貴平等人都成了“大聯委”的負責人，雙方正在著手籌建成立平樂縣革委會的準備工作，兩派的廣大群眾對此是十分高興的。然而，善良的人們哪會想到，韋國清及“聯指”的高參們早就定下了要消滅“四·二二”的決心，消滅“四·二二”建立革委會才是他們的真正的目的。為此，從一九六八年初以來，他們就支持各地“聯指”鬧事，打壓“四·二二”。從一九六八年的四月起，南寧、柳州出現了兩派的武鬥緊張局勢，五月四日起桂林“聯指”又搶先在桂林佔據點，奪武器，製造武鬥的緊張局勢。這股風必然會飄到平樂，影響到平樂的兩派。

平樂“聯指”有縣人武部負責人李渭山和平樂鎮人武部負責人楊永喜等實權人物的支持，縣公、檢、法又站在“聯指”一邊，各公社、大隊的武裝民兵都控制在“聯指”手裏，可以說“聯指”要人有人，要槍有槍，一切大權都掌握在他們的手裏。而平樂“造反大軍”這樣一群由學生、教師、部分機關幹部和工人組成的隊伍，他們並未掌握大權，更不會得到什麼武器，根本不可能去挑動武鬥。當桂林的武鬥之風飄到平樂時，“造反大軍”的人員只有四處躲藏逃命之分，根本無能為力。

與“聯指”派相抗衡。也就是說平樂根本就不可能發生武鬥。如果說當時掌握平樂大權的李湄山、楊永喜等一班人能夠站在公正的立場，主持公道，能夠站出來講一句話，喊一聲“要正確的執行黨的政策。亂打亂殺是要追究法律責任的”，也許平樂就不會出現有史以來空前的大屠殺了。但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幻想，因為他們這些掌權者本身對“造反大軍”就充滿了刻骨的仇恨，更何況廣西“聯指”和廣西“四·二二”與桂林“老多”，他們各自本身就是一個整體，都會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桂林出現武鬥，平樂“聯指”不可能袖手旁觀；消滅各地的“四·二二”和桂林“老多”，不可能留下平樂的“四·二二”讓他生存下去，這一切就決定了平樂“造反大軍”的悲慘結局。

自一九六八年六月以後，桂林武鬥正是熱火朝天之際，受桂林軍分區的調遣，平樂“聯指”數百名武裝人員在人武部的帶領下開赴桂林圍剿桂林“老多”。在縣內他們則瘋狂地抓捕“四·二二”派人員，迫使“四·二二”人員紛紛逃離縣城到鄉下躲藏，少數人則逃到了桂林。當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區革籌”、廣西軍區的《六·一七公告》下達後，平樂縣革委會、縣人武部於六月二十八日聯合發出《關於貫徹〈廣西區革籌、廣西軍區關於破獲反革命案件的指示〉的指示》，要求縣內各級組織立即貫徹執行，對階級敵人大檢舉、大批判、大鬥爭，同時開展所謂清理階級隊伍工作。這一指示立即在全縣範圍內掀起了殺人的狂潮。

七月初，月城區革委召開幹部會議，貫徹縣革委六月二十八日的指示；會後，在中華鄉對一些“四·二二”派群眾採取逼、供、信的辦法進行審訊，個別群眾在毒打下屈招了在龍岩（當地一個山洞）成立“反共救國團”的假供，因此而釀成了一起特大的“反革命組織”假案。此案涉及月城區十九個鄉村，因受牽連被關押審訊的達三百五十人，有一百多人先後被殺害。

中央《七·三佈告》下達後，七月十四日，縣革委又發出《關於貫徹執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指示》，要求

各級各單位組織學習，深入開展革命大批判，開展對敵鬥爭，開展“三查”（查走資派、叛徒特務和黑手）運動。

在此基礎上，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在“聯指”總指揮的指令下，“聯指”頭目莫世奏（公安局秘書股副股長）、張全生（銀行幹部）、林秉剛（平樂鎮工商所市管員）等開會研究到沙子圍剿造反大軍，商定具體的作戰部署。八月五日，“聯指”一百多武裝人員於當晚十一時分兩路向沙子進發，拂曉包圍沙子，在沙子“聯指”的指引下，一槍不發攻入沙子，對造反大軍駐地進行搜捕，抓走造反大軍張弓、馮耀坤等七十五人。

八月六日上午十時，林義文在沙子向在平樂的莫世奏彙報情況，要求派人來處理。莫世奏接電話後當即給在桂林指揮武鬥的朱秋麟請示，朱回答說可以把張弓等人殺掉，但要問清情況。當晚即對張、馮等人進行了非法審問，直到深夜十一時，審問無任何結果。在非法審問中，面對“聯指”頭頭們的毒打和辱罵，張弓等人表現了大無畏的堅強和視死如歸的勇氣，指責他們的違法亂紀和醜惡行徑，據理聲言自己無錯無罪。張弓的反駁使“聯指”頭頭們張口結舌，無以面對。他們惱羞成怒，當即開會研究，決定殺掉張弓、馮耀坤、余海（工人）、楊運才（余海之妻）、余長壽（余海之子）、陳文開（平樂一小教師）、李旭平、廖祖厚（廣運林場工人）等八人。

八月七日，在沙子召開萬人大會，公開槍殺余海夫婦（因余海夫婦是資本家家庭出身）。後將張弓等人拉回平樂，晚上把八人推到安良木材場河邊集體槍殺，屍體推入河中。

張弓只是一個中學生，文革中僅因響應毛澤東的號召起來參加文革，成了一派組織的負責人，一個很好的學生，遭到秘密殺害，法律何在、公理何在呢？

九月五日，縣革委又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聯指”的常委也全部參加會議），會議決定把“四·二二”派逃到農村躲藏的幹部、群眾當作“土匪”來圍剿，九月七日，縣成立“剿匪指揮部”，由武裝部副部長李

恒達任總指揮，“聯指”頭目朱秋麟、蘇紹聖任副總指揮，領導成員有廖德權、林秉剛等，工作人員有曾冬梅（縣法院院長）、李善福、賴永傑、林彩名、余瑞興等，指揮部設在縣城附近的馬蹄井村，並以縣革委名義發佈“剿匪緊急動員令”，調用各區武裝民兵七百六十人到長灘粉岩、附城的水源等地進行“剿匪”，槍殺無辜群眾多人。“剿匪”和清查“反共救國團”、“暗殺團”雙管齊下，全縣範圍內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不久白先春（小學教師、造反大軍負責人之一、縣革委委員）、夏景昇（五金公司業務股長）以及黃海才、陽利民、盧漢才、何自輝、鄭家雄及李庚桃、周繼發、曹景堂、李星華、陳桂治、黃遠來、唐樹崗、黃偉才、邱仕文、黎愛瓊、張與民等一大批人先後被抓，都被殺害。

九月十七日縣革委召開數千人的所謂“剿匪勝利慶功大會”，革委會副主任張貴友在會上講話，給“剿匪”有功人員發獎品。會後，張貴友、李恒達、蘇紹聖、朱秋麟等十多人合影留念。當晚招待所有參加剿匪人員，以示慰勞。

此外，在此期間被殺害的還有：。

“造反大軍”負責人、也是兩派“大聯委”成員之一的毛作仁，一個縣食品公司的幹部，一九六八年八月三十一日被“剿匪大隊”秘密殺害，家屬們連屍體都找不到。

“造反大軍”的骨幹成員、平樂中學學生黃驅虎、龍驅豹被“剿匪大軍”殺害。

縣監委書記肖漢飛，因為是支持“四·二二”的領導幹部被殺害了。

水源小學教師李國宗，附城公社中學教師郭光柱，僅因為參加了“造反大軍”，被殺害了。

飲食公司的職工橋弟夫婦兩人，因為參加了“造反大軍”，平樂形勢緊張時回老家汗沖躲藏，一九六八年九月初被單位“聯指”騙回縣城，說是“沒事了，回去吧”，結果剛一進縣城就被人亂棍打死了。平樂桂劇院女演員黎素平因參加造反派被打死了，打死後還被人用竹簽插

入陰部，殘忍至極。

在短時間內，全縣被殺害的“造反大軍”人員、支持“造反大軍”的幹部、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總數為一千九百二十六人，有少數是全家被殺絕的。這是平樂縣自有史以來濫殺無辜最為慘重的時代。

可憐這些年青的生命，像張弓和毛作仁這樣的學生和幹部，被屠殺了一大批。他們何罪之有？他們至死都不明白，跟隨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會引來殺身之禍，天底下還有公理和王法嗎？仰望蒼天，誰人能為他們評說申冤？他們在九泉之下永遠難以瞑目。

在平樂縣的農村中，亂殺人現象比比皆是，五花八門。透過附城公社金山大隊和二塘公社良龍大隊的殺人，就可想見其他農村殺人的慘況。

金山大隊位於平樂縣城東面八公里處，鄉村的農民們過著日出而起、日落而歸的勞動與生活，這裏也沒有人參加“聯指”和“造反大軍”，也從未出現過什麼武鬥。至於金山小學的教師們參加了“造反大軍”一派，因為他們是知識份子，這是那個時代較為普遍的現象。但他們是老老實實的搞教學，也從未有什麼“事件”之類的事情發生。然而殺人之風颳到金山，這些老師們和村民們，他們也難逃死亡的威脅。

金山大隊的殺人兇手們在陳友香、陳友仁（大隊民兵營長）的指揮下，也乘這股殺人之風大開殺戒，過把殺人癮，把對他們有意見或他們不喜歡的人乘機殺掉，被殺者總計有：。

小村的潘文能和潘水發父子、潘先林、關鳳國、潘孝林、潘老兆、林水發、郭嗣茂、謝彰榮和謝發榮兄弟等十人。

水源寨村的郭光憲、郭橋生二人。

水沖村的藍盛林、徐癸中二人。

金山小學的教師溫素傑、梁良忠、陳貴珍三人。

以上十七人除三位小學教師是白天批鬥公開槍殺的外，其餘的被害者均是晚上秘密槍殺或者抓到水庫用水淹死的。死亡時間都是在

一九六八年的八、九兩月。

金山中醫診所著名老中醫藍宗爐則是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二日被平樂縣衛生局幹部肖焦生等人抓去馬蹄井“剿匪大隊一中隊”駐地，九月十三日上午，即押到平樂黑山腳河邊槍殺。此前，平樂縣法院院長曾冬梅曾親自參與審問藍宗爐，然後由殺人兇手金山大隊的陳樟權和福興大隊的陸明飛負責槍殺。槍殺藍宗爐時並把安良村的謝世明拉去陪殺，強令謝世明把藍宗爐的屍體拖入河中讓水衝走。

良龍大隊是緊靠金山大隊的，原本同屬一個大隊的，一九五八年分為兩個大隊了。良龍大隊的殺人兇手們在黃喜發、黃剛富、黃仁福、藍樟發等人的指揮下，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開槍殺。被殺者計有：。

趙養古、鐘文勝、鐘英賦、藍海清、張發瑞、羅貴英和洪阿養母子等七人。洪阿養還是一個未成年人，這些人何罪之有呢？。

和金山、良龍兩個大隊的亂殺人一樣，全縣各公社、大隊都有類似的情況。在二塘公社的謝家村，兇手們殺人之後，為了尋找刺激取樂，竟強令一個到該村入贅的地主家庭出身的尹之清用刀去割下被害者的人頭。尹之清本是一個老實而又膽小的人，正因為如此，兇手們才強令他這樣做。這個世界上竟有如此野蠻而又愚昧的魔鬼。尹之清本是樂塘村人，是地主尹承紀之四兒子，國民黨軍中將尹承綱之侄子。土改時他家破人亡，爾後才到謝家村入贅。文革中兇手們亂殺人，他害怕極了。因為他為人老實膽小，與世無爭，和週圍的人相處較好，才得以保全性命。兇手們強令他去割被害人的人頭，如果他拒絕的話，自己就會沒命，他只好閉上眼睛，違心的按兇手們的強令去做了。

平樂縣大屠殺的指揮者就是“聯指”派的頭目朱秋麟、林秉剛、黃貴平，幕後指揮者則是李帽山、李恒達等一批當權者。他們目無法紀，無法無天，膽大妄為，草菅人命，連起碼的人性都喪失了。這些殺人兇手們就是一群野獸。

平樂縣五金公司經理鄒灝中和某公司經理林紫，他們都是支持“四·二二”的幹部。“四·二二”人員被迫外逃時，他們也同時外逃謀

生，在虎豹、密山渡、福興等地東躲西藏。由於得到當地好心群眾的掩護，皇天護佑，在“聯指”“剿匪大隊”的多次搜捕中他們都得以逃脫，實在是萬幸了。直到平樂亂殺人之風過後，一九六八年十月，他們才被“聯指”抓獲。而此時“剿匪大隊”早在九月十六日解散了，他們才得以保全了性命。雖然幸免於一死，但“活罪”難逃，因為對“聯指”頭頭們來說，抓獲林紫、鄒灤中是他們的一大勝利。由縣革委出面，把林、鄒二人當成“匪首”關在木籠子中展覽一個星期，給全縣的“聯指”來參觀、批鬥，可憐林、鄒二人遭到非人的待遇，備受磨難。之後被送進監獄，等待“聯指”們的審判和處置。這是廣西的又一次活人展覽，是典型的法西斯暴行。

不但平樂“聯指”打著“落實《七·三佈告》”的幌子在乘機殺人，與它一水相通位於上游的陽朔縣，這裏的“聯指”不但全力以赴調兵遣將到桂林圍攻“老多”，在縣內亂殺人也決不會落後于平樂“聯指”，且殺人手段更是有所創新。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武鬥前線多人戰死 後方報復殺人墊底

話說陽朔縣位於桂林市的南面，灕江自桂林蜿蜒流經陽朔而後進入平樂，陽朔、平樂是緊密相鄰的兩個縣。在文化大革命中兩縣的“聯指”是同呼吸共命運的，兩縣“聯指”與桂林“聯指”關係都是不同尋常的。平樂“聯指”到桂林圍剿“老多”，在縣內亂殺人；陽朔“聯指”更不甘居於後，因為從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白沙事件”後，陽朔“聯指”與桂林“聯指”的關係更為密切，陽朔成了桂林“聯指”最可靠的後方。

關於陽朔縣兩派的形成和演變，還得從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時說起。早在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在桂林及外地來陽朔串聯學生的影響下，一九六六年的八月陽朔縣就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當時縣委領導懼怕紅衛兵，一九六六年九月四日，縣委領導在幹部會上傳達上級指示和外地組織赤衛隊的經驗，防止紅衛兵鬧事，就於九月九日成立了陽朔縣的赤衛隊，並向全縣一八萬人民發出倡議書，要求各戰線、各區、鄉同時成立赤衛隊，以此來“保衛”全縣的安全。赤衛隊成立後，曾在縣委大院內、在燈光球場等地驅趕和圍攻外地來陽朔串聯的紅衛兵，並開大會聲討桂林“老多”。可見陽朔縣的地方領導從文革一開始就是站在“老多”對立面的。

隨著文革運動的深入發展，特別自一九六七年五月南寧出現“打韋”和“支韋”的“四·二二”、“聯指”兩派後，波及到陽朔，縣內也很快出現了“二·一二”（即“四·二二”觀點一派）和“聯指”兩派。“二·一二”派的主要負責人為李慶軍、李祖遺、劉漢偉等人；而“聯指”派的主要負責人為呂明忠、莫橋芳、劉永昌等人。自此，兩派的一切行

動和鬥爭都受廣西“四·二二”、桂林“老多”與廣西“聯指”之間的對立和鬥爭所影響。“聯指”派在縣城內的人數雖然與“二·一二”派的人數相當，但在鄉鎮及農村卻是“聯指”派占絕對優勢，並且“聯指”得到縣人武部及各級當權者的支持，因而他們的力量強大，“二·一二”派自然處於受壓制的處境。

一九六七年的夏季，受南寧及廣西許多地方武鬥緊張局勢的影響，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凌晨，“聯指”派組織一百多人到縣人武部奪槍，共奪得六〇炮一門，機槍十多挺，步槍百余支，手榴彈數枚，手槍五支，子彈數箱，集中放到陽朔中學，以備武鬥之用。對此，八月十七日，“二·一二”派人員到人武部靜坐抗議，要求武裝部把“聯指”搶去的武器追回。奪槍事件與靜坐抗議之後，兩派的矛盾開始激化。但兩派始終沒有發生正式的武鬥。只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陽朔“聯指”出動武裝人員掩護桂林“聯指”撤退時與桂林“老多”發生過槍戰，此外，兩派在縣內一直沒有動刀動槍的舉動。

到了一九六七年的十一月，在中央的主持下，廣西兩派代表在北京達成了停止武鬥實現大聯合的協定。到了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三日至十七日，陽朔縣的兩派代表也到桂林軍分區辦學習班，雙方達成九點協定，實現兩派的大聯合。在此基礎上，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陽朔縣革委會成立，縣人武部部長辛恒山任主任，人武部政委王瑞武任第一副主任，原副縣長黎咸稱任副主任，辛恒山、王瑞武、黎鹹稱、張洪新（原副縣長）、邵連剛（農辦主任）、邵鐵勇（人武部副部長）、張林生（公安局副局長）、邱行舉（統戰部長）等人組成常委，委員（有兩派群眾代表參加）五十九人。雖然常委中多是支持“聯指”派的領導幹部，只要能按政策辦事，保持陽朔的穩定局面，“二·一二”的人也就不計較了。

陽朔的局勢本來是穩定的，兩派過去雖有矛盾和鬥爭，也只是停留在大字報和口頭之爭罷了，從未有動刀、動槍的舉動。現在革委會成立了，人們的心裏更是希望和平安定了。

然而天有不測之風雲。隨著一九六八年初以來廣西各地“四·二二”派不斷遭受打壓和圍殲，隨著南寧、柳州、桂林等地相繼出現武鬥的緊張局面，這股風不可能不波及到陽朔。陽朔“三·一二”派的命运就在劫難逃了。

廣西“聯指”及幕後指揮者們的既定方針是消滅“四·二二”和桂林“老多”建立革委會。到了一九六八年的四月底，廣西的許多地區和縣的“四·二二”差不多被“聯指”殲滅了，剩下南寧、柳州的“四·二二”和桂林“老多”豈有讓它存在下去之理。為此，“聯指”派不但在南寧、柳州相繼製造事端挑起武鬥，就是在“老多”占絕對優勢的桂林他們也要製造事端挑起武鬥，以便一舉殲滅“老多”。一九六八年五月四日，桂林“聯指”搶先佔領據點，搶奪部隊的武器，以此來刺激“老多”以達到挑動武鬥的目的。面對“聯指”派的挑釁，“老多”派也跟著佔據點、構築工事、搶奪武器，以應付“聯指”的圍攻。雙方劍拔弩張，武鬥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就在桂林“聯指”佔據點、搶槍；接著“老多”派也佔據點、搶槍之時，桂林地、市革委會和桂林市人武部及桂林軍分區，他們面對此種局面不但不出來做耐心細緻的說服工作，反而把各自的辦公場所搬到南站“聯指”派的點領區，這不充分說明“聯指”派的一切胡作非為是他們從中支持而搞起來的嗎？

就在桂林兩派武鬥即將一觸即發之時，一九六八年六月初的一天，桂林軍分區支左辦公室主任郝群給陽朔縣人武部打來電話，用暗話說：“分區倉庫的花生米（即武器彈藥）給老鼠（對“四·二二”的誣稱）吃光了（搶完了），你們有沒有老鼠藥，請趕快送來（即派武裝民兵到桂林圍攻“老多”）。”

縣人武部接到通知後，當即與縣革委會的領導們開會研究，同意派武裝民兵到桂林圍殲“老多”。為此人武部及縣革委作出緊急部署，由縣人武部參謀蔣凱向各區武裝部下達出兵桂林的緊急命令，同時要求做好出發前的各項準備工作。

各區和縣直機關接到縣人武部的緊急命令後，除興坪區因重點放在防守以外，其餘各區和縣直機關都派出一個武裝民兵連，於六月三日深夜乘車出發，四日凌晨到達桂林，住在桂林南站對面的東方紅飯店。民兵們住下後，當即成立陽朔縣民兵團指揮部，團長邵連崗，政委遠景宇，參謀長張占奎（縣工交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李仁（財貿辦副主任），後勤部長孫秀國（財辦主任），下屬七個連，約七百武裝人員。

陽朔“聯指”到達桂林，從六月五日開始，雙方的武鬥正式打響。雖然桂林地區十二個縣約八千民兵包圍桂林“老多”，但在整個六月份的武鬥中，“老多”在南線和北線都開始反擊，並不斷取得勝利，而“聯指”派則屢遭失利，損兵折將，丟失據點。為此，“聯指”總指揮部分析原因，認為“老多”的武器好，而自己的武器不好，是失敗的主要原因。他們決心搞到更好的武器，來奪取“保衛紅色政權”之戰的勝利。七月四日，桂林“聯指”武鬥總指揮部負責人曹鐵軍等人在汽車站對面的五一飯店召開各民兵團負責人會議，佈置各民兵團立即派人到興安國防倉庫去搶奪武器。陽朔“聯指”民兵團團長邵連崗參加會議回來後，即命令鄭國祥（白沙區幹部）、楊先發（縣工商局幹部）帶領陽朔民兵一百多人，星夜乘車回陽朔經恭城縣繞道趕到興安縣國防倉庫奪槍。

各縣“聯指”民兵奪槍後，各種槍支和彈藥多了，有了如此多的新式武器，足可以對付桂林“老多”了。七月八日，“聯指”總指揮部在蘆笛岩附近的苗圃召開南北聯合作戰會議，總結南線、北線作戰失利的教訓，策劃在西線與“老多”打一次大戰。具體作戰部署是南線、北線佯攻以吸引“老多”的注意力，西線作為重點防守和反攻的戰場。戰鬥於七月十三日打響，十九日結束。在此次作戰中，“聯指”由於有了先進的武器，兵力上也占絕對優勢，果然阻止了“老多”派在西線的進攻，並奪回了西山、白崖山等據點，給“老多”造成了較重大的傷亡。此役陽朔“聯指”的功不可沒，他們雖然戰死了八人，但奪回了白崖山和西山，為桂林的紅色政權“保衛戰”作出了“貢獻”。

陽朔“聯指”到桂林武鬥，先後有十二人戰死，多人受傷，為此

這些離開家園到桂林殺人放火的武鬥人員心理就失去了平衡，他們急於要找到報仇雪恨的機會來為他們死去的戰友復仇。在桂林武鬥前線他們耐何不了“老多”，只好回到自己的老窩來找手無寸鐵的“二·一二”派人員出氣，名曰“殺人墊底”，為“犧牲”的戰友報仇。

在陽朔縣內，“二·一二”派與“聯指”派雖然對立，但“二·一二”派未掌握武器，他們從來也沒有能力來搞武鬥。此番“聯指”在縣革委和人武部的指令下赴桂圍攻“老多”，“二·一二”派也無可奈何。他們中除一部分人到鄉下躲避外，多數人是老實地呆在家裏不出門，以為“不惹”是非就可保平安了。這實在是一廂情願的自我安慰罷了。“聯指”為了有一個安全穩固的後，為了殺人墊底，他們豈能放過“二·一二”呢？

桂林的武鬥打響後，陽朔“聯指”就相繼把“二·一二”派的大小負責人和骨幹成員、支持“二·一二”派的機關幹部非法的抓起來，集中關押在縣文化宮（改成臨時監獄）。當陽朔“聯指”赴桂參加武鬥人員出現傷亡時，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拿“二·一二”派的人員來開刀，亂殺人之風由此而起。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四日下午，赴桂林武鬥的民兵幹部林定權和十多個民兵乘汽車從桂林回到陽朔葡萄區，當晚就將“二·一二”派陽致政、張雄、蔣任、廖祖儂、張步勳等五人用布蒙住眼睛推上汽車，拉到桂陽公路西側的柚子彎附近槍殺。首開了陽朔縣亂殺無辜的先例。

六月三十日，赴桂林武鬥的民兵幹部容木勝、蘇成惠專程從桂林帶回一個武裝民兵班，經黎元發簽字批准，從白沙區工農兵指揮部（“聯指”）“牢房”把孫錫華、賓正榮、李光祥、韋有恆、容作飛等五人抓出來先後槍殺。

七月八日晚，“聯指”指揮部在縣手工業聯社樓上召開前、後方合謀殺人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前、後方的負責人呂明忠、李先德、陳益昌、莫橋芳、王天德、蔣正本、牟科永、麥建元、邱建生等人。呂明忠主持會議，他說：“最近形勢很好，對我們很有利。現在桂林兩派的代

表被中央召到北京開會，情況必然要出現變化，所以前方同志回來要求處理一批（即殺一批“二·一二”的人）。……”在討論中有五人發言。李先德說：“後方（留守）的同志將階級鬥爭蓋子揭開了，我們赴桂林的同志要向在家的同志學習。我們回來是要與大家交換心情，統一思想。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蔣正本說：“要幹（即殺人）就要抓緊時間幹”。王天德問：“材料怎麼樣”？呂明忠說：“材料夠了的”。邱建生說：“現在就幹”！會議經研究，提出要殺掉的人是：蘇良鈺、程忠純、吳尚賢、李超、廖傑、張伯勳、覃榮華、戴開志等一批人。在討論如何殺這些人的時候，有的提出先抓幾個到桂林幹掉；有的提出由各單位組織群眾，利用批鬥會的形式，由群眾亂棍打死較好。最後形成統一的意見，同意用第二種方案。

七月十五日，赴桂林武鬥指揮部將在武鬥中被打死的縣百貨公司黃金成的屍體運回陽朔，十六日在公園開追悼會，“聯指”派頭目即利用此機會煽動殺人墊底，當即把關押在文化宮的程忠純（縣百貨公司幹部）、蘇良鈺（縣委委員、縣糧食局局長）、李超（縣合作社幹部）押到公園追悼會會場，強迫他們跪在死者黃金成的屍體前，當即殺人來祭奠死者。蘇良鈺是被兇手們先用刀把耳朵割下，再用刀捅死，其他二人是用亂棍毒打後槍殺。這真乃人世間罕見的慘劇。

八月三日晚，“聯指”工農兵指揮部在縣人民禮堂召開拘留莫崇躍（縣郵電局幹部、“二·一二”派成員）批鬥大會，同時由糾察隊從關押在文化宮的“二·一二”派成員二十多人押到禮堂臺上作陪鬥。批鬥大會由牟科永（教育局幹部、指揮部成員）主持。批鬥大會開始後，蔣彬（縣委組織部幹事、赴桂林武鬥縣直屬民兵連指導員）和一部分民兵進入禮堂並衝到臺上，蔣彬搶過話筒，高喊：“保衛紅色政權的戰友們、同志們！我們在前線流血犧牲，他們在後方這麼安然，我們的血不能白流，血債要用血來還”！在蔣彬的煽動下，先後有四十多人手持木棍衝上臺，輪番毒打被批鬥的“二·一二”派成員，莫崇躍、莫文初、吳尚賢、吳章龍、農漢和等人當即被打死，其餘二十多人全部被打成重傷。

不但在前方武鬥的“聯指”不時回來殺人墊底，留守後方的“聯指”人員也在縣革委和人武部的組織下掀起了殺人的狂潮。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廣西區革籌和廣西軍區發表了所謂《關於破獲“中華民國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六月二十五日，縣革委召開緊急會議，宣讀了《六·一七公告》，並傳達區革籌和廣西軍區的指示，強調在全縣開展“三查”運動，向“階級敵人”發起猛烈的進攻。六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按照縣革委的指示，各區又先後召開革委擴大會，學習《六·一七公告》，學習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有關階級和階級鬥爭的論述。七月三日，中央又發出了關於廣西問題的《七·三佈告》。為貫徹《六·一七公告》和《七·三佈告》，縣直機關和各區、鄉、大隊同時向“階級敵人”颳起了“十二級颱風”，一大批“二·一二”派成員、支持“二·一二”派的幹部和地、富、反、壞、右分子遭到了殘酷的鬥爭，一些人被打死和迫害致死。如縣直機關的張伯勳、覃榮華於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日在遊鬥中被打死；戴開志於八月二十一日在遊鬥中被打死；縣水電局副局長蘇志生、農業局幹部朱方瑾被逼自殺身亡，副縣長閻秀清被打重傷致殘；縣良種場職工莫振雲、李志華、莫繼榮、周禎、林九淮、林用忠、林傑、林素、林五高、秦中意；白沙區群眾陶天喜、劉德展、劉五一；興坪區的秦社林、秦金髮、秦運榮、秦水榮、秦年生等人都被非法殺害。更有福利區普益糧所幹部廖大文被殘酷鬥、打後，被本單位職工陳永吉、管德疆二人用繩子把手反綁，面朝下，頭在前，從福利禮堂沿著老街那高低不平的石頭路上一直拖到灕江邊的鯉魚洲上，約八百米的路程，廖大文被活活拖死。

在向“階級敵人”颳“十二級颱風”的狂潮中，全縣先後有六百三十九人被殺害（少數是被逼自殺的），七百二十七人被打致傷殘，二千五百一十三人被殘酷批鬥。被害者有的死於槍殺，有的死於棍殺、刀殺、石頭砸死，也有五花大綁推下河淹死的，更有一些所謂“四類分子”被捆綁後，從陽朔公園山上的臥雲亭丟下砸死，死者血肉模糊，腦漿四射，令人慘不忍睹。

“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堪與甲桂林”。自古以來陽朔不但以山水聞名於世，同時也是一個人傑地靈的地方。碧蓮峰下的人家向以文明、勤勞、樸實而令人稱讚。筆者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曾在陽朔中學學習，早就飽嘗了這裏的山光水色，領略了這裏的民俗風情，對美麗的山水洗禮出來的陽朔人民有著極好的印象。想不到在“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和“群眾專政”這些邪說的蠱惑下，竟出了蔣彬、邵連崗、黎誠稱……這樣一群惡狼，把個好端端的陽朔搞得妖風四起，血雨腥風、屍橫遍野，實在令人憤恨有加，悲痛欲絕。

人民在遭殃，大地在哭泣。不但陽朔的“二·一二”（即“四·二二”派）慘遭殺戮，全廣西各地的“四·二二”都在遭受滅頂之災。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全廣西再起殺人潮

血淚中成立革委會

話說一九六八年的春夏之交，全廣西除南寧、柳州、桂林三座城市外，各地區、縣城的“四·二二”已被消滅乾淨。“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六·一七公告》和七月初中央《七·三佈告》下達後，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又通知各地要認真落實中央《七·三佈告》和自治區的《六·一七公告》，清查“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姿派”、“反共救國團”和“地、富、反、壞、右”分子，要狠狠的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廣西日報》則在輿論上配合，連續發表多篇社論，鼓吹大廳“十二級颱風”，報導各地鎮壓“階級敵人”的消息，鼓動各地加緊“群眾專政”，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由此，全廣西再次掀起了殺人的狂潮，殺人的數量超過了年初以來的大屠殺，七、八、九三個月的時間，被害者有近六萬多人。

邕寧縣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份前只殺了五十四人，在受到“右傾”的批評後，於七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全縣分五個片召開大會，要求每個公社堅定不移地落實《七·三佈告》。對一小撮階級敵人大廳“十二級颱風”，結果在全縣九個區同時調動民兵攻打“四·二二”派的據點，把“四·二二”派消滅。到八月二十二日止，全縣亂殺人近三千多人，九月又殺害殺害近八百人，是廣西亂殺人最多的縣之一。

邕寧縣地處南寧市四週，是一個比較大的縣。“文革”中南寧所發生的一切，無一不波及到這個縣的城鎮和鄉村。這個縣殺人數量之多不但是廣西之最，且殺人手段也特別殘忍。僅從那樓公社被殺的十多人來看，就可見該縣殺人的一般情況了。

華佳大隊陳良坡村農民陳朝裝、陳朝庚，僅僅是同情“四·二二”

派的觀點，被“聯指”派活活的打死了。更有該村的陳朝匡是一個曾參加過志願軍赴朝鮮作戰的退伍軍人，“文革”中僅因同情“四·二二”也慘遭殺害，並把屍體掛在樹上示眾多日，令人慘不忍睹。

那坤大隊那坤坡村的蘇仁芬本是那樓中學的語文教師，也僅是同情“四·二二”的觀點，從學校回到村中即被打死，連他未成年的兒子蘇由希也慘遭殺害。

河浪大隊河浪村的梁啟甫也是那樓中學的語文教師，從學校回到村裏即被“聯指”中的一小撮兇手暴打，打至半死後推入土坑中活埋；其侄子梁琪麟是一個中學生，因為參加了“四·二二”，也同時被打至半死推入土坑中活埋。叔侄倆人在被兇手們活埋的過程中，曾苦苦地哀求給他們一條生路不要埋他們，這群生埋活人的野獸們哪聽得進人的呼聲，兩條可憐的生命就這樣結束了。生埋活人，二十世紀的六十年代人世間竟還有這樣的慘劇。

百濟鄉那華村那敏坡的黃再權是百濟中學的教師，因同情“四·二二”的觀點而被打死；南華小學教師黃森庭因參加過“四·二二”，在本大隊被批鬥時，兇手們用鐵釘釘入他的頭部而被活活釘死，實在是殘忍至極。華零小學教師黃達川及他的兒子黃德滔因為同情“四·二二”，父子倆慘遭殺害。

馬山中學教師梁德峰八月二五日從馬山縣回來，剛回到良慶，一進村即被打死，同時被打死的還有他的兄弟梁德見（農民）、梁德民（高中學生）。他們僅僅是參加了“四·二二”而已，又何罪之有呢？

南華大隊屯思村施振作、施振輝兩兄弟，因是“四·二二”觀點的人，在大隊被批鬥後，押回本村，在半路上即被兇手們用砂槍打，後用刀砍死，十分殘忍。

憑祥市在《七·三佈告》下達後，全市出現亂打、亂鬥、亂殺人事件多次，其中僅中、小學教師就有數十人被殺害。全市共有二百四十二人被非法殺害。

德保縣在貫徹落實《七·三佈告》時，要求各公社召開萬人批鬥

會，大造聲勢。七月七日，那甲公社召開萬人批鬥大會，傳達《七·三佈告》和縣三級幹部會議精神。公社武裝部長向大會作報告，宣佈以大隊為單位，擺開戰場，把所謂的“四類分子”和“四·二二”（他們誣稱為“反共救國團”）兩百多人進行批鬥，當場打死十九人；燕洞公社七月十八日召開萬人大會，對被批鬥對象宣佈“罪狀”後，人人要過“鬼門關”，數十人當場被打死。八月五日，縣革委會負責人王君太主持召開常委會議，決定召開揭批“反革命”分子羅仕彥大會，台下跪著“四·二二”和“四類分子”陪鬥。王君太在臺上高喊“對一小撮階級敵人大廳十二級颱風，向階級敵人進行猛烈進攻”，台下糾察隊、民兵等大打出手，頓時喊叫聲、哭聲震耳，數十人被當場打死，其餘的人均受重傷。區革籌、廣西軍區《六·一七公告》下達後，在貫徹《六·一七公告》中，大揪“反共救國團”，全縣抓捕“反共救國團”一千五百零四人，關押在各地的集中營，嚴刑拷打，有二百八十四人被打死，殘一百二十七人，傷一千零十六人，共失蹤二十四人。

上思縣革委會和人武部負責人為了貫徹廣西《六·一七公告》和中央《七·三佈告》，號召各公社、大隊發動群眾向一小撮階級敵人大廳十二級颱風，實行群眾專政。八月二十九日，有十三名幹部和十六名農民在公正圩被無辜殺害。九月七日至十七日，縣革委召開四級幹部會議，有十多名機關幹部被一些與會代表在揪鬥遊街後用木棍活活打死。九月十三日，縣人武部負責人段振邦等。以“三代會”名義，在上思中學廣場召開萬人大會，捏造罪名槍殺十二名國家幹部和群眾，引起各公社和農村再次亂殺人。除此前“枯那事件”導致九百七十三名慘遭殺害的人以外，又有數百人被殺，全縣殺害的有一千七百零二人。

大廠礦務局位於廣西南丹縣境內，是一個國營大礦山企業。文革中礦務局和下屬各礦山也分成了“聯指”和“四·二二”兩大派。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大廠礦務局“聯指”派聯合南丹縣“聯指”對該局“四·二二”派各據點實施武力圍剿，誣稱“四·二二”是“反革命”，一舉攻破“四·二二”的各個據點，抓捕大批“四·二二”人員，

其中有七十多人被打死，僅拉麼礦就被打死了四十七人。該局的副局長尚光等領導幹部也慘遭殺害。

陸川縣僅陸川中學在《七·三佈告》下達後就殺了十一名教師。未廠中學僅有二十二名教職員工就有七人被殺。文革中全縣幹部和群眾被非法殺害了一千五百五十七人。

在都安縣，《六·一七公告》和《七·三佈告》下達後，七月三十一日縣革委召開常委會議，佈置落實《七·三佈告》和清查所謂“反共救國團”等反動組織，在全縣掀起了對“敵”鬥爭高潮，亂殺之現象遍及全縣，包括縣公安局長和法院院長在內的一千七百一十四人慘遭殺害和被迫害致死。

在柳江縣，六月二十五日縣革委召開常委會議，成立“保紅指揮部”，並與象州、武宣、忻城、柳城等縣建立聯防系統共同圍攻“四·二二”。七月三日至五日縣革委在百朋召開會議，表揚“颱風”較好的百朋、三都等六個區，號召各地把“颱風”颱得更猛，自此全縣亂殺之風更為普遍，殺人的數量由原來的一百六十六人猛增到一千一百八十三人。

在北流縣，為了落實《六·一七公告》和《七·三佈告》，七月八日揪鬥所謂黑班子，七百四十八人被抓，被打致傷四百七十九人，致死三十一人。八月三日，民樂公社都官大隊逼供“反共救國團”，打死十一人，次日，縣城逼供“反共救國團”又打死商店職工二人。同月上旬，新豐區革委一些人以“反共救國團”案誣陷幹部群眾五百多人，二百零五人被打致殘，一百一十二人被打死。文革中該縣被非法殺害七百三十五人。

在博白縣，早在一九六七年的冬天就有一百多名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被殺害。一九六八年的七月底，在貫徹落實中央《七·三佈告》的運動中又有三百三十七名幹部和“四·二二”派人員被殺害。八月二十九日，原副縣長李康峰挨批鬥時被打至重傷，後死於看守所中。九月二十七日，原縣醫院副院長梁展書與妻子潘毓尊（護士

長）因受到衝擊和迫害，走投無路之下，被迫將自己的三個子女殺害，然後兩人自殺身亡。

在昭平縣，早在一九六七年底，該縣的木格、馬江、黃姚等地，就成立了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庭”、“貧下中農鎮反委員會”一類非法組織，召開“公審”大會，有數十名所謂的“四類分子”被殺害。到了一九六八年的五月十六日，“聯指”派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在自治區《六·一七公告》和中央《七·三佈告》下達後，為落實《六·一七公告》和《七·三佈告》，全縣颳起“紅色風暴”，“四·二二”派和支持“四·二二”派的幹部、“四類分子”等一千零一十人被非法拘捕，有七百七十四人慘遭殺害。

臨桂縣從一九六八年五月就出現亂殺人了。早在五月初時，縣武裝部部長、革委會主任龍鳳山就以“抓革命、促生產會議”之名召開幹部大會，龍在會上說：“要抓階級鬥爭，開展‘七清’和‘三保衛’運動，縣和各公社都要成立‘保衛紅色政權’指揮部，狠狠地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在龍鳳山的煽動下，全縣各公社、大隊亂殺人之風興起。這段時間，南邊山公社有莫光華等十八人遭殺害；六塘公社“四·二二”派“農總”負責人白先玉、李明久等十三人遭殺害；廟嶺公社水口大隊文接風、茶洞公社花嶺大隊參加過抗美援朝志願軍復退軍人李平和社員褚火連、褚逃福，保甯公社廖振軍、莫喜三等人遭殺害；農業局幹部李瑾科、謝崇晉、四塘中學學生彭昌林等人也慘遭殺害。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七日“區革籌”和廣西軍區的《六·一七公告》發佈後，為貫徹這個公告，六月二十三日，龍鳳山等領導人到五通公社會又進一步地煽動殺人。他在會上說：“對階級敵人不能手軟，要穩准狠地打擊他們，要颳‘十二級颱風’”。“搞階級鬥爭哪有不死人的？上面講現在死人還不算多，現在死這麼一點人，沒有過去一個戰役死的人多，還比不上一場瘟疫。為了革命，死幾個人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在龍鳳山的煽動下，僅五通區在六月二十九日的群眾大會上，上海下放來的藥劑師丁志瑜（一九五七年曾被劃為右派）、以及李秀亮、於仁龍、

肖德旺、黃勳等十三人慘遭殺害。

七月和八月，工交辦主任蔣善忠、林業局副局長盧定宣、供銷社教導員劉一峰、縣農業局幹部李源森等人在“聯指”頭目胥明德指揮下被推下河溺死。其後縣委副書記李瑾科、副縣長周克仁、縣委常委、法院院長劉錫臣、檢察院副檢察長龍炎雲、工會幹部李志輝等領導幹部以及臨桂中學學生謝務咎等人均在胥明德的直接指揮下被殺害。

另一名“聯指”頭目、縣革委會常委韋英豪，從一九六八年六月至九月，親自指揮殺害幹部、群眾二百九十人（有縣級幹部七名，區級幹部八人），其中一次就集體槍殺幹部、職工達十八人，是一名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

從一九六八年六月五日至九月二十六日，胥明德親手策劃佈置、親自決定和組織指揮，殺害幹部、群眾七十七人，其中科級以上領導幹部十三人，一般幹部十六人，教師四人，醫師三人，學生六人，工人五人。夫妻雙雙被殺的有八對。真乃二十世紀的殺人魔王。

該縣從一九六八年的元月至十月共殺害了二千零五十人，是廣西的文革重災區之一。

全州縣於七月八日召開貫徹執行《七·三佈告》誓師大會，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就殺了一千一百多人。面對大量殺人的事件，縣革委會主任竟在領導幹部的會議上說：“現在農村殺人比較多，要看得慣，領導要站在運動的前頭”。從七月到十二月，各公社先後成立所謂“貧下中農法庭”，有八百五十多名所謂“四類分子”及他們的子女被槍殺，有的全家被殺絕。文革中共有“四·二二”派成員及“四類分子”二千一百五十六人慘遭殺害。

在桂林市，《八·二〇公告》及其行動，使“老多”的組織被壓垮。大批的人員及無辜群眾被抓、被打，“聯指”派開始了瘋狂的報復。八月二十九日，市革委副主任、武裝部政委陳秉德在工人電影院召開市直機關幹部大會，號召全市立即行動起來，向一小撮“階級敵人”大颶“十二級颱風”。在陳秉德的指令下，從八月三十日起全市開始了大遊

鬥、大屠殺。

在八月三十日的遊鬥中，染織廠副廠長陳華、體委教練汪成竹被活活打死，首開桂林市遊鬥打死人的紀錄。

九月一日開始，市革委會在師院把桂林地、市造反大軍中的一些骨幹分子許瑞林、鄧鐵橋、魯鶴松、于文傑、張樹枝、鄧井發（專署農委幹部）、諸國軍（專署外貿局幹部）等十二人以“混進群眾組織裏的階級敵人”之罪名進行活人展覽，組織群眾參觀。

九月二日，許正義（市監委副書記）、邵永清（監委委員）、王仁武（經委副主任）、藍宗貞（財政局長）、崔耀華（財辦副主任）、郭文剛（文化局副局長）等人在遊鬥中均被打傷，有的致殘。

九月三日，著名演員黃婉秋被遊鬥；冶專的“老多”負責人黃宗器、蒙木生、楊正文等一大批人被遊鬥，多人被打傷。

九月四日，專區食品公司的“聯指”把本單位的“老多”負責人及骨幹成員遊鬥，當遊鬥車開到北門食雜倉庫門口時，遇上興安縣“保紅指揮部”組織來桂林收屍（武鬥中被打死）的一批人，他們不問情由，手持木棍、石頭，爬上汽車向被遊的人亂打，邊打邊喊：“打死這些國民黨殘渣餘孽”，“為親人報仇”。此時，興安中學學生蔣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槍朝著被遊鬥的對象連續開槍射擊，直至打完彈殼內的七發子彈為止，“老多”成員林偉（公司業務員）、張少鈞（統計員）、蘇秋楓、王修潔（業務員）、馬洪光（物價員）、黎光錄（統計員）六人被殺害。

九月十三日下午，市建二〇一工區在樂群小學操場召開批鬥會，“聯指”頭目李良佑、陽春輝等人指揮下，把該單位的“老多”成員肖菊生、鎖成林、段輝余、李文祿、胡際生、粟定芬等六人殺害。

九月十五日，市郊區雁山“聯指”頭目秦宗德、文華均等人，經請示雁山公社武裝部長萬春橋同意，召開批鬥大會，會後槍殺了“老多”成員吳全仲（植物研究所食堂管理員）、騰秀山（植物所技術員）、馬崇義（實習員）、秦繼成（工人）、孫慶柳（師院學生）、白勝山（桂

林地區勞動大學學生)等六人。

從《八·二〇公告》開始的一個多月時間內，桂林市內各單位和街道、郊區各大隊，“老多”派的成員、支持過“老多”的幹部及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被打死和迫害致死者三百四十五人，這和廣西各地及桂林各縣相比，死人是最少的了。

由於廣西各地、市、縣的革命委員會和軍分區、武裝部在貫徹落實《七·三佈告》的過程中，肆意歪曲《七·三佈告》的精神，執行韋國清、廣西軍區負責人的指示和部署，由“聯指”出面，對不同觀點的幹部、群眾冠以“土匪、反共救國團、暗殺團、叛徒、特務”等等莫須有的罪名進行鎮壓，亂抓、亂殺，名曰“貫徹落實《六·一七公告》和《七·三佈告》”。自七月初至八月二十六日廣西區革委會成立的一個多月時間裏，據不完全統計，全廣西共殺害和迫害致死的約八萬四千多人。加上《七·三佈告》前各地共殺害的數萬人，總計殺害的人數在十萬人以上。真乃殺人之多，全國之冠；殺人手段之殘忍，歷史罕見。

大屠殺給韋國清及“聯指”派帶來了大勝利。“四·二二”被消滅了，桂林“老多”不存在了。消滅“四·二二”建立革委會的預期目標已經達到了，他們笑到了最後，勝利最終屬於他們。回想起一九六六年底和一九六七初受“老多”和南寧的造反派的批判和遊鬥，韋國清的心中好不是滋味。今天，“老多”和“四·二二”都完蛋了，怎由得他不高興呢？心想自己“一生跟毛主席幹革命，出生入死，是真正的革命派”；“‘老多’和‘四·二二’算什麼東西，伍晉南、賀希明這些人算什麼東西，竟敢要打倒我，與我作對，反對我的人決不能給他有好的下場。”想著、想著，韋國清不免發出了一絲奸笑，更充滿了對“老多”和“四·二二”的仇恨，更充滿了對伍晉南、賀希明等人的仇恨。

也就是在最後消滅桂林“老多”的日子裏，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批准了廣西區革籌小組關於成立廣西區革命委員會的報告，這對韋國清及“聯指”派確實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

中央在批復中指出：“中央同意韋國清任革委會主任，歐治富等十二位同志任副主任”。“中央熱烈祝賀廣西僮（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在激烈複雜的階級鬥爭的凱歌中勝利誕生。這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和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央關於解決廣西問題的決定相比，那一次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被迫交出了檢討，向“四·二二”和桂林“老多”承認錯誤，至今心中尚充滿了仇恨。這一次中央的決定則不大一樣了，“四·二二”和“老多”都被消滅了，這全靠他們向中央謊報軍情，全靠有黃永勝在中央為他們說話。區革委會要成立了！想到這些，韋國清及“聯指”頭頭們的心中更充滿了喜悅。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廣西區革委會正式成立，南寧及廣西各地、市、縣都同時召開慶祝大會，慶祝韋國清及“聯指”派的偉大的勝利。

此時，許多“四·二二”及“老多”的人，那些支持“四·二二”和“老多”的領導幹部，還有所謂的“五類分子”，有的肉體已被“聯指”消滅，還有大批被關押在收容所和監獄中備受折磨而在痛苦呻吟，更有無數死難者的親屬還在熱淚盈眶，悲痛欲絕。可以說，這個革委會是踏在無數的屍體上建立的。有人歡喜有人愁。喜的是韋國清及“聯指”的頭頭們，愁的是無數被關押的人們和無數死難者的親屬們。

在慶祝廣西區革委會成立的大會上，韋國清發表了重要講話，特別強調要狠狠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要把“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以及“地、富、反、壞、右”分子批倒、批臭、鬥倒、鬥臭，要肅清“國民黨殘渣餘孽”。伴隨著《七·三佈告》的貫徹，廣西日報《向一小撮階級敵人大飈十二級颱風》多篇社論的發表，在大規模殺人的基礎上，對未被殺害仍然活著的支持過“四·二二”和桂林“老多”的幹部及大小頭目的大揭發、大批鬥的高潮到來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區革委下令大批鬥 冤假錯案遍及廣西

話說一九六八年初以來，廣西許多地方出現亂殺人的事件。“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六·一七公告》和中央《七·三佈告》下達後，由七月初至九月中旬，近兩個多月的時間是殺人的高潮期，每個縣、每個城市都在亂殺人，殺人總數初步估計最少在八萬人以上。直至此時，韋國清、廣西軍區負責人等人似乎也感到殺人太多了，對他們的名聲會有不好的影響。於是在一九六八年的九月初發出通知，禁止亂抓人、亂殺人。雖然為時已晚，但總比不禁止要好。

然而，就在禁止亂抓人、亂殺人的通知下發後，一些地方卻仍然在殺人。如賓陽縣，本來從一九六八年初以來就殺害了三千九百五十一人；現在禁止亂殺人的通知下來了，該縣的當權者卻一面佈置不要亂殺人，一面又說群眾要求殺的壞人也可以殺，使亂殺人事件在該縣是禁而不止。

在臨桂縣，禁止亂殺人的通知下達後，在軍管會看守所關押的“四·二二”人員和其他幹部群眾不斷的被拉出去批鬥，隨之殺害，無人過問。至於農村的亂殺人事件更是時有發生。

還有一些縣在接到不准亂殺人的通知後，不及時通知下面照辦，而是通知下面（口頭通知、電話通知，不准記錄），“要殺的人就快殺，過幾天要收繳民兵的槍支，禁止殺人了”。如此這般的通知，又使許多無辜的生命慘遭殺戮。如平樂縣、上林縣、鳳山縣、羅城縣、興安縣等許多地方就是這麼幹的。

在宣山縣，一九六八年六月至九月期間共有九百二十一人慘遭殺害。一九六八年八月十日，縣革委印發《關於嚴禁亂打、亂殺人情

況的通報》下發後，縣內亂殺人事件仍有發生，一九六八年九月至一九七六年間，全縣被打死、逼死者達二百五十四人，是廣西亂殺人延續時間最長的一個縣。

到了一九六八年的九月中旬以後，由於各方面的反映太大了，特別是廣東的西江流域沿岸，許多死屍流往他們那裏，污染了水源，他們的意見很大。因為廣西各地的亂殺人，大多數把屍體推下河了事，而廣西的河流多經梧州流入廣東的。至此，絕大多數地方亂殺人的事件慢慢停止了。

隨著亂殺人事件的結束，接踵而來的是對那些沒有被殺的“四·二二”人員和支持過“四·二二”的領導幹部進行大批大鬥，清理階級隊伍，深挖隱藏的階級敵人，徹底清算“伍修集團”的“反革命”罪行。為此，韋國清少不了要作動員報告，並指令區革委會成立鬥批改領導小組，指導全區各地運動的進行。一場聲勢浩大的揭發批鬥運動在全廣西開展起來了。

運動首先在南寧展開，以便給全區各地作出榜樣。《廣西日報》在輿論上積極配合，搖旗吶喊，配合各地運動的開展。

八月二十九日，區革委會舉行第一次全體委員（擴大）會議，會議中心議題是“務必不要鬆懈自己的警惕性，要牢牢掌握階級鬥爭的主動權，同一小撮‘階級敵人’開展針鋒相對的鬥爭，狠狠打擊他們的反革命破壞活動，徹底粉碎他們翻案復辟的罪惡陰謀”。

九月六日至九日，區革委會又連續召開全體委員（擴大）會議，連續批鬥所謂中國赫魯雪夫在廣西的代理人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

在南寧，從一九六八年九月中旬開始，多次召開聲勢浩大的批鬥大會，把“伍修集團”的主要成員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等人押到臺上批鬥，台下則站滿了自治區、南寧市支持過“四·二二”的幹部和“四·二二”大小頭目作為陪鬥。伍晉南沒有出現在批鬥會場，也許是因為中央未點伍晉南的名，他還是區革委會的常委，使

韋國清有所顧慮，伍晉南才免於到大會上接受批鬥。

批鬥會開始，首先是歷數賀希明等主要成員的歷史檔案材料，當然是歪曲了的材料。然後則是捏造事實，揭發所謂的“伍修集團”在廣西的三條黑線：其一是以賀希明為代表的國民黨殘渣餘孽；其二是以霍泛、傅雨田、謝王崗為代表的叛徒、特務集團；其三是所謂“王、關、戚”反黨集團。伍晉南利用這三條黑線企圖“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全面復辟資本主義”。所有這些集團的成員，都是當時廣西區和各地區的黨、政幹部，如工交口的江平秋（區經委主任）、程曙天（區經委副主任）、李德觀（區經委副主任）、呂集義（交通廳副廳長）、王漢昭（建工局副局長），黨群口的林克武（區人委秘書長）、鐘侖（區總工會主席）、莫一帆（區政協秘書長），政法口的農康（區人委副秘書長）、楊德華（原高級法院院長）、吳洪寧（高級法院院長），計劃口的楊明（區計委主任），農林口的謝東來（農業廳長，後調科委主任）、吳啟增（區農科院副院長），財貿口的駱明（區財委副主任）、馬鴻祥（區財辦主任），文教口的葉培（廣西醫學院院長）、岳平（區文化局副局長）、滿謙子（藝術學院院長），還有自治區副主席李任仁，南寧地委書記甘懷勳，百色地委書記鄭少東，玉林地委書記韋樹輝，南寧市副市長黃夢醒，柳州鐵路局黨委書記張炎，桂林地區專員吳騰芳，桂林市委書記王同連，區黨委常委段遠鐘、尚持、李殷丹，區黨委直屬機關副書記張青棟等一大批領導幹部。這些人在文革之初本來是站在韋國清一邊鎮壓革命造反派的，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革命”後，他們站出來亮相支持造反派，就成了“叛徒、特務、國民黨殘渣餘孽、反黨集團急先鋒”，“四·二二”的黑高參，真乃令人啼笑皆非。這些人支持“造反派”就被誣稱為“瘋狂地進行反革命奪權”，不同意支持韋國清站出來“三結合”就被誣為“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反黨亂軍、陰謀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本來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廣西軍區和韋國清已向中央檢討承認了錯誤的東西，現在又反過來是“正確”的東西了，並且又成了伍晉南等人的“罪狀”，天下真有如此不要臉的人才說得出不要臉的話。

所謂的批鬥會，完全是一言堂，一派胡言。除了空喊口號外，絕無什麼事實根據。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韋國清及“聯指”們是很會玩弄手法的，被他們抓起來批鬥的人就休想逃過劫難，也絕不容許有任何申辯，只有在“聯指”們的口號聲中“低頭認罪”。

南寧開了批鬥大會，給各地樹立了榜樣，各地才好仿效，也召開同樣的批鬥大會，把“伍修集團”的成員押到各地輪番批鬥，以推動各地運動的開展。如：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都安縣體育場召開萬人批鬥大會；一九六九年一月六日在武鳴縣召開五萬多人批鬥大會（隆安、邕寧、馬山等縣派人參加）；一九六九年一月十九日在荔浦縣召開數萬人批鬥大會（平樂、恭城、陽朔等縣派人參加）；一九六九年二月一日，在靖西縣公園體育場召開十三萬人批鬥大會（那坡、德保等縣派人參加）；一九六九年二月四日，凌雲、樂業兩縣召開萬人批鬥大會；一九六九年二月初，欽州市召開萬人批鬥大會；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三日，田東、田陽、平果等三縣在平果縣城召開數萬人批鬥大會；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廉州中學操場召開了萬人批鬥大會；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五日，桂平縣召開萬人批鬥大會；一九六九年三月下旬，在八步飛機場召開十三萬人批鬥大會；一九六九年四月三日，在昭平中學運動場召開八萬人批鬥大會；一九六九年四月五日，在鐘山縣召開萬人批鬥大會；一九六九年四月七日，在富川縣召開八萬多人批鬥大會。以上各次的批鬥大會，其聲勢之浩大都是空前的。每次批鬥大會都把韋國清和“聯指”要打倒的賀希明、霍泛、傅爾田、謝王崗、袁家柯等人押到會場上批鬥，各地那些支持過“四·二二”派的黨政領導幹部及“四·二二”派頭頭都被押到會場陪鬥。這些領導人大多年事已高，連續不斷的在各地輪番批鬥，使他們的身心備受磨難，人格受到侮辱，好不令人心酸難過。而韋國清及“聯指”頭頭們則是心花怒放，好不得意。

在對所謂“伍修集團”展開大批大鬥的同時，各地各單位也跟著聯繫本地的實際開展了大批鬥和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那些沒有被殺害

的“四·二二”和“老多”派的頭頭、骨幹成員，那些支持過“四·二二”的領導幹部，還有文革中從未亂說亂動的所謂“四類分子”，他們都會成為各種批鬥會的活靶子。

特別是在九月九日，區革委會、廣西軍區公佈了所謂《關於廣西“四·二二”農總寧明地區分部的反革命罪行公告》說，“破獲了反動組織廣西‘四·二二’農總寧明地區上石分部，農總上石分部設作戰部、組織部、宣傳部、後勤部，下屬十七個分團，一個武裝連，農總分部共二百四十人。經常活動有一百四十三人，是一個‘反革命’組織”。製造這個冤假錯案，對當時全區各地採取高壓手段壓制那些尚未被殺害而活著的“四·二二”帶來重大的影響，“四·二二”就等同於“反革命”。

經過各級的大揭發、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許許多多的人被打成“叛徒、特務、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一些人則被誣稱為“反共救國團”、“暗殺團”、“反黨亂軍分子”。在批鬥中有少數人被折磨致死，一些人則被送進監獄一關就是多年。多數人則是在本單位勞動改造，由群眾專政。所有這些事實證明都是冤假錯案，是韋國清與“聯指”頭頭們胡作非為、憑空捏造的罪名加害於人的。雖然這些人未被殺害而保存了生命，但是在所謂的群眾專政下，他們過著備受折磨的非人生活。這千古奇冤的牢獄之災，何日才是盡頭呢？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清查運動又起狂潮 造反骨幹再次遭殃

話說一九六九年的元旦，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聯合發表的元旦社論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毛澤東說：“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誤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對那些已經認識並決心改正錯誤的人。“要及時解放他們”。毛澤東也許看到了全國被整、被抓的人太多了，批鬥擴大化了，運動要收一收了。特別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要打倒劉少奇一夥，這個目的已經達到了，而且中共的“九大”即將要召開，全國應有一個安靜平和的局面，故而毛澤東急於發表這些講話。在這種形勢下，廣西各地揭發批判運動已逐步進入尾聲，一些被關押的“四·二二”頭目和支持他們的領導幹部，經過多次的揭發和批判以後，也沒有發現什麼新的問題，批來批去還是所謂的“打韋、反軍、反對新生的紅色政權”，“聯指”們本身也覺得聽煩了，沒有什麼新東西了。就這樣，他們要緊跟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各單位就宣佈“解放”一部分人，但還得警告他們，出去以後不准亂說亂動，好好改造，這些被“解放”了的人身是恢復了自由，然而仍是處在暗中監視之中，幹部仍然是靠邊站。只做一般的事務工作罷了。不管怎樣，這些人總算逃出了牢籠，過著人的生活了。

“解放”一批人，但仍有不少人被關在監獄或者在本單位由群眾監督勞動。這些人多是“四·二二”和“老多”的主要頭目和支持他們的領導幹部。對這些人，“聯指”們不放心讓他們出來，還須進一步的內查外調來審查。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中央召開“九大”，全國掀起了慶祝“九大”的熱潮，也同時掀起了批判劉少奇的高潮。在廣西則主要是批判劉少奇

的“代理人”伍晉南、賀希明等人。但這種批判也多是造聲勢，老調重彈，人們沒有什麼新鮮感了。故而各種批鬥會也只是流於形式罷了。

到了一九七〇年全國範圍內開展打“一打三反”運動。在這期間，廣西也比較平靜，因為“四·二二”和“老多”的頭目們或則被殺，或則被關，放出來的又沒有什麼新的“罪行”。故而這次運動沒有整到他們的頭上，才使得廣西較為平靜罷了。

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轉眼到了一九七一年，一場清查“五·一六”的運動在全國展開，受其影響，廣西再次出現清查運動的高潮。首當其衝受害的仍然是活著的“老多”和“四·二二”的頭目們。

其實所謂的“五·一六”，在全國並沒有統一的組織，只是在文化革命開始之初在北京個別紅衛兵組織的行為。“五·一六”本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那個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通知》的簡稱，後來，北京成立的諸多紅衛兵組織中有一個以此為名，叫“首都紅衛兵五·一六兵團”。這個組織的成員很少，主要活動是張貼反對周恩來總理的大字報。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人民日報》用三個版面發表了姚文元誣陷陶鑄的長篇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那篇文章公開點了所謂“五·一六”的名。文章說：“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用陶鑄的反革命兩面派的辦法”。“他們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與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

一九七〇年初，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部署抓“五·一六”。很快，抓“五·一六”遍及全國。

廣西的清查“五·一六”的運動在一九七〇年八月八日區革委會就進行了部署，把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間，“四·二二”組織衝擊《廣西日報》、搶劫援越抗美物資、挽留六九八四部隊（當時六九八四部隊在南寧支左，支持“四·二二”派，被黃永勝藉故調走）、演出《南

疆烈火》、“兵管兵訓”等事件，作為“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人和事來清查。此後，清查運動逐步在廣西各地展開，使這一運動成為派性迫害的繼續，把“四·二二”和“老多”的活動當作“五·一六”反革命的陰謀活動來清查。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六日，自治區黨委發出《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廣西的清查運動在各地正式開展。

清查運動在廣西開展起來以後，韋國清們找不到任何“五·一六”在廣西活動的證據就只有搬出他們在一九六八年鎮壓“四·二二”和“老多”用過的手段，把文化革命開始後“四·二二”和“老多”的一系列活動都說是和“五·一六”有關，聳人聽聞地大談什麼“在劉少奇羽翼下的王力、關鋒、戚本禹反黨集團，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把黑手伸向廣西，他們派王荔等黑爪牙打著‘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等報刊記者的身份，甚至打著‘中央文革’的旗號，來進行破壞活動。他們一到廣西就與‘伍修集團’的主要人物伍晉南、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之流勾結在一起，狼狽為奸，結成一股反革命勢力”。他們又重新把“四·二二”和“老多”的所謂“罪行”清算了一遍，諸如什麼“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衝擊軍事機關，搶奪槍支彈藥”，“反對新生的紅色政權”，“組織反共救國團、暗殺團”等。這些老調又搬出來重彈，弄得被整的人們啼笑皆非。而“聯指”在那時所做的一切，不論是衝擊軍事機構，還是搶奪國防倉庫，甚至是殺人放火，在他們看來都成了“革命行動”。

在廣西，清查運動雖然搞不出什麼新的像樣的東西來，但運動還得裝模作樣的搞下去。這可苦了“四·二二”和“老多”的大小頭目們。被關押在監獄的人則繼續關押，要進一步地深入審查，如南寧的曹東峰、朱仁、熊一軍，柳州的白監平、王反修，桂林的劉振林、劉天賞、謝榮傑等人及各縣那些仍被關押的大小頭目就是這樣被進一步的審查。已經“解放”了的頭目，如廣西師院的周兆祥、李日明、王剛，以及其他單位的“老多”負責人許瑞林、張雄飛、龔志明、蒙木生、楊正文、

張寶義以及廣西各縣的那些“四·二二”大大小小的頭目，此時又被重新隔離不准自由活動，大會批鬥，小會名曰辦“學習班”，實則派人在輪流搞逼供，連續幾個月的審查，使被審查者苦不堪言。好在這一次並沒有亂殺人，比起一九六八年的鎮壓真是不幸之萬幸了。只是這些被審查的人們身心備受折磨罷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摔死在蒙古國的溫都爾罕。林彪一死，林彪死黨黃永勝等一批人也跟著完蛋了，清查“五·一六”運動也就有頭無尾的收場了。在廣西，被清查的人沒有作任何結論，無聲無息中他們自由了。

時光猶如流水，轉眼進入了一九七四年。這一年北京又出現了新的運動，廣西當然也受其影響。然而此時的“老多”人開始了反擊，揭露一九六八年的“八·二〇”行動，這可惹惱了韋國清，他們又一次施展了手中的權力。再一次把敢於與他們對抗的人打成反革命。有分教、山城桂林大字報又抬頭，韋國清下令緊急鎮壓。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批林批孔又批韋祖珍 桂林老多揭批八二〇

一九七四年，“批孔批林”運動即在全國展開。

“批林批孔”之風飈到廣西，韋國清這些當權者當然是惟命是從，很快廣西的“批林批孔”運動也全面展開。不但“批林批孔”，大講“儒法鬥爭”，並且要結合廣西的實際批判韋祖珍。

韋祖珍本是福州軍區副政委，一九七一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後被調到廣西工作，擔任區黨委副書記，協助韋國清工作。韋祖珍也是廣西東蘭縣人，與韋國清是老鄉，早年一起投靠紅軍參加革命。照理說有老鄉回來共事，應該是合作得很好的。然而韋國清是一個心胸狹窄、容不得人的小肚雞腸。韋祖珍回廣西後，深入基層，聯繫群眾，曾到全區五個地區、兩個市、三十七個縣和區直一些單位做調查研究，對實際工作中的缺點和問題進行了中肯坦率的批評。他的人際關係好，與身邊工作人員相處得很好，一次他們乘車到基層考察時，看到一群人在水中摸魚，韋祖珍就開玩笑說：“這就是渾水摸魚”。又一次談到廣西解放以來的變化時，韋祖珍說：“還是老祖宗的辦法種田，烏龜爬沙，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要說有什麼變化的話，就是我家門前那幾棵大樹砍掉了”。這些話傳到韋國清的耳裏，他感到十分不是滋味，這不是“否定自己在廣西多年的工作嗎”？韋祖珍的出色工作，對廣西工作的意見，遭到了韋國清的嫉妒和憤恨，因而千方百計地想搞掉韋祖珍。

機會終於來了。借“批林批孔”之機，把韋祖珍整下去，豈不是兩全其美。為此韋國清急忙召開會議，作動員報告，區直機關率先“批林批孔”，並結合廣西實際揭批韋祖珍。學習江青的一套辦法，也叫人整理一份韋祖珍在廣西各地的講話材料（摘要），印發給全廣西供批判

使用。“批林批孔”批韋祖珍，成了廣西的頭等政治任務。

一九七四年四月中旬至五月底，自治區黨委在全區範圍內多次批判韋祖珍。四月十七日，自治區機關黨委召開“批林批孔”大會，深入揭發批判韋祖珍的“反革命”罪行。嗣後，南寧、百色、玉林、桂林、河池、欽州、梧州的地、市相繼召開“深揭狠批韋祖珍”大會，“口誅筆伐”韋祖珍遍及廣西城鄉。五月下旬，在自治區黨委召開的擴大會議上，給韋祖珍戴上“上了林彪反黨集團賊船”、“來廣西進行反革命奪權”、“全盤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績，惡毒咒罵、醜化廣大幹部、群眾”等帽子。完全和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批判“伍、賀、霍、傅、謝、袁”的伎倆如出一轍，是韋國清的慣用手段。

儘管韋國清們喊得震天價響要“批林批孔”批韋祖珍，《廣西日報》也在輿論上配合，但在老百姓中卻沒有什麼反響，有的只是跟著走過場罷了。因為此時的人們對這種批判運動早已司空見慣、習以為常，沒有什麼新鮮感了。然而此時的桂林。由於少數人借此運動之機，寫出了不少揭批一九六八年“八·二〇”行動的大字報，貼到了桂林的大街上，倒是把個冷清的桂林鬧得翻騰了，當權者們更是被嚇出了一身冷汗。

一九六八年的八月二十日，桂林地、市革委會和桂林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聯合發出《八·二〇公告》，組織“聯指”武鬥人員上萬人，對手無寸鐵的桂林“老多”實行大搜捕，致使“老多”數千人被抓，許多人被打，三百四十五人被殺害。這一行動由桂林市區波及到桂林地區十二個縣，使各縣城和農村再次掀起了殺人的狂潮，有近萬人慘遭殺害，真乃慘絕人寰的大慘案。當年的“老多”人被鎮壓下去了，但一些活下來的“老多”人的心裏是永遠不會忘記這個“八·二〇”的。乘此“批林批孔”之機，活了下來的“老多”骨幹成員張雄飛、許瑞林、黃錦祥、龔志明、李新、陳體鬱等一批人站出來，發揚“老多”人當年大無畏的造反精神，勇敢地站出來寫大字報揭發批判《八·二〇公告》及其行動，大字報列舉了許多被迫害和被非法殺害的幹部，“老多”成員及所謂“地、富、反、壞、右”等具體的人名。這些大字報在桂林的大

街上出現，立即招來了許多群眾的圍觀。人們在認真的爭看大字報，深深地為大字報的內容吸引，也深深地為之感動，對無數被抓、被打、被殺害的人表示同情和惋惜，對打人及殺人兇手和幕後指揮者、策劃者表示無比的憤怒和仇恨。《八·二〇公告》是一道殺人的動員令，《八·二〇公告》及其他策劃者韋國清、景伯承、陳秉德之流早已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桂林的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血腥的恐怖日子。“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八·二〇公告》及其他行動永遠是遺臭萬年的歷史恥辱。

張雄飛、許瑞林、李新等人的大字報，在全市各單位和廣大市民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獲得了一片喝彩之聲；同時也引起了桂林及廣西的當權者陳秉德、鐘楓（新上任的市委書記）、韋國清等人的恐慌。他們心想：“現在桂林竟還有如此大膽不怕的人，敢來如此反對我們”，“這些人在一九六八年颶飈風時為什麼沒有斬草除根殺掉呢？”面對桂林如此嚴重的情況，韋國清當即責令鐘楓、陳秉德等桂林的領導人，必須立即部署清查和鎮壓。他們把桂林的大字報事件定為“反革命”事件，由區黨委主管報公安部備案，區公安廳派人參加，市委書記鐘楓掛帥，管政法的副書記潘樹彬具體負責，市公安局副局长吳務群協助，成立專案組具體辦理。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先後拘捕了彭富森、許瑞林、龔志明、黃偉祥、李和平、周述耀、張雄飛、李新、劉玉生、賴東榮、潘文元、陳體郁、牛建良、楊炎玲、楊德華、魯鶴松、劉重喜、張樹枝、唐兆煊、莫汝、陽文生、湯其新、孔憲才等二十三人。同時在全市各單位及街道組織領導和群眾開會，強制每一個人都要表態，聲明《八·二〇公告》“好”，“八·二〇”是“革命行動”。其後對龔志明、張雄飛、許瑞林、黃錦祥等十八人由法院分別判處死緩、無期和有期徒刑。這一切實在是韋國清、鐘楓等人卑鄙惡劣的醜惡表演。

韋國清們在一九六八年殺了人還不許人講話，誰敢於發表不同意見，他們就要鎮壓，獨裁專制到了何種地步。原來被打死的人還沒有平反昭雪，被關押的人尚未解放，現在又在抓人，公理何在？正義何在？

冤死的人們何日雪恨，那些還活著的但仍在受迫害的人們何日才能重見天日？俗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血淚控訴悲憤交集 殺人兇手逍遙法外

話說桂林揭批“八·二〇”的舉動被打壓下去了，張雄飛、許瑞林、李新等人被當成現行“反革命”而遭到逮捕，轟動一時的山城桂林又趨於平靜。槍打出頭鳥是韋國清的一貫作法，逮捕張雄飛、李新等人的目的在於封住桂林人們的嘴。武力鎮壓能鎖住這些人的身體，暫時封住人們的嘴，但永遠也封鎖不了人們的思想。對“八·二〇”的鎮壓和此次的打壓，桂林人民是永遠不會服的。

轉眼到了一九七五年，“文革”運動已步入尾聲。毛澤東從一九七四年開始重新啟用鄧小平，讓他站出來協助周恩來總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所謂的“第二號走資派”也就無事了。許多老幹部如胡耀邦、趙紫陽等也都重新站出來工作了。他們站出來工作後，面對一片混亂的中國經濟，一九七五年他們採取了整頓的方針，對各行各業大加整頓，以圖發展生產，儘快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無疑鄧小平和胡耀邦等人的設想是對的，但要整頓就必須涉及到“文革”中的許多事和許多人，特別是江青、王洪文及各省的造反派頭頭。整頓就要否定許多人和事。全國許多省、市的造反派頭頭都參加了當地的革委會，都成了整頓的對象。然而在廣西則與全國許多地方截然不同，全國各地都在對造反派大加整頓，廣西則無造反派可整了。因為廣西的造反派早在一九六八年就被韋國清和“聯指”派殲滅了，整頓之風在廣西也就消聲無息。這就是廣西的特殊之處。因為廣西的造反派“四·二二”和桂林“老多”，自文革運動開始後，他們的行動除了符合當時報刊社論和文章的精神外，並未得到過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的支持；相反“聯指”派不但得到了韋國清的支持，也得到了黃永勝和林彪的支持，他們的後臺硬的很，

無怪乎敢於在廣西如此瘋狂。

隨著整頓工作的開展，一股否定“文革”之風潮也隨之而起。鄧小平和胡耀邦等人所做的一切，當然會遭到江青、王洪文等人的反對和抵制，也遭到了毛澤東的批評。江青和毛遠新等人向毛澤東彙報了許多有關鄧小平和胡耀邦否定“文革”之事，毛澤東大為惱火，認為鄧小平和胡耀邦這是“右傾翻案”，毛澤東批示“要反擊右傾翻案風”，一場新的運動也就由此而生。

雖然在廣西沒有造反派可整頓，但當“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在全國颳起時，廣西卻走在了全國的前列，幾乎可以和當時的上海（江青等“四人幫”所控制的地方，全國“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橋頭堡）比美。

從一九七五年冬天開始，“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在全國逐步展開。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總理病逝，全國人民萬分悲痛。從一九七六年的三月下旬以來，北京的許多群眾自發集結於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給周恩來總理送花圈，悼念周恩來。人們所做的一切，實際上是借悼念周總理而把矛頭對著江青等人。此時的毛澤東儘管已臥床不起病入膏肓了，但當他聽到了他的侄子毛遠新彙報了天安門的情況後，對廣場上的人們和鄧小平都十分不滿，竟同意江青一夥對天安門廣場上群眾實行鎮壓。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江青通過當時掌握實際大權的華國鋒下令鎮壓，這就是人們習稱的“四·五”天安門事件。

早在一九七六年的一月十七日，區委宣傳部召開宣傳口黨員副科長以上幹部大會，廖煒雄（區黨委宣傳部負責人、“聯指”派頭目）在大會講話中就搶先公開點名批判鄧小平，說“鄧小平是右傾翻案風的總根子”。

一九七六年《紅旗》雜誌第三期為了配合“批鄧”，刊登了廣西區黨委寫作組署名“桂志”的題名《右傾翻案風與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此後廣西區黨委多次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區直機關、各大專院校、各地、市、縣黨委也跟著照樣辦理，召開黨委擴大會議，點名批判鄧小

平，批判“三項指示為綱”，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高潮在廣西形成。從一九七六年的一月至八月，《廣西日報》刊登“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稿件一千七百三十八篇，區黨委領導人和“聯指”頭目到處講話鼓動人們起來“反擊右傾翻案風”，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病逝，區黨委於九月十日即給江青發唁電，“向江青表示親切的慰問”，極力討好江青。十月六日葉劍英、李先念等一批中共的老幹部利用當時掌權的華國峰、汪東興等人，一舉逮捕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及他們手下的全部幹將。至此，歷經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隨之結束。

一九七六年廣西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廣西的當權者們把第二次抓捕的桂林“老多”骨幹成員張雄飛等人說成是“復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和依靠力量”；一九七六年冬“四人幫”垮臺後，在一九七七年揭批“四人幫”時，又把張雄飛等人說成是“四人幫”反黨集團的組成部分，是“四人幫”的別動隊。一九七七年廣西區黨委發出的三號文件中說：“在批林批孔運動期間發生的桂林那幾個‘反革命’分子挑起事端，是‘四人幫’插手廣西的嚴重‘反革命’事件，是‘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陰謀的一個組成部分”，並在廣西日報登載批判文章。對於廣西區黨委和桂林市委領導人這種“翻雲覆雨”的卑劣伎倆，時而把“老多”的張雄飛等人說成是“右傾翻案，復辟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時而又說成是“四人幫”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時許多的“老多”看後都覺得可笑。這充分反映出這些領導人的內心空虛得很。他們自己也深知一九六八年的“八·二〇”抓人，殺人錯了，但就是不肯認錯，千方百計的封鎖、壓制不許人們講話。實在是可惡至極。

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先後垮臺，“文革”壽終正寢，對毛澤東所發動的“文革”應該反思了。歷史已經證明，十年“文革”是一場大災難，前所未有的大浩劫。“文革”應該從根本上加以否定，“文革”中所發生的一切應該總結和清算，特別是期間的冤假錯案應該平反昭雪，殺人兇

手應該追究法律責任。

“文革”結束了，廣大的人民歡欣鼓舞，特別是那些在“文革”中慘遭迫害的人們，他們更是有一種不同尋常的感情，重見天日的時刻到來了。能不發自內心由衷的高興嗎？

廣西是“文革”的重災區，殺人數量全國最多，殺人手段之殘忍全國罕見，出動部隊鎮壓“造反派”全國首創。此時“文革”結束了，無數死難者的家屬、無數尚在監獄中關押著的人、無數慘遭過迫害的人，他們紛紛的寫申訴材料、上訪，要求平反昭雪，恢復名譽；要求懲辦殺人兇手。然而，這些最起碼的合理要求，廣西的當權者和韋國清（此時雖已調到廣州當廣州軍區政委了，卻仍然可以指揮廣西的一切）卻一概置之不理，千方百計地設置障礙，捂住蓋子，不許人們談及“文革”中打死人之事。

在韋國清等人的阻撓和壓制下，廣西一九六八年的大屠殺事件得不到清查，人們的上訪被拒之門外，申訴材料也石沉大海。一次韋國清到桂林，人們發現了他的車隊就上前圍住申冤，要求給死難和受迫害的人們平反昭雪，懲辦殺人兇手，韋國清卻調動員警驅散人群，溜之大吉不予理睬。人們更加悲憤交加，義憤填膺，對韋國清更充滿了無比的憤恨。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的優良傳統，難道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對此就不適用了嗎？人們百思不得其解。“文革”結束了，在“文革”中把中國搞得烏煙瘴氣、冤假錯案隨處可見的林彪、江青兩個集團垮臺了，清查這兩個集團的種種壞事和平反冤假錯案就成了中國人民的頭等大事。全國各地都開始了平反冤假錯案，給蒙冤受難者昭雪；對那些違法亂紀特別是殺人兇手給予法律的制裁，這是人心所向，是時代的正義要求。然而在廣西卻是按兵不動，豈非天大的怪事。廣西有什麼特殊之處？原來“文革”中廣西所發生的一切，都是因為韋國清而引起的，是他一手造成的；“文革”雖然結束了，但韋國清的勢力仍在當政，如南寧的“聯指”

頭目顏景堂、廖煒雄，桂林的“聯指”頭目曹鐵軍等等，以及各地那些支持“聯指”的領導幹部，廣西許多地方的當權者是靠“文革”起家的，他們仍在臺上。正是這些人，他們或者本身就是殺人兇手，或者是殺人的幕後指揮者、策劃者，他們怎麼能夠自己清理自己，自己把自己抓捕繩之以法呢？

江青集團的垮臺，“文革”之結束，猶如嚴冬過去，春回大地，神州大地一派春意盎然。清理整頓、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追查違法者的法律責任在全國展開，好似一江春水在蕩滌著陰暗的死角，正義的人們無不由衷的高興。然而在廣西，人們是怎麼樣也高興不起來。因為廣西這個死角是景物依舊，人事依然。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廣西的慶父尚在，人民哪有說話的天日，那些冤死的英靈又豈能在九泉之下安寧。仰望蒼天，公理何在？人權何在？人們沉浸在苦苦的思索之中，在等待著、期待著……

尾聲

廣西背後有黑手，這個來了那個走；
一脈相承本同根，全把群眾當阿斗。
當年八桂大屠殺，兇手逍遙未正法；
而今處遺輕帶過，遺恨人間萬世撻。

這首七律意在給廣西的“文革”作一小結。十年“文革”，廣西殺人如麻，震驚神州大地。然而“文革”結束了，由於韋國清仍在阻擾，由於廣西各地仍是支持“聯指”的幹部和“聯指”的頭目在掌權，這些殺人事件始終得不到處理，受難者家屬和受迫害的人無不心急於魂，切齒之恨。面對現實，平民百姓又能有什麼辦法呢？

一九七五年韋國清升遷了，調到廣東當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兼廣東省委書記。韋國清走了，由喬曉光繼任區黨委第一書記。“文革”之前喬曉光就是區黨委的常務書記，“文革”雖然出面不多，但一直是跟韋國清走的，是韋國清手下的人。“文革”期間廣西的大屠殺雖然與他無直接關係，上臺後，他對廣西的大屠殺事件仍是不准揭露，不進行任何處理。只是後來反映的人多了，特別是向中央的反映；有一個武宣縣文化館的幹部，此人原是一個縣的縣委書記，一九五七年反右時被打成右派，眨到了武宣縣文化館當館長。“文革”中他沒有“亂說亂動”而保存了生命，但他耳聞目睹了武宣縣的殺人、吃人肉、吃人肝的慘劇，出於義憤，在“文革”後他寫了不少揭發材料，通過朋友的關係，最後把材料送到了中央。加上許多其他人反映的材料，中央最終知道了廣西“文革”中的大屠殺，並責成廣西處理好這一事件。至此，廣西的黨政當局再也不敢按兵不動了。

鄧小平、胡耀邦等“文革”中被打倒的高級幹部，重新站出來工作，面對當時中國的局面，開始了拔亂反正的工作，否定“兩個凡

人混為一談呢？一九六八年《八·二〇公告》引發的亂殺人（把對方抓到後殺害），特別是桂林地區十二個縣的亂殺人，成百、成千、成萬的亂殺人，這僅僅是“錯誤”嗎？某些領導人為什麼要混淆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呢？這只能說明“文革”的流毒遠未肅清而已。

對於絕大多數的殺人兇手和幕後指揮者未追究刑事責任，千千萬萬死難者家屬們是非常不滿意的。他（她）們失去了親人，內心深處是無比的悲痛。平樂縣金山村的莫祥英老太太已經九十歲了，她怎麼也想不通她的丈夫藍宗爐，一個深受當地百姓愛戴的老中醫，在文革中僅僅是同情“四·二二”的觀點，一九六八年九月十三日被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槍殺。而“文革”結束後的“處遺”又是怎樣的呢？請看當時的平反結果：

平反通知書

莫祥英同志：

藍宗爐在“文化大革命”內亂中，被迫害致死，含冤去世。現根據黨的政策，對強加給藍宗爐的一切不實之詞，一律推倒，給予平反昭雪，恢復政治名譽。

希望家屬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顧全大局，團結一致向前看，積極工作，努力生產，同心同德，為社會主義四化建設作出新貢獻。

特此通知。

平樂縣人民政府（蓋章）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發放“文革”中被害死者喪葬費、撫恤費通知

編號：一二九

莫祥英同志：

你家藍宗爐在“文革”十年內亂中被迫害致死，應予平反昭雪，並表示慰問。現按上級規定，每個死者發給喪葬費一百元，撫恤費一百二十元，共計二百二十元，請查收。希望認真學習，執行黨的三中

全會以來的各項政策，顧全大局，團結一致向前看，努力發展生產，積極勞動致富，為四化作出貢獻。

此致

敬禮

平樂縣人民政府（蓋章）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全廣西各地農村中給死難者的平反通知大概都如此吧！

拿到這樣的通知，莫老太太是悲憤交集，欲哭無淚。因為多年來的眼淚早已流幹了。她始終想不通，人命關天的大事，如此的平反通知和二百二十元的喪葬費、撫恤費就這樣了結了嗎？法律何在？公理何在？為什麼殺害她丈夫的兇手陳樟權和陸明飛、帶人來抓她丈夫的縣衛生局幹部肖焦生、親自參與所謂審問的縣法院院長曾冬梅，他們應承擔什麼樣的法律責任不是十分清楚的嗎？為什麼不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呢？九泉之下的死難者永遠不會瞑目的，死難者遺屬們也是永遠不會心服的。

同莫老太太一樣的千千萬萬死難者家屬，他（她）們有著共同的心願，多麼希望一個民主、自由、法制社會的早日建成，多麼希望能按法律程式來處理“文革”中殺人之事，還死難者一個公道，對殺人者必須繩之以法，這是他（她）們最大的心願。可是，他們的這個心願至今仍未能實現。

一個自由、民主、法制化的國家；一個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富裕的國家，億萬中國人期盼著他的早日實現！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至二〇〇四年二月作
二〇〇五年六月重新修改
二〇〇六年三月再補充修改

附錄一：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七·三”布告》

中央《“七·三”布告》

照辦。

毛澤東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布告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向全面勝利迅猛發展。全國形勢空前大好。廣西壯族自治區和全國一樣，形勢也是一片大好。

但是，最近兩個月來，在廣西柳州、桂林、南寧地區，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及其在廣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和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蒙蔽和欺騙一部分群衆，連續製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第一、破壞鐵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復通車；

第二、膽敢搶劫援越物資，拒不送還；

第三、連續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部隊、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殺傷人民解放軍指戰員；

第四、在中央發出“六·一三”特急電報以後，拒不執行，繼續頑抗。

中央認為，這是一小撮階級敵人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破壞抗美援越鬥爭、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中央相信，廣西兩派革命群衆組織和廣大革命群衆是要革命的。他們對這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反革命罪行是極其不滿的、極其憤慨的。有些人跟著別人幹了壞事，絕大多數是受蒙蔽的。

爲了迅速制止這一小撮階級敵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號召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衆，在廣西革籌的領導下，在人民解放軍駐廣西部隊的支持下，努力實現以下各點：

- 一、立即停止武鬥，拆除工事，撤離據點。首先撤離鐵路交通綫上的各據點。
- 二、無條件地迅速恢復柳州鐵路局全線的鐵路交通運輸，停止一切干擾和串聯，保證運輸暢通。
- 三、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援越物資。
- 四、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
- 五、一切外地人員和倒流城市的下鄉上山青年，應當立即返回本地區、本單位。
- 六、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破壞交通運輸、衝擊監獄、盜竊國家機密、私設電臺等現行反革命分子，必須依法懲辦。

黨的政策歷來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首惡必辦，脣從不問，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兩派群衆組織中的壞人，由兩派群衆各自清理；同時，要把一個組織混進了壞人同這個組織嚴格區分開。

中央相信，一小撮階級敵人製造的反革命事件，只能亂了敵人，鍛煉了群衆。廣西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衆，駐廣西的人民解放軍全體指戰員、廣西廣大革命幹部，一定能够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定地站在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牢牢地掌握革命鬥爭大方向，向階級敵人發動猛烈進攻。這一小撮階級敵人的陰謀必然遭到可耻破產，廣西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會越來越好，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必將在階級鬥爭的凱歌中誕生。

一九六八年七月三日

附錄二：《“八·二零”公告》

最高指示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無論是中國的反動派，或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都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

關於進一步全面落實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

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在向全面迅猛發展。全國形勢空前大好。桂林市和全區、全國一樣，形勢也是一片大好。特別是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指示“照辦”的中央“七·三”布告的光輝指引下，形勢越來越好。

但是，最近三個多月來，在桂林地區，以中國赫魯曉夫為首的黨內最大一小撮走資派及其在廣西和桂林的代理人、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賀希明、霍泛、傅雨田、謝王崗、袁家柯、王同連、吳騰芳、楊德華，桂林地、市造反大軍中的一小撮壞頭頭劉振林、劉天儕、諸葛軍等，以及桂林地、市造反大軍中的一小撮壞人，糾合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和國民黨殘渣餘孽，操縱造反大軍中的一些組織，蒙蔽和欺騙一部分群衆，瘋狂地把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偉大的人民解放軍，指向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指向革命群衆組織和廣大貧下中農，製造了一系列的反革命事件：

- 1、 瘋狂反對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說：“革命委員會好”。而一小撮階級敵人却把地、市革命委

員會誣衊為“派委會”、“騙委會”、“偽委會”、“國民黨南京政府”，並狂叫他們“要掌權”、“要左右桂林形勢”，竭力鼓吹資產階級反動的“多中心論”，惡毒攻擊、反對區革籌和韋國清同志，反對廣西區革命委員會的成立，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

- 2、把矛頭指向偉大的人民解放軍，連續衝擊人民解放軍的機關、部隊，搶奪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殺傷人民解放軍指戰員。
- 3、武裝包圍、襲擊並強行占領桂林軍分區，大搞打、砸、搶、抓；武裝封鎖並連續炮擊一零四部隊，炮擊一八一醫院；在“七·三”布告下達後，多次火力襲擊三零一部隊水塔哨所；打死打傷人民解放軍 XX 名，揚言要踏平空軍、市人武部等駐軍單位，分裂駐桂部隊，並把矛頭指向廣西軍區和廣州軍區，妄圖毀我鋼鐵長城；
- 4、把矛頭直接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公開對抗“七·三”布告的宣傳、張貼和散發。圍攻、射擊駐軍宣傳“七·三”布告的宣傳車和街頭宣傳隊，一次就毆打解放軍宣傳員一百二十一人，搶走宣傳“七·三”布告的廣播器材。公然向散發“七·三”布告飛機開槍射擊。甚至搶走和撕毀布告，誣衊“七·三”布告是假的，是“大毒草”。更不能容忍的是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指示的“照辦”二字上打×，不准喊毛主席萬歲；
- 5、炮擊鐵路橋梁，向我人民解放軍搶修鐵路通信線路的戰士射擊，打死、打傷我軍戰士。在中央三令五申之後，還搜查 45 號列車，直接對抗中央關於恢復正常通車的指示；
- 6、衝擊桂林第三監獄，並非法成立“接管委員會”，奪了軍管小組的權。“七·三”布告下達後他們還繼續製造事端，用武力封鎖我看管分隊和軍管人員，限制進出，斷絕水電供應，搶

走急需的口糧。公然抗拒中央關於立即撤出三監的命令，並謊報情況，欺騙中央，以破壞無產階級專政；

- 7、強占銀行，非法奪中國人民銀行桂林市支行軍管的權。竟于一九六八年六月九日和六月十八日先後發表了《關於對桂林市人民銀行支付現金的緊急通令》和《關於桂林市人民銀行支付工資的第二號緊急通令》，與中央“二·八”通知相對抗；
- 8、炸毀橋梁，斷絕對越校的供應。燒毀百貨倉庫，搶奪陽橋以北、觀音閣以南的所有商店大量物資。並非法免票、免證出售大量布匹、糧食，破壞國家計劃供應，破壞社會主義經濟；
- 9、打傷越校工作人員，炮擊越南學校，製造國際爭端，破壞國際團結；
- 10、製造了“五·一七”等一系列嚴重的政治事件，挑起了大規模的武鬥，私設公堂、抓人、打人、殺害貧下中農，進行階級報復，把矛頭指向廣大革命群衆；
- 11、大搞反革命串聯，制造反革命輿論，極盡造謠之能事。勾結和窩藏外地壞人，拒不執行中央一系列指示，破壞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破壞桂林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以達到其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目的。

這是一小撮階級敵人破壞無產階級專政、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反革命行爲，他們對人民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必須徹底清算。

桂林市廣大革命群衆是要革命的，他們對這一小撮階級敵人的滔天罪行是極其不滿、極其憤慨的。有些人跟著別人幹了壞事，絕大多數是受蒙蔽的。

毛主席教導我們：“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決不甘心于他們的失敗，他們還要作最後的掙扎”。中央的“七·三”布告和“七·二五”講話是對一小撮階級敵人的沉重打擊，宣判了他們的政治死刑。但是，

他們並不甘心失敗，繼續玩弄新的花招。一方面，裝出一副可憐的樣子，也假惺惺地喊幾聲“擁護革命委員會”的口號，而另一方面，却利用各種方式繼續蒙蔽和欺騙一部分群衆，轉移、分散、破壞、私藏和拒絕上交武器，包庇和放走壞人，改頭換面，化整爲零，企圖成立非法的所謂的“工人糾察隊”；制造反革命輿論，大造謠言，繼續加深群衆之間的對立情緒，妄圖東山再起，這是一小撮階級敵人明目張膽地破壞“七·三”布告和“七·二五”講話的反革命罪行。

爲了進一步全面落實“七·三”布告，狠狠地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必須實現以下各點：

- 1、向一小撮階級敵人人發動更加猛烈的進攻。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衆務必不要鬆懈自己的警惕性，立即行動起來，組織強大的工農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向一小撮階級敵人進行不停頓的進攻，給敵人以毀滅性的打擊。
- 2、無條件地、徹底地上交搶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和一切自製殺人武器。不得轉移、分散、破壞和私藏。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 3、徹底地清理外來人員。一切外來人員必須立即到桂林市革委會收容所報到，聽候處理。對拒不報到者，要求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衆，將其扭送到收容所集中審查，嚴防壞人漏網。

黨的政策歷來是：坦白從寬，抗拒從來，首惡必辦，脣從不問，受蒙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

桂林市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工人、貧下中農、桂林駐軍全體指戰員和革命群衆，一定要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以毛主席爲首、林副主席爲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領導下，牢牢掌握革命鬥爭的

大方向，進一步全面落實“七·三”布告，向一小撮階級敵人發動更加猛烈的進攻。希望受蒙蔽的群衆，與一小撮階級敵人劃清界線，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共同對敵，為奪取桂林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而奮勇前進。

桂林專區革命委員會

桂林市革命委員會

中國人民解放軍桂林警備區司令部

政治部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

附文



永遠難忘的苦難歲月 ——我所見到的大躍進與大飢荒

曉明

西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奪取了全國政權。毛為著鞏固其獨裁統治，從一九五〇年開始就在全國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諸如清匪反霸、土改鬥地主、三反五反、肅反、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合作化、反右派等等。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搞亂了中國，害苦了人民，不少人甚至丟了性命。這一切毛澤東還嫌不夠，從一九五八年開始，他又利令智昏，頭腦發熱，企圖使中國“超英趕美”，加速實現“共產主義”。毛澤東要把神州大地當作他的試驗場，把勤勞樸實的中國人民當成他的試驗品。他一聲號令，全中國頓時颳起了“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大煉鋼鐵”的狂風巨浪，把個中國搞得雞犬不寧，百孔千瘡，由此造成連續三年的大饑荒，民不聊生，哀鴻遍野。使中國陷入苦難的深淵。

時間雖然過去四十多年了，每當回憶起那個謊言和荒唐鑄就的歲月，總是使人心裏不能平靜，許多事情仍在發人深省，難以忘懷。

一九五八年我還是一個在校學習的學生。我學的是地質勘探專業，為了加強教學與實踐相結合，學校組織我們到地質勘探隊進行生產實習。六月二十四日，我們二十多個學生到了廣西二〇四地質勘探隊，七月初我所在的小組分配在桂東南普查小組工作。此時正是在共產黨的

八大二次會議之後，毛澤東和黨中央向全國人民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號召，要求人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全國掀起大躍進的高潮，大辦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在毛澤東的號令下，人們多麼地夢想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一九五八年的七月至十月，我們先後在蒼梧、藤縣、岑溪、容縣、北流、平南等縣進行礦產普查工作，親眼目睹了這些地方的大躍進。身臨其境，感慨萬千，但當時的許多問題是無法理解的。

我們的工作主要是到各縣檢查礦點。每到一個縣城，先到縣的工交部門聯繫，再到各鄉鎮農村，流動性是很大的。居無定所，生活也是走到哪裏食宿就在哪裏。由於這樣的工作性質，使我們有機會目睹了各地所發生的許多情況。

七月中下旬和八月初，我們到了蒼梧縣的新地、大坡、古茅；藤縣的金雞、象棋。踏勘了古茅鎢礦和象棋鉛鋅礦，這兩處都是地方民辦的礦山，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開礦。民工們打坑道開採鎢礦，在沖溝邊露天開採鉛鋅礦，勞動強度大，勞動保護條件差，十分艱苦。我們也在礦山吃飯，礦山特意為我們做了一些帶肉的菜，但民工們只是一點青菜，生活十分清苦。我們路過這些地方的農村，看不到多少農民在田間勞動，大部分人都到水利工地上去了，農村中顯得冷冷清清，一片蕭條景象。

八月中旬起，開始到岑溪、容縣、北流等地開展工作。

到岑溪縣後，正趕上《人民日報》八月十三日在頭版頭條報導“湖北省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的消息，同時報導“福建海星社創花生畝產一萬零五百多斤記錄”，這是首次在全國放的水稻和花生的“高產衛星”。這一爆炸性的新聞，立即在岑溪縣的城鎮農村引起巨大的反響。岑溪縣委當即號召全縣人民學習麻城和福建海星，要修改原來的大躍進計劃，自己也要放衛星。該縣原來的計劃是全縣水稻畝產六百斤，向一千二百斤進軍，這一計劃顯然是落後了。

九月十二日，《廣西日報》登了環江縣畝產十三萬斤的消息，並登有三張小孩在禾上面爬來爬去也掉不下來的照片，同時發表社論，區黨委發賀信；九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報導了這一消息。這一大放衛星的消息傳到岑溪，使人們驚呆了，天下真有如此奇跡麼？我的腦海中也產生許多疑問，這有可能嗎？但這是黨報登的，並有照片，黨的領導機關發賀信祝捷，難道黨報會說謊嗎？只有跟著相信。頓時，岑溪縣城鄉歡騰了，人們敲鑼打鼓，呼喊口號，表明自己也要大躍進、大放衛星的決心。大字報、大標語貼滿了許多牆上，“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標語也打出來了。熱烈慶祝和歡呼的場面在城鄉隨處可見。這一切顯然是幹部們組織的，我看到許多農民的臉上顯得茫然，只是跟著喊喊口號而已。

從八月開始，大辦人民公社、大煉鋼鐵開始了。岑溪縣的第一個人民公社是八月二十九日成立的，名叫東方紅人民公社。九月上旬，全縣就實現了政社合一的公社化，共成立十二個人民公社。為了加強組織管理，以軍事化的組織出現，全縣成立十三個民兵團，一百一十一個營，四百一十個連。同時各村屯都成立集體食堂，吃飯不要錢，農民勞動還得報酬，似乎一夜之間就邁入共產社會了。

隨著公社化的實現，真正的大躍進在該縣開始了。此時，正值中共中央提出“鋼鐵元帥升帳”的口號，要求各地大辦鋼鐵，一場前所未有的、聞所未聞的大煉鋼鐵運動在全國展開。岑溪縣委此前主要組織農民搞增產運動和大修水利，現在則還要集中精力搞鋼鐵。為此，縣裏組織二十三萬人投入到大辦鋼鐵中，連中小學生也派上陣了。千軍萬馬上山挖礦，砍樹燒炭，建土高爐。煉鐵和燒炭的基地都是人山人海，熱氣騰騰。我在新圩、筋竹、水汶等所謂的鋼鐵基地，看到許多的男女農民成群結隊而來。他們帶上簡單的行李衣物，帶上勞動工具，帶上糧食和炊具，到指定的工棚或者當地農戶家中住宿。他們大多數人的表情顯得木然，一切按幹部們的指揮而動作。他們所挖的礦石有些赤鐵礦，但大多為含鐵極低的紅色砂岩，也有一些含鐵較低的褐鐵礦石，再就是農民揀

來的廢鐵和砸鍋得來的鐵，投入土高爐中冶煉。當地的官員常叫我們去幫他們看鐵礦點，怎奈這些地區本無好的鐵礦，我們也就無可奈何了。

農民們的勞動雖不十分艱苦，但拖的時間長，我看到許多民工都是無精打采的，一些中小學生在捶著礦石，不久就沉入夢鄉，一不小心把錘頭砸到了自己的腳上。勞動的時間長，也就使人十分疲倦了。民工們飯是有得吃飽的，因為那時吃飯不要錢，雖然沒有什麼菜，但可以放開肚皮吃飯，農民們也就滿足了。

說到吃飯不要錢，我在公路上看到在松毛塔的彩門有這樣一副對聯：“鼓足幹勁生產，放開肚皮吃飯”，足可見當地的大躍進和辦集體食堂的一斑了。

九月下旬，我們到了容縣的六王、縣底檢查了一些礦點。容縣鋼鐵指揮部的領導們叫我們去幫他們看一些鐵礦點，雖然我們知道此處的地質條件不可能有什麼好的鐵礦，盛情難托，只好走馬觀花似的為他們跑了幾個點。所到之處也看到了千軍萬馬在挖礦，砍樹燒炭。據當地領導的介紹，該縣建有爐群十五處，土高爐四百七十七座，足可見該縣大辦鋼鐵的決心之大。

不幾天，我們就到了北流縣。該縣工交辦的領導們非常歡迎我們的到來，他們也成立了一個地質隊正在找鐵礦和在銅石嶺找銅礦。地質隊的負責人是剛到我們學校兩個月短訓班培訓出來的，我們可是校友了，一見面十分熱情。據他介紹，該縣成立了十八個人民公社，出動了十萬人大搞鋼鐵，十一萬人搞後勤。辦了十四個鋼鐵廠，建一千座小高爐。縣裏許多幹部都出來搞鋼鐵了。

我們先後在民安、民樂、新圩等地檢查礦點；在那些煉鐵基地，看到許許多多的民工們在挖礦，在砍樹燒炭。這些所謂的鐵礦石除少許褐鐵礦外，多為含鐵的紅色砂岩，是不可能煉出鐵來的。因燒炭倒是砍了不少樹，許多大樹都被一掃而光。

在民安，我們看到強勞動力都外出大辦鋼鐵或者修水利去了，村中多為老人和小孩，偶爾有幾個壯年勞動力在收割莊稼。這裏的農民喜

歡用一根竹制的大煙袋，裏面放上水，吸煙時發出“呵呵”的響聲，十分有節奏。他們很好客，叫我們抽煙，我們不會，只好謝絕了。在他們的集體食堂，我們看到只有少數勞動的人員就餐，多數為老人和小孩。沒有什麼菜，但飯是足夠吃的。食堂及周圍的環境衛生極差，蒼蠅飛舞、灰塵滿地，看到這些心裏總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中國的農民實在是太艱苦了。

十月中旬，我與一位姓黎的同學離開普查組到了平南縣。到達縣城後，我們先到縣的鋼鐵指揮部聯繫工作，指揮部的領導們十分歡迎我們的到來，給我們介紹了縣裏大辦鋼鐵的情況，希望我們能為他們找到鐵礦點，指導他們開礦。同時給我們開出了介紹信，以便我們到各地便於解決交通和住宿的困難。

平南縣內除縣城至大新一帶較平坦外，大部為山地和丘陵。公路極少，只有縣城到玉林的公路，其他地方多不通車，但水運則較為便利，潯江穿過全境，其次就是靠自行車運輸了。

我們在縣城和盲梧、馬練、思望、丹竹、武林、大安、大新、古和、六際等地奔走，全靠自行車給我們解決交通的困難。這裏的人們自行車技術十分了得，在那崎嶇不平的小路上搭上人也行車自如，我坐在後面都感到害怕了，他們則穩穩地握著車頭從不倒下。坐在自行車的後架上，車子往前行進，兩邊的青山翠竹閃過，倒是別有一番風味。

平南縣此時已全部實現了公社化，各生產隊都成立了集體食堂。現時已有十萬人在挖礦、砍樹燒炭大煉鋼鐵。我在古和鋼鐵基地看到，他們用鈦鐵礦砂和褐鐵礦在煉鐵，民工們日夜不停地守在土高爐旁，熬紅了雙眼。許多人在錘打著礦石，有許多是廢鐵和農民的鐵鍋，打爛後一併投入爐中冶煉。古和是一個大隊，大隊部及周圍農家都住滿了各地來的男女民工，人山人海，熱鬧異常。

大隊部及周圍房屋的牆壁上都有許多大標語，有用毛筆寫在紙上的，也有用紅油漆直接寫在牆上的。“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十五年內趕美超英”，“跑步

進入共產主義”……就些是當時主要的標語口號。

所有來參加鋼鐵會戰的男女民工都是軍事化的組織，一個大隊就是一個民兵營，一個小隊就是一個民兵連。所有各營、連都要開展插紅旗拔白旗的競賽活動。政治思想好、勞動好的就得紅旗，差的就得白旗。一天我看到一個四十多歲的民工被批鬥，不知他是地主還是因為講怪話，不好好勞動，只見其他的民工都在批判鬥爭他。真是勞動競賽也忘不了政治鬥爭。

在丹竹的赤馬，我看到一個中年婦女被繩子綁在大隊部門外的柱子上，幾個看熱鬧的小孩用棍子輕輕的打她。這個婦人含著眼淚在哭泣，似乎有滿腹的冤屈。我問大隊的文書是怎麼回事，文書說這女的在搞腐化。我明白，這女的一定是丈夫去大煉鋼鐵離家時間久了，寂寞難耐，紅杏出牆。但為什麼不見抓男的呢？男的是何許人也，別人都去大躍進了，他卻有閒工夫在家風流。其實就這麼一點男女私情就如此侵犯人的尊嚴和人格，是我們這個社會應該有的麼？

在古和住了兩天，我們就到了六陳，這是一個公社所在地。十月十八日，我看到《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報導：“忻城氣蓋世，日產賽煤都”，報導廣西忻城縣十九小時產煤六十七萬一千噸，放了一顆“煤炭衛星”，並發表《祝賀廣西大捷》的社論，聯繫到前些時的水稻高產衛星、花生高產衛星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衛星”，全國湧現出一片大躍進的熱潮。加上各地那些形形色色的大躍進的口號，在我的頭腦中也引起了極大的振動，受到了鼓舞，也產生了懷疑。作為一個青年學生的我，思想單純，閱歷不深，許多事情難以理解深透。就現實中所見到的這一切，心想社會主義就是這樣的嗎？心裏有許多想法……只是這些想法當時不敢說出來罷了。

十一月初平南的工作結束了，黎同學回到了普查組，我則奉調回大隊部，不幾天就轉到普查分隊的四小隊工作。

四小隊在富川縣朝東岩鷹咀。我一個人離開大隊部，先到鐘山縣城住了一晚，第二天乘車前往富陽（富川縣政府所在地），沿途看到許

多民工前往鐘山的鋼鐵基地和水利工地。在富陽住了一晚，第二天就僱上一輛馬車前往朝東（此段路尚無班車運行）。富陽到朝東數十華里鄉間大道，來往的人十分稀少，沿途的村莊也少見有人，偶爾有幾個老人和小孩在村邊張望，大多數勞動力都去修水利和搞鋼鐵去了。

到達朝東已是下午了。由於朝東到岩鷹咀尚有幾十華里山路，只能在此住上一晚第二天再進山。

趕馬車的農民為我找到一家私人小客棧，只好在此將就一晚了。朝東名為一個小圩鎮，實際上就是一個較大一點的村子。所在位置緊靠湖南，是一片小小的沖積平原，田地較多，土地肥沃，是一個盛產糧食的地方。客棧的老闆告訴我，以往每逢圩日，附近的村民及山裏來的瑤族同胞來這裏趕圩，農副產品和各種山貨是很豐富的，湖南那邊的人也來趕圩，更增加了這裏的熱鬧。只是現如今許多人外出修水利、搞鋼鐵了，才顯得冷清。

晚上這裏沒有什麼玩的，沒有電燈，整個小鎮籠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偶爾可見居民點的煤油燈火露出星點火光。小鎮顯得蕭條，沒有生氣。早早的我就躺到床上去了。我靜靜的躺著，聽到秋風刮起的泥沙打在瓦背上發出沙沙的聲響，不時有耗子出沒的吱吱聲。加上這床大概許久沒有人住，有一股難聞的氣味，使我久久的不能入睡。幾個月來在桂東南幾個縣所見的大躍進和大煉鋼鐵的情景又在我的腦海中浮現。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來，太陽已從東方升起來了。小客棧的主人很好，為我做好了早餐，特意煮了兩個雞蛋，這是十分難得的。早飯後，我付過房費和餐費，等待著山裏普查組來買菜的人員，以便一道進山。近中午時分他們來到了，我與他們一起到集市上買菜。買好菜後，吃過中餐，僱上一個農民挑菜和我的行李，我們離開朝東向岩鷹咀進發了。朝東到岩鷹咀有近三十華里，沿著一條大的沖溝往上游走，都是崎嶇不平的山路。經過了三個多小時的行程，到達時已是下午五時多了。

普查四小隊的同志們對我的到來表示歡迎，安排我住下後，不久就開晚飯。這一餐吃得很香，炊事員是一個湖南師傅，燒的湖南菜我很

愛吃。由於一路行走山路勞累了，晚上我很快沉入夢鄉。

岩鷹咀是瑤族同胞居住的山區，最高山峰海拔一千五百多米，屬都龐嶺山脈的餘脈，普查小隊就在近半山腰瑤族同胞茅草屋旁邊的空地上搭上帳篷居住，與瑤族同胞朝夕相處。

這裏的瑤族同胞屬於過山瑤，即這兩年種這一片山地，過兩年又種另一片山地，類似於原始時代的刀耕火種。種植的作物主要是玉米，在沖溝邊也有少量的梯田可種水稻。他們的飲食主要是吃玉米，打一些油茶，很少有吃大米飯的時候。出門就是爬山，男人們頭上包上頭巾，女人們腳上打綁腿，頭戴特有的瑤族布帽，男女們都穿上土布的衣服，背上一個大竹簍，拿上砍刀上山耕種，比漢族同胞確是落後多了。

由於處在大躍進時期，這裏年青的瑤胞也都去修水利或者砍樹燒炭煉鐵去了。留下來少部分勞動力和老人小孩。他們也辦了集體食堂，每到吃飯的時候，食堂的人就打梆（一種類似竹筒的東西），梆聲清脆悅耳，很遠地方就可以聽到。可憐這些瑤胞們，為了吃這餐飯，有的從對面山上過來，要先下到山底，再過沖溝往這邊山上爬。兩邊山可以看到人，有時大聲講話都可聽到，卻要走上近個小時。我對他們寄予無限的同情，為什麼不因地制宜非得要辦這樣的集體食堂呢？

我們地質隊的生活與他們有天壤之別。每人每月有四十斤糧食，副食品供應當地的供銷部門也會保障，每天都有肉吃。看著身邊的瑤族同胞們的生活，我的心裏感到很不是滋味。毛澤東想要給中國的農民過上幸福的生活，不知何日才能實現。

我們的工作是每天的爬山，進行槽探、爆破和採樣等施工，地質人員則是去指導施工，進行地質編錄和地質填圖。在大躍進的歲月裏，白天上山，晚上有時開會學習，按大隊的指示，地質工作也要大躍進放衛星。為此，各工種就多報完成的工作量，採樣的也不嚴格按照要求行事，以達到多採樣品的目的，就連地質填圖，觀察點也任意多寫，各工種差不多天天放小衛星。但領導上在總結工作時照樣表揚這樣的作法，放衛星原來就是如此這般了。

十二月下旬，這裏連續下了幾天大雪，滿山遍野樹枝上都掛滿了冰雪，一片銀白色的世界，是我從未見過的。以前只聽說北方才有冰天雪地，想不到在南方的山區也銀裝素裹，漫天皆雪，實在是少見的情景。幾天來大雪封山不能出去，我和一位同伴就到一個瑤族老人家玩耍。這位瑤族老人約五十多歲，單身獨戶，他一個人耕種，家裏只有一些玉米棒子。但老人的身體還顯得很健壯，是一個樸實本份的山民，五十多歲了連縣城都未到過。一個人在家打油茶，炒玉米，見我們來了，就請我們喝油茶吃炒玉米，十分熱情。我嘗了一口油茶，很苦，難以下嚥，炒玉米倒是香脆可口。瑤胞們的日常生活就是如此，他們怎樣進入共產社會呢？

普查小隊有一個姓劉的採樣工，湖南人，約四十多歲。此人在抗日戰爭期間，曾參加過國民黨的遠征軍，到過緬甸、印度，在印度受過美軍教官的訓練。他見多識廣，因而平時話語較多，也常愛開點玩笑。我對此人的印象還是較好的。他的工作也是肯幹的，只是有時愛說兩句怪話，在這大躍進的年代裏，為了要抓落後的典型，曾有兩個晚上開會批判他，名曰插紅旗，拔白旗，抓思想鬥爭。看到這些，我思想上感到很不好受。但這種批判會在各地都是較為普遍的，不管什麼單位，總會要找出一些批鬥對象的。

二

一九五九年的三月初，我們的野外實習結束，同學們都回到了學校。離開學校半年多，學校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是招了許多學生，我們五六級只有五百名學生，現在則有二千多學生了。新招收的學生半年多來都在搞勞動沒有上課，學校在九華山建了幾座小高爐煉鋼鐵。幸好我們外出實習，否則在校也少不了整天搞勞動。現在回到學校上課，仍然每週要抽出一天多的時間勞動。

回校上課後，學校組織我們對實習工作進行總結，每個人都要在會上交流，談感想。同學們都把在各地所見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大煉

鋼鐵談了許多見聞和感想，都是讚揚之詞，顯然這都是說的違心話，是那種說假話年代的通病。

一九五九年開春以後，聽說有的農村因缺糧已發生浮腫病人了。但我們生活在城市還感覺不到什麼。特別是國慶十周年時，桂林市區的副食品供應還顯得豐富，街市上裝上許多五顏六色的霓虹燈，人們載歌載舞地狂歡，顯示出市區一片繁榮景象。

然而這種繁榮很快就變了，年底桂林市的各種供應就憑票了。布票、糧票早就實行，現在又增加了糕點票、糖票、自行車票、手錶票，甚至連香煙、肥皂、煤油、火柴都要憑票供應。還要說形勢一片大好，實在使人無法理解。

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會議，會議期間國防部長彭德懷對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提出批評意見，有不少人同情這種意見。僅僅因此，彭德懷與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被毛澤東打成反黨集團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在全國開展了一場反右傾的運動。我們學校的校長王一民也因右傾而受到了批判。原來緊跟王校長，說王校長就“像他親生父母一樣”的校團委書記，此時則成了批判王一民的急先鋒。真是落井下石，什麼樣嘴臉的人都有。對這樣的小人我在心裏十分反感。

當時共產黨所控制的輿論一再為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唱讚歌，聽不得任何批評的意見。作為一個學生，當時我對許多事情尚不明就裏，只是現實中的所見所聞在心裏產生疑惑，因為組織上常教導我們要相信黨，聽黨的話，相信社會主義，對許多問題儘管思想上有看法，但不敢說，也未能往深層次去思考罷了。

很快到了一九六〇年的春節，學校放寒假。我回家了。回到家之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滿目荒涼的景象。村裏許多壯年勞力都還在外面修水庫沒有回來，顯得冷冷清清的。往年在過年前家家戶戶都要忙著做年糕、糍粑、炸油果、打餅子，忙得不可開交，還要準備雞、鴨、魚，殺年豬，準備過年。而今這種景象是看不到了。直到過年前的三天，外

出修水庫的人才陸續回村。

由於當時是集體食堂，也是集體養豬場養的豬。過年了，食堂暫停伙，把糧食分給各家回去自己開伙；年豬也是生產隊殺的，按人頭每人只分得兩斤豬肉，實在是太可憐了。我家還好些，父親是個中醫，多少有些豬肉及副食品之類的東西供應，我作為城裏回來的學生，縣食品公司也供應了一些豬肉，比別的家庭要好多了。

一月二十九日是農曆的正月初一，也就是農民過年之日。以往家家戶戶要燃放許多鞭炮，還要舞龍舞獅，走親戚，是一派熱鬧的景象。而今這一切全沒有了。因為大家連飯都吃不飽，兩斤肉過年，客人來了吃什麼呢？老人們只有昏昏欲睡，兒童們也沒有了往日的嬉鬧聲，大人們或做點什麼家務，或趁機好好睡覺。整個村莊一片蕭瑟。

母親告訴我，上個月工作隊和大隊幹部來過，對各家各戶檢查，查看生產隊和各家是否有隱瞞和私藏了糧食，名曰搞“反瞞產”運動，不但一些生產隊的幹部被批鬥，我的一個嬸娘有幾十斤糧食沒有藏好被查出來，被幹部們捆綁起來批鬥。我的一個遠在陽朔的叔叔是大隊幹部，參加縣裏的四級幹部會，因完不成上面規定的糧食產量任務，被誣為“瞞產”而遭到批鬥。我聽後心裏十分難受，心想怎麼會出現如此局面呢？難道社會主義就是這樣的嗎？

一九五九年的冬天和一九六〇年的春天，全廣西各地都在開展反瞞產運動。上級壓下來的高指標，各隊必須完成，否則就是隱瞞產量，生產隊的幹部就要被批鬥，有的甚至被捆綁吊打，把產量按上級的要求申報了，就過關了。如此的虛假產量能不害死人嗎？

聽到這一切，我的腦子裏茫然了。怎麼我們在學校時領導上給我們說的是全國形勢一片大好，而現實中卻是農民沒有飯吃，一些幹部和群眾還要挨鬥，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春節期間我們沒有去走親戚拜年，家裏也少有客人來。只有姐姐帶著小外甥回來了。姐姐不是外人，雖然生活清苦，一家人春節團聚，也增加一絲快意。

春節後不久我就返回學校。這是我四年來的最後一個學期了，我必須集中精力努力的學習，排除種種不愉快的見聞，完成最後的學業。

一九六〇年的四月中旬，我們畢業班開始畢業實習了。我和班上的二十多名同學被分配到二七三地質隊實習，二七三隊在貴縣（現在的貴港市），開始我被分配在鐵礦普查組工作，任務是沿貴縣至黎塘沿線鬱江組地層中尋找鐵礦，為貴縣鋼鐵廠找到可供冶煉的富鐵礦石。我們在鐵路邊的山坡中尋找，都沒有找到含鐵高的富礦層；我們也爬到了鎮龍山上，這裏有較多的黃鐵礦和毒砂礦，有地方鄉鎮企業組織農民在此開礦。這些農民工穿著破爛，硫、砷都是有毒的東西，開礦的民工沒有任何勞動保護，飲食又特別差，民工們面黃肌瘦的，有的人眉毛都掉光了，樣子十分可憐。

在沿線的農村，我看到許多村莊都是冷冷清清的，人們都顯得無精打采。顯然這一帶是嚴重缺糧。我們雖然每月有三十五斤糧食，飯是夠吃的了，但副食品供應太差，也感到十分不是滋味。到黎塘鎮後，我們用地質隊的介紹信到供銷社聯繫，供銷社也只供給我們一些玉米餅，別的一概沒有。在那個年代，玉米餅可是上等之物了，也只有我們才能買到，農民是不可能買到的。拿著這些玉米餅，回到住地後，晚上我們就分了一些給住家的房東，他們可是高興極了，萬分的感謝我們。我們只能給這一家，還有村上的眾多家誰來照顧他們呢？想到這些，心裏十分難受。

一個月後，我和幾個同學被調到了平南普查組。這是我第二次到平南了。回想一九五八年在平南檢查礦點時的所見所聞，至今尤在腦海中時時浮現。而今再次重返平南，怎不令人感慨呢？

此次到平南的主要任務是進行砂礦的普查，地點就是沿大新到古和至六陳一帶的山間平地中。舊地重遊，當年千軍萬馬大煉鋼鐵的景象是沒有了，只見那些小高爐的殘骸尚在，當年所燒出的結鐵尚堆在地上，是根本不能用的廢物。當年的民工們放開肚皮吃飯，而今是每人每天只有半斤不到的糧食，還要勞動，他們是如何生活呢？

到處都是面黃肌瘦的農民，無精打采的，毫無生氣，勞動起來慢慢的蠕動，完全沒有了往日的幹勁。許多人是挖野菜，野山芋充饑，大新、古和、六陳等地農村中都有不少人得浮腫病。農村中一片荒涼的世界，少有人走動，偶爾只有幾聲犬吠罷了。看到這一次，好不使人心痛。

六月底我們的實習結束，回到了學校，從七月初開始進行畢業前的個人總結，七月底畢業分配。

我被留在學校從事教學工作，下學期就要走上講臺上課，放假期間必須很好的準備。八月份學校就給二十多名留校人員發工資了，第一次領到工資，心裏自然是十分高興的。

九月初開學上課了，我擔任五八級地質專業兩個班古生物、地史的教學。第一次走上講臺，心裏是緊張的，但上課的結果同學們還是歡迎的，我與同學們相處得較好。此時正是國家經濟困難時期，學校每週都安排一定的時間從事勞動，主要是開荒種地，以圖增加蔬菜、雜糧，補充國家供應的不足。我們教研組也種了幾塊菜地，下班後許多時間都要去淋水、施肥。

上課兩個多月後，學校就組織一些班級的學生到龍勝縣去摘茶果。龍勝是個山區，茶果多，大概因為當地農民要修水利，缺糧使許多人生病，勞動力缺乏，桂林市就組織不少學校的師生前往支援。摘到茶果後，榨出茶油來學校也可以得到一部分，這在那個困難的年代可是雪中送炭了。我雖然留在學校編寫教材沒有去，但不時也要搞些勞動。後來聽回來的師生們說，這次去勞動是十分艱苦的，生活條件差，摘茶果爬山消耗的體力大。當地農民缺少吃的，他們更沒有體力去收茶果，如果我們不去，許多茶果就只好丟在山上了。

由於糧食供應困難，我們的口糧標準也一減再減，從原來的每月每人三十三斤，減到三十斤，現在又減到二十七斤，加上肉類和副食品供應少，許多教職工和學生就因此而缺乏營養，不少人患了營養不良症，有的甚至得浮腫病，我們教研組就有三個教師得浮腫病。全校有近

三百人得浮腫病。像我們這樣的單位都出現如此情況，農村中就可想而知了。為了解決這些困難，學校一方面向市裏申請一些豆類和副食品的支援，另一方面組織部分教職工專門負責養雞、養兔子、養小球藻，企圖改善師生們的伙食，以減少浮腫病人的出現。

一個學期就這樣過去了。寒假我回家，與家人團聚過春節。這時家鄉的糧荒越來越嚴重了，集體食堂解散了，各家各戶重新開伙，但每人一天只有半斤米，許多人就全靠雜糧和野山芋配合充饑。過年了更是一片靜寂，沒有一點生氣。我們這個小小的山村只有一百多人口，竟有幾十人得浮腫病，其中有藍耀甫、藍耀德、藍老榮等數人已因浮腫病而死去了。母親告訴我，我們大隊許多人去修平口水庫、謝家水庫，勞動強度大，又缺少吃的，一些人在工地上就餓死了，一些人在回來的路上，走不動了，半路上倒下就死了，我們大隊的鐘天發、潘文茂等人就是這樣餓死的。多麼悲慘的情景，“路有餓死骨”，我聽到這些心裏實在不好受，母親還說到我家的一個堂弟，只有十歲，因饑餓難耐，一次大人們尚未回家，他把蒸好的本不屬於他的那一盅飯也吃掉了，等大人們做事回來就沒有吃的了，為此遭到了她母親的一頓暴打。誰會這麼打自己的孩子呢？聽母親說到這些，我沉默不語，沉入悲痛的冥想之中……不是說大躍進取得了偉大的成績麼，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怎麼會使人沒有飯吃呢？

春節是過得很不愉快的，但我們家因為有父親和我在外面工作，沒法使家裏增加了些糧食和副食品，總算不致於餓死。不久我就回學校了。

新學期開始後，我被安排到野外隊帶學生實習。這在當時來說可算是個好差使，到野外不但每月有十五元（當時可是夠一個月的伙食費了）的津貼補助，而且糧食定量每月可增加至四十斤，實在是一個美差。我們是帶學生到栗木錫礦實習，協助二七〇隊完成一定的生產任務。到野外師生們情緒好多了，吃食比學校增加了，野外心情特別好，大家都很高興。我見到礦山的工人們生活還過得去，下井的工人還可享

受到營養餐，我們跟著下井也有這種待遇。但礦山附近的農村就差多了，聽說有不少農民得浮腫病，出現不正常死亡的情況。難怪在礦山經常可見一些衣服襤襯的農民（特別是老人和小孩）在這裏乞討。如果生活好過有誰會出來要飯呢？

從一九五九後冬以來，特別是一九六〇年期間，不但我所見到地方有饑荒，出現餓死人現象，聽說全國許多地方都出現類似的情況。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二年春，是全國大饑荒的時期，當年各級黨的領導人說是三年困難時期。造成這種困難，這些領導人和當時的報紙、廣播都說，一是由於天災；二是由於蘇聯逼債；三是少數幹部瞎指揮，刮共產風。黨的領導幹部向我們作報告就是這麼說的。要我們相信黨的領導，一定能克服這臨時的困難；要樹立堅定的信心，跟黨走，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定能實現的。我的心中雖然有疑問，也只能聽黨的話了。

隨著各級黨的官員和媒體的如此宣傳，此時的政策也做了某些調整，如允許農民有自留地、自留田，允許農民種養搞副業，農民生產的農副產品也可以拿到自由市場去賣。這一政策推行的結果，從一九六一年春以後，市面上慢慢有些東西賣了，雖然價格昂貴，但人世間顯得有一些生氣了，確是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

三

這就是我所見到的大躍進和隨後發生的大饑荒。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段苦難的歲月。

大躍進有多少人去大辦鋼鐵，有多少人去大修水利，特別是大饑荒的年代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毛澤東在世時，是從未向世人公佈的，剝奪了人們的知情權。

四十多年過去了，現在的事情都清楚了，這一切都是毛澤東所造成的，是毛澤東獨裁專制造成的惡果。且不論毛澤東當時的主觀願望如何，他的共產主義怪論，他的種種倒行逆施，把中國人民推向了苦難的深淵卻是鐵一般的事實。對於造成如此的大饑荒，當時他們解析說是

因為天災，因為蘇修逼債，這完全是在騙人。現在有人統計了當時全國的氣象資料，一九五八年是好年景，其後幾年也屬正常年景，並無特大的自然災害。而蘇修逼債也根本無此事，是毛澤東為了批判所謂“蘇修”，強裝面子，主動要把蘇聯的債務還清（即使還這點債也不致於餓死人）。大饑荒的真正原因就是人禍，是毛澤東這個天字第一號人物造成的。

有學者估計，三年大饑荒，全國大約有三千多萬人被餓死，幾乎接近八年抗戰死亡的人數。這是一段多麼悲慘的歷史。號稱代表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共產黨和他的領導人毛澤東，他所製造的謊言和種種荒唐之事，使人民深受其害，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許多公開出版的資料披露了大躍進和大饑荒的具體事實。我翻閱了八十年代以來出版的廣西所有各縣的縣誌，其中有些縣誌在數字上說了真話，公佈了大躍進和大饑荒的具體數字。現就一些縣的縣誌所統計的資料記述如後，僅從這些記載人們足可以透視廣西乃至全中國大躍進和大饑荒的真實情況了。

平樂縣：一九五八年七月平口水庫開工，數萬人投入水庫工地；八月至十月，全民大辦鋼鐵，全縣八萬多人投入挖礦煉鐵、砍樹燒炭。一九六〇年元月至四月中旬，全縣發生營養性缺乏而患浮腫病人一萬三千多人，出現嚴重的非正常死人情況（死人數位未公佈，估計在千人以上）。

臨桂縣：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起，組織三萬五千人大辦鋼鐵，十月中旬增至十八萬人，至十一月中旬，在十三個“鋼鐵基地”建成土高爐三千多座，燒去木炭二萬六千三百噸，木柴六十萬立方米，拆毀民房一千三百八十間。十月二十日，數萬民工組成四個民兵師興修青獅潭水庫。

一九六〇年春、夏，農村中因缺糧發生浮腫病，婦女子宮下垂，兒童營養不良等嚴重疾病，當年出現死亡人數一萬五千八百人（含靈川

縣)。

資源縣：一九五八年一萬多人大辦鋼鐵，各村寨風景樹幾乎都被砍光。

一九六〇年全縣共餓死四千二百餘人，皆因高指標、高徵購、反瞞產等錯誤政策所致。

忻城縣：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縣委決定抽一百一十四名幹部，民工一萬零四百四十一人，支援南丹縣砍樹燒木炭煉鐵。十月十一日，全縣抽調七萬多民工到紅渡挖煤，十四日向上級報捷，以十九小時產煤六十七萬一千噸，放了所謂“煤炭衛星”，二十七日，再放一顆一百一十萬三千五百噸的“煤炭衛星”，十一月八日，又抽調五千多人上山砍樹燒炭。

一九六一年因缺糧，全縣餓死二千一百九十一人。

河池市（原河池縣）：一九五八年八月開始大辦鋼鐵，全市投入七萬三千人。

一九五九年全市正常和非正常死亡人數五千五百三十二人，一九六一年浮腫病人達兩萬，相當數量的浮腫病人死亡。

柳江縣：一九五八年大辦鋼鐵時，男女老少齊上陣，到處搞煉鋼煉鐵，建小高爐，到處大砍大伐樹木。九月二十三日，抽調一萬七千個勞動力到鹿寨英山支援該縣大煉鋼鐵，另抽六千五百人到宜山修龍江河水利。

一九六〇年一萬六千人害浮腫病，死亡率從一九五九年的百分之十一點八上升到百分之十三點九六，一九六一年達到百分之十六點六二。

都安縣：一九五八年九月開始，十萬人上山砍樹燒炭、挖礦大辦鋼鐵，十月，六萬多人開赴馬山，支援該縣大辦鋼鐵。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全縣開展糧食核產和“反瞞產私分”運動，使農民嚴重缺糧。一九六一年全縣發現浮腫病人五萬八千九百三十八人，出現餓死人現象（未列數字）。

橫縣：一九五八年九月開始大辦鋼鐵，歷時三個月，先後調動二四萬多人，組成十一個鋼鐵野戰兵團，大搞土高爐，砍樹燒炭，共砍樹四十二萬方，燒炭十萬噸。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全縣一萬多民兵，前往上思縣支援興建那板水庫，歷時一年。

一九六〇年因缺糧，患浮腫病二萬一千多人，餓死四千八百人。

武鳴縣：一九五八年八月，全縣實行軍事化，成立鋼鐵兵團、水利兵團、農業後方兵團，大辦鋼鐵，大修水利。僅小陸煉鐵基地就有四千多人上大明山砍樹燒炭，共砍木材一百四十多萬方。

由於大辦鋼鐵、水利，全縣糧食總產量只有七千四百四十萬公斤，比一九五七年減產二千一百七十三萬五千公斤，下降百分之二十九點二。一九六一年底，全縣有二千八百五十人餓死。

上林縣：一九五八年十二萬多人上山挖礦、砍樹燒炭來辦鋼鐵；一九六一年因缺糧餓死二千多人。

田東縣：一九五八年二萬六千多人大搞鋼鐵。由於搞大躍進和反瞞產私分運動，使農民嚴重缺糧，一九五九年五月中旬至六月十日，全縣就發現浮腫病人三千六百四十四人；一九六一年底發現浮腫病人三萬多人，死亡四千六百十四人。

容縣：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提出“鋼鐵元帥升帳”的口號，全縣全民大搞鋼鐵，建爐群十五處，土高爐四百七十七座，小土煉鐵爐不計其數，燒炭一萬六千九百噸。

一九六〇年“反瞞產運動”，搞人人過關。至一九六一年底發現浮腫病、乾瘦病、婦女子宮脫垂病、小兒營養不良等病人九萬六千五百五十一人，死亡二萬一千九百六十七人。

德保縣：一九五八年十月，全縣組織遠征軍十個團三萬多人大修公路和水庫，其中調三個團八千多人到凌雲縣那樓鄉煉鋼鐵。

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提出畝產糧五千斤，並向七千五百斤進軍。為此，當年夏收之前，各屯將數塊已經孕穗的禾苗並到一塊田裏，謂之“衛星田”；後因通風不良和病蟲害等，造成糧食歉收，全縣只產糧

五千四百五十二萬公斤，比一九五七年少百分之五點一七。農民因缺糧，從一九五九年一月至一九六一年間，餓死六千三百二十八人。

貴港市（原貴縣）：一九五八年六月起掀起大躍進熱潮。夏收後開展反瞞產運動。九月底起大搞鋼鐵，歷時三個月，先後調動四十六萬多人次，成立六個民兵團，八個生產鋼鐵基地，建土高爐一萬六千三百零七個，燒木炭二萬四千零三十六噸二百公斤。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二日，提出“實現水稻畝產四萬斤口號”。

一九六〇年三月至七月，因缺糧發現水腫病人二萬三千零二十二人，一九六一年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九人非正常死亡。

蒼梧縣：一九五八年六月掀起大躍進，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二十五日，全縣成立九個人民公社。八月至十一月大辦鋼鐵，投入十六萬三千一百零五人，共煉出鐵一千四百八十五噸，燒結鐵六萬九千七百二十一噸，辦食堂二千一百零八個，年底二萬多人興修水利。

一九五九年四月，全縣四級幹部會，開展“反瞞產”運動。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的浮誇風，所謂“萬斤畝”都是假的，如一九五九年全縣實際稻穀總產量一萬一千六百二十噸一百四十公斤，畝產三百零三公斤，而上報畝產五百五十二公斤半，一九六〇年口糧減到一百四十七公斤。因缺糧造成六萬多人得營養不良和浮腫病，死亡二萬六千零五十七人。

昭平縣：一九五八年六月至九月，全縣實現公社化，大辦集體食堂。九月起，十多萬人大搞鋼鐵。

一九六〇年，因饑餓患病人數達十多萬人，年末死亡八千一百四十六人，人口比上年下降百分之十四點六六。

合浦縣：一九五八年八月成立十四個人民公社，全部實行軍事化管理，集中食堂開飯，一日三餐乾飯，無償平調社員生產、生活資料，造成極大浪費。九月起七萬多人投入深耕改土，十二萬三千人上山開礦、砍樹燒炭，大辦鋼鐵。一九五九年二月起，因缺糧開始出現浮腫病人，至九月病人達四千多人。一九六〇年一月上水利工地二十一萬人，

春、夏間浮腫病人有八千六百人死亡，縣委第一書記被撤職。

上思縣：一九五八年九月實現公社化，吃飯不要錢，辦食堂九百五十五個。從九月起大辦鋼鐵，一萬三千人挖礦煉鐵；十月起另組織二萬五千人上山砍樹燒炭，共砍伐木材十萬方，放了一顆砍伐木材“衛星”。

一九五九年三月開展“反瞞產”運動。至一九六一年因物資奇缺，農民挖山薯、蕨根、芭蕉根等充饑。因缺營養，引起浮腫病增多，死亡三千三百八十一人。

無須再舉了。全廣西乃至全中國絕對是如此。神州蕭瑟，餓殍遍野，許多人被活活餓死，有的甚至全家死絕，是人世間少有的慘劇。

四

事實充分說明，一九五八年的所謂大躍進完全是謊言，是毛澤東發號召，全國跟著說空話、假話；而由此引發的大放各種“衛星”，更是荒唐、愚昧。大煉鋼鐵是百分之百的勞民傷財，得不償失。人民公社化、軍事化組織完全是把農民當農奴，剝奪人的自由和尊嚴，是地地道道的封建法西斯專政。這種種倒行逆施所造成的災難，已經永遠載入史冊，中華民族世世代代都不會遺忘。

對於當年大躍進和大饑荒之事，當今的人們（尤其是年青人）千萬不要以為那是天方夜譚，滑稽可笑；或者認為未必有如此嚴重，這都不是對待歷史的正確態度。大躍進的種種胡作非為，造成了數千萬的中國人死於非命，這是血淋淋的鐵一般的事實。牢記歷史，拒絕謊言。要認真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從根本制度上深化改革，建立真正的民主自由的法治社會，才是正確的態度。如果任其獨裁專制繼續下去，類似大躍進、大饑荒和文革一類的災難就有可能在中國重演。

猛醒吧！勤勞、樸實的中華民族。面對獨裁專制，應該去掉自身的奴性，多一些勇敢的抗爭。

後記

我親歷了廣西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

在廣西，特別是在桂林，“文革”的發生、發展、演變；兩派的產生及其相互間的武鬥，韋國清支一派壓一派，調動部隊和農民進城鎮壓造反派、大屠殺；這一切都是我耳聞目睹，身臨其境的。

“文革”的結束雖然過去近三十年了，但，當時的許多事件尚歷歷在目，特別是大屠殺之事至今尤令人不解，難以忘懷；許多問題至今想來仍在發人深省……。

（一）我為什麼會成為“文革”中的造反派

“文革”前我是個不太過問政治，只管讀書和工作的所謂“只專不紅”的人。其實不太過問政治，也不盡然。對現實的不滿，對單位領導的官僚主義和不民主作風是很有看法的。只是在那個“黨委書記就是黨”的年代裏，人們雖有諸多不滿，卻是敢怒不敢言，生怕被扣上“反黨”的罪名而被打入另冊遭到迫害，只好不過問政治了。

“文革”中我和我的學生和同事們為什麼又會成為激進的造反派呢？可以說是那個時代的一種巧合，是我們這群年青人的激進思想，是我們對現實的不滿、對單位領導的不滿與毛澤東為了搞掉劉少奇一批高層領導人而號召人們起來“造反”的巧合。平時我們這些人沒有說話的機會，沒有發洩不滿的時機；“文革”開始了，是毛澤東給了我們這樣的機會。毛澤東發動批判《海瑞罷官》、批“三家村”和批“四家店”，毛澤東主持制定“五·一六”通知，毛澤東支持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多次接見百萬師生……所有這一切都極大地激發起我們敢於造反的決心和勇氣。毛澤東號召全國人民“對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

受，而應當堅決抵制”，這對我們有巨大的影響。我們這一群激進而又天真的青年人，在毛澤東這些思想的激發下，成為“文革”中的造反派也就順理成章了。

“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成了那個時代最響亮的口號，成了許多青年人追求的目標。當時所有的宣傳工具，都在毛澤東的指令下，發表大量指導運動的社論和批判文章，號召人們起來“造走資派的反”，“造修正主義的反”，“打倒中國的赫魯雪夫”，“破四舊、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所有這一切，激發和指導著我們投入到“文革”的洪流中去。

在桂林，一大批優秀的青年學生，如劉振林、周兆祥、李日明、謝榮傑、廖祖亮、王宗器、吳虹、蔣建榮、馮志華、覃瑞環、劉炳然、黃可非……以及青年教師楊福庭、潘國球、蒙木生、林明靜等許多人，甚至連老共產黨員教師楊正文，老教師、歸國華僑韓卓元都成了桂林的首批造反派（即後來的桂林“老多”）。他們響應毛澤東“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號召，組織和領導群眾寫大字報，貼大標語，印發傳單，幾乎是日夜奔忙。為保衛毛澤東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英勇奮鬥。是那個瘋狂的年代把我們這群青年人推上了政治的歷史舞臺，成了一時的風雲人物。而這一切正是按照毛澤東的教導行事的，毛澤東那時成了我們的“紅司令”，我們是他忠實的衛兵——一群充滿激情和幻想、一群可愛的青年人。

（二）桂林“老多”是一支優秀的隊伍

桂林“老多”本是廣西師範學院（現在的廣西師範大學）內的“多數派”。“文革”一開始，他們就反對廣西區黨委派出的“文革”工作隊和本單位的領導，並在鬥爭中逐步發展壯大；不久桂林市所有大中學校的師生幾乎都參加到這個隊伍中來了。緊接著全市大多數工廠和單位的人員也多數支援這支隊伍。就連他們原來要打倒的馮邦瑞市長和廣西區

黨委文教書記伍晉南和賀希明、傅雨田等領導人後來也支持這支隊伍了。可見這支隊伍在桂林以至在廣西影響之大，在全國也是一支有名的造反派隊伍。一九六七年春，部隊介入地方“支左”後，駐桂六九五五部隊支持這支隊伍，《光明日報》和新華社也曾報導過這支隊伍的事蹟；一九六七年周恩來總理在接見廣西兩派代表時曾幾次稱讚過這支隊伍。這支隊伍是深得老百姓支持和好評的。不論在什麼時候，從什麼角度來看，都可以說是一支守紀律而又文明之師。

當然，在那個特定的年代裏，他們必然也會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如喊過一些過激的口號，出現過一些過激的行為，給桂林市委文教書記徐為楷甚至給廣西區黨委書記韋國清戴高帽遊街等等。這也是那個時代造成的，是毛澤東的路線造成的，這群天真的青年人是不應承擔什麼責任的。因為他們並沒有違法亂紀，更沒有打人、殺人。

這支造反派隊伍也有別於外省市的造反派，如上海的造反派有張春橋、姚文元甚至毛澤東的直接支援，被利用作奪權工具而打倒曹荻秋和陳丕顯；北京的造反派則得到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的支持，得到毛澤東的贊許，被利用來打倒劉少奇等一批高層領導人。而桂林“老多”以至廣西“四·二二”，他們的所為除了迎合毛澤東當時的所謂“革命路線”，得到當時《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發表的社論和文章思想的支持外，並未得到當時掌握實際大權人物的支持，因而他們一直都是處於受壓制和受打擊的處境，尤以各縣的造反派所受的壓制和打擊更為慘重。

至於一九六八年五月以後，桂林“老多”和南寧、柳州“四·二二”派也搶佔據點、搶奪軍隊的武器以至發生武鬥，這完全是韋國清和“聯指”頭頭們逼出來的。因為是“聯指”派搶佔據點和搶奪軍隊的武器在先，而且從一九六八年初以來，除南寧、柳州、桂林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尚存在外，廣西各地、縣的造反派（“四·二二”）都遭到了“聯指”派的圍剿和迫害，組織被打垮，一些人被抓、甚至被殺害，一些人則跑到南寧、柳州、桂林等城市逃生。這是韋國清及“聯指”高參們有

計劃、有預謀消滅“四·二二”建立革委會而實施的步驟。從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韋國清及廣西軍區交出檢查，中央關於解決廣西問題的決定下達後，韋國清及“聯指”高參們就著手實施這一報復計劃了。。

(三) 廣西大屠殺是韋國清造成的

韋國清等人在“文革”初期受到衝擊，被戴高帽遊街批鬥，由此他對造反派是極為惱恨的。雖然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他向中央交出了檢討，承認在“文革”中支一派壓一派，挑動群眾鬥群眾，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並反復說向毛主席請罪，向造反派賠禮道歉，但他的內心是極不情願的。後來的事態發展完全證明他是虛偽的，是他用緩兵之計以便日後報復的一種策略而已。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廣西兩派赴京代表在中央的主持下達成了大聯合的協定，以韋國清為首的“區革籌”同時成立。在此基礎上，如果韋國清能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對待兩派一碗水端平，耐心地做好兩派的工作，廣西決不會發生大規模武鬥，更不會出現大屠殺。但韋國清及廣西各級仍在掌握大權的領導人，他們仍在繼續堅持支一派壓一派，對造反派恨得要命，必欲置之於死地而後快。對站出來亮相支持造反派的幹部，被他們誣衊為“野心家、陰謀家、妄圖向無產階級奪權”，必須把他們堅決打倒。

從一九六八年初以來，韋國清等人就縱容“聯指”派在各地尋釁滋事，借機打壓各地的“四·二二”。他們製造輿論，誣稱“四·二二”派是“反革命”、“反共救國團”、“國民黨殘渣餘孽”。在各地軍分區和人武部組織下，調動民兵和“聯指”圍剿各地的“四·二二”，抓人、殺人，把各地的“四·二二”打垮。一些幸免於難的人員逃到南寧、柳州、桂林這三座城市後，他們又縱容“聯指”在這三座城市搶先佔領據點，奪軍隊的武器，以此來刺激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被迫自衛而發生武鬥，他們就可以堂而皇之地進行圍剿了。事態的發展完全是按韋國清及“聯指”高參們的設計進行的。

他們對中央謠報軍情，對下發動宣傳攻勢，製造輿論，說什麼“三點一線”（南寧、柳州、桂林三市為三點，湘桂鐵路為一線）是“伍修集團的最後堡壘”，是“反革命份子、反共救國團、國民黨桂系殘渣餘孽、叛徒、特務、死不改悔走資派及地、富、反、壞、右分子的集聚地”，“他們要奪無產階級的權，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決徹底地消滅他們”。不但在輿論上大放厥詞，蠱惑人心，而且以政府的名義（“區革籌”就是當時執掌大權的政府）、以廣西軍區的名義發佈《六·一七公告》，在全廣西掀起大揪“反共救國團”的高潮。同時又妄報軍情，欺騙中央，使中央發出了《七·三佈告》（一個錯誤的佈告）。其後桂林市又發出《八·二〇公告》。正是這些《佈告》和《公告》對全廣西的亂殺人起到了推波助浪的作用；韋國清和“聯指”高參們也是利用這些《公告》、《佈告》來達到消滅“四·二二”和桂林“老多”的罪惡目的。他們利用《公告》、《佈告》，在各地大飈十二級颱風，製造白色恐怖，大抓、大捕、亂打人、亂殺人，無惡不作，殘忍至極。一九六八年的七、八、九三個月正是血雨腥風、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時期，是人類歷史進程中極為少見的慘劇。

對桂林問題的最後解決，雖不像南寧、柳州那樣是由部隊和“聯指”武鬥人員強行圍攻打下的，但桂林“老多”的結局仍然是悲慘的。

《七·三佈告》下來後，桂林“老多”已經主動撤除據點，主動繳還部隊的武器，但桂林地、市革委及桂林軍分區在韋國清的指令下，不但不叫“聯指”繳槍，反而把他們改編成“工人糾察隊”和“工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全副武裝到“老多”佔領地區來抓人、打人、殺人。就以《七·三佈告》而言，雖是一個錯誤的佈告，但《佈告》中指出的“兩派組織中的壞人，由兩派群眾自己清理”則是正確的，韋國清為什麼就不執行呢？韋國清及廣西軍區某些負責人不顧黨紀國法，毫無人性地組織一派群眾來鎮壓另一派群眾，事實說明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劊子手，一個獨裁者、報復狂、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暴君。

(四) 發人深省的聯想

“文革”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浩劫，一場人世間空前的大災難。就全國而言，這個責任當然是由毛澤東和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人來負的，他們是歷史的罪人。然而在廣西，廣西的“文革”在全國似有特殊之處，造反派沒有得到過“文革”領導人江青、陳伯達等人的支持，也從未掌握過廣西的大權；相反，“聯指”派卻自始至終得到韋國清及各級當權者的支持，甚至得到黃永勝、林彪等人的支援，最終把造反派組織徹底搞垮，許多人被殺害，這在全國來說是極為少見的。

人們怎麼也不會想到，至今也仍然想不通，廣西的“文革”會是這麼一種結局：“四·二二”和桂林“老多”組織被壓垮，無數的人被抓、被打、被關押，活生生的生命隨意被處死，人世間怎會有如此草菅人命的事情呢？十多萬的生靈死於非命，靜默地想來，許許多多的問題確實是值得世人認真反思和總結的。

(一) 桂林“老多”和廣西“四·二二”的組織中確有一批優秀的人才，他們站在了時代的前列，對當時廣西出現的問題有敏銳的觀察和透析能力，能夠透過現象看到本質的問題。早在一九六八年初他們就透過各地“四·二二”受迫害和打擊的現象看到了廣西問題的癥結所在，看到了韋國清、廣西軍區及各地的掌權者在放縱或支持“聯指”派的胡作非為。對此，當時他們曾就此問題發表聲明和文章，批評各地的革委會是“派委會”，一針見血的指出區革籌和廣西軍區的《六·一七公告》是搞政治陷害，打著貫徹、落實《六·一七公告》和《七·三佈告》的旗號，目的是為了消滅“老多”和“四·二二”；指出當時的《廣西日報》實際上成了一張“聯指”報，為廣西的大屠殺起到了推波助浪的惡劣作用。無疑這些看法都是正確的，經過時間的考驗，到了現在來看，也仍然是正確的。如果韋國清和廣西軍區負責人當時能聽取這些意見，能出以公心耐心做兩派的工作，能有一絲法制的觀念，採取一定的措施，就決不會有後來的亂抓、亂打、亂殺人的慘劇出現。以政權機關（“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就是當時廣西的最高權力機關）出面公開支持一派的胡

作非為，公開發公告，誣陷另一派群眾組織是“反動組織”，從而導致其後的大屠殺，這在全國是絕無僅有的。廣西文革的歷史確實值得世人反思，值得研究。

(二)“文革”中的兩派都有派性，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隨意殺人就遠遠超出派性的範圍了。廣西大屠殺絕不是用派性所能掩蓋的。“派性”與“殺人”是決不能混淆的兩個概念。無數的事實證明，大屠殺完全是有組織、有計劃進行的，是幕後組織者、操縱者們利用派性，把派性變成了毀滅同類的獸性。沒有韋國清們製造的鎮壓理論，沒有各級當權者及“聯指”頭頭們的指揮或授意，殺人之事是絕不可能出現的。事實說明大屠殺是一種政府行為，個別地方至少也可以說是政府不作為的結果，同樣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處遺”為什麼不能完全依法辦事呢？

(三)對於十多萬的無辜慘死者，事實證明他們全都是無罪遭誅的；“四·二二”和桂林“老多”組織的背後根本沒有黑手在操縱指揮，他們更不是“反革命”、“反共救國團”。相反，那些殺人兇手，“聯指”派的背後卻有韋國清及各級大小當權派這些“紅手”們在支援、操縱、甚至直接指揮。毛澤東說：“對廣大人民群眾是保護還是鎮壓，這是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對於這些殺人兇手及其幕後指揮者、策劃者，他們到底是什麼人，人們不是很清楚了嗎？

(四)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的傳統。然而在廣西，這個傳統被徹底地破壞了。十多萬的生靈慘遭屠殺，在“文革”結束後，因為韋國清及他的殘餘勢力仍在廣西當政，事情本來就是他們搞起來的，要他們自己來處理自己是不可能的。嗣後，韋國清升遷了，他的繼承者們當政，也同樣遲遲未作處理。只是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在各方的強烈要求下，在中央的干預下，才在形式上作了“處遺”工作，卻是走過場的表面文章而已。因為絕大多數的殺人兇手及其幕後策劃者、指揮者都沒有受到法律的追究，有的甚至還得到提拔重用、參軍提幹。在當今的中國有如此怪事，實在是讓世人不可理喻和

無法容忍的。

(五)一九六八年廣西的大屠殺，追溯到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初的七、八兩月，北京所謂的“紅色恐怖”時期就有一千多人被打死或被逼至死，死者中包括北京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在內的一批中、小學教師。打人兇手主要是十多歲的男女中學生，他們用帶鐵釘的木棍、用帶銅扣的皮帶打人取樂。這同廣西的殺人兇手一樣，用木棍和石頭砸人的腦袋，使其血肉橫飛，腦漿四射，而達到刺激取樂的目的。這不能不使人想到，中國人怎麼了？這個民族不存在問題麼？中國人的劣根性，被扭曲了的心靈，在一個獨裁專制的社會裏，違法亂紀、喪盡天良之事，在一定的氣候條件下是必然會產生的。我們不值得反思這個民族，反思這段歷史麼？那麼，認真總結這段悲慘的歷史教訓，就顯得十分必要了。

早就想寫一點關於廣西“文革”的東西，記述那個瘋狂年代所發生的一切，但由於諸多原因始終未能如願。“文革”中的許多事件至今還歷歷在目，許多被抓、被打、被慘殺的人（其中包括我的同事、學生和親屬），他們生前的音容笑貌，他們被打、被殘殺的慘狀，至今尤在我的腦海中時時浮現，使我頓感悲傷和無比的憤怒。所有這一切，都在激勵著我要把當年之事記述下來，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無數冤魂。

現在，文章雖然寫成了，但限於自己的水準，特別是許多資料無法收集到，所以寫出的東西是很不全面的，文筆也十分粗淺，但這些都是真實的東西，作為留給世人的資料，作為後來的人要瞭解當年的文化大革命，似可作為參考吧！我期待著有更多的人能把“文革”之事寫出來。

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過不少朋友提供資料，也參考了有關文革的出版物，特別是查閱了廣西各市、縣的地方誌、獲得了不少寶貴的資料，使本書增色不少。在此，筆者對引用的資料不再一一列出，敬請原諒。並向提供資料的朋友們和有關出版物的作者們表示衷心的感

謝！

“文革”的結束已經三十年了，被殺害的人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寧多年了，當年受到迫害和打擊的人許多也已作古；就是當年的殺人者和幕後策劃者也有不少自然死亡了。今天重提“文革”中殺人之事，並非在追查什麼兇手，也不希望他們的後人冤冤相報，而是要總結那個時代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以給後來的人們作為借鑒。因為文化大革命是中國當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一場大災難、大浩劫；它踐踏了人的生存權，踐踏了民主和法制，也把中國的經濟引入崩潰。這場災難從反面喚醒了中國人民：要使文化大革命和形形色色的政治大災難不致在中國重演，惟有國人起來認真地總結經驗教訓，起來清算它的罪行才能做到前車之鑒，後事之師的。

在時下之中國，面對日甚一日的環境污染、觸目驚心的貪汙受賄；面對腐敗的橫行蔓延、治安惡化、世風日下；面對惡性事故的頻發、公檢法司執法犯法、黑社會甚囂塵上、官吏們冷漠無能、特權階層肆無忌憚……所有這一切，國人看在眼裏，急在心尖，罵在口中。國人惟有百倍的努力，執政黨惟有對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革，一個高度民主和自由，一個法制健全的民主國家才能屹立於世界的東方。

與世界接軌，中國的未來是光明的。

作者
二〇〇四年二月

後記二

本書寫成之後，一些朋友又陸續向我介紹了廣西一些地方文革中的殺人事件，我自己又再次查閱了一些縣、市的文革檔案資料，訪問了一些受迫害未死的文革幸存者，從中獲得了許多寶貴的資料。每當聽到這許許多多的殺人慘案，我的內心裏總是充滿了對兇手們的無比憎恨和對無辜慘死者無限的悲痛與同情。當我訪問一些從死亡中走出來的幸存者時，談到他們親歷的殺人慘狀，他們都會泣不成聲，久久地說不出話來，我也只好暫停訪問，與他們一道沉入無限的悲憤之中。這一切都在催促著我，必須要把這些記錄下來，寫到書中去。為此我又再次對此書進行了補充和修改，想使它成為一本內容更充實、更能反映當時實況的書。

一九六八年的廣西大屠殺確是太慘了。那些許許多多的殺人慘況用語言是難於完全表達出來的。當年的兇手們隨意抓人、打人、殺人，用木棍打、石頭砸、用刀捅、丟下水溺死、生埋活人、生割活人、挖心肝、五馬分屍……，歷代以來的酷刑幾乎都用上了。進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人類社會早就步入文明時代了，怎麼還會出現“返古”現象回到原始社會的野蠻時代呢？

文革中許許多多的現象和問題是值得世人總結、研究和反思的。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永遠都不致再重演文革的歷史悲劇，我們必須要研究文革的歷史，必須要反思文革的問題。

文革中要反思的問題當然很多，但我以為首先值得反思的是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這個民族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自有歷史記載以來，我們民族中的許多優秀分子都是功載史冊的。這個民族的許多優良傳統都是為世人稱讚的。這個民族在歷史的發展中曾作出過巨大的貢獻。這些都是我們引以為自豪的。然而，我們這個民族（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

人）也有醜惡的一面，存在著醜陋、愚昧和兇殘的一面，也就是這個民族“劣根性”的表現。如不正視這一面，那對我們這個民族將是貽害無窮的。

古代和中世紀的事太遙遠了，我們暫且不論；就以近代和現代而言，愚昧無知、兇狠殘忍、濫殺無辜之事是時有發生的。早年的義和拳、其後的土改鬥地主，文革中的亂殺人，都是人們記憶猶新的。就從這些開始反思，於我們這個民族是大為有益的。

回首二十世紀之開初，一九〇〇年的拳匪暴亂，那些愚昧無知、生性殘忍的暴民，他們視現代的文明為“妖孽”，為此他們倒電線杆、撬鐵軌、毀教堂、殺洋毛子、殺二毛子，不論男女老少都殺無赦。真乃無法無天，毀滅文明，是我們民族的恥辱、國家的恥辱。到了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在鬧共產革命的地方，一些農民搶奪地主的錢財，殺地主，有的全家都被殺掉；等到地主們組織還鄉團打回來時，地主們也大批的殺農民，有的也全家殺絕。這種地主與農民之間的互相殘殺，使這些地方哀鴻遍野，滿目荒涼，這不是我們民族的悲哀嗎？

到了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土改鬥地主運動，同樣是奪財又要命。一些地主被槍殺，一些地主則被鬥得死去活來。我親眼目睹了一些人在鬥爭會上，把地主捆綁，然後是打、吊、上老虎凳、坐土飛機、用竹簽插入被綁住的手指間；有的長時間被放在太陽下暴曬、不給水喝、不給飯吃。人世間的種種刑法幾乎都用上了。為什麼這些人會如此殘忍呢？

到了文革期間的亂打人、亂殺人，更是與時俱進，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代。文革之初的一九六六年七、八、九三個月，在全國各地（特別是北京地區），一些十多歲的男女中學生、大學生（也有少數小學生），在瘋狂的打他們的校長、老師，打社會上的“牛鬼蛇神”，用木棍打，用皮帶抽，把人捆上放在地上拖；把人打死了還認為被打者是在“裝死”，就用開水來燙，真是殘忍至極，令人慘不忍睹。而這時的打人兇手卻在哈哈大笑，自鳴得意。為什麼會如此呢？

王友琴博士在她的《文革受難者》一書中記述了六百多位校長、教師、藝術家、學者以及所謂的“牛鬼蛇神”在文革初期慘遭殺害的真實情況。這些記述在全國眾多的死難者中雖然只是極少的一部分，但已足以讓國人震驚，讓世人憤恨和悲痛。

文革期間的廣西大屠殺，筆者在書中已有詳盡敍述，在此就不再重複了。其實不論是拳匪們的濫殺無辜，土改鬥地主、殺地主，還是文革期間的草菅人命，這些殺人兇手和被害者本無什麼深仇大恨，而是我們民族的“劣根性”，使一部分愚昧無知的人變成了兇狠和殘忍，在某種邪教文化的鼓動下必然爆發出不可抑制的瘋狂。加之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封建獨裁統治和儒家禮教傳統的毒害，使這種瘋狂更是無以復加，不可收拾。

人們會清楚的記得，文革中鼓吹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群眾專政”，號召人們要把“階級敵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鼓吹“政權就是鎮壓之權”，對“階級敵人”就是要“鎮壓”。在這種種邪惡思想的鼓動下，無怪乎十幾歲的男女學生都會成為殺人兇手。這些殺人兇手們的邏輯就是“打人越狠、殺階級敵人越多，表明自己的革命性越堅強”。邪惡的狼奶餵養了他們，使他們成了兇惡的“狼群”。豈有不殺人之“理”。

像南寧的顏景堂、廖焯雄；桂林的陳秉德、曹鐵軍、李年生；臨桂的胥明德、韋英豪；凌雲的王德堂；賓陽的王建勳、韋善強；陽朔的呂明忠、蔣彬、黎鹹稱；貴縣的覃錫明；蒙山的譚釗奇；武宣的黃培剛、王春榮；羅城的段志英、崔永祥；上思的段振邦以及各地那些許許多的殺人策劃者、指揮者和殺人的兇手們，都是一群吃狼奶長大的兇狠狼群。給這些人喂狼奶的就是韋國清和其指揮之下的《廣西日報》那些鼓動颶十二級颶風殺人的社論和文章。而提供奶源的則是最高的執政者——當代的“皇上”。認識這些，就大有利於我們對文革的總結和反思了。

人類社會已經進入到二十一世紀了，我們這個民族至今仍有人在

利用職權貪汙、受賄和腐敗；仍有人在偷盜、搶劫和殺人；仍有人在肆無忌憚地破壞環境，毀滅我們生存的家園；仍有人在麻木不仁、見死不救。所有這諸多矛盾的存在，特別是兩極分化的擴大和弱勢群體的增多，反映出我們這個國家和社會制度存在著弊端。不解決這些存在的問題，我們這個社會是很難再向前發展的。而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僅僅停留在什麼“三講教育”、“三個代表”和“以德治國”、“八榮八恥”等的宣傳，顯然是不夠的，也是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惟有在政治體制上進行徹底的改革，實現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經濟市場化；開放黨禁、報禁；尊重人權，讓人民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司法獨立，法治健全；非如此才能與世界真正的接軌。只有與世界接軌，我們這個民族，我們這個國家才能在世界這個大家庭中作出更大的貢獻。

二〇〇六年四月

主要參考文獻和資料來源

- 1、《毛主席同百萬群衆共慶文化大革命》，人民出版社出版，1966年8月。
- 2、《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訪華文章》，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71年7月。
- 3、廣西區直機關批鬥修集團大會領導小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清算修集團的反革命滔天罪行》，1968年12月。
- 4、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9月。
- 5、《中國百年大寫真》(1900~1995)，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5月。
- 6、廣西文革大事年表編寫組《廣西文革大事年表》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7月。
- 7、《紅旗》雜志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偉大的歷史文件》，1967年5月16日。
- 8、《南寧市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10月。
- 9、《桂林市志》，中華書局發行，1997年12月。
- 10、《全州縣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5月。
- 11、《玉林市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12月。
- 12、《巴馬瑤族自治縣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6月。
- 13、《上思縣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3月。
- 14、《平樂縣志》，方志出版社出版，1995年12月。
- 15、《臨桂縣志》，方志出版社出版，1996年10月。
- 16、《武宣縣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12月。
- 17、《荔浦縣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1996年3月。
- 18、《忻城縣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1月。
- 19、《柳江縣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一版。
- 20、《宜州市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6月。
- 21、《都安縣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第一版。
- 22、《賓陽縣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12月。
- 23、《武鳴縣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3月。
- 24、《上林縣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9年5月。
- 25、《樂業縣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6月。
- 26、《平果縣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12月。

- 27、《容縣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6月。
- 28、《陸川縣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8月。
- 29、《貴港市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10月。
- 30、《賀州市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第一版。
- 31、《鐘山縣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5年7月。
- 32、《浦北縣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8月
- 33、《欽州市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0年8月。
- 34、《合浦縣志》，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7月。